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

强家华

在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前夕，原中顾委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发表回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其中写道：“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他所说的“三强”，即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第二任院长钱三强。

学以致用 报效祖国

钱三强 1936 年清华大學毕业后，考取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和丈夫约里奥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伊莱娜夫妇由于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的创新性成绩，于 1935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39 年年初，伊莱娜·居里让钱三强与她一起进行一项实验，用中子轰击铀和钍，观测其产生的和镭相似的放射性元素，看它们放出的β射线能谱是否相同，以进一步验证核裂变。实验结果证明，铀和钍受中子照射后产生的镭 9 射线是相同的，就是说用不同方式裂变，可以获得同样的裂变产物。这是物理学上第一个支持裂变现象的成功实验。这个重大发现，使人类对原子核科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后来，当钱三强谈到同伊莱娜的这次愉快合作时，感慨地说：“我很幸运，刚到法国两年，就参加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我初步懂得了怎么搞科学研究工作，理解了导师和实验室环境的重要性。我更懂得了这只是我研究工作刚刚迈出的第一步，以后要在多积累、多学习、多合作上下功夫。”1940 年，钱三强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钱三强在法国期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原子核裂变进行的，共发表研究论文 40 多篇，有些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与他为首的研究小组（成员有夫人何泽慧及另两个法国助手）对原子核三分裂和

四分裂的发现。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基本粒子学术会议期间，他们看到一张铀核裂变的照片，铀核在受到轰击之后，放射出方向相反的两条粒子线，这就是铀核的“两分裂”。但是，仔细看去，他还看到在两条粒子线之间，沿垂直方向还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粒子线放射出来，它的位置与其它两条粒子线不在同一方向。于是，钱三强想到，难道铀核裂变还会产生第三颗粒子？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站在身旁的爱妻何泽慧。从那一时刻起，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决定，要共同努力揭开这一未知的科学之谜。1946年12月，经过几万次的实验、观察、记录，以及几百次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300次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三叉形径迹和四叉形径迹。也就是说，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后经与约里奥讨论确定表述为“三分裂”和“四分裂”。1947年3月，钱三强进一步完成重要研究论文《论铀的三分裂的机制》，并由约里奥推荐到法国科学院国会上作书面报告，随即在法国科学院和美国《物理评论》发表，成为研究“三分裂”的经典性文献，受到广泛关注。1947年，约里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公布了钱三强小组的研究成果。他说，“在我们实验里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已经证明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项新发现，是由两个中国青年科学家钱三强和何泽慧及两个法国青年科学研究人员共同取得的，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西方各国报刊相继报道钱氏夫妇的伟大发现改写了科学史上核裂变的理论，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由于钱三强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的新成就，法国科学院将法兰西最丰厚的奖金——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授予了钱三强。他就这样在异国他邦为正陷于苦难之中的祖国赢得了荣誉。而这时学有所成、荣誉满身的钱三强却不由想起了父亲“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教导。

钱三强家学深厚，他父亲钱玄同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领导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共同创办《新青年》。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由钱玄同编辑发表的，故鲁迅称钱玄同为益友。钱玄同主张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造社会，他常对三个儿子说，对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学习知识技能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钱三强在法国学习工作期间，父亲钱玄同经常去信勉励他努力学习，在给他的最后一封长信中，钱玄同在信的末尾写了“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八个字。钱三强将父亲的教导作为自己终身的座右铭。

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冷静地考虑到：现在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又年富力强，到了该回国效力的时候了。他对约里奥·居里夫妇说：“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学技术，我应该回去为国家服务。”1948年春，在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即将打响，我们祖国正在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钱三强、何泽慧怀抱半岁的女儿，回到了离别十一年的祖国。他谢绝多家研究机构的邀请，选择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因为，他想到离法前旅法支部负责人刘宁一的话：要踏踏实实培养人才，迎接全国解放。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培养人才的事业中，除了在清华大学授课以外，还借中法大学教室，每周开办一次核物理学讲座，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听课。还请北京大学出版社翻印了他从法国带回的三本关于原子核物理学的文献。以后，这三本书竟然成了新中国原子核物理扫盲班的基本教材，一批又一批核物理学家就是先肯烂这三本书后，才走向原子世界前沿阵地的。

延揽人才 奠基创业

新中国的诞生，为钱三强施展报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舞台，他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建，特别考虑了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建设。1950年5月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1948年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先被任命为副所长（吴有训担任所长），1951年初继任所长。他服从需要，着眼全局，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为建设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基地不懈努力。

钱三强根据各国的经验和自己的体会，认识到中国原子核科学要起飞，必须要有领飞的雁。他求贤若渴，到处登门拜访招募贤才。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王淦昌教授收到钱三强的亲笔信，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王淦昌1930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就在报纸上见到关于钱三强、何泽慧发现铀“三分裂”、“四分裂”的报道。钱三强也深知王淦昌在核物理研究方面的成就。1950年4月，钱三强和王淦昌这两位核物理学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此，他们成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同事和挚友。后来，王淦昌在研制原子弹、氢弹中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广为人知的著名科学家。然而，当王淦昌向记者回顾中国核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时，仍特别强调了钱三强的重要贡献，他说，“中国核物理有了钱三强的组织领导，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很大。”

在给王淦昌写信的同时，钱三强来到清华园彭桓武教授家中，登门邀请彭

桓武教授到近代物理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彭桓武早年留学英国，曾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是当时第一个在英国取得副教授职称的中国人。他在理论物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解决数学问题的本领很强，尤其善于联系实际。1950年春，彭桓武、王淦昌先后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所报到，一年后经钱三强推荐，王、彭被任命为副所长。从此，他们并肩战斗，艰苦创业，成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大军中具有凝聚力的核心。

光有领头雁不行，还要有一个大雁群。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钱三强通过各种途径延揽人才。一年以后，陆续来所的已达三十多人。他们中有从海外归国来所工作的科学家郭挺章、金星南、肖健、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其中不少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才回到祖国的。如，1950年赵忠尧先生离英途径日本回国时，曾被美日反动派扣押，由于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声援，才在1950年11月返回祖国。当时，还从国内邀请了一批年轻的物理工作者来所工作，并从五一、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来所工作，到1952年，已发展到近百人。事业初创，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因此，要建立和发展各种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验技术，就不得不从研制各种核探测器和粒子加速器开始。后来，钱三强回忆这段艰苦岁月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自力更生’这句话，可是延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却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那里最先领受了。”他和王淦昌、彭桓武等所领导接过这个口号，作为一种激励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召全所职工“自己动手，一切从零开始”，立志让原子能科学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于是，在钱三强的指挥下，一个热火朝天的局面出现了。大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研制仪器设备。缺少器材、元件，有些科研人员就跑旧货摊、寻找代用品。全所职工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了一批必需的设备，取得了一批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并成长出新中国第一代核科技人才。正如当年钱三强总结工作时所说：“这段时间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通过这个艰苦创业的过程，的确使我们得到了锻炼，在研制设备的过程中，掌握了不少技术知识，这对以后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将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到中南海讲课

1955年1月15日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应邀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这是

当年毛泽东主席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主题是研究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宗明义地说道：“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李四光、钱三强同志来上一课。”

李四光首先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的情况与发展原子能的关系，并拿出一块黄中带黑的铀矿石标本给毛主席看。

钱三强接着作了说明：这是一块天然石头，里边含有放射性很强的物质，这是发展原子能必不可少的。但是，里边需要的物质含量极少，而且提炼它，要有很复杂的技术和设备，要经过溶解、蒸发、分离等复杂程序。当年，居里夫人花了近四年时间，从几十吨这样的铀矿废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纯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镭这种物质就正式存在了。居里夫人因此获得了一次诺贝尔奖。接着，钱三强用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桌上的石头，扬声器里开始发出“咯拉、咯拉”的响声，当把盖革计数器移远后，响声就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好奇地亲自上前作了试验，引得会场上笑声不断。活跃的气氛中，钱三强又作了一个试验，他本人朝着盖革计数器慢慢走过去，等到靠近时突然又有了响声。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仪器自己响呢？钱三强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小点放射源，向领导人介绍说，“就是这点放射源，是我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的。”

钱三强简要介绍了各国发展原子能的情况后说：“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做，几年的努力，应该说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

在说到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时，钱三强重复了曾经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看法，关键是要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且详细解释了它们的作用，说明没有这些设备，有了铀矿资源也无济于事。

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从



两弹功勋钱三强在作报告（强家华提供）

主观愿望说，我们不愿意搞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一个法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掌握了它，就能打掉嚣张气焰。”毛泽东继续说：“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了铀矿。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指造原子弹）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安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不但要有更好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毛泽东环视着大家，最后把目光落在钱三强身上，接着说：“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积极的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全体与会者都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中国研制战略核武器的最高决策就这样通过了。

组织攻关 为国争光

从中南海出来后，钱三强心潮起伏，一股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中升腾。

1955年4月，国务院派刘杰、钱三强、赵忠尧三人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定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我出售一个重水实验型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

1955年1月，经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并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仪器放在这个基地中。这项工程从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仅仅用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一座新的原子能科研基地就在那昔日的荒滩田野上奇迹般的矗立起来了。从此，原子核科研工作全面展开。

正当我国原子能事业蓬勃发展，顺利前进的时候，那个标榜“无私援助”的“老大哥”开始翻脸了。1959年6月，苏联单方撕毁协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8月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撤回。当时正在进行的工程项目中断了，计划应由苏联供应的设备物资取消了，甚至连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制作的图纸、资料也一起带走了，他们并讽刺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西方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叫嚣要使中国在“核方面绝育”。

处在严峻形势下和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肩负着特殊的作用。他在科学家中，像一块磁铁，团结并组织大家拧成一股绳，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在领导决策面前，他当好参谋，适时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他要做领导与科学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是历史赋予钱三强的光荣使命。

中国原子能事业进入全面自力更生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钱三强和所里其他领导成员和科学家一起，将全所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做出全面调整。钱三强清楚，发展原子能事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致使全线败退。他坚信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紧密依靠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力量攻关，保证两弹研制工作进行顺利。

1962年下半年，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两年规划”。同年11月，毛主席批准了“两年规划”，并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接着，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掌管此事。“两年规划”和中央决定，给了钱三强和全所职工极大鼓舞。大家把研制原子弹叫“争气弹”，将实验室当作战场，为研制原子弹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协议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为“59·6”。

六氟化铀，是铀浓缩厂使用的主要生产原料。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铀235就是由六氟化铀经气体扩散法取得，根据原中苏有关协议，应由苏方提供。苏联撕毁协议后，尽快掌握铀转化技术就成了当时的突出矛盾。钱三强亲自抓这件事。他先抓生产，同时又不放松铀转化厂的建设，他把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之为“骑驴找马”。钱三强将这种“简法生产”交给所里吴征铠、汪德熙、王承书等科学家主抓。四个月后的第一次试生产之时，钱三强陪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亲临实验室。他提出：只要拿出二克合格产品，就算成功。结果生产出了3.3公斤合格产品。到1963年，胜利完成十八吨六氟化铀生产任务，为我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扩散分离膜是生产铀235的最核心部分，买不到、学不到、甚至连看也不让看。钱三强接受任务后，亲自跑北京、跑上海、跑东北、跑西北、组织原子能所、上海冶金所等有关单位的力量，自力更生，联合攻关，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按时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后第四个能自己研制扩散分离膜的国家，为研制原子弹又攻克了一大难关。

建立良好的分析方法，对研制原子弹有关键性的影响，钱三强和科学院、二机部领导一起及时组织原子能所、长春应用化学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通力合作，拟定了数百个高质量的分析方法，为建立核燃料的工艺和分析方法

提供了条件。

原子弹点火中子源，是一项紧急任务，钱三强慧眼识英雄，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年轻的化学工程师王方定，并把自己从法国带回的放射源派上用场。王方定小组接受任务后，在简易的工棚里，战酷暑，斗严寒，日夜奋战，经过三年的 978 次试验，终于获得了理想的生产工艺，制成高标准的优质化合物。

集中力量，排兵布阵，是“59·6”工程成败的关键。钱三强协助领导担当了这方面的重要角色。经过他的努力，原子能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优秀人才，钱三强了解每位科学家的特点，知道什么任务由哪位科学家担当最合适。二机部成立核武器研究所，需要一位有统筹能力的专家来负责。宋任穷部长让钱三强物色人选，他毫不迟疑地推荐了朱光亚。原因是，朱光亚在核物理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又有从事教学、科研的实际能力和组织工作经历，而且年富力强。核武器所理论部需要一位理论功底好，善于团结共事的科学家挑大梁。钱三强看中了邓稼先。邓是原子能所理论组科研人员。钱三强对邓稼先说“小邓，要放一个大炮仗（指原子弹），让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这可是绝密任务啊！”从此，邓稼先舍家弃业，隐姓埋名，刻苦攻关，为研制“两弹”做出重要贡献。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一直对钱三强心怀感激之情，担任九院院长后仍念念不忘。1985 年，他亲自登门看望钱三强，表示敬意并赠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20 周年纪念品，以感谢钱三强的重要贡献。钱三强谦虚地对邓稼先说：“你们做的很好，我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根据中央决定，核武器研究所的力量要大大加强，钱三强服从大局，又从原子能研究所抽调了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于敏、黄祖洽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去担当重任。据统计，从 1959 年至 1965 年间，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的科技人员共 914 人，其中高级研究技术专家 28 人，他们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的中坚力量。1999 年中央表彰的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科技专家中，包括钱三强在内的 7 人，曾在原子能研究所建立功勋。当时，有人比喻说：在中国研制“两弹”的伟大进军中，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一天，在钱三强等核科学家的记忆中，是个难忘的日子。下午 2 时 45 分时，二机部部长刘杰用颤抖的声音对钱三强说：“三强同志，再过一刻钟我们放的那个炮仗就要响了，你看还有万分之几的可能不响？”钱三强听了，眼里噙着热泪，十分激动地说：“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下午三时整，随着一声“起爆”的命令，一颗猩红色的小太阳从西北大漠荒原冉冉升起，直冲云天。一声惊雷过去，一团美妙无比的蘑菇状云团在祖国

西部的天空翻腾着，舒卷着，构成一幅壮丽的奇观。

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哭泣着。原子弹的头号功臣钱三强眼角上挂着晶莹的泪花，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59·6”争气弹终于成功了！

当原子弹爆炸的烟云还在太平洋高空飘散之际，一场研制氢弹的攻坚战又在中国大地上打响了。

这是一项比研制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技。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氢弹决不是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可以了。它们的基本原理大相径庭：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时候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去点燃核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做火柴，去点燃核聚变材料，引起爆炸。

还在研制原子弹最紧张的时刻，周总理便高瞻远瞩地向二机部做了部署，要求有关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1964年底，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便在原子能所组建中子物理研究组，对外叫470组，由黄祖洽和于敏负责，任务是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能结构等做探索性研究。中子物理组一度达到四十余人，工作一步步前进，共写出研究论文69篇。这些工作，使对氢弹原理和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认识，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同时，钱三强还决定成立一个轻核反应实验组，先后由蔡敦九和丁大钊负责，成员逐渐增至十人，任务是用轻核反应数据的精确测量来配合470组的工作，很好的体现了理论与实验的密切结合，后来急需时，及时可靠地提供了轻核反应数据，为氢弹技术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1965年初，中子物理组黄祖洽、于敏等30多人带着已开展的工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汇成攻克氢弹难关的坚实力量，及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终于创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速度最快的奇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大西北的上空爆炸成功了！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其间只有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这样的发展速度，成为外国人心中的不解之谜。因为，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七年零三个月时间；苏联用了四年时间；英国用了五年零两个月时间；法国早在1960年2月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时至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法国的第一颗氢弹还杳无音讯。难怪法国总统戴高乐听到中国爆炸氢弹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惊问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也简单，就是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大战略家，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钱三强这样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和组织者，以及有邓稼先、于敏这样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创造氢弹奇迹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钱三强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立下了大功，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钱三强的重大贡献。

1966年1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氢弹原理性试验后，周恩来总理邀请少数人到中南海举行庆祝酒会，名单中就有钱三强。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讲到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时，特别提到了钱三强，他说：“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逝世，江泽民总书记闻信后亲自打电话给何泽慧表示哀悼，他说：钱三强同志是对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损失。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钱三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3年9月，在纪念钱三强先生逝世一周年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他立了一尊半身铜像，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为铜像揭幕，朱光亚、周光召等领导出席了揭幕仪式。

钱三强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立下的光辉业绩将永留史册。

我的同学侯隽

韩秀琴

侯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1962年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后，她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农村受到了锻炼成长为一名人民的好干部。1963年作家黄宗英采访了她，曾写了《北京的特别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她先后曾任窦家桥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达九年，后任县委副书记、天津团地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当选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

1980年侯隽任天津市人大代表、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宝坻区政协主席。侯隽同志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四次接见，周总理六次接见。2002年胡锦涛主席到宝坻曾看望她，她现在身体很好，仍工作在第一线。现将侯隽所写《北京到窦家桥》一文全文录出，以供读者阅读。

回顾下乡以来的生活经历，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命运选择。正是上山下乡和多年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是窦家桥的乡亲们给我以厚爱，给我以力量，他们在我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常有许多知青朋友来信，谈到当年如何受到我的影响，其实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家。下面我就把自己下乡前后的经历谈一谈。

—

下乡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1955年夏天，我当时12岁，在市内的石驸马二小读完四年级，因母亲所在单位搬迁，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京郊的良乡。我转学到良乡北京基建局子弟小学继续读书，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良乡中学。在良乡读初中和高中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农民和农村。良乡是房山区的一个镇，因为地处北京远郊，学校里农民子弟占多数。上初中时，班上只有我

们5名来自子弟小学的同学是所谓城里人。农村的孩子待人朴实、热情，学习非常刻苦，看起来很成熟。学校的劳技课，内容很丰富，下乡劳动的机会也特别多。学校的实验园也很有名，记得还拍过电影——《青春的园地》；还养了鸡、鸭、猪，而且自己烧砖建校。良乡中学不放暑假，而是按农时放麦假和秋假。在下农村参加劳动的时候，农民和农村同学吃苦耐劳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阶段的经历，使我对农村产生了最初的好感。

在学生时代，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理想，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儿，曾经想当个音乐家或画家；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又想当个医生；后来对语文感兴趣，便又想当个文学家。在初中临毕业时，我的身体仍然不大好，所以本想不考高中，最好去一所卫校，毕业后当一名医生或护士。可是学校鼓励报考高中，而且要求第一志愿必须报良乡高中。于是，我把良中报了第一志愿，其他志愿都填了卫校和护士学校，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真实志愿，考试时，我还故意漏答了两道数学题。当然，也不敢丢得太多，谁知仍被良中录取了。一年后我家搬回市区，我要求转学，校长不同意，我只好住校，继续留在良中。既然上了高中，自然就立志考大学了。我在高中的成绩一直很好，由于自己的努力，曾两次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品学兼优奖章。在毕业考试中，我7门功课都是5分。临近高考的时候，文科的老师劝我学文史，理科的老师建议我读理工。当时自己也非常自信心里打算：“要考就去北大、人大、别的学校还不去哩！”可是在临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考大学上面了，这主要是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有关系。

在毕业前的动员会上，校长介绍了国家的形势，号召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是准备升学，继续深造；再就是向王培珍、邢燕子、徐建春学习，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国家的号召，先进人物的事迹，以及老作家赵树理送女儿下乡的情景，都深深打动了。我改变了考大学的计划，决定到农村去。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个人确定什么样的志愿和理想，不能光凭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首先要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现在党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农业战线是第一线，全党全民正在集中力量加强这条战线。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不也有支援农业的责任吗？我应该自觉地服从祖国的需要，承担最艰苦的工作。于是改变农村贫穷落的面貌，就成为我的最大理想了。

我从小特别“拧”，想干的事情非办到不可。听母亲讲，在不满周岁的时候，大人带着我去公园。我非要自己爬台阶，大人把我抱上去，我便哭闹着下来，然后自己再爬下去。结果弄得满身都是泥土，却感到很高兴。现在我认准了下乡这

条路，别人的劝告自然没有用。有部分老师、同学甚至学校的校医都好心劝过我，他们主要是担心农村条件差，生活艰苦，我经受不住。我半开玩笑地说：“所以我去锻炼嘛！”此后，在同学们紧张复习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的是到哪里下乡。也有一些农村的同学，因为功课不太好或是家庭困难，便主动地放弃高考，陆续回到了农村。我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人。在送行的时候也在盘算自己的去处。也曾有几位北京郊区的同学邀请我去他们村子，可我觉得人家一大家子人，我插在里头不大方便，当时下乡虽然是大方向，但没有组织负责联系和安置，像我这样家在城里的想下乡只能是自己联系接收地点。

班里一位同学司福珍，也放弃了高考准备下乡。我们俩是同窗六年的好朋友。她告诉我说，她母亲以前曾在宝坻县窦家桥打过零工，土改时还分得地主两间房子。后来她们全家都迁到北京，但房子还是他们家的，我们俩可以奔那儿。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下总算有了下乡的去处了。

我决定去窦家桥，当时我们都住校，就没告诉家里人。我和司福珍一起打点行囊，兴冲冲地从学校直奔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生产队。那是自然灾害刚过的1962年，当时良乡到宝坻长途汽车站等一宿，转天早晨再乘上午唯一的一趟长途汽车去宝坻。在天津等车的时候，一些人听说我们想去宝坻县下乡，都劝我们赶快回去，说农村可苦了。

在天津吃早点的时候，一些饿急了的人伸手就抢我们的东西吃。看到这种情况，我更加认识到建设农村、大办粮食的重要，也更坚定了下乡的决心。

二

我们来到窦家桥村以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竟是接收问题，厚道的村干部接受了司福珍，因为她总算跟窦家桥有点关系，可是不肯接受我，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收留。但是我们并不死心，到村以后就每天去地里干活，和大家渐渐熟悉了，乡亲们都非常喜欢我。当时，我借住在回乡青年张俊峰家里，司福珍天天晚上去找村干部对付，说服他们留下我。张俊峰也帮她一起去找支书“蘑菇”，后来他看实在没戏了，就想出了个鬼点子，对干部们说：“人家那闺女比大姐来得还硬气呢！她是福玉的对象，将来还不是咱村的人？”司福玉是福珍的弟弟，还在北京读书。这样的理由本来不存在，也说不过去，但奇怪的是干部们居然相信了，而且迅速同意接收我。村书记恍然大悟地说：“我早就说嘛，没有关系，人家城里人怎么会来乡下吃这份苦。”因为当时按照他们的思维方

式，我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北京跑到陌生的窦家桥村来。

1962年7月10日，我回北京迁户口时，才向家里公开了选择。全家人都感到非常突然，但没人表示反对，因为我要干的是一件很有志气的事。母亲只是提醒我说：“这件事你可想好了，真要去一阵子后悔了，半途而废，我可没本事把你调回来。”我坚定的说：“我不会半途而废的。”父母亲考虑我在农村没有收入，表示只当我上了大学，每月寄生活费给我。我迁了户口，还带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就匆匆回到了窦家桥。乡亲们见我们果不食言，真来当庄稼人，全村人像办喜事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和司福珍虽然估计到会有很多困难，但是绝没有想到困难会如此的难以克服。不仅天天下地干活，累得我们腰酸腿疼，手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血泡，而且一天到晚还要做三顿饭。我俩都不会用柴禾做饭，只好天天瞎对付，夹生过火、盐大碱小地填了肚子了事。虽说队里在田粮上还照顾我们，每天按8两分配，可由于当时没有副食，再加上我们“不会过日子”，所以一个月的粮食几天就吃完了。那时候队里还分给我俩点自留地，自留地里种的红薯，很小的时候就刨出来煮着吃了。这样过了一个月，司福珍对我说：“这口粮要是一个人吃也许还行，我先到蓟县老家住几天，秋后分了粮食我再回来。”我想了半天，只好同意我这个伙伴暂时离去，可是司福珍到蓟县不久，当地招聘代课教师，她就留在那儿教书了。

我住在那间小土房，矮得伸手就能摸到房顶。后墙外边的地面比屋里还高，又是东厢房，所以冬天冷，夏天热，又湿又潮。赶上雨天，房顶到处漏雨所有的盆盆罐罐都得用来接水。雨下得时间长了，雨水还会从耗子窟窿渗到屋里来，我就在地中央挖一个坑，把水汇集起来再淘出去。窗和门都是用秸秆插的，很不结实，糊的窗纸被风一鼓荡就破了，所以冬天要糊许多次窗户。那时，窦家桥还没通电，回家还得推碾子推磨，把原粮加工好再去点油灯做饭。

说来也怪，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一没觉得寂寞，二没觉得烦闷，而且天天特别高兴，觉得生活得挺充实、潇洒，真是境由心造。你对生活很热爱，你也能真正以苦为乐。我天天下地时捎带着书报，歇晌的时候就给大家读报、讲故事。看到乡亲们那专注的眼神，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已经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我一个人忙忙活活地做饭。村里的小青年们吃完饭就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帮着我推碾子，帮着我做饭。然后嘻嘻哈哈地看着我吃饭。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炕上坐得满满的，院里还站着十几个，我们就屋里一句屋外一句地聊着。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姑娘主动跑来和我做伴，小小的坑上，

挤得身都翻不过来。青年们爱到我这儿来，一开始是因为新鲜，我刷牙漱口，他觉着新鲜，我吹口琴、唱歌、他们也觉得新鲜。那时村子里也没有别的热闹，我好像就是“热闹”。有几天真没粮食吃了，晚上收工回来就不做饭。咋办呢？饱吹饿唱！我就躺在床上唱，唱《洪湖水》什么的。原来，饿着肚子唱歌显得嗓音特别好。从此，我就经常和伙伴一起唱歌，我的小院里常常充满了歌声。

司福珍离开以后，她母亲觉得对不起人。后来司福玉从学校毕业了，也要求下乡，于是，他母亲就支持他到窦家桥来，说可以照顾照顾我。他是1963年来到窦家桥的，刚来的时候也是自己做饭。由于他不会做，也是一顿糊两顿生的，我为了照顾他，就让他一起吃。村里人对此也有议论的，可我一直没往心里去，一直到县里的老田同志下乡蹲点，正式提出我与司福玉的关系问题，我才认真地考虑。我觉得他人挺好，而且我原来曾假借过他的名义，现在不同意，不成了“变心”吗？后来我当支书时，司福玉当副支书，我认为他实际上比我能干。以后他还当过一段县委副书记，因为我的问题，也挨过一段整，现在是县粮食局的工会主席。

我们有个女儿，今年17岁了，正在读高中，由于我太忙了，顾不上照顾她，她从小就自己玩。她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只是有时遗憾地说：“要是妈妈不是县长该多好，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

三

1963年，黄宗英大姐来窦家桥，在我那间小厢房里住了20多天。上午她跟我们一块儿去地里干活儿，中午帮我做饭，收拾房间，下午写作。这期间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在召开，黄宗英也出席了。当周总理请赵丹、张瑞芳、黄宗英等人到家里作客时，黄宗英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总理当即肯定说：“这是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并让黄宗英写文章宣传我的事迹。不久黄宗英大姐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送到《人民日报》社，但迟迟没能发表。当周总理了解到是因我的家庭包袱出身问题而不能发表时，明确表态说：“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她向着光明，向着新社会，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青年带起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1963年6月《北京姑娘侯隽下乡落户一年被称为“特别姑娘”》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963年7月《特别的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河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又发表多篇访问记和报道，天津地委还发出了《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

隽事迹的通知》。我一时间成了“名人”，被当作“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农村”的典型，广泛宣传，并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地、县的先进青年、青年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和农业先进工作者。1964年6月我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在开幕式的那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结束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工作人员特地把我们20几个青年排到了边上，并且叮嘱说：“照完相以后，你们都跟我走。”

我们随工作人员去了一个会议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在那里，准备接见我们。我跟毛主席握手时，非常激动地说：“主席您好！我们全村的干部群众问您好！”可是走到周总理跟前时只想哭，我知道总理一直关心着我。总理没有见过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怕哭出声来，抑制着自己，声音很小地回答：“我叫侯隽。”总理还没有听清，其他同志就走过来和总理握手了。事后我当然非常后悔，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1965年3月，我到天津开劳模会，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也来到了天津并参加了会议。在主席台上周总理看到邢燕子，就问她：“侯隽来了吗？铁姑娘来了吗？”燕子告诉周总理：“她们都来了，在下面呢。”台下有的听见了总理的问话，赶紧告诉我说：“总理问你呢。”我看着台上的周总理，心中十分感动，但是我不能上台去见总理。过了一会儿总理就离开了会场。我两次见到周总理，而且亲自感受到总理的关怀，可是在总理的印象中还是没有见过我。我既感到幸运，又觉得懊悔。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总理，但决心踏下心来好好干，要对得起周总理的关心。

1966年我光荣地入了党。三年以后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选举时全票通过，我还投了自己一票。我想，有了生产指挥权，就可以科学种田，更好地实现自己改造农村的愿望了。这时，村里最大的难题是改造盐碱地。我和群众一道，用深井的水浇碱，使旱地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水浇地，实现了园田化，也彻底改造了盐碱地。与此同时，我们还大搞秸秆还田，让土地松软增强肥力，使粮食亩产由1964年的400斤达到了千斤。我们还组织了副业，窦家桥群众的生活明显地比周围的村富裕了。

我那会儿又要搞生产，又要开会作报告，忙得不可开交，本来身体就不大好，这下更显着精力差。心里还总想着多干点儿实事，多参加点儿劳动，可身体受不了。有一回，《人民日报》的记者王炳奎到村里采访，我坐在坑上靠着被子跟他说，他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记。我说着说着就睡着了。过一会儿，醒来一看，王炳奎正坐在地上看表。我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怎么睡着了，

你怎么没叫醒我呢？”王炳奎说：“我看你是太累了。”我那时干活就怕停下来，在地里干活只要说该休息了，我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有一次，省长到村里看望大家，我们坐在那儿听省长讲话，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实在是太紧张了，也太累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天不亮就去给五保户挑水，除自留地的草……，等于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人怎么能受得了。王炳奎回去写了一篇“内参”，反映了这个问题，被周总理看到了。总理当时在昆明，刚刚访问14国回来，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打电话到国务院，通知天津地区和河北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此定下：我要外出开会作报告，必须由天津地委批准才行。

1971年我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看病，《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了我，并发了一个通讯。周总理看到这篇文章，知道在北京住院便让秘书找我，因为不知道是哪一家医院，等一家一家地找到我时已是夜里11点了。医生把我叫了起来，说周总理接见，我迅速赶到大会堂，总理的秘书告诉我：“总理正在开会，开完会要接见日本外宾，你也参加。”我等了一会儿，总理走出来，握住我的手说：“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只是没有见过你。”我说：“见过。”总理惊讶了，问：“什么时候？”“我在共青团‘九大’时见过您。”总理又关心地问起我所在村的情况和家族情况，我一一回答，总理很高兴。

“文革”初期，我也曾一度受到冲击，但是不久随着部队“支左”就被解放出来了。在那段时间里，总理很多场合提起我，经常过问我的情况，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仅从1971年到1975年我就四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71年5月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日本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特意安排我在场。总理接见外宾整整两个半小时，还利用外宾到来前和送别后的机会和我们在座的三个农民代表谈了近一个小时，其间和我就交谈了将近20分钟，总理关心地询问了我们村改造盐碱地的情况和知青的生活情况。总理是那樣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无拘无束地向总理一一做了汇报。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在那个年月里，像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文革”中不仅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还能多次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出席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有了总理的精心安排和关心爱护啊！

四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起因是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不寒而栗一封信，说孩子下乡的困难。毛主席寄了300元钱，还附一

封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因此，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解决知青的困难。我和邢燕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也参加了会。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江青表现得烦躁不安。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照照镜子，一会儿出去转一圈再回来，一会又点着一张纸，引得火苗窜起老高……。周总理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并且称赞干得不错时，江青突然插话：“还有一个好青年，他叫张铁生！”总理立即打断她的话：“这样的好青年到处都有。”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1974年江青来天津视察时，听市委第二书记吴岱汇报。吴岱举学大寨先进典型的例子时，有宝坻的小靳庄。江青听说村里办夜校学唱样板戏，很感兴趣，就要到小靳庄去。以后小靳庄就定为江青的“点”。江青每次去小靳庄，市委都要通知邢燕子和我去小靳庄陪她。

1974年夏天，我正在党校学习，接到市委通知，让我马上回到小靳庄陪江青视察。江青穿着连衣裙，白高跟皮鞋，戴着大草帽。当她看见当地农民都戴着一种尖顶草帽时，问我：“你有那样的草帽吗？”我说：“有。”江青立即让我去拿来跟她换。可窦家桥离小靳庄有50多里地，我怎么能回去拿草帽呢？于是，我就找到小靳庄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你们小卖部有卖那种草帽的吗？”王作山说：“有。”我说：“你赶快找人去替我买一顶来，再帮着缝个帽圈。江青跟我要这种草帽。我上哪儿拿去？”

跟王作山说完，我又跑去坐着听江青说。江青问：“你怎么还不赶快去拿帽子啊？”我也实在，回答说：“我家离这儿特别远，他们去小卖部买草帽了。”江青听了很不高兴，说：“你不要我这顶帽子了，是不是？我这草帽还是延安时戴的呢！你不要，我就不给你了。”我说：“怎么不想要啊，只是我家离这儿太远了，拿不来。”江青讥讽地说：“我看你都快成小官僚了。”我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说：“这顶帽子是我在延安时代开荒生产时戴的，很多人跟我要，我都舍不得，现在送给你和燕子俩人，你们轮着戴啊。”我看看那顶草帽，心想：接得慢点，帽子就变成两个人的了。一会儿给我买来了草帽，身边的人帮着缝了个小帽圈，我就把它送给了江青。我当时觉得江青送的草帽代表革命前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便把那帽子送到了村史馆展览。

1976年我当了3个月的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说清楚”却有一年多。1977年12月16日，我重新返回窦家桥村。从天上掉到地下，我觉得应该。我本来就应该在地上，不应该上天。我接着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直

干到 1979 年。村里群众传我可能要调走，闹得我也不塌实。我干脆找到县领导问清楚。县领导回答说：“知青连以上干部都要安排工作，你也不例外。”可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村，我觉得在村里干得不错。群众为我着想，说：“叫去就去，哪怕干一天就回来呢，也说明咱们没问题。”

1980 年我离开干了 18 年的窦家桥村，到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非常投入地干了 10 年。

1990 年组织又调我到县政府当副县长，让我分管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还兼任宝坻红十字会会长。根据县里情况，我从 1994 年开始，在全县范围搞了 9 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募集 90 多万元，又争取到“邵逸夫工程”捐款 40 万元，为残疾儿童建立起一座特教学校。

1996 年底，县里又让我分管外经贸，1998 年又让我分管农业。不管干什么，我都坚持按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工作。

五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切实体会到，教育就是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必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青年人有一个在艰苦环境锻炼的机会，对他的一生都有好处。中国是个大农业国，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我们就不可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考虑问题。不接触一段农民，对农民没有感情，也就很难谈得上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扎根农村，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建设着社会主义农村。我最初曾经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后来又成了一代知青建设农村的典型人物。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我经过了更多的磨炼，既当过多种多样的官儿，也踏踏实实地务过农。但是，由于有了深厚的农村生活这个根底，由于我对农村和农民的热爱，也由于有了绵绵不断的农民群众对我的关怀和支持，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也很踏实。

知青生活对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几十年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毅力，使我在任何时候都经得起荣辱、苦乐的考验，能够把名利、地位看得很淡。过去，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窦家桥村参加劳动搞科学种田，为窦家桥村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我在县里担任职务，实际上也没离开农村，是在更大范围内为农村、为农民服务。我将永远不改初衷，永远无怨无悔。

宿光明的一生

李金志

宿光明，1911年出生于霞云岭地区四马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时曾读过五、六年的私塾，办事稳健，待人诚恳，很受全村百姓的敬重。

抗战暴发后的1937年11月7日，原房山县九区的霞云岭、下石堡、宝水、四马台等村的组成了霞云岭联庄自卫团，宿光明出于抗战卫家的目的，也参加了自卫团。自卫团由地主出身的杨万芳任团长，地主出身的杨天沛任参谋长。自卫团下设三个营，一营营长为李春文，二营营长为宿光明，三营营长为罗宗奎。

参加自卫团的成员中由于出身不同，入团的目的不同，再加上此地区地处深山，交通闭塞，缺乏正确的领导，该团实际上是一个少数地主控制的村民自治性组织。

到1937年底，随着战争吃紧，当地土匪肆意施凶，百姓们民不堪命。霞云岭联庄自卫团继而随之扩大，与全境内其他几个自卫团或武装组织连成一体，后又与平峪一带的“六山会”相联盟，并被抗日政府所改编，但仍称霞云岭联庄自卫团，被抗日政府命名为房涿涿抗日游击大队第七支队，仍袭用联庄会自卫团之名，自卫团司令为思想开明的安济云。

安济云当上自卫团司令后，看到自卫团内部成员在原领导的操纵下，既不能有力地打击日寇，又不能有效地保护地方百姓，而是打着保家抗日的幌子，打家劫舍，危害一方，决计整顿这支纪律涣散，作风腐败的组织，同共产党八路军实行真正的联盟。

杨天沛、杨万芳察觉出安济云的目的后，百般阻挠，叫嚣八路是土匪，不消灭八路军，这个地区不得安宁。三人固此结下了积怨。这支抗日组织，在少数坏人的操纵下，已蜕变为一支彻头彻尾的反动民团。心灰意冷的安济云不得不辞去自卫团司令职务。在外躲了一段时间，毅然决然地找到了挺进军司令邓华，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8年8月8日，杨天沛、杨万芳等一伙反动骨干分子站在地主阶级的

立场上，终于掩饰不住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刻骨仇恨，制造了震惊华北的“王家台惨案。”此时宿光明已在家发疟疾病多日，听到自卫团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极为震惊，立即找到了杨天沛，理直气壮地辞去了联庄会自卫团二营营长的职务，离开了自卫团。

后几经辗转找到了安济云，两人商量后，在安济云的带领下连夜赶往张坊、白岱村一带，找到了已任平西军分区敌工科长的姜时泽（姜解放后曾任察哈尔省代省长、北京地质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宿光明向姜时泽表示了要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和抗日的决心，姜时泽代表抗日政府表示欢迎。经组织研究决定，派宿光明秘密地潜回四马台村，与较早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村党支部书记任显本取得联系，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当时霞云岭地区的党组织和其他抗日组织都是秘密进行活动的。尤其“王家台事件”发生后，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联庄会很多人都家住四马台村，人员较多，敌我难辨，这无疑给宿光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

宿光明与任显本联系上后，以家庭为掩护，利用各种机会从事革命工作。不久便担任了本地区青救会、抗联和村里抗日组织的领导职务，后由任显本等人介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扭转艰难的抗战局势形势，1938年11月初，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率部挥师平西。与平西军民一起消灭了制造紫石口事变的反动民团后，又乘势击溃了霞云岭联庄会反动民团。霞云岭地区局面平稳后，房良联合县重新调整区划。1938年底，霞云岭由原来的房良九区改为房良一区，安济云受命组织一区政府，出任一区区长，宿光明任区政府助理。

1940年秋季，抗日战争进入空前残酷阶段。日军对包括霞云岭地区在内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分三路展开了疯狂的扫荡。杨天沛、罗宗奎等残余匪首也蠢蠢欲动，勾结驻南窖日伪军，于1940年11月13日凌晨，猖狂发动了“一区事变。”

“一区事变”发生期间，匪徒和伪军疯狂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据统计，我军民20人牺牲，46人被俘。有的当场牺牲，有的在押解的半路上被惨遭杀害，还有的直接被送往南窖伪军据点。庄户台区公所罹变，宿光明被五花大绑押到南窖。到南窖日伪据点后，敌人对宿光明进行了严刑拷打，又利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拉拢腐蚀诱降，并以家人的性命相威胁，但宿光明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更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

宿光明被捕后，党组织立即开始积极营救。由于宿光明平时的工作是极其隐秘的，在看押过程中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派熟人去南窖伪军据点说情做保，家里人也想尽一切办法疏通关系，终于幸免一死。最后，通过保人和南窖伪军交涉，家里便卖了四亩地和仅有的一头驴，敌人才将宿光明释放，但暗中仍然对他进行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宿光明无法和组织进行联系，只能根据现有的条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此他在南窖村开了名为“义和昌”的小杂货店，以做生意之便，了解敌情，解救抗日爱国人士，本村在抗战期间当过村正的赵荣福老人就是被解救的其中一个。一年之后，宿光明终有机会逃离了敌人的监视，与组织机关取得了联系。

宿光明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如一，工作受到了各级部门的充分肯定。1943年，宿光明被任命为九区区长（原房良县于1941年6月又与房良涿涿合并一县，霞云岭复又改名为九区）；1947年被任命为县工商科长；1948年被任命为六区区长；后又任房山县农民联合会主任；1948年5月任房山县副县长。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平西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抽调一大批富有农村斗争经验的干部奔赴南方（指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农村）帮助进行土改、除匪反霸等斗争，为渡江战役做准备。当时房良两县已分开，都隶属察哈省所辖。房山县委、县政府根据这一指示，不仅派了一大批干部，而且还担负了护送路过干部的工作。此时，已任房山县政府副县长的宿光明亲自带队护送了这批干部，并加入了南下干部工作队的行列。

全国解放后，宿光明又根据工作需要，直接被调到了察哈尔省委，任省委总务科科长。

1950年年底，撤消察哈尔省机构，其行政隶属河北省。宿光明又奉命调到中共中央直属的华北饭店任经理。这个饭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接待来京各界爱国人士以及参加祖国建设的海外爱国华侨。

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撤消华北行政管理委员会，组织华北局，宿光明同志又奉命调入华北局工作，担任华北局行政处处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宿光明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无辜地遭到迫害。有些人竟借他以前参加过联庄自卫团一事，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的人格与尊严，受到了诬蔑。1967年7月14日，面对造反派愈演愈烈的例行逆施，他愤怒之极，最后以死抗争，愤然跳进市内昆玉河，终年五十六岁。

在宿光明沉冤十一年后，党中央实施了“拨乱反正”的重大国策，开始逐

步纠正冤假错案。197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华北局军管及时召集有关部门，为宿光明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华北局党组、北京市委、河北省委、房山县委等许多部门的老领导、老部下刘庆芳、曹庶民等都做了发言，悼念这位为平西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同志。追悼会后，宿光明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烈士英灵永存

唐占忠

张晋龄烈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与敌展开了英勇斗争，直到献出了宝贵生命。窑上地区人民对他的英雄事迹永远难忘，今忆写二、三，以示缅怀。

三闯良乡城

1944年春，驻扎良乡的日寇多次来窑上一带骚扰，百姓生无宁日。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壮大民众势气，区委一方面组织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巧妙打击敌人；一方面有计划地深入敌后，开展宣传搞攻心战，牵制敌人活动。这年农历二月初二，张晋龄化装成讨饭花子，头戴破毡帽，身披麻袋片，肩背破布搭（内装传单和标语），手捧砂锅（内盛浆糊），傍晚来到良乡南门。守门的日军和宪兵正在盘查，看他是个讨饭花子没理睬，于是，混同查过的人们进了城。

夜深人静，张晋龄走大街、串胡同，在僻静处把标语贴在墙上，到住户便将传单塞进门缝。忙了一夜，天亮城门开了他又回到南门。将毡帽往下拉了拉遮住半个脸，蹒跚地凑近城门口，守门的瞅他那副花子样，舞动枪刺吼道：“别磨磨蹭蹭的，快滚出去！”他从容地溜出城门。

天明，城里到处都是“八路军大部队近日打良乡！”“消灭小日本，清灭宪兵队！”“中国人一条心团结起来打敌人！”“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霎时，惊动了城里日军，宪兵队像饿狼挨门挨户搜查。敌人吓坏了，下令四门增加重兵把守。这样，有一些时间敌人龟缩在城里没敢出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占了良乡城。1946年，逃亡地主、汉奸如里渠村的商本斋、官庄村的许炎武等，盘居良乡勾结伪军和还乡团，大肆向窑上一带反扑。为了打击敌人和保护人民，我党开展了除奸反霸斗争。7月下旬的一天，张晋龄和韩营村交通员张珍打扮成掏大粪农民，赶着一辆装粪的马车，天朦朦亮便来到良乡西门。守门伪军拦住盘查，张珍从车上取下一筐桃儿，对伪军说：

“秋天种麦缺肥进城掏点粪，请老总给个方便……”伪军收了“叩门礼”，一杨手说了声：“进去吧！”

张晋龄二人进了城，赶车来到西北角城隍庙后门（据城内地下党报告商本斋住西配房），两人轻手轻脚走进去，院里没人；到窗下一听，商本斋正在洗脸。张珍守在门外，张晋龄掏出手枪闯进屋说：“不许动！”顿时，商本斋吓呆了，小老婆也吓得钻进床下。张晋龄威吓道：“跟我走！”刚迈出门口，被张珍用毛巾堵上了嘴。两人押着商本斋迅速走出后门，到车前像扯死狗一样把他扔进粪筐，盖好盖，鞭子一扬，车又返回西门，守门伪军一见是方才的粪车，怕闻臭味捂着鼻子喊道：“快，快走！”粪车顺利驶出城门。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年夏末，我平南第一、二支队协助区武工队，连续消灭了肖场和公议庄两个伪据点后，准备继续攻打缩进良乡的伪军。为摸准敌情，张晋龄决定三闯良乡城。一天，他化装成卖土碱的农民，推个独轮车走近良乡西门。守门伪军见车上是土碱，没有什么可查之物便放行了。进城不远向左拐进了罗府街。张晋龄看看前后无人，急速将车推进一户人家（我党地下工作联络站）。他得知城里敌人情况后吃了饭卸下碱，推着空车又向南门走来，时近中午，城门口来往行人熙熙攘攘，将走出城门时，那里正和伪军聊天的韩营村伪保长韩仲河一回头认出张晋龄，他如获至宝地高声大喊：“推独轮车的那人是共产党干部，逮住他！”守门伪军应声便围了上来，张晋龄心想，此时身份已暴露，只好和敌人拼了，他扔下独轮车，朝敌人开了枪，打死一个伪军，顿时，行人乱成一锅粥，张晋龄混在人群里越过护城河石桥，跨进白家饭店院里蹿过东墙，飞快向东南方向奔去。任凭敌人慌乱不堪，张晋龄早已穿过京汉铁路，钻进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

诱歼“黑杀团”

自从1946年11月，张晋龄领导的区小队中有一名叫王殿文的队员叛逃投靠了良乡国民党黑杀团头子游申会。我们的同志接连遭受杀害，张晋龄悲愤交加，决心除掉这个叛徒。

1947年农历8月13日下午，张晋龄带领武工队和区小队秘密来到韩营村。他让武工会主任刘国珍叫来老贫农唐怀将两封信交给了他，并且告诉他如何送法。

傍晚，韩仲河（伪保长）老婆正在街上装柴，唐怀拎着上衣走过去，那女

人见状便问：“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去五间房。”唐怀答道并将上衣往身上一披，兜里两封信刚好甩落在街上。他们毫无察觉地朝村外走去，出村不远便藏进路边玉米地里。那女人转脸见街上有两封信，马上捡起带回家。韩仲河打开一看是张晋龄写给五间房、辛庄、鲍庄等村负责人约定今夜 10 点到金门闸（今窑上村东南永家河上乾隆年间修的排水闸），第三孔桥下开会的通知，他如见珍宝，将信塞进怀里骑上毛驴急忙向村外奔去。唐怀看韩仲河过去了便回村向张晋龄做了汇报。晚饭后张晋龄带领队伍来到金门闸。他让战士从堤畔上打来蒿草捆成五、六个草人摆在第三孔桥下，然后，队伍迅速埋伏到南、北坝台和桥面上。

韩仲河到肖场据点把信交给王殿文，他看后高兴得一拍大腿笑道：“哈哈，张聋子（张晋龄外号）今天老子非生擒活捉你不成……”马上召集二十多个黑杀团成员奔金门闸而去。他让逃亡地主陈偏带一部分人从堤里桥东堵截，他带一部分人从堤外包抄。王殿文借着朦胧月光往东窥望，隐约可见桥下有五、六个人，便急不可待地开了枪，同时大叫：“张聋子你跑不了啦！”便狼一般地扑过去。此时，张晋龄一声令下：“打！”“叭、叭、轰、轰……”六、七个敌人应声击毙。其他敌人吓得魂飞魄散、撒腿便跑。“追！决不让王殿文跑掉！”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紧追不舍。王殿文象没窝的草鸡刚跑到桥西鞞塘边，就被战士广明和任万川抓获了。将他押到桥上，张晋龄用手枪对准他的脑袋：“你叛变革命，杀害革命同志，死罪难逃！”“叭！”一声枪响，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终于得到应有下场。张晋龄掏出写有“谁跟共产党作对，危害百姓者，下场就跟他一样！”的告示用石头堆压在王殿文的尸体上，然后，带领队伍踏着月光，沿永定河大堤向南走去。

巧战“六股道”

“六股道”地处琉璃河镇原窑上乡，它北通鲍庄，南至涿州市陶营，东到五间房，西到官庄，东南去韩营，西北去辛庄，形成六股交叉，故而得名。解放前，这里沙丘连绵，梨树成行，墩子杨虬枝参差，蔬凉阴森，路人稀少，是土匪时常出没的地方。

1946 年，良乡国民党勾结地主还乡团疯狂向窑上一带特别是韩营村（当时是涿良宛联合县五区根据地，区长张晋龄常住此村）加紧进剿，白色恐怖日趋恶化。这年 12 月的一天，北风呼啸，黄沙迷漫，驻扎在辛庄的良乡县讨伐

队和还乡团三百余人，在叛徒王殿文带领下，穷凶极恶地向韩营扑来。正在村口放哨的民兵赵永山发现后立即“叭、叭”连发两枪，一方面阻击敌人，一方面以示民众赶快躲避，随后他也迅速地钻进了地道。

敌人进了村，像恶狼闯进各家各户，挥枪东扎西挑，大呼小叫寻找共产党、区武工队、张晋龄、民兵和抗日家属。折腾了半天只抓住孙永民和唐庆两个来不及隐蔽的百姓。王殿文对两人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审问，两人忍着疼痛，咬紧牙关一字不吐。王殿文气急败坏地骂道：“难道你们村的人都是共产党作的！不说，老子崩了你们……”敌人抓不住人，开始了灭绝人性的抢掠勾当，抢牲口，烧民房……把全村糟蹋得不成样子。

当敌人刚进村时，赵永山便从村东头地道爬出，不顾寒风凛冽，快速越过永家河大堤，直奔大兴县赵村跑去（当时区武工队和平南省二支队正在此村休整）。张晋龄听了赵永山的紧急报后，立即组织队伍，并对战友们风趣而果断地说：“诸葛亮借东风灭曹，我们借风沙灭顽敌。”武工队一行人直扑六股道东北高沙丘，张晋龄命令地雷手在西北、正北、正西、正南四股道上埋好地雷；命令鞭炮手带上水桶、火柴和鞭炮埋伏在东北、正东、东南三股道两侧，全体指战员冒着严寒风沙等着敌人上勾。

时近中午，从韩营归来伪军押着十三辆大车和两个老百姓，摇头晃脑地走进六股道。七、八个前卫兵刚到西北股，脚下便踏响了地雷，“轰、轰、轰”几声巨响，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无存，其他敌人顿时昏头转向乱作一团。鞭炮手立即划着火柴点燃鞭炮放进桶里，霎时，叭叭叭，哒哒哒……鞭炮如同机枪声响彻天空。这时，张晋龄和二十几名武工队员顺着强劲的东北风高呼：“冲呀！冲呀！交枪不杀……”一枪未放，十多分钟结束了战斗。十三辆大车和两位乡亲也脱险得救。这次战斗缴获敌人机枪一挺，步枪十七支，子弹三百余发和一些军用物资。

秦芝楼生平传略

顾梦红

了解房山历史的人都知道大石窝镇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尊师重教氛围，这与当地两位名人密切相关。一位是著名书法家石岩，一位是在这个地区呕心沥血培育人才，辛勤工作三十多年的模范校长秦芝楼。

抗战烽火熔铸心志

秦芝楼，祖籍河北献县，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家中经营着一座车马旅店，四十亩薄田，日子也算小康。少年时代的秦芝楼聪颖灵慧，喜读诗书，为人谦和热诚，深得父母和乡邻喜爱。他在《忆儿时》诗中写道“母做寒衣儿夜读，殷切相守到三更”。当时石亭有清末拔贡张文标、张济元父子是河北省声名赫赫的宿儒，他们不慕功名利禄，倾家资致力于乡梓教育，竭心智奖掖莘莘学子。

秦芝楼幼年就读于张济元先生的私塾，国学功底深厚，深得恩师垂爱，12岁时被济元先生聘为己婿。在桑梓乡里，少年秦芝楼有了“儒冠駉马”的美誉。1927年北方军阀混战，秦芝楼家中旅店倒闭，债台高筑，生活陷入窘境。岳父张济元慨然相助，全力支持芝楼继续就读，直至师范毕业。

1929年，秦芝楼考入涞水县官立师范，各科学业均名列前茅，他尤其喜爱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这对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的秦芝楼获益非浅。此间他受进步思想的启迪影响，参加了由保定二师发起的在中国北方影响很大的河北学潮，引起当局的不满，毕业时被发配到涞水县的边远山区虎过庄任教（今河北省野三坡地区）。1932年秋，19岁的秦芝楼毕业后，匆忙完婚，蜜月未几，便只身一人到虎过庄任教。这里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别说学堂，连私塾也没有。立志用文化教育改变山乡面貌的秦芝楼在一座破庙中开始了教师生涯。他传道授业于禅房之内，砍柴种菜于山岭之中；不但物质条件艰苦，还经常有地痞无赖到“学校”骚扰捣乱，甚至夜间装神弄鬼恐吓。人不堪其清苦，

芝楼却不改其心志。寒暑易节，春秋六载，他走乡串户，动员青少年入学，用自己微薄的钱粮资助穷苦学生。在《自述》一诗中他写道：“课读在山村，六载韶光逝。野寺对孤灯，夜雨荒山泪。此情只自知，谁解其中味……”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间，杨成武、肖克率领的八路军来到野三坡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房涞涿联合抗日政府。秦芝楼积极参加抗日文化教育，为青少年讲中华民族历史，教部队战士学文化，很快成为平西根据地知名度颇高的教育工作者。这期间他结识了房山县民主爱国人士周硕臣父子。

周硕臣是颇具名望的开明士绅，周家是中共平西地下联络站。国统区的进步青年投奔根据地，赶赴延安从这里中转，中共地下工作者也从这里进京。这个联络站还担负着搜集情报，筹措物资等工作。由于秦芝楼的教员身份，加之知识功底深厚，联络站把收集敌伪报刊，甄别信息真伪，为中央首长选择采购所需书籍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出色完成任务的同时，他还结识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如姚依林、赵然、陈辉等。

1940年，由周硕臣父子推荐，经抗日联合政府同意，秦芝楼到惠南庄抗日小学工作。这期间，他一个人担负着四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还帮助抗日政府进行减租减息等工作，常常忙到深夜。虽然很辛苦劳累，但他却觉得很充实。他在回忆当时的生活时写道“壮岁遭国难，救亡迫眉际。驰驱战火丛，出没硝烟里。”革命战争的烽火熔铸了秦芝楼的心志，在当地获得了乡亲们的赞誉和学生们的口碑。

解放战争开始时，秦芝楼来到南尚乐下滩村执教。1947年解放区土地改革，村里按照革命干部的待遇把他的家属接来，分给秦芝楼房屋土地，从此，他在下滩村定居生活。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坚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地方服务”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秦芝楼为满足广大贫苦农民渴望学习文化的愿望，成立了一至四年级的复式班学校。不久又增加了五六年级。创业之初，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师；既是校工和门卫，又是总务兼厨师；一个人教语文、数学、书法、珠算、体育等多个学科，工作量之大，超过常人想象。即使如此，正值壮年的秦芝楼非但不觉得苦累，还整天哼着小曲主动为村里土地改革跑前跑后，帮助丈量土地，抱着算盘拨算着田亩面积；为保卫解放区的胜利成果，他组织学生在路口道边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白天教课，晚上写标语、出板报，编快板剧，组织学生屋顶广播。南尚乐地区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敌人经常来骚扰破坏和

捣乱，他发挥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以文化教育为武器，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

艰苦创业情系桑梓

1948年底，房山全境解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到了重要位置，人民政府为了满足广大工农群众对文化教育的急切需求，制定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

1949年2月，秦芝楼参加了房山县知识分子学习班，认真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从1949年到1956年，他先后担任下滩完小主任、南尚乐完小主任、南白岱完小主任、张坊学区校长、南尚乐学区校长等职务。这些地区，在解放初期，有的村根本没有学校，有的村只有一两个年级，校舍残破，教室透风漏雨；师资匮乏，教学也很不规范。秦芝楼满怀豪情，为营建新校园，为添置课桌椅，为动员学生入学，为聘请年轻有为的教师，席不暇暖食不甘味。为筹措资金，争取上级的支持，秦芝楼跑县城、到专区。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年轻教师言传身教；把学生视为嫡亲子弟，严格要求又关心备至。房山区西南乡的基础教育从建国初期到如今，始终在全区名列前茅，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房山县的各级领导干部，秦芝楼功不可没。50年代中期，秦芝楼被推荐为房山县首届政协委员。当时的房山县委文教部长李栖良称赞秦芝楼是“房山西南乡教育的奠基人”，这评价恰如其分。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让广大农民尽快走上富裕文明之路，上级决定建立南尚乐“戴帽中学”（即在完小的基础上加设中学班），秦芝楼兼任校长。学生来自长沟以西、十渡以下的农村青少年，教师大部分是南尚乐张坊地区各完小的主任、副主任、骨干教师。秦芝楼与广大干部教师一起，齐心协力，严谨治学，把一个乡村中学搞得红红火火。

在大跃进的岁月中，北京高校的讲师下乡讲课，带来了城区治学理校先进经验。南尚乐中学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开拓出农村中学的教学和管理新路，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958年，秦芝楼应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邀请，写了关于解放区教育和农村中学发展的文章，发表在北师大校刊上。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在全市中学统考中，南尚乐中学的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在全市

也名列前茅，南尚乐中学名声大震，被评为北京市普教系统红旗单位。秦芝楼被评我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明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秦芝楼从北京扛着红旗回来了，为房山争了光”。

这一年，秦芝楼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群英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接见。从北京回来，秦芝楼更加振奋精神，他在赠高尚良老师的诗中写道“桃李盈阶信手栽，细心培育自成材。今日分手君须记，明年花开可再来”。

从1959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南尚乐中学的统考成绩和升学率一直处在全县领先地位。北京郊区乃至河北省的许多学校纷纷到这里学习取经。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几次来到学校视察指导。市教育局也曾多次研究，打算把南尚乐中学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可惜，一场浩劫把宏图变为泡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秦芝楼未能幸免，被诬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挂上黑牌子，被押上批斗台，遭受了22个月的摧残。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自述》诗中道：“帽子漫天飞，冤案如山积；忠诚是罪状，勤恳遭攻击。凌辱与漫骂，使我身心疼。午夜自寻思，扪心实无愧。凛然对狂徒，残暴何所惧……”

老骥伏枥 鞠躬尽瘁

1973年，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工作，开始治理整顿，教育界也见到了一丝曙光。秦芝楼被摘掉了黑牌子，不再批斗。他不顾病魔缠身，先后到半壁店中学、长沟中学任副校长、校长。但不久，又一场反回潮、反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袭来，秦芝楼只得抱病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房山县教育局领导准备把长沟中学办成重点中学，决定让秦芝楼任校长，专门派人到河北省把他接回来。此时，他已是65岁高龄的老人。

第二次来到长沟中学，秦芝楼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组织配备有能力干实事的领导班子，加强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设，狠抓校风校纪的规范管理。长沟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社会声誉和知名度迅速提升。秦芝楼“严而有格，宽而有度”的管理经验在房山县传播推广。

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秦芝楼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但他仍然坚守岗位，直至在工作中摔坏了腿，才离岗病休回家。他遗憾地写到：“巍巍百年业，

辉煌亿民计。叹我近七旬，百病又交集。耿耿一片心，报效实无力。”

1985年，秦芝楼不幸病逝，享年72岁。

秦芝楼一生致力于农村教育，情系热土，其人品事业，有口皆碑。可谓桃李满天下，赞誉遍房山。

忘我拼搏的由培先

宋景宽

1954年4月28日，一支输变电施工队伍在良乡东北关昊天塔下落户了，正式成立送变电第二工程公司（北京送变电公司前身）。几十年来，是良乡这块沃土哺育了北京送变电公司职工，培育了无数个优秀共产党员，由培先就是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

1956年，由培先毕业于吉林电校，他怀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愿望，迈进了北京送变电公司大门。从此，他扎根良乡，为祖国电力建设忘我拼搏了三十二年。

由培先学的是电力网专业，几年后，领导让他改行做开关板结构技术员。这一改行跨度非常大，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为了做好工作，他发奋读书，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大学机械专业主要课程，为后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4年，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庄重地向党组织表示“只要是党的需要，我就尽力去做，甚至可以献出鲜血和生命，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从此，他把自己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誓言。

为了使书本的知识更好地运用于实践，他边学习，边深入班组跟工人一起劳动，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并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和新产品试制。

为了保证工艺质量，降低消耗，从1973年开始，用了五年的时间整理了3000余张仿苏式开关板结构图。既方便使用，又提高了效率。

在开关板生产中，原来是用手工开孔，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他设计了一套模具，用机器冲孔代替部分手工开孔。他要实现开关板全部机器冲孔，而原有的冲床没有那么深的虎口，于是，1975年6月，他开始设计深虎口冲床。机床设计谈何容易？在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下，他不畏艰难，向技术难关冲击了。他翻阅、收集、整理了大量技术资料，分析、计算。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饿了啃口馒头，渴了喝口水，用了三个月（边工作边设计）时间，终于

将深虎口双柱 80 吨冲床的全部零部件图及总装图设计出来了。在冲床制造过程中，他和工人师傅共同研究，用现在的 50 毫米摇臂钻加工，用它代替铣床、镗床。他设计了一个夹具，可以变换不同的角度。为了尽快加工出冲床，工人昼夜倒班干。开始几天为了让大家熟练掌握加工技术，他几乎班班跟着，大家看他消瘦的样子，心疼地说：“老由，这样下去身体要搞垮的，你不要总跟着干了。”他笑了笑，依然坚持跟班。在他的精神鼓舞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冲床制造出来了。随后，他又设计制造了一个电动定尺。从此，开关板生产达到了半自动化程度，比过去提高工效 10 多倍。

1976 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电厂、电站遭到破坏，局领导决定要立即恢复送电，各电站恢复送电的表盘（当时取名抗震箱）全部由北京送变电公司表盘车间承担。可是没有图纸和可参考的技术资料。时间紧迫，车间立即派由培先等二人到现场勘察用电情况，了解控制盘、保护盘的技术要求。这是震后第三天，余震还不断发生，塌下的楼板把表盘压得七扭八歪，楼板不时发出“咔咔”声，碎水泥块、砖头不断地往下掉。怎么办？他们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直到在里面画出全部草图，就是靠这种不要命的精神，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回到良乡，他便一头扎到办公室设计图纸，当夜就把全部图纸画出来了。随后又到班里跟工人一起干。由于大家的努力，仅用三天三夜就把加工好的表盘运到了电站。他也三天三夜没有回宿舍睡觉，困了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会。醒来用凉水洗把脸，又投入工作。看到他熬红的眼和日益消瘦的面颊，大家都关切地劝他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他只是感激地点点头。

1981 年初，北京供电局决定在配电系统中逐步装设计量柜，旨在控制用户定量用电；其次，准确电能计量。它对缓和供电紧张，减少电能漏计起着重要作用。当时，他们想到技术精湛对生产开关板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由培先。委托他进行第一批计量柜的设计、试验。经他精心设计，新产品很快诞生了。试制品经半年运行，情况良好。

1982 年初，北京供电局又要他进行“第二代”计量柜 8 个方案的研究、设计。该项课题难度很大，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他又勇敢地承担了。对于集电气工程师、结构工程师于一身，有基础理论指导，又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他不怕吃苦的精神，“第二代”计量柜很快就诞生了。通过运行，供电局高度评价了他设计的计量柜。从此，开关板生产又增加了一种新品种。

由培先的名字和表盘车间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由培先也就没有表盘车间的发展。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表盘年产量 300 面左右到 80 年代中期的 3000

面左右，每一次发展都凝聚着他的汗水。表盘车间是线路器材厂（北京送变电公司的下属厂）产值和利润最高的车间，文化大革命后期，线路没任务，全公司开支全靠表盘生产维持着。由培先是对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

1983年9月，表盘车间接受了北京房山500千伏变电所架构的加工任务。它是三角形铁管架构，铁管间通过联接板用角钢连接。这样，铁管上要焊不同角度的联接板，联接板与支撑角钢相连要完全吻合，技术难度很大。由培先接到这一任务后，连续七八个夜晚在办公室工作到一两点钟，每张图纸、每个尺寸他都要反复计算，当把图纸下到班组后，他又带领工人做样板，焊胎具。在组装过程中很顺利，他计算的尺寸很准确，在场的领导和工人师傅感慨的说：“咱们老由不但干表盘是‘专家’，干别的也是硬手啊！”

根据由培先的突出表现，1983年11月21日，党组织吸收他为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

1984年初，他从线路器材厂到北京送变电公司下属第三工程处搞机械配套和技术革新。当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说：“只要是党的需要，我就尽力去做吧！”他深入施工现场了解情况，亲自动手设计、放样、参加试制，搞成功了比较规范的吊装工具，使吊装机械台班降低50%，保证了施工安全顺利地进行。随后，他又接受了房山500千伏变电所主变压器架构的加工任务。这是一项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起攻下了这一难关，节约加工费39000元。

5月初，为了房山500千伏变电所蓄电池按时充电，领导把解决蓄电池注酸罐的任务交给了他。从设计、加工、采购零部件到拿合格产品都由他去办，而时间仅有10天。他怀着无私无畏事竟成的信念，把这副担子挑了起来。任务如期完成了。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从那天起，我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抓紧业余时间设计图纸，寻找加工点，采购零部件，有时为了解决特殊的零部件误了班车，在车站过夜。于是零部件解决了，注酸罐按期投入使用，心里格外高兴。”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正因为他有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他三十二年革命生涯中，始终遵循着“做好工作是自己的本分”他的这一句名言。

“做好工作是自己的本份”，这是由培先常说的一句朴实的话。几十年来，他从技术员到工程师，身份变了；从线路器材厂到第三工程处，单位变了；从健壮的体魄到重病缠身，身体状况变了，但他这句朴实的话没有变，他走到哪里就把自己“本份”体现在哪里。

从由培先一生——平凡的岗位、辉煌的业绩中看到“知识就是力量”。他在1980年4月30日《技术干部业务考核档案》业务自传栏“理论”、“知识”、“能力”的成长过程中写到“我没有什么本领，自我相比有提高，这主要是党的培养，要求我、促使我去提高。形势促使我学习基础理论，这些都不能不使得我努力去钻研科学技术和业务知识，反过来又去满足生产需要。”

1986年11月，他住院后，经诊断是鼻咽癌晚期。他给哥哥写信，嘱咐不要将情况告诉父母，免得老人惦念。

由培先没被死神吓倒，更没有悲观、消沉，而是充满着对生活的眷恋和战胜疾病的勇气。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的病床是通往人间的希望，绝不是死神的接待站，我要向病魔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88年11月22日早晨6点，由培先像往常一样，穿好衣服准备下楼走一走。到楼下没走几步，突然摔倒了。在场的同志立即通知第三工程处，工程处领导及时把他送到友谊医院。当天下午，他对公司及处领导说：“看来我不能在为党工作了。……我还有9000元存款，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我死后把遗体献给医院，解剖作科学研究，好给更多的人治病。”

11月24日6点10分，由培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按照他生前遗愿，遗体做了病理解剖。医生惊异地发现：他全身布满了癌瘤，颈椎骨前两节已经变黑，一碰就碎了。医务人员掉下了眼泪，说道：“好人啊！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好人！这该承受多大的痛苦！可你竟没有吭过一声！”

1987年9月17日，北京送变电公司党委发出《关于号召全体党员、职工向由培光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公司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北京送变电公司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职工向由培光学习。学习他勤奋工作，刻苦学习，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的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忠诚老实，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精神；学习他对待组织多做贡献，少索取，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对恶疾顽强斗争，忘我拼搏的精神。

杨浚与中国第一套 30 万吨乙烯工程

孙 明

杨浚（1922—1999），福建省福州人，中国化工技术和科技管理专家。新中国大型石油化工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1970 年 2 月杨浚由化工部化工原料工业公司调至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燕化公司前身）工作。1978 年 3 月 24 日由燕化调至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和科委副主任之职。此间，杨浚与科委其他领导开展的计算机应用（特别是微机应用）工作，开中国应用微型计算机之先河；他倡导的、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星火计划”，在中国广大乡村实施后，取得巨大成功，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他完善和发展了科技进步奖励制度，创立了国家星火奖，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1985 年，杨浚被任命为六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1988 年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0 年 2 月，杨浚由化工部调至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的前身——北京石油化工总厂，8 月 11 日，担任石油化工总厂临时党委常委，其后于 1971 年 9 月至 1973 年 5 月任总厂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一直负责技术和生产等工作。组织完成了顺丁橡胶会战和中国第一套 30 万吨乙烯工程的建设等工作。把中国的石油化工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1 年，作为主管技术工作的总厂领导，杨浚在燃料化学工业部的支持下，组织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研究和设计部门及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对胜利化工厂年产 1.5 万吨顺丁橡胶生产装置存在的连续运转时间短，“一堵（管道容易堵塞）、二挂（反应物挂在反应釜壁，不容易消除）、三污水（污水排放量大）、四质量（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等问题进行攻关会战。经过近 2 年努力，于 1974 年再次开车，运转周期达 240 天，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到 1976 年，这套生产装置年产量达到了 6 万吨。这一成果获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98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72 年，杨浚重点抓了年产 30 万吨乙烯装置建设，开展了以引进年产

30万吨乙烯装置为中心的“四烯”（乙烯、丁二烯、聚丙烯、高压聚乙烯）工程建设大会战。经过3万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仅用27个月，就完成了一期扩建工程，成为中国建设大型引进乙烯装置的成功范例，从而使中国石油化工技术向世界先进水平迈出了有力的一步。

建设决策

1970年初，中国乙烯年产量不到3万吨，乙烯生产水平的落后，制约着石化及下游工业水平的提高。1971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乘专列由上海返京。一名工作人员讲述了在上海买“的确良”布难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提出要引进一批石化、化肥、化纤生产装置。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利用国内石油资源，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装置，加速发展石油化工、化纤、化肥工业。报告经周恩来、李先念等批准、报毛泽东同意。

当时，燕化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利用工程正在展开大规模建设，负责技术工作的杨浚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由于我国缺少发展石油化工的经验，并受当时国际环境、资源和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这些代表中国当时最高石化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化工原料没有充分可靠的保证。由于原计划只建一个炼油厂，化工产品的生产主要是建立在利用炼厂气及极少量的石油产品基础上的，化工原料来源不可靠，而且质量不够稳定；二是综合利用方案品种很多，但是规模不大，特别是化工产品规模较小，布局不紧凑，辅助系统庞大，投资效益差。

面对国家大力发展石化工业的机遇，曾经在吉化接待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总理表扬为又懂技术又懂管理的杨浚，自然十分关注国家决定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情况。

1972年4月，杨浚编写了《把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成大型石油化工基地（草案）》，首次提出把燕化公司的发展目标从“综合利用”向“大型石油化工基地”方向调整，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否定综合利用工程可能会被扣上“否定自力更生路线”、“洋奴哲学”等等大帽子。但是杨浚凭着他对中国石油化工事业的热爱，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我国石油化工工业自五、六十年代发展以来，一直走油头化尾的路子。即利用炼油厂

尾气生产化工产品，所以规模小，发展很慢。报告认为：按我国对石油化工产品的需要量和世界石油化工技术发展水平看，我国还没有一个大型石油化工骨干企业。他建议，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建立几个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同时，把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改造为一个大型石油化工基地。

就燕化公司规划问题，杨浚在草案中，提出炼油能力由 250 万吨增加到 600 万吨，汽、煤、柴油产量保持原设计（250 万吨原油）的水平，润滑油产量比原设计增加一倍。化工产品由年产 14.5 万吨扩大到 80 万吨，其中三大合成材料由 6 万吨扩大到 57 万吨。为此，常减压蒸馏、润滑油、各化工装置都要进行扩建改造，将原 12 万吨轻油裂解分离装置改为 20 万吨，并新建 40 万吨轻油裂解分离装置一套。“五五”期间再建一套 50 万吨轻柴油裂解分离装置，乙烯总产量达到 24 万吨。建高压聚乙烯装置和聚丙烯装置等。

报告完成后，以当时石化总厂党委的名义上报燃化部，表明了当时石化总厂建设大型石油化工基地的决心，这与当时以康世恩、徐今强为首的中国石化的决策人发展大型石油化工基地的思路不谋而合。

1972 年 5 月 13 日，燃化部在北京召开三大合成材料会议，燃化部的领导仔细分析了各大企业的各方面条件，并充分考虑了企业的主观意向，决定在北京石化总厂建设我国第一套引进的 30 万吨乙烯装置，搞大基地。此方案报请国务院，得到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批准。杨浚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而非常高兴。

方案确定

要建设大型乙烯装置，首先要解决原料路线问题。国外的原油轻组分含量高，多采用石脑油为原料。而我国原油重组分含量高，石脑油收率只有 6%-8%，按当时 250 万吨的原油加工量，按照 3 吨石脑油生产 1 吨乙烯计算，原料肯定不能满足 30 万吨乙烯装置生产的需要。因此，杨浚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轻柴油为原料。但是，当时国外乙烯生产技术比较成熟的工艺是以石脑油为原料，轻柴油作为裂解原料的乙烯生产装置在世界上还没有一家工厂有成功的经验。杨浚与当时任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规划室主任的吴嘉祥等人多次探讨这一问题。

1972 年 6 月 12 日，轻工部、燃化部、外贸部共同组成的中方谈判小组，在北京与外商开展关于引进石油化工、化纤（原料）生产装置的技术谈判。参

加谈判的主要外商为日本三菱油化公司、可乐丽公司、东洋工程公司等近十家日本公司，以及美国、联邦德国的有关公司和厂商。吴嘉祥作为专家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谈判中，他通过日本东洋工程公司了解到，美国鲁姆斯公司用轻柴油作为裂解原料，实验已经获得成功。吴嘉祥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杨浚作了汇报。杨浚认为，如果用柴油作原料，国产原油中含 23%，按当时 250 万吨原油的加工量，30 万吨乙烯原料就解决了。经过反复测算，杨浚认为有把握，便让设计院作方案。

方案确定后，杨浚向当时主持燃化部工作的副部长徐今强作了汇报。徐今强当时问：“用轻柴油作原料有多大风险？”杨浚详细地给徐部长分析了利弊，他说：“如果说有风险，主要是两个，一是以轻柴油为原料，乙烯收率略低一些，但丙烯、丁二烯收率较高；二是裂解炉清焦周期短些，轻柴油 40 天一次，石脑油 60 天一次。风险不大，却解决了原料问题。”徐部长认可了这个方案，他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你们要立军令状。

8 月 29 日，在杨浚主持下，编制《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调整建设方案汇报提纲》，明确提出调整原综合利用方案。

9 月 7 日，在中共北京市委万里和燃化部徐今强主持下，对北京石油化工基地建设方案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总厂杨春茂、林源、杨浚参加会议。根据尽量减少对环境污染的原则，基本肯定了石化总厂调整建设方案，选择无毒、低毒、污水少、易处理的品种和工艺流程，决定调整原综合利用建设项目。取消未动工的乙丙橡胶、异戊橡胶、甲醛、涤纶聚酯、锦纶聚酯、腈纶聚酯、乙二醇、轻油裂解、有机玻璃、丙烯酸甲酯和硫酸铵等 11 个项目；引进 30 万吨乙烯（包括丁二烯抽提）、18 万吨高压聚乙烯、8 万吨聚丙烯、4 万吨涤纶聚酯、6 万吨乙二醇、15 万吨脱烷基制苯制萘等 6 个建设项目；原油加工量增加到 600 万吨。9 月 9 日，燃化部向国家计划委员会上报《建设北京石油化工基地和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问题的报告》，燕化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编制了《扩建工程计划任务书》。

在方案确定的同时，与外商的谈判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1972 年 12 月 25 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与日本东洋工程公司签订引进 30 万吨 / 年乙烯生产装置（包括丁二烯抽提装置）的合同，29 日举行签字仪式。成套设备合同总价为 9650 万元人民币（折合 4250 万美元）。合同规定 1974 年 1 月开始交货，年底交完，1975 年 12 月 31 日建成。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外乙烯技术的实际生产情况，1973 年 5 月，燕化公司

杨浚、张彦宁、吴嘉祥、李作政等人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一行 10 人赴日本三菱石油化工公司对乙烯装置作了详细考察。并确认，轻柴油作为乙烯原料是可行的。回国后杨浚向徐今强作了汇报，徐今强非常支持。

6 月 20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查修改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计划任务书》后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报《关于审批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工程计划任务书的报告》。李先念于 24 日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审批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这个工程很重要，建议计委、各有关部和北京市经常讨论工程进展情况，真正能够多快好省，真正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否则，国外设备一到，而我们的工作和原料设备跟不上，很不好，必须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 11 位中央领导圈阅。

同年 8 月 20 日，与日本住友化工公司签订引进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合同；9 月 29 日，与日本三井油化公司签订聚丙烯合同；10 月 26 日与日本日曹工程公司签订乙二醇合同。至此，引进工作全部完成，燕化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开工投产

1975 年下半年，乙烯工程进入收尾阶段，10 月 28 日，北京市和石化部联合成立乙烯工程试车开工领导小组，具体开车投产工作由燕化公司杨浚、葛立兴负责。杨浚等同志与化工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设计和科研人员，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共同研究，首先制订试车方案，指导试车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生产准备工作中，在杨浚等领导的精心组织下，重点进行了组织准备工作，由于参加开工的职工，有一半左右是入厂不到两年的学徒工，老工人也没有在这样大型的、现代化的装置上操作过。燕化陆续派出组织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出国实习，大部分人员到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等老企业实习。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出国实习人员作用，狠抓技术练兵，边讲课，边到现场熟悉流程和设备。化工一厂裂解车间开展了百次练兵、百次假设事故处理、百问不倒的“三百”练兵竞赛，苦练基本功。并组织职工参与工程质量检查验收、设备检验、仪表调校、设备管线吹扫、试压和化学清洗。还让他们承担烘炉、催化剂装填、系统干燥和单机试运、联合试运工作，受到实际锻炼和考验，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再次是抓了物资准备。生产所用的百余种化工原料、数十种润滑油、数千种备品配件，基本上以国内为主，国内没有的

就从国外进口，采购了生产必需的储备量；同时编制了工艺规程、设备维修规程、安全规程、分析规程和岗位操作法等各种技术文件，建立了各种管理制度、各种原始记录报表，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技术文件。

在开车过程中，杨浚深入生产一线，与广大技术人员和职工共同探讨技术难题，经常加班加点，甚至彻夜不眠。按照“单机试车要早，联动试车要全，物料试车要稳”的方法，燕化采取先易后难，解炉、15座精馏塔、103台换热器、6000台件仪表、几万个阀门，驱动物料通过30万米管道，无一操作事故，这套30万吨乙烯装置是世界上第一套以轻柴油为原料的裂解装置，从1976年5月8日正式投油到生产出合格产品只用了9天零15个小时，比国外类似装置开车的平均速度21天快了一倍。5月18日，丁二烯抽提装置投料试车，仅用两天零8个小时就生产出合格的丁二烯，6月7日，高压聚乙烯装置投入催化剂后两个小时就生产出合格的高压聚乙烯粒料。聚丙烯装置投料，22个小时后就生产出合格的聚丙烯粒料。“四烯”开车取得一次成功。比原计划的投料试车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在乙烯装置现场工作的美国技术人员给鲁姆斯公司打电报，说中国用了不到10天时间就出了乙烯，这个公司认为没有这个可能，回电要求“再调查核实”。那位在现场工作的美国人说：“在没有乙烯冷剂条件下，用这么短的时间生产出合格乙烯，这确实是世界第一水平”。

“四烯”投产后，经过一个阶段的考核，中日双方代表分别于1976年10月6日、12月10日、12月30日进行交接验收签字。扩建工程从1974年4月乙烯装置开槽动工，到1976年6月“四烯”等装置全部生产出合格产品，仅27个月，创中国建设大型引进装置成功范例。使燕化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四烯”的投产，使燕化的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在投产第二年，即1977年，燕化一跃取得了工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实现利税突破10亿元的“双突破”。

乙烯装置的建成投产，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石油化工工业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中国工业的发展史册，而被誉为“化工名将”的杨浚也以其在这一工程中的出色贡献而载入史册。

葬于良乡的窦燕山

赵思敬

宋代学者王应麟所著《三字经》，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赞颂之句。窦燕山，这位五代后周时期的教子典范，与良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就葬于“良乡西北十五里的窦各庄”。

窦燕山其人，正史无传。《宋史·窦仪列传》中，有简略记载，为叙述方便，现将窦燕山长子“窦仪列传”摘录如下：

窦仪，字可象，蓟州渔阳人。曾祖逊，玉田令；祖思恭，妫州司马；父禹钧，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禹钧，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历沂、邓、安、同、郑、华、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为户部郎中，赐金紫。显德中，迁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致仕。

从以上记载看，窦禹钧为后周人，官宦人家，宦至谏议大夫。祖籍蓟州，这里所说的蓟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地区和京东三河、蓟县等河北省区。这只是窦禹钧祖籍的说法之一，查阅编纂于1979年的《涿州志》，也说窦禹钧为范阳人。古代的范阳，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北京地区。并说窦禹钧之墓在涿州团柳村。这个说法源于明朝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今涿州西二十里有窦禹均墓，土人但呼为十郎冢”的记载。但据墓前石碣所记，此墓为明朝太监窦吉祥之墓，石碣中说吉祥为窦仪九世孙，葬于祖坟。我以为这是不可靠的。因为“祖坟”的概念比较含糊，所以，此处所说的“祖坟”，未必就是窦燕山的埋葬之地。再看另一条例证，也与窦燕山有关：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昌平十三陵附近的龙田庄一带，有一个棵古槐倾斜了，园中的太监们便集资把树扶正了，同时建起围墙加以保护，还立碑一通，文曰：

山色何峥嵘，浓绿摩苍舞。
霏微堕宿云，精神畅新雨。
入碧俨披堂，寻阴谬移舞。
灵椿孰与老？良木肯同腐。
花不为人黄，风但清环堵。

蔚蔚蟠龙碑，圣迹相千古。

文中的“灵椿”，指的就是窦燕山。这通石碑很可能被清代的顾炎武看到了，所以，他在《昌平山水记》中说，明代陵园“东山口内二里景陵果园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数十围，中空，可容十人坐，传为燕山窦氏山庄。”一个“传”字，可知顾炎武也没有肯定窦燕山故居即此地，当然，也就很难说窦氏为昌平人。不仅如此，从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在“宛平·古迹”中又说：“窦禹钧墓，墓在城西二十里玉河乡之鲁郭村。”明代的宛平县署故址在今北京西城平安里路东，地名东官房，以此方位推断，鲁郭村应在今京西八宝山一带。同一时代的书籍，对窦燕山的葬地却有4种不同的记载，可见，这些记载与历史出入甚大。

那么，窦燕山葬于良乡的根据在哪里？民国十四年（1925）编修的《良乡县志·乡贤》篇记载：“窦禹钧，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为左谏议大夫。致仕广行阴德，置义塾，延名儒给衣食以教四方游学之士。生五子：仪、俨、偁、侃、僖，相继登科，时号窦氏五龙。”这里的左谏议大夫，显然为正史右谏议大夫之误。成书于民国年间的《河北通志稿》，在“地理志·古迹”条目中也说：“窦禹钧墓，五代周，良乡西北十五里窦各庄。”同时，《河北通志稿》还说“《窦谏议阴德碑》，佚，在（良乡）县西北十五里，范仲淹撰。”编纂者因考《范文正集》中不载此碑文，所以推断碑文为窦氏家人或后人所为，我以为这种说法也未免武断。

清朝于敏中等人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京畿·良乡县》条目下收有署名范仲淹的窦氏碑文，文曰：

窦谏议阴德碑

窦禹钧，范阳人，为左谏议大夫致仕。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冯道赠禹钧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人多传诵。禹钧生五子：长曰仪、次俨、侃、偁、僖。仪至礼部侍郎尚书，俨为翰林学士，侃右补阙，偁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钧家甚丰，年三十无子，夜梦亡祖亡父谓之曰：汝早修行，缘汝无子，又寿不永。禹钧诺。钧为人素长者，先有家仆盗用房廊钱二百千，仆虑事觉，有女年十二三，自写一券家臂上，云求卖此女以偿所负。自是远逃。禹钧见女契，甚哀怜之，即焚券留女，嘱其妻善视之。及笄，以二百千择良配，得所归。仆闻之，还归感泣，诉前罪，禹钧不问。父子由是图禹钧像，晨夕以祝公寿。尝于元夕往延寿寺，忽于佛殿后得金三十两，银二百两，持归，朝日诣寺候失物主。须

舆一人涕泣至，公问所因，具以实告。曰：父犯罪至大辟，至亲戚处贷得金银若干，将以赎父罪，昨暮以相知治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赎矣。公遂与之同归，还以旧物，仍加赠焉。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贫困者，有丧不能葬，公出金葬之，凡二十七人。亲旧孤遗有女未能嫁者，公为嫁之，凡二十八人。或与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则择其子弟可委者，随多寡贷以金帛，俾之兴贩自给。由公而活者数十家。以至四方贤士赖公举人者，不可胜数。每视岁之所入，除伏腊外皆以济人之饥。居惟素俭，器无金玉之饰，家无衣帛之妾。于宅南建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居师席。远方寒士觅无所就师友无供需者，公咸资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子弟闻见益广，凡四方之士由公门登贵仕者，前后接踵，来拜公前，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礼。及公之亡，有持心丧以报公德。先是，公梦亡父后十年，复语公曰：以汝有阴德，特延三纪之寿，赐五子各荣显。公享年八十二岁，沐浴别亲戚，谈笑而终。五子八孙，皆通显于朝。后之教子必曰燕山窦十郎云。

《良乡县志·艺文志》亦有《窦燕山阴德记》，与此文大同小异，只是未标作者姓名。从以上碑文中，我们得知，窦禹钧最初的家道非常富有，但为人却很恶劣，常常昧心行事，借势压人，以至于年已三十岁，仍膝下无子。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一天夜里，禹钧梦见了爷爷和父亲，他们严厉地批评教训了他，说：你的心术不正，所以三十岁还没有儿子，不仅如此，你的寿命也会宿短。禹钧听了，连忙点头称是，并表示改恶从善，多积阴德。一觉醒来，他决心改恶向善。多做好事。具体事例有：家中一仆人盗钱二百千，后怕禹钧发现，将十二三岁女儿卖于他以抵债，禹钧嘱咐妻子将女孩抚养成人，并以二百千钱择婿出嫁。元旦到延寿寺进香，捡到三十两金子、二百两银子。等了一天，终于物归原主。凡男女婚配，贫困交加和死不能葬者，禹钧都慷慨资助。更令人称赞的是他在住宅南边盖了四十间房子，设立义馆，聚书千卷，办起了义学，使无力读书的儿童能够上学。做了许多好事之后，禹钧果然生了五个儿子。由于他对儿子们“教之以义方”，五个儿子后来都当了官。长子窦仪为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窦俨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窦侃曾任补阙；四子窦偁为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窦僖曾任起居郎。冯道诗中“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中的“灵椿”，指窦禹钧，这源于《庄子·逍遥游》：“大椿长寿”，“五枝芳”，喻其五子。这便是古语“五子登科”的来源。十年后，窦禹钧又梦见了死去的父亲，父亲对他说：“由于你积了阴德，所以可延长三十年寿命。”窦禹钧后来

果然享年八十二岁。



五子登科花钱（正、反面）（赵思敬提供）

窦禹钧教子有方，后世的艺术家们便以他为题材吟诗作画。清代海上画派著名画家任颐（字小楼，后字伯年），于清光绪年间画有《丹桂五枝芳》图。画面为在一长方形条案旁，面带微笑的窦禹钧手持戒尺，坐在孩子身边。画面视觉中心为长子教弟弟写字，另一子手拿书卷注目观看。后另一子则抱幼子立于窦禹钧身旁，背后为一高大丹桂树。整个画面使人感觉窦禹钧的慈爱之中蕴含严厉。可见，窦禹钧是以“棍棒出孝子”的教育方式闻名于世的典范。在后世铸造的花钱当中，也有许多铸有“五子登科”的吉语钱，五子，指窦燕山的五个儿子，“登科”指入仕做官。这些都是窦禹钧留在历史回廊中的影像。窦禹钧之所以被称为窦燕山，是因为古人称谓，多冠以地名，就像祖籍涿州的刘备因做过“豫州牧”，因而后来被人称为“刘豫州”一样，窦禹钧在做了许多善事之后，自然便以其居住地附近之“燕山”之名称之。

窦禹钧下葬的“窦各庄”，就是现在青龙湖镇的“豆各庄”村，村子所处地理为丘陵向平原过渡区，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豆各庄之“豆”字，是从“窦”姓转讹而来。如果这个解释可以成立，那么，豆各庄就应该是窦燕山的下葬之地，属名范仲淹撰写碑文的阴德碑，就应树立在这个村的周围。《日下旧闻考》的作者于敏中，生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未见此碑，可见窦燕山之阴德碑应遗失于清代乾隆年间。

爱好历史的人都知道，名人的墓葬和故里，历来是各地争夺的对象，窦燕山也不例外。关于他的葬地和故里，就有种种记载。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于1956年发掘定陵期间，与赵其昌先生曾专门谈到窦禹钧的



反映窦燕山“教五子”的清代画家任颐作品《丹桂五枝芳图轴》（赵思敬提供）

故里问题，他说：“我也查了查书，找不到什么直接线索。就现有的材料看，要属于他（窦燕山）出生在山沟的可能性略大些。当官成了名，应酬多起来，山沟自然不便。涿州地处要冲，可能在那里建宅落户更方便些。文人、官吏要面子，不好说山沟生人，就笼统说是幽州、范阳人氏了。不过还得看看，那儿是否有子孙繁衍，姓窦的多不多。有空时你（指赵其昌）可以去涿州看看，才敢说定吧！”吴晗与赵其昌的谈话过去 48 年了，吴晗先生于十年浩劫中与世长辞，赵其昌先生也没有时间到涿州去搞调查。两位先生关于窦氏的对话，似乎只能搁浅于此了。如果我们查阅其它方志类的书籍，还可看到有关窦燕山故里和墓地的记载。我想，这也是合情和理的，因为，窦燕山去逝时有五子八孙，他的晚年很可能频繁穿梭来往于子孙住地之间。所以，后人根据他的行踪，把这位教子典范说成是自己的乡贤或下葬之地，也是毫不奇怪的。我以为，如果窦燕山真的像吴晗先生所推断的那样，是把家从山里搬到了涿州，但那里却不宜选择墓地，因涿州处于交通要道，繁华之外，更易发生战乱，葬于良乡窦各庄一带，应是比较适宜的。这里不但僻静，而且交通也十分便利。我们期待《窦燕山阴德碑》这个消失了三百多年的文物，有一天能在豆各庄一带出土。

参考书目：

- 《宋史》（元）脱脱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下旧闻考》（清）于敏中等编纂北京古籍出版社
- 《昌平山水记》（清）顾炎武北京出版社
- 《顺天府志》（清）孙承泽北京大学出版社
- 《良乡县志》民国十四年版
- 《北京古今名人辞典》马尚瑞主编新华出版社
- 《中国古代职官词典》沈起炜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 《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
- 《燕都》1990 年第 6 期
- 《涿州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无偿献血的苗忠

唐占忠

苗忠，1933年生，农民，房山官庄村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个人无偿献血总量达53000多毫升。在房山区、北京市乃至全国无偿献血事迹中，也可谓寥寥可数，令人敬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很快战争的火焰燃烧到鸭绿江边。在危难关头，中国政府迅速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3年春，官庄村里召开征兵动员会。会上，苗忠意志坚定地向区委书记顾宪图递交了“报国赴朝”血书。三天后他光荣地参加了志愿军。从良乡上火车出山海关直达丹东大桥。稍作休整待入朝时，部队突然接到上级换防命令，于是调头开往哈尔滨驻进了军需处，任务是严密看守苏联支援我国的各种武器和弹药。

当时朝鲜战场打得非常激烈，志愿军伤病员有些需送回祖国治疗。不久，军需处接收一批重伤员，有的急需输血，军需处发出献血号召，苗忠率先报名并跟领导讲：“我参军就想去朝鲜打美帝，不怕流血牺牲，在这里站岗巡逻有劲使不上，如今看到战友负伤缺血，我献点血算得了啥……”。

在他影响下，其他战友纷纷报名献血。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有输血任务，他就一马当先无偿献血。他常跟战友们讲：“在部队我为战友输血，将来转业回农村也矢志不渝，一个人活着要为天下百姓活着才有意义！”苗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在部队革命的熔炉里铸成了。由于他觉悟高，思想进步快，参军一年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底他得了一场重病，在东北治不好，部队将他送回天津陆军医院。1956年，苗忠身体恢复，他所在部队奉命外援去埃及。领导认为他身体条件不宜到外国去，最后，苗忠转业回到农村，先后曾在窑上公社、粮站、永定河防汛指挥部等部门工作过，后随公社兴修水利大军去修建密云水库。由于水库工程艰巨，有时民工出现伤情需要输血，他得知与自己的B型血相符合，就迅速赶到挽袖抽血。医生问他姓名他不谈，输完血拔腿便走，所以水库工地上他有无名献血英雄之美称。

1960年后苗忠便扎根农村，但献血誓言未变。每年都去房山医院，房山血站献血每次400毫升。给他红糖、奶粉等补养品他都不要。他的事迹由公社妇联主任张秋玲向北京日报作了报道，报社领导感到事迹突出，曾派两名记者下来调查，经有关单位证明的确如实无误。从此，这个普通农民苗忠的名字声扬内外，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当时窑上公社书记郎宝山曾到家走访并关照说：“有啥困难向我提，一定解决！”由于苗忠无偿献血事迹突出，北京市血液中心（红十字会）授予他为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更加激起他的奉献精神。

在苗忠的带动下，全家人都投入了献血活动，成了无偿献血之家。从1956年部队转业到1993年，苗忠40来年如一日，一直把献血放在心上，其间曾受到各有关方面的嘉奖。窑上公社、房山血站分别给他颁发过锦旗；房山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到他家走访慰问以示关爱；北京市血液中心（红十字会）先后给他颁发铜牌、银牌、金牌；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中南海接见与其合影并颁发金杯以示褒奖。他不愧是房山人民的骄傲。

房山县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李金

沙秀英

李金，房山周口村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解放前，他们全家六口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年到头吃的是糠菜窝窝，穿的是麻包片片，父亲被吃人不眨眼的地主资本家榨干了血汗，很早就死去了。母亲长年给地主做活，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落下一身病。叔叔给资本家上灰窑，活活惨死在资本家手里。哥哥十四岁就给地主当小做活的，李金也从小拾灰背煤，受冻挨饿……



晚年的李金（工淑阁 提供）

1948年1月，李金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由于在部队表现优秀，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无论从事哪项工作，他都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没有文化他咬牙苦读，到1953年小学文化课程他全部拿下，并获得部队颁发的文化修学优秀学员证书。

1954年，他从部队复员，临回来，在北京转建委员会办理手续时，办公室工作人员问他会有什么技术，他琢磨可能是要分配工作。当时他一心要回到农村搞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家乡周口村的面貌，就把会通讯设备安装、拆卸、管理的技术隐瞒了，说自己什么也不会，李金委婉地谢绝了上级的安排，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回到了周口村。

一回到家乡，李金便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

周口村是1948年10月解放的，1949年建立了党支部，李金回村后担任了合作社副主任，1956年1月经党员和群众推选，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工作。因为村子解放时间不长，初级社刚刚成立起来，村里百废待兴，集体房屋只有六间旧庙，村干部办公，长期在一个磨棚里。八百多亩“西靠河滩，北靠荒山”的石碴地零零碎碎。面对着仅有的运输工具一头老牛和一辆旧铁瓦车，让人心

寒。村里穷，非常困难，李金的家也不富裕，李金说服家人，克服困难，毅然将自己仅有的 400 元复员费，拿出了 300 交给了合作社，作为生产底垫，让他们开展生产；余下的 100 元分给了村里的贫困户。

面对众多困难李金没有屈服，他团结党支部一班人，克服困难，身先事足，严格要求，努力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公而忘私的情怀

李金回到村子后，全身心扑到集体事业中。他心中装的都是集体，把集体的每一项事都看得非常重要。在他的头脑中认为，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正确处理个人和革命的关系，不让家务琐事拖累自己。1955 年，东、西两个合作社的干部正在研究并社的工作，家里人告诉他老母亲病危，要他赶快回家。他想并社正处在关键时候，这是大事，不能走。一直等到散了会，他才赶回家中，此时他的老母亲早已去世了。有些社员心疼地劝他说：“李金呀！工作重要，可也得顾顾家呀。”他当时虽然因母亲的故去非常悲痛，面对乡亲们的关心，他诚恳地说：“干革命就不能顾个人，离开家乡当兵打仗是这样，现在，在村里搞建设种田也是这样。现在正需要人，我不能因小家而不顾大家。”

1962 年他老伴生第一个小孩，正好他要到县里开会，临走时媳妇肚子就开始疼了，当时没有一张草纸、一两红糖，为了开会不迟到，他让媳妇自己准备，就赶路去了，这一走就是一个月，他走那天孩子降生，回来那天孩子满月。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是李金一贯的作风。村中那家的房子老了，该修了，谁家的房子漏雨、要塌，等等，他全都记在心里。每到雨季，有的险户他就让提前搬家；有的户就分配专人负责检查照顾，使贫下中农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可他自己家的房子是解放前家人留下两间破屋，夏天漏雨，冬天冰凉。院子小，连上厕所的地方也没有，早就有人劝他拆了旧房，找个地方盖三间新房。而李金却说：“干革命就不能图吃、穿、住，不能摆阔气，要为大多数着想。大伙要是都住上新房了，我就住上了。”旧房他一住就是 25 年。他当村干部多年来从不搞特殊化，从不向集体伸手。

1968 年，考虑到李金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党委书记亲自批准，给李金解决盖五间房的木料，但当 1970 年公社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号召时，李金把自家备的两间房木料加上公社给的五间房木料全部交给了集体统一使用。按他的条件当时可以分到集体盖的五六间房，但为了优先群众住房，李金只要了一间

半，直到 1990 年儿子结婚，住房紧张，李金才接受集体硬分给他的一间半房。

1978 年，周口店公社一位副主任到周口村找到李金，准备给李金的大女儿安排工作。李金拒绝了，他把这次机会安排给了村中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

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初级社时期，周口村只有一头老牛，一辆破旧的铁瓦车。仅有的八百多亩石碴地，零零碎碎，分布在村北边荒山和村西的河滩上。最大的一块地不过五十亩，平均亩产量不足百斤，百姓生活非常困难。

面对这种现实，李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回到村子后，首先带领群众，开展了“治坡”运动。先从改善农田基本现状这个基础入手。从 1968 年到 1982 年间治理了 10 条长 1000 米、宽 30 米、深 7 至 8 米的大沟，削平乱石岗大小 50 余个，河滩地深挖 1 米，筛土捡石子，改良土质。削岗、填沟、开荒、造地。几年下来，共动用土石方 50 万立方米，扩大了土地面积。在原来仅有的八百亩土地的基础上，把零零碎碎的小地块联接起来，小块变大块，大块连成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百亩以上的地以有 11 块，最大的地块达到了 600 亩以上。土地面积达到了 2190 亩。

一头老牛一辆旧车的家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到 1982 年，村里发展骡马 150 头，胶轮大车 42 辆，特别是，购置了五十五马力大拖拉机 2 台、七十五拖拉机 8 台、手扶拖拉机 12 辆。扬场、铡草、脱粒、粉碎、磨面、碾米等各种机械 100 余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兴修水利，扩大水浇地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李金带领群众披星戴月，打井修渠，短短几年内打机井六眼、修砌砖石水渠 2500 米、建了一座能储水 18000 立方的蓄水池。购买了 21 台各种不同类型的水泵。两千多亩地全都浇上了水，改变了以往水过地皮湿，坡上浇水坡下涝的现状。

由于有了农田基本建设成果的保证，周口村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63 年上了“纲要”（亩产达到 400 斤以上），1964 年过了“黄河”（亩产达到 500 斤以上），1972 年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粮食平均亩产 841 斤，过了“长江”（亩产达到 800 斤以上）。粮食总产量达到 167 万斤，从 1962 年到 1972 年 10 年间，每年增加 10 万斤，摘掉了缺粮队的帽子，从吃返销粮的村，一举成了向国家上交公粮的余粮村，到 1982 年粮食亩产量达到吨粮，粮食总

产达到 300 万斤。一年就向国家交余粮 200 万斤。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集体的积累不断增加，社员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家中有了余粮，信用社有了存款。

在“治坡”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为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又开展了“治窝”工作。按当时情况，如果社员一家一户自己盖房，一户占地三四分，人口按自然增长计算，一年也得生二十几个小孩，每年三四十户要求盖房，就得占十几亩地，这样一来，几十年村里的地就占完了。

1968 年，村里开始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李金带领党支部一班人，从本村实际出发，在不占用集体耕地的前提下，经过反复研究，认真规划，1973 年由集体统一盖两层楼的排房，创出了当时房山县按规划建设新农村的第一。由于多年坚持不懈，并不断改进汲取先进经验，使群众居住更加方便。三十多年来，虽然村里人口自然增长，但村里的土地却一点没减少。

以身作则的风范

高标准严要求是李金一贯的作风。无论是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是农业生产，李金都身先士卒，那里活最脏那里有他，那里活最累准是他干在最前，抢在最前。只要公社和县里不开会，他都会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哪怕是半个小时，他也从不放过。在李金的带领下，为了保证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能在晚上办的事不在白天办，能在晚上开的会决不在白天开，能在小队解决的问题不在大队解决，能个别谈的决不开会，精简会议。在周口村，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坚持三不脱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每人每年平均劳动都在 300 天左右。

不吃请、不受贿，是李金从政以来对自己始终如一的严格要求。他不但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全村的党员干部。李金常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人家不会平白无故地请你吃、请你喝，只要一请必定有事，在你手里端着碗、嘴里嚼着饭、正往肚里咽着的时候，人家提什么要求你只好脑袋一低答应了，不犯错误你等什么？”

李金从自己做起约法三章：第一不许到社员家吃喝；第二不许搞封建迷信活动；第三社员分家党员、干部不许出头露面，防止打开吃喝缺口；第四不许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私分瞒产等歪的邪的。一次李金的孩子找劈柴生火，

一个社员从大队木工房拿了一把刨花给了他，他看见后，立即叫孩子送了回去。有人说他太认真了，他认为，集体的东西白拿一点不以为然，慢慢的思想上就会放松警惕，久而久之就会犯大错误。村里人都知道李金认真，所以没人敢给他送礼、请他吃饭。

从解放初到 1982 年的二十八年中，周口村的党员干部严格按照要求去做，没人因此受到过处分，在村中形成了拒腐蚀永不沾的一个坚强战斗堡垒。

由于李金心里装着百姓，担任党支部书记二十八年来，坚持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断推动全村各项事业同步发展。抓教育，建起了托儿所、育红班、小学、初中一条龙的培育体系，既解决了村里妇女参加劳动的后顾之忧，又使孩子们从小得到系统的培养教育。

在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产的前提下，为了不断增加集体收入，李金又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发展畜牧业和村办企业，先后建起了村办水泥厂、保温材料厂、水泥构件厂、修配厂、服装厂、制钉厂、运输队、猪场、煤矿、灰厂等十几个企业，这些企业每年上交集体纯利润达到 800 万元。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村党支部连续多年被评为出席周口店公社、房山县、北京市的先进党支部。李金连续多年被评为出席公社、县、市的先进个人。

李金的付出得到了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的事迹在周口店、房山县、北京市都得到了宣传，1973 年 10 月李金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李金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周口店人民的荣誉，是房山人民的骄傲。

李金参加中共“十大”会议归来，十分激动，满怀激情地作诗一首，抒发了心中的感慨：

开十大见到毛主席，
幸福的眼泪一串串滴。
顿时想起旧社会，
当牛作马受人欺。
要没有毛主席解放了我，
骨头也早就烂成了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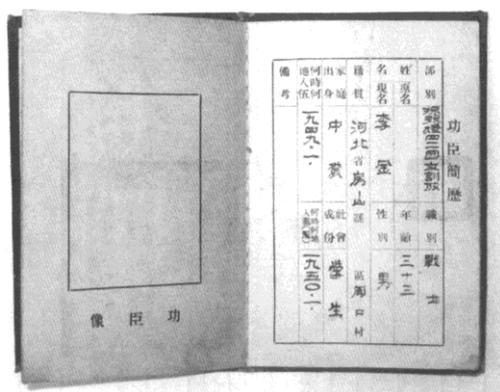
开十大见到毛主席，
从眼睛亮到我心底。

有您给咱指方向，
前进途中路不迷。
别说叫坡岗变平原，
泰山挡道也敢移。

乘着“十大”的东风，带着党的嘱托，百姓的希望，李金又积极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和生产第一线，为革命和生产在上新台阶，为百姓生活更加美好而日夜操劳。

从1956年到1982年，李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二十八年。1982年底年，由于年纪和身体原因李金主动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工作，但他时常挂念村中大事小情，关心村子的发展。1996年2月17日李金因病去世，享年80岁。

李金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勤政廉政的一生。由于他辛勤努力，为周口村实现大地园林化、农业机械化、改造旧住宅、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金立功证书（王淑阁 提供）

志愿军归国代表马维华来房山

宋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爱国群众运动。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家喻户晓，举国上下捐献飞机大炮、争取世界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展开，志愿军战士被全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1952年1月18日，志愿军组成以李雪三为团长的归国代表团，代表团一行270人回到北京，然后分赴全国各地，向祖国人民汇报抗美援朝战绩和战争形势。



马维华同志

为了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房山县各级组织早已开始做好充分准备。笔者当时就读于房山中学附属师范三年级二班，对于社会上的工作还不甚了解，只是感到学校里政治空气空前高涨。同学们听说要欢迎“最可爱的人”，真是群情振奋，欢腾雀跃。全校师生投入紧张有序的欢迎准备工作。各班同学都排练或自编自演一些宣传抗美援朝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快板、相声等文艺节目，多次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到街头和城隍庙戏楼演出。

1952年初，学校派出两名女同学（附师二班梁淑兰、陈秀华）到通县学习打腰鼓。从各班抽调二十余名同学组成腰鼓队，由学习归来的两位同学任教。每天课余时间校园里就响起“咚咚”的腰鼓声。同学们把参加腰鼓队准备欢迎“最可爱的人”看做政治荣誉。笔者开始没有被选入腰鼓队，心情十分沮丧，曾给班主任王香岩老师写了一封长信，陈述自己的心情和要求参加腰鼓队的理由，以表达自己的急切心情。王香岩老师和团支部干部陈瑞芬一起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明参加腰鼓队不是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的唯一形式，还有更多的工作可做，况且现在只是抽调第一批同学参加，将来还要陆续扩大队伍。此后一段时间，正式队员挎着腰鼓练，我们一些非正式队员就跟在后面徒手练。在志愿军归国代表到来前夕，腰鼓队吸收了第二批队员，我也荣列其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52年4月22日早晨，鼓号队开路，仪仗队高举红旗，数十名腰鼓队员腰扎红布，肩挎腰鼓，头扎洁白毛巾，在梁淑兰、陈秀华两位教练的指挥下列队前进，全校其他师生紧随于后，来到房山县城东门外，与各界群众数千人夹道迎接，上午9点左右，志愿军归国代表——志愿军某部连长、战斗英雄马维华在县里领导同志陪同下，乘坐县供销社的大卡车从良乡县来到房山（马维华4月20日上午到良乡县，4月21日到良乡县交道镇，夜宿良乡）。见到欢迎群众，马维华同志立即下车步行到群众中间。“热烈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天。马维华身穿志愿军军服，英姿飒爽，一边向群众频行军礼，一边高呼“祖国人民万岁！”在欢迎群众的簇拥下，步行一里多路，来不及休息，直接到城内西北角的城隍庙戏楼会场。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人们席地而坐，广场上几无立锥之地。戏楼西侧的城墙上，北侧城隍庙的房顶上，东侧民宅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一派热烈欢腾景象。

县委书记崔乐春宣布开会，并致欢迎词（当时房山城内尚未通电，用干电池扩音机带动高音喇叭）。然后，马维华开始作报告。他首先代表志愿军向祖国人民问好，感谢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大力支援。他以许多具体的事例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生动事迹。由于年代久远，马维华所讲的具体内容多已失记。唯有讲到志愿军在战场上——一口炒面一捧雪的艰苦生活中仍然怀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面对武器优势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阵地前美国大兵尸横遍野，而自己一个连的战士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仍然坚守着阵地时，会场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一场景至今记忆犹新。报告不时为“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口号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报告结束后，县长杜恩霖讲话，要求全县人民以志愿军为榜样，把抗美援朝、爱国增产运动引向深入。

上午11点左右大会结束后，房中学生又列队陪同马维华步行到西大街县人民政府大院。县领导要求同学们回校，但是许多同学不舍离去，一直簇拥着马维华来到县政府后院（县长、副县长办公、住宿的一个四合院）东屋。早有准备的同学们纷纷掏出小笔记本要求马维华签名。马维华不顾旅途劳累，欣然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下“热爱祖国”四个潇洒遒劲的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时间。当时我也簇拥其中，荣幸地得到马维华的签字。那个小笔记本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可惜在“文革”中丢失。

下午，马维华离开房山去良乡县琉璃河镇。4月底，志愿军归国代表从全

国各地陆续回京，5月1日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5月下旬返回朝鲜前线。马维华来房山那激动人心的情景，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当年5月初，我们房师二班全体同学给马维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敬仰思念之情。不久，接到马维华的复信，并给我们每人寄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

曹庶民县长二三事

刘振祥

曹庶民同志，1946年任中共房山县委秘书，1953年从河北省通县专区奉地委专署之命，到中共良乡县委任第二书记兼县长。从此到1958年房良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后（定名为周口店区），曹庶民继任周口店区委书记处书记，周口店区区长。1960年以后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曹庶民又继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直到“文革”开始，前后长达近十四年时间一直担任县长职务。“文革”后，曹庶民调到北京市农口工作，曾任北京市气象局局长。

曹庶民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调到良乡县任第二书记兼县长的同时，我从良乡中学总务处调到县委机关任宣传部、农村部干事。在这期间与曹庶民同志接触较多。现将我与他相处十多年，记忆最深、觉得又有教育意义的往事回顾一下。

组织观念强，带头模范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每次召开县常委会，曹庶民都是首先到会，讨论问题，他都是有啥说啥，怎样想怎样认识就怎样说，光明磊落。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全党上下一直把引导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作为农村的中心工作。为此中共良乡县委曾制定每个县委委员分工包社的制度，每个县委委员除完成本职工作外，都要与本人分工的农业社保持经常的联系，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曹庶民做到了认真执行，一丝不苟。他经常到自己分工所包的农业社，调查座谈，然后写出内容扎实、有分析有措施的调查报告，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其他县委成员也纷纷行动起来，县委的决定变成了行动，这与主要领导的带头作用是分不开的。

胸怀全局，积极维护县委的统一领导。农业合作化时期，成立农业社，整顿农业社是农村的中心工作。主抓是县委农村工作部，但要经常从全县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队进行建社整社的工作，对此曹庶民县长坚决支持，包括政府机关，授权给农村部，直接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当时成立农业社和经营管理生产劳动，秋收分配任务十分艰巨，靠农村部的干部忙不过来。为此曹庶民县长毫不迟疑将政府办公室主任王显慧、科员高淑英送到县委农村工作部

与农村部同志一起办公，审查批准建社的申请，掌握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并动手起草农业合作化方面的材料，这样加强了合作化指挥机关的力量，缓解了农村部人手不足忙不过来的局面。政府办公室力量虽有所削弱，但却加强了全局的力量，有利于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

关心爱护干部，但在原则问题严格要求，从不护短。在县里，曹庶民对待干部特别是对中下级干部的婚姻、家庭个人生活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是找到他，他都弄清情况。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从而使这些同志得以全神贯注的投入工作。1956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曹庶民经常暗示、提醒干部，要头脑冷静，深思熟虑，要全面正确的看问题，不要头脑发热。他的告诫，使一些人免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之苦，从而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在1954年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之后，机关干部口粮粗细搭配都有明确的指标，执行非常严格。政府机关财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自己作主多给机关食堂搞了些“细粮”（即白米、白面），曹庶民知道后对有关人员进行严厉批评，责令检查。时隔多年后，这位受过批评处分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虽挨过批评，受过处分，但曹县长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坚持原则不护短，他的人品至今我还从心里佩服。

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据原良乡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同志介绍：1956年的一天，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与通县地委联系，最后确定由良乡县委负责接待越南党中央代表团，主要座谈解答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问题。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去北京座谈，真是时间紧、任务重，涉及到外交问题，关系到我们党的形象。第一书记张会清不在机关，第二书记曹庶民责无旁贷。张本荣立即动手搜集、整理资料，一个通宵列了二十多个问题并整出文字书面材料。第二天早上把材料交给了曹庶民，随后就起程，先到县社驻京办事处等待。曹庶民只能简单地看了一下书面材料，之后二人就被接到钓鱼台，参加了与越南党中央代表团的座谈。座谈结束了，张本荣领教了这位第二书记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应变能力。说：“曹庶民同志有理论水平，应变能力快，我从心里佩服他”。

关心人民疾苦。1957年春节，县委书记张令德、县长曹庶民、农村部长罗玉源、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和我们几个干事，到临近的房山县惠南庄全国劳模杜宝珍那里去参观学习稻麦兼作的经验。杜宝珍深有感触的说：“曹县长是我的老领导，十多年前他在房山县委当秘书时，我们就相识，那时他对我们关心爱护像亲兄弟一样，出主意想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给我们讲形势，讲革命道理……”。在文化大革命前，当曹庶民县长得知我们的深山革命老区的

老百姓过年都吃不上白面饺子时，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内疚。解放二、三十年了自己当着县长，真是愧对山区百姓。于是他立即找来粮食局的同志下命令似的说：今后过年要千方百计保证山区人民要吃白面饺子，平时也要设法给山区人民调剂一些细粮。这原本是件好事，但在文化大革命时，为山区人民调剂细粮却成了曹庶民的一条“罪状”，说他“破坏粮食政策，腐蚀拉拢山区人民”，并叫曹庶民检查“认罪”。当曹庶民同志将事情经过如实讲了出来，与会人员觉得，曹县长让我们山区百姓过年吃上白面饺子，怎能算他的罪状呢？批斗结束后，工作人员给曹庶民他们送的白开水是加了糖的，吃饭时，粗菜底下有好菜，大家心里明白广大人民群众是希望生活得到改善啊！

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践证明，没有牺牲精神，“实事求是”四个字是做不到的。“文革”期间，曹庶民同志被揪出后，造反派叫他承认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庶民认为自己从参加革命工作参加共产党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跟着党走，决不是“三反”分子。遭到了造反派恶毒的打骂和批斗，给他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之后不久，曹庶民被分配到地处房山远山区的蒲洼乡的鱼斗泉村参加劳动。三十多年后，前蒲洼乡党委书记，现任房山区工商联会长的耿春奉提起曹县长，仍深有感触的说，尽管当时曹县长被当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可我们村的百姓把他当亲人，见他不怕苦不怕累的干活，我们心疼，在我们百姓眼里，他几十年为房山人民特别是为山区人民，日夜操劳，尽心尽力，他是我们的好县长。他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在运动中顶着难以忍受的压力，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佩服他，敬重他。

河南中学首任校长姬锡瑞

吕甫英

河南中学（原北京市第六十九中学）首任校长姬锡瑞，在众多的师生心目中是一位永远令人难忘的优秀校长。

姬锡瑞，1923年出生于河南省淅川县姬家堰村，194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四年级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向解放区转移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进步人士。

1949年，姬锡瑞毕业后，先后任北京三中、七十七中校长。1956年，姬锡瑞从北京日报看到一篇题为《一所无人过问的学校》的文章。该文反映当时的河南中学，地处偏远山区，是一所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的学校。于是，他怀着对革命老区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向上级递交了到六十九中工作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到六十九中任首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年仅34岁。

到河南中学上任后，姬锡瑞又说服了在西城区当小学教师的爱人刘春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北京市区，来到河南中学工作，在河南村租房安家。

河南中学，1954年建校，师资条件较差，为了建设一支政治思想过硬、教学素质高的教师队伍，姬锡瑞数次跑市教育局和北京师范大学选拔应届优秀毕业生十余人到河南中学任教，充实了教师队伍。

1957年，姬锡瑞被扣上了思想右倾的帽子，在干部考察时给下了“不提拔、只使用”的结论。面对如此结论，他坦然自若，工作热情仍如从前。

姬锡瑞在河南中学工作期间，经常利用这里是革命老区的优势，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早在1957年时，学校便设立了榜样牌，经常将好人好事登在榜样牌上，激励师生向榜样学习。姬锡瑞做为校党支部书记，对党团工作抓得很紧。据统计，1957年时该校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写了入团申请书，百分之八十五的教师写了入党申请书。

1958年，一些左倾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姬锡瑞与师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克服各种困难，尽量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给同学上课、补课，以减少因师生劳动过多而影响的的教学进度，保证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三年困难时期，姬锡瑞和师生一起去挖野菜、采树叶、捞河草，直至把玉米皮制淀粉，蒸窝头以充饥。他还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并实行了“严紧细休”的四字治校方针。“严”就是纪律要严明，态度要严肃，工作要求要严格；“紧”就是工作要抓紧，作习要紧张，干工作不拖拖拉拉；“细”就是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细致，要努力调动师生教和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休”就是在当时生活很困难，师生吃不饱的情况下，要师生注意休息，学校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和会议，以保师生的身体健康。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姬锡瑞校长的带领下，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河南中学初中升学合格率在全市统考中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好成绩。在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中，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多，在北京远郊区县名列前茅。

姬锡瑞来房山工作时，就已是14级干部，比当时多数副县长级别还高。因为种种原因，在房山工作二十多年，只长过一次级，但他对此没有怨言。

1983年，姬锡瑞逝世，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他那种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认真工作的精神却永远鼓励着后人。

北京市劳模徐忠

白玉

徐忠，原房山县葫芦垡公社葫芦垡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从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到1959年任支部书记以来，全心全意的发展集体经济。当时的葫芦垡大队是北京市的农业先进单位，1965年，徐忠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合作化的带头人

解放后，徐忠和贫下中农一起获得了翻身，分到了牲口和土地，生活得到了改善。1952年组织成立了互助组，徐忠带头参加。由于互助组的庄稼长势好，收成也好。第二年，群众纷纷参加他的互助组，互助组由十几户到几十户。1954年，经良乡县委批准，村里成立了初级农业社，徐忠任社长，该社成为葫芦垡地区的骨干社。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劳动记分，统一管理和耕作，统一按“劳六地四”进行分配。初级社的发展，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当年农业获得了丰收。1956年全村成立了高级社，徐忠任高级农业社社长。工作中他顶住了拉牲口闹退社的歪风，巩固了农业社的发展成果。1959年，徐忠任支部书记，把葫芦垡村东北，紧靠永定河的近二百亩地上建了一个小水库，把永定河水引过来浇灌水稻田。从此，葫芦垡的“南大荒、北大荒”，变成了米粮仓。

落后队落户

当时葫芦垡大队有四个生产队，各队的土地、劳力情况基本相同。1961年，二队因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粮食减了产，社员们的口粮比先进的三队少了将近一半，劳动日值只相当于三队的三分之一。社员们的情绪十分低落。

怎么办？在开支委会研究二队问题时，徐忠斩钉截铁地说：“重整旗鼓赶上去！”并自告奋勇，带领全家从先进的三队，搬到二队去抓生产。当时，三

队有人劝他：“你先一个人去试试，过两年二队情况好了再搬家也不晚，为啥全家都跟你去受累呢？”徐忠回答说：“我要是一个人去，二队社员就不相信我是真心实意帮助他们了”。

到二队以后，徐忠白天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到社员家去串门访问，摸清了二队减产的原因，与队干部制定了增产措施。奋斗目标明确之后，他团结队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1962年，二队的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加8万斤，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社员口粮增加了，劳动日值也显著提高了。可是徐忠家的收入同在三队比较，还是减少了。社员和干部纷纷提出来给他补助，公社也同意了，徐忠坚决不要。有人说他是“睁眼跳井，明吃亏”。他反驳说：“当干部是为了革命，说不上什么吃亏”。

1964年，徐忠又只身一人到最差的一队参加劳动。又帮助一队，改变了落后面貌。

以国家利益为重

1962年秋后的一天，二队的队长气冲冲地找到徐忠说：“我们队虽说增了点产，可还比不上别的队，那八亩玉米地，就别报产量，分给社员吧！”徐忠严肃地回答说：“增了产，按政策社员也能多吃，为啥要瞒产呢？这样做既骗了国家，又埋没了大伙的成绩。咱们得顾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啊！”队长当时心里不大服气，他说：“这是大伙的意见，你不答应，我们也不好交待，你去跟大伙说吧！”徐忠就和他们一起去和社员商量。他头一句就问：“1956年咱们闹水灾，缺二十多万斤粮食，后来粮食从哪儿来的？”有人回答说：“是国家救济的。”他又问：“国家的粮食是哪儿来的？”有人回答说：“是农民卖的吧，这还用问！”徐忠趁势又说：“大伙想想，那阵人家丰收的地方，要是都瞒下产量，咱们还能吃上粮食吗？咱们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啊！”经他这么一说，想瞒产的人醒悟了。打那以后，再没有人提瞒产的事，积极向国家交售余粮。1963年全大队卖给国家8万斤余粮，以后为了支援河北灾区，又多卖了7万斤余粮。



徐忠在葫芦堡村落后队参加积肥劳动

徐忠在大队当书记期间，时刻按“六十条”要求参加劳动，除去到县、社开会以外，每年参加队里劳动都在二百天以上。每次开会发的误工补贴，都如数交给生产队，从没有不交的时候。徐忠说：“这是上级的规定，交队记分，该交的就交，不交事小，影响事大。”

1963年的一天中午，徐忠的儿媳妇李彦兰从河西拾回一抱树杈子，徐忠一见就问：“从哪儿弄的？”儿媳妇说：“捡来的。”他说：“全村都是集体所有，就你会捡来东西，从哪儿捡的送回哪儿去。”儿媳妇只得把树枝子送回了地边上，可是徐忠还是不饶，非叫她送回原地不可。当着很多社员，儿媳觉得很难为情，含着眼泪把树杈子送回河西。回来后，徐忠对她说：“咱们是当干部的，别人拿了还得拦着点呢，咱们自己不能带这个头。”在徐忠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全家都能够克己奉公，不动集体的一草一木。

处处精打细算

葫芦堡大队有段“一间草棚起家”的往事。1954年，由互助组刚转初级社的时候，村里没有办公室。徐忠让出自家一间草棚来办公。到1956年，草棚塌了，有人主张花300元钱，新盖三间办公室。可是，徐忠说：“办公室是为了办公，能呆下几个人就行。”后来就在饲养室旁边接了一间房，只花了二十多块钱。

徐忠对集体的经济开支始终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他个人从不乱花集体一分钱，可以报销的，他也是省吃俭用。有一次他到县里学习两个月，只花了村里一角五分钱。

1982年，徐忠已经70岁了，因身体有病，经公社党委同意，不再担任大队干部职务。他说：“我干不了大事了，可以干力所能及的事，那十几份电视报，就由我给社员送吧！”就这样，他义务为社员送报，坚持了两年。

徐忠处处为集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奉献精神，至今还使人难以忘怀。

抗日烈士白文如

白玉



白文如烈士像

白文如，1915 年出生在务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十四五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在姑姑帮助下，耕种着几亩薄地，经营着几十棵梨树。由于梨树老化，产量低，收入很少，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就到牛坨、垡头、冯村、老赵村等地包个小梨园，挣点钱来养家。在冬闲的时候，他就骑一辆旧自行车，带着两个筐，走村串街去买鸡蛋，然后就到北京去卖。再从北京带回火柴、食盐、臭豆腐等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到交通不太方便的牛坨、垡头、冯村、老赵村等地去卖。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白文如目睹了日本鬼子入侵务滋村放火烧毁了村中有几百年历史的东庙和西庙，还烧了李润和刁海停两家的十几间民房的暴行，但苦于没有办法，只能把满腔怒火埋在心中。白文如常去作小买卖的地方，正是涿良宛联合县的游击区。在此结识了王玉玺、田连仲、王丙章、张晋龄等党员干部，经他们启发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认识到只有推倒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才有好的日子过，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出路。王丙章见他很会作买卖，就让他以作买卖为名，为武工队采购一些禁运物资，火柴、食盐、电池等。他通过敌人岗哨时，总能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从 1943 年开始，白文如就在村中秘密地发展民兵队伍，建立抗联会，他任抗联会主任。后经王丙章、王玉玺介绍，于 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常往返于窑上和务滋之间，为活动在窑上地区的武工队送情报。武工队政委张晋龄看他很能干，就让他就在民兵中发展新党员。党员中有抗联副主任张广仁，民兵干部崔悦、张广礼、抗联秘书肖斌，还有白文广、陈福等人。1944 年，建立了务滋村党支部，白文如任党支部书记。

务滋村地处刺猬河（也叫小清河），当地人叫它二道河东。沿岸各村经常受这条季节河水患所害。1943 年白文如以抗联会的名义，以本村民兵为骨干，

联系各村的穷苦百姓，发动和组织了几百人的挖河大军。在他的带领下，北起东石羊，南至大石河北岸的路村，疏通了三四十里的河道，解决了沿岸各村粮田有水就挨淹的问题。从此，务滋村的抗联会名声远扬。

在张晋龄的指导下，白文如又发动抗联会，组织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召开不同形式的会议，成立贫苦农民减租减息小组，宣传党的有关政策。要求凡是地主、富农收高地租，放高利贷的一律要给贫苦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李佑清等贫苦农民得到了实惠。当地敌伪势力对白文如怀恨在心，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敢怒不敢言。



1983年6月15日。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白文如同志革命烈士证明书（曹焕志 提供）

1945年，为打击伪保势力，进一步扩大我党的影响力。在张晋龄和武工队的支持下，白文如又组织抗联会和贫苦农民，清查伪保甲长的帐目。当时务滋村和西地村是一个联保，联保长徐殿奎，副联保长是尹国柱和王守纯，在清查中发现联保长等有贪污问题。经区委批准，在1945年的8月13日，批斗有问题的联保长徐殿奎。8月12日村中搭了批斗的大台子，还给他糊了个大尖帽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区武工队在政委张晋龄带领下，也有二十几人驻进了村。8月13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良乡伪保安团二百余人在大队长毕喜停和副大队长高定福的带领下，闯进了务滋村。他们进村就抓抗联会的人，先抓的抗联会副主任张广仁、张广礼。这时，有人告诉白文如让他躲一躲。他和家人说：“我不能躲，敌人是冲我来的。我躲了，老百姓要遭殃。再说张区委和那二十几名武工队员也就完了，会使党受很大的损失。”说完坦然的走出家门。当他走到大地主张晋臣房后，被正在抓他的敌人发现，当场就把他绑了起来。由于绳子绑在大臂上，小臂还能回弯，趁敌人不注意，白文如随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开会的人名单，放在嘴里吃了。他的妻子宁淑茂，在家门口看见白文如被抓，赶紧回家把有关党的材料，抗联会的人名单等烧了。

敌人知道白文如是抗联会主任，开始好言相劝，让他交出组织名单。白文如反而破口大骂，“交名单是妄想，要杀就杀！”敌人见软的不行，就用枪托打，用皮带抽，用刺刀扎，把他打的遍体是伤。白文如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在东街一个井台旁残忍地杀害了白文如，时年三十岁。敌人走后，张晋龄和武工队从庙里弄了口棺材与其家属一起埋葬了烈士。

全国战斗英雄孔祥元

潘惠楼

孔祥元，佛子庄地区北窖村人。生于 1919 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8 岁即在村中放牛放羊，14 岁开始在本村及附近的煤窑背煤。后在外出时被国民党军队抓到 27 师当兵。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平津战役。在当年 11 月攻打张家口的沙岭子战斗中，孔祥元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解放。孔祥元遂投诚参加解放军，被补充编入解放军 2589 团。由于孔祥元是穷苦人出身，参加解放军后深深感到部队的温暖，变得比以前爱说爱笑了，和部队的同志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对人民解放军也有了更新的认识。

张家口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加速了对北平城的包围。孔祥元做好了充分准备，为了在战斗中立功，他要求参加爆破组，打攻坚战。结果北平城和平解放，孔祥元憋了一身的劲没有用上。

1948 年春，孔祥元所在部队接到命令攻打太原城。在向太原进军的动员大会上，孔祥元表态说：“我当过长工，下过煤窑，在国民党那边当兵是受气的兵，过去对人民是有罪恶的，这次攻打太原城，我一定要立功赎罪。”在向太原进军的千里行军路上，孔祥元虽然身材瘦小，右脚还有毛病，却每天都背着 50 多斤重武器弹药和物资，跟随部队急行军。他的脚上打了八个血泡，硬是没有掉队。当部队休息时，孔祥元还唱歌为战士们鼓劲。行军路上，沿途多是解放区，村庄里的老乡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为解放军点烟送茶水，为解放军运送物资。老乡们说：“欢迎劳苦功高解放军，打下太原城，解放老百姓。”孔祥元听到老百姓的鼓励，心里很是惭愧和不安，认为自己参加解放军后，时间很短，没有立功，还当过国民党兵，老百姓却这样信任自己，支援自己的部队，他非常感动，这更坚定了他在攻打太原城战斗中为人民立功的决心和勇气。

1949 年 4 月 24 日，总攻太原城的战斗打响了。孔祥元担任架梯子的任务，被分配在第二组。因他的个头小，被安排为抬梯子的战士背 4 支大枪、3

包炸药、两个手雷，跟在第二组后面。攻城战斗开始了，解放军的上百门大炮向城里猛轰。压住敌人的炮火后，连长即命梯子组前进。孔祥元听到后，忍不住就想往前冲。他跳起来将身上的几支枪交给了炊事班长，自己加入了抬梯子的队伍，冒着枪林弹雨就往城前跑。敌人见解放军要架梯子过壕沟、上城墙，立即将炮火集中起来，对付抬梯子的解放军。孔祥元和战士们把梯子往壕沟一竖，随即跳入壕沟内。沉重的梯子把瘦小的孔祥元压倒了，但他立即爬起来，将梯子向太原城方向竖起来，和战士们一起将手榴弹、手雷向敌人的地堡投去。趁敌人火力被压下去的一刹那，孔祥元把大枪一背，拿了9颗手榴弹，纵身上上了梯子。忽然想起没拿红旗，恐怕登城后不能为炮兵指挥目标，又转过身来，从战友手中夺过红旗，迅速地爬上梯子，将第一面红旗插上了太原城头，给后面攻城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孔祥元率先登上太原城，插好红旗，就单人向城内纵深前进发展。城里的敌人从暗堡中向他射击，他机智地跳入壕沟内，向地堡扔手榴弹，还一边高喊：“交枪不杀，解放军早就占领城墙了！”以瓦解敌人。随后，他端着枪往前冲，有7个敌人把枪举了起来，交了枪。这时后续的解放军战士来到了，孔祥元又领着战士们解决了敌人的一个卫生所。搜出17支步枪，2门六零炮，3挺机关枪，2支冲锋枪，俘虏30多名敌人。

在攻打太原城的战斗中，孔祥元立了大功。1950年9月25日，北京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会议。孔祥元作为战斗英雄参加了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总理还在孔祥元的日记本上亲笔留言。1950年9月27日，《华北解放军报》第七版专门介绍了全国战斗英雄的事迹。其中有记者刘微采写的文章《太原登城头名孔祥元》，并配发了孔祥元身着解放军戎装、胸带大红花的照片。

1952年7月，孔祥元参加“回乡转业建设速成小学”学习，获得高小毕业证书。1953年9月，孔祥元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北窰村务农。1959年1月，京西矿务局房山煤矿在矿区附近农村招工，孔祥元来到房山煤矿工作，当了一名井下采煤工人，以后又从事井下掘进工作、防尘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孔祥元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以自己是全国战斗英雄自居，就连多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工友、家乡村中的许多亲朋好友，也不知孔祥元曾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战斗英雄。1977年10月，孔祥元从房山煤矿退休回到北窰村。1983年4月20日，孔祥元因病去世，终年64岁。

蔡 雄 其 人

赵润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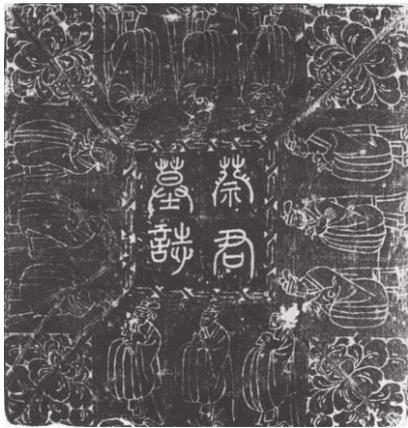
阎村镇政府西约 3 公里的大董村是个古老的村庄。据史书记载，该村早在唐代就已成村，名叫董村，因姓氏而得名。后因村落外延扩大而一分为二，分别称大、小董村。在村西南葬有唐代墓葬群，并且于 1982 年发现唐贞元年间银青光禄大夫、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雄墓及墓碑，这为挖掘和研究本地区悠久的历史提供了有利的资料。

全文：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府君墓

蔡公讳雄信都人也系绪略而不书曾祖贞虢州别驾祖遥沧州乐陵令考济泽州司户咸著政能皆谓时杰善馀庆远间气是生公器涵江湖才备父武童稚之岁曾不儿戏习经史蕴韬略尝曰六国之印可绍佩之未弱冠有河邦朔之举属中原乱离国为深忧诏书辟公招谕取定乃私愤曰离合异智也治乱辅霸忠也扬名荣亲达也吾以此三者必是行矣由是口衔天书身入绿林示以安危破其巢穴遂优授贝州清河尉解褐也虽包棒扬威而壮心未骋乃投笔攘袂来游蓟门获前连帅朱公上宾待之署幽州卢龙节度押牙长剑陆离辕门生风未几奏授莫州刺史申国公命之日前职公之假道也常以郑亭境邻南赵安人来远在良二千石公以其勉乎下车后一之岁捕逃复居二之岁商估关逋三之岁者考续居最众君子曰蔡君之政渔阳张堪之俦又属祸乱未平尤人生疾卧治不迨辞荣寻医车次檀州疾之已亟以贞元三年二月十六日终子题与之官舍春秋五十有三夫人陇西李氏则袁州使君女也居丧礼闻抚孤成人有子四长曰昭幽州良乡尉有干父之誉次日■旰日昉以学与艺孝乎事亲守先人之清贫寄颜氏之陋巷宅地营备悉在亲知以十九年十月廿五迁窆于良乡邑北复业乡之原礼也棧多素棺务从以俭刻志玄室拟于佳城其词曰天回日缚兮年代无穷人生此去兮今古攸同青山暮雨松柏悲风

该墓盖长 0.49 米，宽 0.47 米，周围刻有十二生肖像，上题篆书“蔡君墓志”。墓志宽 0.52 米，高 0.50 米，周围刻有花纹。碑文行书，21 行，每行字数不等。首书：“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府君墓志。”



蔡雄墓志盖拓本

从碑文中看出，唐人蔡雄，信都人，官位较高，兼职亦多，在当时也可称为朝廷重臣。他的曾祖父蔡贞曾任别驾之职，祖父蔡遥任沧州乐陵令。由此可见，蔡雄为官宦子弟。蔡雄年幼时“曾不儿戏”，“习经史，韬武略，”宗师有道。青年时代，胸怀大志，在国家乱离之季，授命朝廷深入绿林。此时蔡雄任“贝州清河尉”，由此脱离布衣，进入仕途。在破除动乱，捉捕逃犯过程中，破其巢穴，功绩突出，不断受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

柱国、申国公。据碑文记载，蔡雄面对当时不能平息的混乱局面，忧心积虑，以至生疾，“卧治不迨”。后“辞荣寻医”，驱车前往檀州（今密云）医治，终因病重而不能起死回天，于唐贞元三年二月十六日而终，时年 53 岁。蔡雄病死后，当时并未葬在良乡属地。从墓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蔡雄灵柩是后迁此地的，其迁葬时间为“贞元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迁窆于良乡邑复业乡之原”。也就是唐贞元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 803 年 10 月 25 日）。

那么，银青光禄大夫、瀛州别驾刺史、上柱国、申国公又是何等官职呢？古代官职繁多复杂，而且各个朝代不尽相同，有的还时设时废。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就要了解历代职官情况。所谓光禄大夫，又分金紫光禄大夫和银青光禄大夫，即职官等级或爵位名。据《古代职官辞典》记：殷周时期，有大夫、乡大夫、遂大夫、朝大夫、冢大夫等。春秋时期，晋有公族大夫。秦、汉两代，有御史大夫、谏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等。品秩自六百石至比二千石不等。多系中央要职和顾问。唐、宋两代，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明、清两代不设置。《史迹·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他。”根据《唐代文、武官散阶简表》、《明代文、武官散阶简表》记载，三代时，官分卿、大夫、士三级。秦、汉时期将爵位分为公士、上造等二十级，其中大夫居第五级，又有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等名目。隋、唐、明、清的光禄大夫、荣禄大夫原为文职散官的称号，专为封赠用。光禄大夫是从汉武帝刘彻时改称的，秩比二千石，与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同，掌顾问应对，属光禄勋。魏、晋以后无定员，皆为加官及礼赠之官。加金章紫受者，称金紫光禄大夫，加银章青受者，称银青光禄大夫。唐、宋之光禄大夫为从二品阶官。元、明升为一品，清代升为正一品。遂为文官最高之阶官。

所谓别驾刺史，最早为汉官名。别驾为州刺史之佐吏。也称别驾从事史。刺史以巡行视察为职，别驾即另乘传车，辅助刺史出巡，故称别驾。据史书记载，魏、晋时因州郡不甚分别，所以在各州设别驾，总理众务，职权甚重，时称其职居刺史半。隋唐曾改别驾为长史，长史、别驾之名迭兴迭废，有时并置刺史之下，并无职事。刺史为秦代所置，监督各郡。刺，检举不法；史，皇帝所使。在西汉时，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部（州），设置刺史，为巡查官性质，以六条察问郡县，官阶低于郡守。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改为州牧，居郡守之上，为州之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恢复为刺史；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再改刺史为州牧，位于郡守之上，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也多设置刺史，一般由都督兼任。隋代以后，刺史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只有隋炀帝及唐玄宗时曾两度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不久又恢复旧称。唐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兼领驻地的州刺史，管辖境内各州的刺史都为他的属官，刺史的地位渐轻。宋代设置知州，以朝臣充任，虽然仍有刺史一官，但仅属虚衔，并不赴任。元明两代，刺史官名废除。清代用作知州的别名。

何谓上柱国？所谓上柱国，官名。战国楚制，立覆军杀将战功者，官为上柱国。例如陈胜起义时，以上蔡人房君蔡为上柱国；项梁、陈婴都有上柱国名号。北魏置柱国大将军，北周增置上柱国大将军。唐、宋时期也以上柱国为武官勋级中最高级，柱国次之。历代沿用，清代废除。

国公，封爵名。据《古代职官辞典》记：古代五等爵中有公，位第一。晋代开始设开国郡公、县公之称。隋代称国公，位次郡王而在郡公之上。其后历代沿置。明以后为宗室封爵。清代所封镇国公和辅国公，位次于贝勒、贝子，仅宗室和藩部得封。

由上述官职情况可以得知，唐代官员蔡雄，在行政职务上主要为文职散官。他曾被授予加银章青受的二品阶官，即银青光禄大夫、辅助刺史巡行视察的别驾刺史。同时，又被授予武官勋级中最高级别的官职上柱国，申国公。尽管蔡雄是一位虚职散官，但在当时，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称得上是十分显赫的。这样一位唐朝散官大臣，死后十几年又迁葬今址（大董村），一方面因为他的长子蔡昭时任良乡县尉，要为父亲选址安葬；另一方面更能说明此地依山傍水，具有地势优胜之处，所以才将蔡雄墓地迁葬于此。

房山唐代高僧可止

赵思敬

在辉煌的唐代，有两位房山籍的僧人名垂史册，一位是以“苦吟”著称的贾岛，一位是以“学识”见长的可止。两人的诗作都被收入《全唐诗》。不同的是，贾岛早已家喻户晓，而可止却一直深锁在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现在我们就谈谈可止其人其事。

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二册卷八百二十五，收有可止诗作九首，诗前附小传：“可止，姓马氏，范阳房山人，长近体律诗。乾宁中，赐紫。后唐庄宗令主持洛京长寿寺，署号文智大师。有《三山集》，今存诗九首。”这条记载比较简略，但透露出可止在出家前俗姓马，而且长于五言“近体律诗”，乾宁是唐昭宗年号，只存在两年，即公元 894 至 896 年，在这期间昭宗李晔曾将紫袍袈裟赐予可止，可见唐王朝对他的重视。此后三十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又令他主持洛京长寿寺，并署号为“文智大师”。长寿寺为当时东都洛阳佛教文化弘传中心之一，以译经文化而著名。不少西域、天竺沙门曾在这座寺院居住。唐高宗时，南天竺释菩提流志来中国，高宗闻其高风，遣使迎接，武则天复加礼待，敕其住在长寿寺内。这座寺院位于唐东都南市（又叫半都市）之西南端，即今洛南十方院之南，寺院创建年代不详。查今人赵荣向著《九都释道》，可止于“后唐天成三年（928 年）任长寿寺住持，应顺元年（934 年）正月二十二日圆寂。享年七十五岁，僧腊五十六年。清泰二年（935 年）四月八日，建塔于龙门广化寺之东南隅。”

元人辛文房在阅读史书、文集、笔记、小说的基础上，“游目简编，宅心史集”撰写成的十卷本《唐才子传》，是书为唐代文士立传者 278 人，附见者 120 人，共计 398 人。今人傅璇琮校笺此书时“可止”条目的内容几乎全部引自《宋高僧传》。这本书原名为《大宋高僧传》，该书三十卷，记述唐初直宋初高僧传记，正传 532 人，附见 125 人。是通慧大师赞宁（919—1001 年）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87 年）奉敕编撰的。本书卷七有千余字的《后唐洛京长寿寺可止传》，读后可知他书所引史料，皆源于此。为了方便读者，我们不妨

将原文标点如下：

释可止，姓马氏，范阳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悯忠寺法贞律师。年十五为息慈，辞师往真定习学经论。时大华严寺有仁楚法师讲因明论，止执卷服膺三遍。精义入神，众推俊迈。有老宿维摩和尚者，释门之奇士也。问楚师曰：“门人秀拔，孰者为先。”曰：“有幽州沙弥者，温故知新，厉精弗懈。”于是求见。遂质问胜军比量。随难应变，辞不可屈。维摩曰：“后生可畏。契经所谓虽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请止开讲恒阳，缙素无不钦羨焉。迨十九岁抵五台山求戒，于受前方便感文殊灵光烛身已而归宁父母及师，于寺敷演。二十三往并部，习法华经百法论。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请讲因明。后于长安大庄严寺化徒数载。乾宁三年进诗昭宗，赐紫袈裟，应制内殿。本道刘仁恭者，据有北门控扼蕃汉。闻止之名，移书召归故乡。其父与师相次物故。母犹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诵《青龙疏》三载，文彻忽有巨蟒见于房，矫首顾视似有所告。时同院僧居晓博物释子也，且曰：“蛇则目睛不瞬，今其动乎，得非龙也。”止焚香祝之曰：“贫道念《青龙疏》，营斋养母。苟实龙神軫念，希值一檀越。”居数日，燕师家子曰：制胜司徒，召申供养。时庄宗遣兵出飞狐以围之，历乎年载，百谷勇贵。止顿释忧惧，未几燕陷，刘氏父子俘归晋阳，止避乱中山。节度使王处直素钦名誉，请于开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着《顿渐教义钞》一卷，见行于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师问罪，定州陷焉。招讨使王晏休得瀛王冯道书令寻止。既见，以车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从荣优礼待之。奏署大师号文智焉，于长寿净土院住持。应顺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弥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腊五十六，闰正月二日荼毗收遗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于龙门山广化寺之东南隅。止风神峭拔，戒节孤高。百家子史，经目无遗，该博之外尤所长者近体声律诗也，有赠樊川长老诗，流传人口。在定州日，中山与太原互相疑贰诸侯兼并，王令方欲继好息民。因命僧斋于庆云寺，会有献白鹄者。王曰：“燕人诗客试为咏题。”止即席而成，后句云：“不知谁会喃喃语。必向王前报太平。”王欣然。诗人李洞者，风骨僻异，慕贾阆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赠止三篇。时宰相孙公渥、赵公凤、马公裔、孙、窦学士梦征符侍郎蒙李侍郎详，皆唱予和汝，埭箴韵谐。止顷在长安，讲罢游终南山逍遥园，是姚秦什法师译经之地。年代■深，鞠为茂草。且曰：“吾为释子忍不兴乎。”奏昭宗乞重修，帝允，仍旧赐草堂寺额。后请樊川净休禅伯，聚徒谈玄矣。及在洛也，讲外长诵《金刚经》不知纪极。昔多居终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诗三百五

十篇，盛行于时。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见师之道焉。

“大房山高丘”锁定了可止家乡的方位，只可惜我们现在还不能推断具体地点。十二岁时，他便有了出家之心，开始在幽州悯忠寺（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向法贞律师学习佛教知识。十五岁时息慈遁入佛门，息慈是梵语沙弥的旧译，为初入佛门息世情，行慈济之义。这一年可止辞别了法贞律师，到真定（今河北正定）习学经论。正定城内佛寺甚多，不知可止在哪一座寺院学习。在那里他遇见了大华严寺一位叫仁楚的法师正在讲因明论，他执卷服膺讲解三遍，把道理讲解得出神入化，众人惊服。服膺指把书中的道理牢记在心中。因明是梵文的音译，始于唐玄奘，属于论理的学科。有一位释门老者曾问楚师，释门中出类拔萃者是谁？楚师说，幽州有个叫可止的小和尚，能温故知新，见解精到。于是两人见面，经过论辩，老者说：后生可畏。于是力请可止到恒阳讲经，受到各界钦佩。十九岁时可止来到五台山正式出家，立志求得正法，感到文殊菩萨灵光照彻全身并光被父母及师傅。于是根据自己的体会，叙述并讲解经文的要旨。二十三岁时又学习了《法华经》和《百法论》。《法华经》全称《妙法莲花经》，鸠摩罗什译，7卷，28品。称释迦牟尼于说《无量义经》后，自称其出世说法的本怀在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说一切众生凡与佛法结缘者皆可成佛，佛常住不灭。观世音等菩萨有利益济度终生的功德等。当时持颂此经者广泛，在民间影响巨大。《百法论》全称《大乘百法名门论略录》，世亲著，唐玄奘译，1卷。论述瑜伽行派五位百法之说，为法相宗所依重的重要论典之一，收入《大正藏》。唐昭宗景福年间（892——893年）可止来到河南河池，应邀讲解因明学。后来，又到长安大庄严寺讲经收徒多年，受到教化引导的人日渐增多。乾宁三年（前面说过，乾宁无三年，这里文字有误），可止将自己的诗作进呈给唐昭宗。昭宗李晔将紫袍袈裟赐予他。幽州兼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占据房山大安山自立为王后，知道可止是得道高僧，便写信邀其还乡。可止回到阔别的家乡时，他的师傅和父亲都已故去，只有母亲还健在。可止便手持钵盂四处乞讨，以供养母亲。他坚持三年，一边行走一边念诵《青龙疏》（即沙门道氤奉玄宗诏命所作《金刚经疏》），一天，有一巨蟒来到可止的房屋，昂首环顾似乎要告诉什么事。同院一个通晓博闻的僧人说：“蛇的眼睛向来不动，可这条蟒的眼睛动了，难道不是一条有吉兆的龙吗？”可止赶忙焚香祝告说：“我念《青龙疏》，是为了斋养母亲，不值得龙神挂念，如果挂念，请得到一个对我施舍的人。”数日后，便接道刘仁恭的邀请。得到了“招申供养”。但时间不长，潜称大燕皇帝的刘仁恭父子便被后唐庄宗所消灭。可止因为有附逆的嫌疑，

不得不避乱于山中。义武（今河北省定县）节度使王处直（862—922年），素来敬重可止，便把他请到开元寺，逐月供应钱粮。这期间可止写成阐述顿教与顿渐教义的《顿渐教义钞》一卷。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定州被王师问罪之兵攻陷。可止又面临云游的命运，这时，在五代时初事燕，继事晋，自后唐明宗至后晋出帝皆为相的冯道使他再一次化险为夷。招讨使王宴休奉冯道之命千方百计找到可止后，用马车将他送到河南洛阳。秦王安从容优礼相待，同时上奏加封可止为“文智”大师，并任长寿寺住持。四年之后，可止得了一点小病，召集弟子们说：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吧，帮助我往生。然后气息渐弱而圆寂。肉身焚化后，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建塔葬于龙门山广化寺东南。可止的这座塔还存在与否，我们不得而知。可止不仅“风神峭拔，戒节孤高”，对于“百家史子”更是博览强记。在定州时，为阻止中山侯与太原侯的兼并战争，他借有人献白鹄之事，当场吟出“不知谁会喃喃语，必向王前报太平”的诗句，可见，他是力主和平的态度。贾岛的追随者李洞，和当时的宰相孙渥、赵凤、马裔等人常与可止“唱予和汝”这些诗作还有待我们挖掘整理。可止在长安讲学之余，还到终南山、崆峒山游历。看到昔日译经圣地颓败，他奏请昭宗，重修逍遥园。可止生前编有《三山集》，诗三百五十首，盛行于时。他的弟子有修文、修智、修行，可惜都是“微见师道”。

可止善诗，多与当时名人相酬唱，《三山集》散逸不可寻。现将《全唐诗》所收九首抄录如下：

山 居

雪消春力展，花漫洞门垂。果长纤枝曲，岩崩直道移。
重猿围浅井，斗鼠下疏篱。寒食微灯在，高风势彻陂。

赠樊川长老（一作清尚诗）

瘦颜颧骨见，满面雪毫垂。坐石鸟疑死，出门人谓痴。
照身潭入楚，浸影桧生隋。太白曾经夏，清风凉四肢。

寄积麦山会如长老

默然如大道，尘世不相关。青桧行时静，白云禅处闲。
贫高一生行，病长十年颜。夏满期游寺，寻山又下山。

送 僧

四海无拘系，行心兴自浓。百年三事衲，万里一枝筇。
夜减当晴影，春消过雪踪。白云深处去，知宿在何峰。

哭 贾 岛

燕生松雪地，蜀死葬山根。诗僻降今古，官卑误子孙。
冢栏寒月色，人哭苦吟魂。墓雨滴碑字，年年添藓痕。

雪 十 二 韵

落处咸过尺，■然物象凄。瑞凝金殿上，寒甚玉关西。
润比江河普，明将日月齐。凌云花顶膩，锁径竹梢低。
出谷樵童怯，归林野鸟迷。煮茶融破练，磨墨染成■。
陷兔埋平泽，和鱼冻合溪。入楼消酒力，当槛写诗题。
道路依凭马，朝昏委托鸡。洞深猿作族，松亚鹤移栖。
及夏清岩穴，经春溜石梯。丰年兼泰国，天道育黔黎。

精 舍 遇 雨

空门寂寂淡吾身，溪雨微微洗客尘。
卧向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

小 雪

落雪临风不厌看，更多还恐蔽林峦。
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

送婆罗门僧

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
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

可止的诗集，宋人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唐诗纪事》卷七十七录可止诗六首。李洞赠可止诗，见《全唐诗》卷七三二《赠可上人》：

寺门和鹤倚香杉，月吐秋光到思■。
将法传来穿泐漭，把诗吟去入嵌岩。

模糊书卷烟岚滴，狼藉衣裳瀑布絨。

不断清风牙底嚼，无因内殿得名衔。

贾岛逝后，葬于普洲岳阳山，从《哭贾岛》诗推测，可止很可能到过蜀地，并专程吊祭过贾岛。诗中的“冢栏寒月色，人哭苦吟魂。”因为意境凄美，被曹雪芹在《红楼梦》76回中借史湘云与林黛玉两人面对一轮皓月联句时，点化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佳句。关于可止的诗风，还可另文探讨。可止与贾岛交相辉映，他们都是晚唐历史上可以大书一笔的风流人物，都是房山的骄傲。

参考资料：

- | | |
|----------------|------------|
| 《全唐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宋高僧传》 | 中华书局 |
| 《唐才子传校笺》 | 中华书局 |
| 《佛学大辞典》 | 上海书店 |
| 《中国佛教》 | 知识出版社 |
| 《中国历史人名大辞典》 | 黄河出版社 |
| 《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分册》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留得清操证素心（上）

段天顺

2007 年是父亲段西侠诞辰一百周年。回想他老人家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

父亲本名段茂棻，字润泉，号西侠，中年以后一直沿用段西侠的名字。生于 1907 年旧历 10 月 17 日，1995 年 4 月 26 日辞世，终年 88 岁。

父亲自幼生长在北京郊区房山区一个小山村（今房山区河北镇河东村）。家里有 20 多亩山坡地，八间石板房。他的祖父教了一辈子书。他的父亲段联瑞和两个哥哥，大哥段茂堂、二哥段茂楷也都念过书。后来两个哥哥都在房山小煤窑和煤厂作过司账之类的工作。还有一个弟弟，名段一虹，学生时代 1934 年即参加革命，解放后任公安部消防局局长，1960 年去世。在这一带的山村，按当地生活水平，我们属于中等，算是“书香门第”。

父亲幼年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1 岁从家里出来先在卢沟桥读高小，13 岁考入通州京兆师范。1926 年（19 岁）师范毕业，在北京城里牛街小学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员后，又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艺专前身）学习三年毕业。1932 年开始，先在海淀小学当科任教员九年。1941 年调至城里北平市第二职业补习学校（地址在和平门外梁家园），当了只有 20 名学生的“校长”。至 1942 年改为北平市立初级商业学校（相当普通中学初中）。先是担任教导主任，后来任事务主任兼任国文和音乐教员。1947 年暑假该校与北平市第一临中合并为北平市立第八中学，父亲任高三国文和初中音乐教员。一直到 1949 年 2 月北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父亲继续留在八中，出任校长。后来又担任过新生中学（当时有志成男中女中等几个私立中学合并而成，后改名 35 中）校长、市教育局视导员。北京市工农教育局成立后担任北京市工农教师进修学校校长。1958 年以后为提高北京工业战线科以上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根据北京市委指示，

筹办北京市厂矿干部文化学校，主持修建新校舍。新校建成后担任该校校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判斗争，长期在学校锅炉房“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后，至1979年平反，那时他已72岁了。随即办理了离休手续。父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

父亲辞世后，他离休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师范学校党组织，在《段西侠同志生平》中介绍说：“他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在教育战线上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一批批年轻学生奔赴解放区，走上革命的道路，成长为党的各条战线的工作骨干和领导干部。段西侠同志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

父亲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动时期。他在旧中国生活了半辈子。是从旧中国“拼杀”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经历了由自由革命者，通过长期地下斗争考验，成为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坚强战士。

他出生于清朝末年（光绪三十三年），童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饱尝了社会黑暗和军阀混战的生活经历。正如他在建国初期（1951年）所写的《自传》中所说：

因为连年的军阀混战，生活不安定，对暗无天日的社会现状，感到无情地憎恨而激发起我的正义感和革命性。

他继续写道：经过直皖和两次直奉的军阀混战，迫使我各处逃难。有一次，十五、六岁的我背着一个大行李卷，由通县逃亡家乡，途中露宿了几个冬夜，冻坏了手脚、受尽了败兵的凌辱。又有一次在家乡被溃兵抓住了，挨了一顿打，还抢去了我由家里带出来的表。我家因为僻处山村，经常遭受溃兵的洗劫，我目睹和身受的苦痛太深了。我痛恨、我诅咒这个黑暗社会，使我毅然投入了现实社会斗争。

这正是他在通州京兆师范读书时的思想写照。这一时期他拼命读了大量书刊，包括清末的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书，他被引导成为一个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爱国青年。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他第一次参加了北京学生的大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那时，他18岁。

1926年父亲从通州京兆师范学校毕业。经人介绍到北京城内牛街小学当教员。他刚刚踏入社会，就遇到该小学校长贪污和欺压教工的事。他年轻气盛，打抱不平，积极策划组织驱逐校长的斗争。促成市教育局派人清查，撤换了校长，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7年他认识了曾经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过的国民党员卜哲民。当时的情况是：1925年国共合作后，1926年进行北伐战争。北伐的口号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依照孙中山先生生前提出的革命目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当时，中国共产党有一些领导人和骨干参加国民党并担任职务。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北方国民党左派势力影响还很大。父亲是在这样形势下，由卜哲民领导参加国民党的（当时北京仍在张作霖统治下，国民党是秘密的）时间是1927年末。《自传》中曾详细写了这段历史过程：

“参加国民党时没有填表，也没党证，最初只教我秘密地看书……他（指卜哲民）给我介绍的书，除三民主义外，还有辩证唯物论，列宁传等。因为卜是受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常听他讲守常同志（即李大钊）怎样怎样，他还特别跟我讲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1927年我只是看些书并没有参加工作，1928年初才开始参加工作。当时卜的工作是担任京兆二十县农民工作，有时他让我给他整理些材料，有时他让我到外县传达些事情。”

1928年下半年北伐军进北京后（最先进京的军队是阎锡山的）就首先压制群众运动，在前门五牌楼贴有布告，大意说，打倒帝国主义伤国际感情，打倒土豪劣绅伤社会感情，当时把我气哭了。我愤恨地说“命还得从头革起”。随着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在天津成立，卜哲民当了省委兼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叫我作干事。我到津后与卜大骂革命失败，应从头革起。我还说，我革命必须深入民众，在民众里做工作。在办公桌上革命，我会腐化的，会使我变成贪官污吏，坚不接任。后由卜派我到玉皇阁（天津市地名）帮助组织天津总工会，任秘书。因为我的作风与其他人不同，经常下到工厂里给工人们解决劳资纠纷，所以很快得到一部分工人人们的拥护。”

不久，因为国民党员登记者，父亲去天津市党部与组织部长苏蓬仙大闹一场。为此把他“以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搅闹市党部罪，由直隶省党部公布，通电全国拒绝登记，永远开除党籍。当时的大公报、益世报等都在第一版用大字登载”（据《自传》）。

父亲参加国民党不到一年即被清除。这是 1928 年下半年的事。他随即从天津回到北京。

北京解放后，父亲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这段历史，我没有向任何人故意隐瞒过。因为我认为从泥沼里拔出腿来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父亲以后走过的漫长革命道路，证明了他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坚决的战士。

三

父亲回京后于 1929 年暑假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艺专前身），学习绘画三年。这一时期他参加的革命活动，主要有：

一、1930 年暑假由北大学生杨秀怡介绍去天津搞工人运动。杨 1927 年时曾与父亲一起参加国民党，此时已是共产党员。到天津后的情况，《自传》写到：“去津后见了一位姓马的同志，他是北大学生和我是同学，还有一位同志是朝鲜籍，经过两次谈话，关于组织工人的方式，我和他俩的意见不合，他们要我在两月内把工人都组织起来（当时天津工人总计有二十万），我主张深入工人队伍掌握基本干部，然后在对资本家的斗争中组织起来，限日期完成任务我干不了。后来，有一次找到他们住处时，楼窗并没有开着，我没敢进去。因为我们的记号是开窗是安全，不开是有问题了，我想大概是出了岔错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所以我只得再回北京继续上学”。此后再未发生联系。这是父亲最早与党的一次接触。

二、1930 年冬参与领导了天津清洁水业工会罢工工潮，并取得胜利。

天津清洁（掏大粪的）水业（推水车的）工会是父亲在 1928 年在天津总工会时帮助组建起来的。有工会会员八千多人。后来有几个天津资本家要垄断这两个行业，成立清洁水业公司，他们出资四十万买通了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已领取了许可证。工会向市党部和市政府交涉多次，无奈钱能通神，总是无效。后来工会听说公司正在打水车、粪车，不日即将武力接管。这时，工会不知所措，才秘密派人来北京找父亲，请他帮助想办法。他非常同情工人的遭遇立即去了天津。《自传》中写道：

我到津后就秘密地住在一个水业工人的家里（在南市）。当即召集一个主要的工会委员会议，制订出几个斗争步骤，第一，先在报纸上刊登和自己印刷斗争宣言，坚决表示不惜以鲜血头颅争取四万人民的生存权力 按每个会员有

四口家属计)。第二派代表向市党部市府请愿。第三，全体工人请愿。第四，动员工人家属妻儿老少请愿，包围市党部和市政府要求生存。当时准备最后进行武力阻止接收并准备砸公司水车、粪车，捣毁公司。

我们进行到第三步时，我们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于清晨五时大部分工人便陆续到达伪市党部附近，每人预备好小旗藏在袖口里，一个号令大家便很快地集合起来擎出小旗，列队走进伪市党部礼堂。我把指挥部设在伪市党部传达室（当时传达室的工友皆是我在总工会时训练过的工人）。所以当第四步正待进行时，他们就屈服了，由伪市府将已发出的许可证追回，停止公司工作。这个斗争只罢工三天就得到全盘胜利。

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北平各校成立抗日救国会和学生会。

父亲积极参加艺术学院学生会的工作。他们与北京各学校组织了全市大游行，向张学良少帅府请愿。当年11月为组织南京请愿团，父亲参加由部分同学组织的北京东车站的卧轨行动。当南京请愿团南下时，他与部分同学未赶上火车，于是他们继续参加送行学生队伍的游行示威并参加捣毁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国民党机关报）的斗争。

四

1932年暑假，艺术学院根据教育部指令改为国立艺专，艺术学院三年级学生以专修科名义毕业。父亲经朋友介绍到西郊海淀小学担任科任教师。

这年冬天，父亲与燕京大学附属平民学校周鲁民同志有了联系，并由一位姓王的同志领导（没有右臂，称小王）。曾在燕大开过会研究在海淀小学组织读书会 and 儿童团事。不久，在父亲的努力下1933年成立了由五位教师为主干的读书会，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其中有一位骨干教师王桥与父亲合作给北京的进步刊物《教育短波》经常写抗日救亡的文稿，该刊还约请他们二人编写小册子在刊物上连续发表，散发于北京各小学。在北京教育界颇有影响。王桥后于1943年病亡。建国后才知道他是位老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初曾任冀南一个县的党的中心县委书记。因组织被破坏，逃亡到了北京。

成立读书会后，父亲又在高年级学生中组织起少年先锋队（是学校内部的学生组织）。在校内组织学生教唱抗日歌曲，给学生们讲形势，讨论时局，阅读进步书刊。在父亲带领下利用暑假还去香山和西山刘村搞了两次游击战演

习，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十分高涨。后来一些骨干学生陆续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后来参加了地下党，有一位被党派进伪军中工作，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这些学生虽然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但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少年时期的“段老师”，并结成了终生的师生情谊。

1934年在海淀小学召开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抗日救亡游艺演出会。由父亲和周鲁民主持。演出节目除去由小学师生准备的节目外，还请来左翼戏剧家联盟演出话剧《血衣》。（该剧曾于1932年公演过遭到禁演）在演出中间，发现来了不少警察和便衣。这时小王和周鲁民恐发生意外，要求让剧联停演，二人随即离开学校。父亲对此很不满意。他一方面布置师生提高警惕，另一方面继续演出，结果演得很成功，会场内外群众受到很大教育，连警察便衣们也都深受感动。此事过后，父亲与王、周的联系也中断了。北京解放后，父亲说起这件事，觉得当时搞得够冒险的。虽然游艺会演出成功，扩大了抗日宣传，教育了群众，但也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和监视。

父亲和党组织发生正式工作关系是1934年。这一年叔父段一虹（后改名冯纪）因在通州师范读书时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北京父亲处，在海淀小学住过一段。后考入东北大学，继续参加学生活动。曾担任华北学联秘书长，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他们兄弟二人在这时与党组织有了工作关系，当时称平教会，属于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人马辉之，建国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1935年秋叔父参加了党，不久即派往天津作地下工作。父亲继续留在海淀小学接受党交给的工作任务。他在《自传》中详细写了每一个时期的联系人和他们解放后的工作单位。

1934年父亲与叔父在海淀小学时，还接受冀东地区党组织委托起草过一个关于天津贺家口等五村全体佃农向全国的《哀告书》小册子。内容是向全社会控诉大地主大盐商李善人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农民的恶霸劣行。先是有两位农民代表通过父亲在天津搞工运时的朋友一起来海淀找到父亲，当时叔父也正在海淀与父亲一起。他俩认真听取了情况，与两位农民代表进行磋商，用了两周时间写成的，共有一万多字，其中正文五千字，附录六千多字。建国后1959年由中科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出版的《北国春秋》创刊号全文刊登了这篇《哀告书》和附录，并有编者按称：“‘哀告书’是一本农民血泪控诉书，它揭露了地主的伪善面目和罪恶活动，以及军阀国民党政府为虎傅翼的丑恶卑鄙行为。‘哀告书’所反映的是天津郊区贺家口等五村农民反对大地主，大盐商李善人夺取佃农斗争。这个斗争起于1915年，傅茂公（彭真）同志曾领导

过这个斗争。‘哀告书’是在 1934 年于宝林、赵建中、孙留光三人上北京，找海淀学校教师段西侠、段一虹弟兄二人写成，草稿带回天津付印。当时共印了五十多本，寄发全国各地。这里发表的这本‘哀告书’，就是当时参加者施文兰同志赠给天津历史博物馆的。”此后 1999 出版的《房山区志》也将‘哀告书’作为房山籍老党员、老干部段西侠、段一虹兄弟所起草的我党抗战前的一份文献史料刊载入志。

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北京发生了波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父亲经与燕京大学救国会联系，发动海淀小学的师生们参加在海淀镇的游行演讲，宣传群众，痛斥国民党政府杀害爱国学生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许多听讲的群众群情激愤，有的痛哭失声。

五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为扩大敌后抗战，勾通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北京的联系，吸收京津一带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在原有的从海淀经北安河、妙峰山一条交通线以外，新开辟了一条从北京经房山河套地区至长操、涑水、易县等地的交通线。父亲的海淀住家成为这两条线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点。

为开辟这第二条交通线，父亲为了发展安全可靠的秘密关系，经过缜密的了解，结识了在房山河套地区开煤矿的老板李献琛，他的煤矿名叫伟业煤矿，当地人称“西矿”。有相当规模，运煤车都是有轨的人力小推车。李家住北京城里，有时去矿上研究处理事情。父亲的大哥就在这个煤矿当司帐先生，与李家关系不错。在日常接触中了解李有民族感，拥护八路军抗战，愿意为八路军共产党干事。所以，父亲先将他发展为秘密关系，作为这条线的重要掩护人。

房山的河套地区（也称河套沟）在日本占领时期从河北镇以下基本属于八路军的游击区。虽然经过日伪军的多次“讨伐”，“清剿”，并在几个大的村庄建立炮楼，但一直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力。有的村政权，白天是日伪天下，夜里共产党的活动，有些村的住户还是边区政府的军属、干属。李献琛除伟业煤矿外，还在去往北京路上的河北村、东庄村合伙开了两个分销煤厂。父亲的大哥、二哥分别在这两个煤厂当经理或司帐。运煤的骡马大车和汽车络绎不绝，给开展秘密工作提供了掩护条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条秘密通道不仅向平西根据地护送过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也成为我党边区抗战人员秘

密进出北京的通道之一。通过运煤的骡马大车和汽车携带从京津地区采购的各种物资，包括药品，纸张，文具，小型印刷机等等，平西根据地的经贸干部彭城同志，就通过这条交通线运转根据地所需物资。彭城同志解放后担任北京商业局长，后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条通道始终安全可靠，没有出现出问题。

据父亲说，从根据地出进的人员，有的认识，也有的只知道姓，名字也是假的，按照地下工作规矩，也不能多问，都是根据上线传达的任务来安排。父亲说记得在抗战时期冀东区党委负责人吴德同志到北平看病养伤就是通过他安排的。经他接待过的还有李运昌同志（解放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林铁同志（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等。当时父亲与他们并不认识，也不清楚他们的工作身份和真实姓名直到北京解放以后，才真相大白。当时与父亲有过工作关系的王子玉同志（解放后曾任河北省纪检委负责人）、严子涛同志（解放后曾任吉林铁路局局长）等在北平解放后都保持着联系。

父亲从1932年起就在海淀住家，直到北平解放后1950年才搬进城里。在海淀住了近二十年。那是一所独门独院的住宅（海淀镇莺房甲六号）。院内有三间房屋和一间小耳房。门外东北侧有小路可通海淀后山的北安河。从1934年以后，父亲由于抗日宣传有些暴露，受到当地警察分局的注意和监视。在斗争中他逐渐学会如何做好隐蔽工作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机智，更加安全，更加成熟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为掩护好作为地下交通站点的住家，麻痹敌人耳目，父亲毅然学起了中医。为了取得中医考试合格资格，他下苦功夫，将每味中草药性写在纸片上，贴在床头，天天诵背，定期贴换。他还经常向一位张姓中医朋友请教，拜他为师。父亲说，他要学习他的祖父，教一辈子书，行医一辈子。他告诉我，乡民们还给他祖父送过一块“儒医济世”的匾。一直挂在老家。果然，在北平市中医师考试时，父亲考取第二名，从此，“中医师段西侠”的招牌挂在了海淀镇那所小院的门外。父亲的身份除了在海淀小学担任教员外，还同时兼有中医师。父亲在《自传》中写道：

为了掩护工作更方便，在1939年我考中医师挂牌行医，以便来往的关系多些、杂些。紧张时期我经常在来往同志面前放着药方子（便于掩护）。有一次伪警察分署长盛铸领着一大堆巡官警长来我家，我很惊讶他们的到来，遂很快从屋里出来，衣冠不整地问他：“署长，今天怎么来亲自查户口呵？”他回答说：“查什么户口呵，谁不知道你呀！我是来约牌手来了，三缺一。”我

说：“好呵，当然要舍命陪君子了。”

的确，由于父亲久居海淀，是个老住户，连拉三轮的都认识他。他除教书外，琴棋书画，打牌饮酒，样样拿得起来。他好与人交，爱说笑话，什么诗、书、易经、阴阳八卦都聊得起来，不少人都和他称兄道弟。在海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思想左倾，警察局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但总抓不住把柄。警察局的人说，段西侠很像共产党，但“听着像，看着不像。”从外表上看，他给人的印象倒很像一个作风散漫落拓不羁的文人。

说起父亲的行医来，那可不是个挂名的，日子久了，附近的居民和一些朋友常向他求医问药。我至今保存有一部《百草从新》还有一本他亲手写的中医药抄本，内容包括中草药药性和成方，还记有一些施诊心得和用药方剂。可以想见他的钻研精神。据我所知，在1955年左右，北京中医医院建成后，市政府主持文教卫生的副秘书长李续纲同志还曾推荐过父亲去担任院长呢！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父亲还以习武为掩护，结交青年武术爱好者，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他说，小时候身体瘦弱，到师范学习后有国术课，很喜爱，经常练习。在海淀小学教书期间，他拜当地武术名家黄宝亭老先生为师，学习顺手拳。黄宝亭老先生在当时名声甚旺，“平西学武者大半皆投其门下。”

（见1934年出版《顺手拳·张景涛序》）“一时知名武术家多相率顶礼，又有大学教授王侈仁君、陆建勋君、李德奄君及清华燕大等校职员、海淀小学教员等亦拜投门下……”（见1934年出版《顺手拳·业师黄宝亭先生略传》）不仅如此，三教九流也有拜黄老为师的，其弟子大概有七、八十人。父亲不仅练武还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无疑，这也是进行地下工作的一种掩护。比如海淀小学的教员赵英然、刘济柔等是读书会的骨干成员，燕京大学的周鲁民、陈叔亮也都是黄老师的入门弟子。陈叔亮后经父亲介绍去了根据地。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叔父段一虹也是黄老师弟子，他那时（1935）就已入党。父亲习武很认真，是黄老师的得意弟子，武术界许多人都与他交过招，知道他。抗战前为传播顺手拳曾出版过一套两集《顺手拳术》，内有父亲、叔父等人的拳式示范照片。后来，父亲调城里工作后，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都挂着他那口心爱的宝剑，墙角处立着一条白蜡竿（是练武术用的木杆，）。白天搞教学，晚间夜深人静后经常到后院练习。一直到晚年，他虽然不练“顺手”了，但练功却长年坚持，终老不辍。

留得清操证素心（下）

段天顺



段西侠早年留影

诗书画，是父亲的本行。早在京兆师范读书时，绘画老师赵孟朱很器重他。他考艺术学院时，徐悲鸿先生是监考老师，入学后对他们绘画班进行过亲自指导。著名版画家王青芳、国画家李苦禅等与他是前后班的同学。他在海淀小学是科任教师，教“小四门”，包括音乐和绘画。每当春节回老家常给乡亲们写对联，给亲友们画画、写条幅。他调到城里第二职业补习学校当校长时，学生少，教师少，房子多，他一人占有一间卧室兼书房。在校老师中有版画家王青芳，是他的师兄。爱好相同，也都喜欢饮酒。父亲给他的戏题诗云：“世事岂须分黑白，云狗何劳认假真。雕罢杜梨还痛饮，还他醉眼看风云”。“杜梨”指杜梨木，是做木刻画的版材。“云狗”即白云苍狗，形容云的变化多端。他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取名“将就斋”，自题款名“将就斋主”。他喜画梅、竹、花、鸟，有时给朋友画扇面兼题诗，抒发情怀。比如，他在一幅《芦鸟芙蓉》画中有道：

一苇临江任卷舒，芙蓉隔岸舞轻裾，
枝头野鸟闲情甚，不羨芙蓉羨水鱼！

值得一提的他是那方寿山石的闲章——“成公后裔”。每次完成一幅字画题款时，他常要盖两方印章，一是“将就斋主”，另一是“成公后裔”。“成公”是谁呢？是指唐代德宗时的良臣段秀实。段秀实，字成公，陇州汧阳人。曾任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大历间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在任“三四年间，吐蕃不敢犯塞。”德宗时，朱泚叛变，欲篡帝位。秀实向暂附朱泚的文臣武将做工作。一天朱泚召开会议，当讲到欲“僭位”时，秀实大怒，乘机夺得旁人象牙笏版。“奔向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可磔万段，我从汝反耶?!’遂击之，泚流血被面，匍伏走”（见《新唐书》）。秀实由此而英勇就义。翦灭朱泚后，朝廷诏赠秀实为太尉，谥忠烈。记得父亲是在说到南宋文天祥的《正

气歌》时向我讲述这段历史。他说，《正气歌》中有“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就是写的段秀实。他说文天祥在这篇诗中举出十二位历史上的忠烈先贤，其中包括段秀实，并高度评价这些人“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父亲认为段秀实是段氏祖先的光辉榜样。在日本统治时期，父亲身处敌战区，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显然，这“成公后裔”是一方表明心迹的印章，如果一旦被捕，就要向远祖先人那样尽忠报国！

实际上，一个有血性有骨气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日本铁蹄下生活从事秘密地下斗争，心情经常是压抑的，寂寞的。地下工作者把根据地解放区亲昵地称为“老家”。他们心系“老家”，思念“战友”，关心“家乡”的形势发展。父亲在抗战中向根据地输送他的学生、战友，接送根据地往来的干部，他的感受就更加深切。当日伪向根据地“清剿”，大搞“三光”政策，乡亲们遭到烧杀抢掠时，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这在他写的诗词作品中常有表露，虽然只能从隐晦的文字曲折地表达他的炽热情怀。如1939年写的两首诗：

半窗明月照孤眠，寒舍灯残淡似烟。
一枕乡心千里梦，随风飞过万重山。

空阶冷雨堕藤花，风撼庭槐乱暮鸦。
百里家山归梦远，连天鼓角动胡笳。

1940年的深秋，有一首写红叶的小词。词前小序云：

前赴西山友人约，流连竟日。主人情重，红叶依人。设无俗职在身，几欲与碧云红树终老矣。归赋小词两阕，寄赠所思，托题红叶，聊抒情怀。

其中一首调寄《调笑令》云：

红叶，红叶！染就啼鹃怨血！写成一片秋心，天涯寄与伊人。悽切，悽切，惆怅落花时节！

词中所写“伊人”，出于《诗经·蒹葭篇》，原是一首祭祷伊水水神之歌。“伊人”本意指伊水女神。后来演变借指女友或恋人。地下工作时期为掩人耳目，也有把男同志叫成某“小姐”的。我就听到父亲在与人交谈时提到过“任小姐”。后来，我见到从城工部来的“任小姐”竟是男的，他就是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人事局局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任彬。

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我根据地缩小，形势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为了保存实力，党的地下工作，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强调长期独立作战，切断各组织间的横向关系。父亲与根据地

的联系也少了。这一时期，他的心情是沉闷寂寞的。他在 1943 年 3 月一首《春夜听雨》的诗中写道：

频来枕上偏无力，偶到阶前却有声。
重衾漫嫌归梦冷，征衣此际正殷红！

在一首《墨竹》题画诗中写道：

素心劲节老烟霞，风雨连宵不胜嗟。
兴到纵横三四笔，写出胸中寂寞花！

六



段西侠兄弟在练顺手拳

1944 年，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孙逊同志从根据地来京，代表组织将父亲的工作关系。“由社会部关系转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见《自传》）。1945 年 6 月 10 日，孙逊和高彬二同志介绍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后补期三个月。父亲在解放后回忆他革命多年长期没有要求入党的思想过程时这样写道：

有时同志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入党？”我说：“我是自由革命者，我怕党内的铁的纪律，我不愿意受束缚，但我决不背叛革命，反正给我的任务，我绝对完成。”一直到 1945 年我才感到革命

事业的艰巨，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才能有力量，才能完成革命事业，才感到没有组织的正确领导革命事业便会一事无成，因此才有入党的要求。

1945 年日本投降，晋察冀城工部从根据地不断派人到北平开展工作。父亲海淀住家，成为往来活动的据点之一。据我所知道的，像进北平较早的孙逊、俞立同志，其后的任彬、陆禹同志，北平解放后陆禹同志曾任北平市委工业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我在家里都见到过他们。俞立是孙逊同志的夫人，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崇文区副区长。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北平地下党员宋匡我、段西侠，……孙逊进城后，积极与他们接头。他们在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段西侠 1945 年入党，他的妻子黄淑珍——我们都叫她黄四姐，待人热情，他家就成了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我在 1945 年下半年进城后也常去他家。黄四姐的弟弟黄天佑也通过孙逊开始作

地下工作”（《历尽艰辛战古城——忆孙逊》）。北师大的何书谦同志，毕业后即去解放区。抗战胜利后又派回北平，曾在父亲的宿舍（梁家园）住过一段时间，后介绍到求实中学以史地教员为掩护，做地下工作。

随之国共重庆谈判，组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进驻北平，党的地下工作更活跃。当时北平出版了《解放》三日刊。不久在孙逊同志领导下筹备出版了《人言周刊》。记得在父亲所在的学校宿舍，孙逊、宋匡我和父亲研究过《人言周刊》的出刊事，我也见到过该周刊。出刊半年左右即停刊了。在1946年暑假，父亲还参与组织进步学生去解放区张家口参观学习。这一活动在不少的中学都组织过，在北平学生中影响很大，以至伪北平市教育局密令各中学要防止学生利用暑假期去解放区。

从1946年末开始，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大规模爆发，国民党完全撕去民主的伪装，疯狂镇压学生和市民。在1947年和1948年那段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北师大、艺文中学、河北高中、汇文中学、志成中学、山西临中等学校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每次都有一批学生遭逮捕。1948年发生了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的“七五”事件，国民党军警开枪打死学生和市民17人，重伤24人，轻伤百余人。“华北剿总”的武装巡逻车，整天呼啸在街道市肆间。地下斗争处境越来越严峻。北平地下党领导骨干，如“平委”和“学委”的领导人赵凡（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农村工作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余涤清（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常委）都曾先后被捕，因未暴露身份，缺乏证据，经组织营救出狱。

父亲所在的北平市立初级商业学校，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当局派了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马耀三接管并担任校长。他是1927年的国民党老党员，与父亲认识。在政治上是个反共的顽固分子。马耀三初来时，对父亲还比较信任，让父亲担任教导主任兼国文和音乐教员。但到了1946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共谈判失败，内战大规模爆发，也由于父亲前一段工作有些暴露，引起马耀三的关注。就不让他当教导主任了。1947年，市立初商与市立第一临时中学合并成北平市立第八中学，马耀三继续担任校长。他对父亲的监视活动变本加厉，他派亲信教员住进父亲宿舍对门，日夜进行监视。一天在教职员会上，马耀三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威胁说“在学校里，就是不许有左倾思想存在，谁有我就‘牺牲’他！”他公开警告父亲，不再照顾朋友的情面了。此后父亲讲课时，教导主任经常去偷听，并多次向他提出警告。训育主任还偷偷去他的卧室查看过他的日记。父亲的工作环境比在抗战时期还要困难。甚至连我（当时我

是八中初三学生)也列入校方特务的监视网。当我考入河北高中后又把监视“关系”转到那里。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父亲根据地下党“学委”布置的“隐蔽、分散、长期、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一方面将工作方式搞得更加隐蔽，与联系人接触经常变换地点，如陶然亭、图书馆和海淀住家等。另一方面对进步学生多做个别接触个别做工作，避开监视网。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内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一个又一个示威游行，从大学引向中学，从学生扩到职工和市民，参加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父亲在注意做个别学生工作的同时结合形势，在课堂上利用报纸公开的资料向学生宣传。比如，有一次，父亲教音乐课，按教育局规定必教的一首反动“勘乱”歌曲。他抓住歌词中有“前门赶出狼，后门进来虎”一句。大讲了一通美军在北平强奸女大学生“事件”。他说，美国还供给国民党军火打内战，这不都是后门进来的“虎”吗！还有一次在音乐课给学生讲述当时放映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借影片中那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民歌，揭露国民党官员发国难财，鱼肉人民的丑闻。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北平解放后，一提到段老师讲课时，有的同学说：“谁也听不出来是做宣传，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就特别憎恨起国民党，而希望共产党来，并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1996年出版的《北京八中建校七十五年周年书画诗文集》中有七、八位父亲当年教过的学生在文章中回忆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中由范士林、谢龙同志（八中地下党员）执笔的那篇《北京解放前后的八中》（是根据15位老同学的座谈回忆写成）。其中对父亲在八中的情况作了真实的描写。文章在最后一段写道：

更加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解放后我们的第一任老校长段西侠同志。

在课堂上他是我们的好老师，讲课认真，诲人不倦。他平时和我们一起住在扬州会馆的学生宿舍里，课余时间，夏季在槐树荫下，冬天在火炉边，和我们一些同学促膝谈家常，督促我们学好各门功课，给我们讲诗词，讲历史故事。他也通过我们当中的同学和地下党联系。黄维忠、王恕恒等同学给他们送过信。

解放前夕，围城期间，他关心我们一些不能回家的同学的生活问题，怕打仗伤着我们，叫我们在宿舍里挖避弹洞，以防万一。怕饿着我们，在他生活本来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挤出那份口粮让我们吃饱，我们几个同学上街卖报，赚钱买了窝头，也和段老师分享。解放后他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的校长，更关心我们学习和政治上的进步。

实际上，父亲在做学生工作的同时，还一直联系着打入北平警察局和中统局的地下关系黄天佑。黄天佑原由孙逊同志领导，后转父亲联系。通过父亲将情报及时送达党的领导机关。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1947年春，那时我在北平四存中学读书。我与父亲住在一起（梁家园初商宿舍）。一天清晨，父亲尚未醒来，我从他的衣袋里拿走几张崭新的钱票，准备到学校门外小卖摊上吃早点。我刚刚到学校门口（学校在府右街），父亲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过来。他神色慌忙地问我，新钱票花了没有？我说还没花。他高兴地要回了新钱票。又拿出几张旧票给我，匆忙离去，我迷惑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当时哪里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北平解放后，他才告诉我，原来那几张新钱票上是党的秘密信件。如果花掉就误大事了。

北平解放时，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宣武门国会街北大四院召开的全市地下党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父亲。我们父子终于以两代共产党员革命者的身份终于会见了。

记得那是1949年2月4日下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式仅过三天，我所在的河北高中的地下党员较早到达。平日同学间虽然熟悉，但党员身份各不相知，见面后欣喜若狂。一会儿，我忽然发现父亲随着人流进入会场。那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近视镜……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我已经有半年未见过他了。我情不自禁地从人群中挤到他面前。他开始十分惊奇地看着我，随后拍着我肩膀说：“你什么时候也成长起来了”。那时我十六岁，在他的眼里我仍然是个孩子。他没有料到尚未成年的儿子，会参加共产党，卷进人民革命大潮中来。他那瞬间闪过的惊奇而欣慰的目光，至今难忘！我简单地向他讲了自己入党的经过。他当然理解，在地下参加党组织的事是不能告诉父母的呀！那天的大会是晚间召开的。记得是李葆华同志主持会议（李是当时北京市委副书记），彭真同志做报告，参加会的林彪，聂荣臻，薄一波等都讲了话。聂荣臻讲话中表扬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肯定了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并要求党员学会掌握中央政策管理好城市。李葆华同志还介绍了地下党员们经常说起的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领导人刘仁同志和萧明同志。大会一直开到午夜以后才结束。

散会后大家都各自回校了。大概隔了两天，我与父亲相约到他的宿舍。我们父子做了彻夜长谈，他用颤抖的手（那时就有手颤）抚摸着我的头说，我们终于迎来了黎明，回想起来，你多让人担心呀！其实，我又何尝不担心父亲呢！那夜我们都非常兴奋。他忽然哼起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来，并一句

一句地教我唱。那歌声至今音犹在耳：“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热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青春的大旗高举起，勇敢地迈步向前进……（瞿秋白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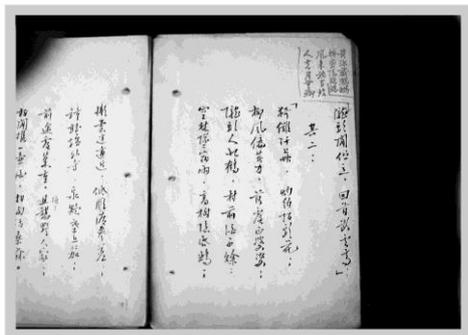
七

1949年北平解放时，父亲已经42岁了。但仍像年轻人那样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迎接解放的洪流中。他似乎把他个人那些执着爱好，什么诗书画、中医医术、顺手拳等等，都抛在一边，没时间顾及了。一切都从头做起，从头学起。他夜以继日地为八中的接管工作操劳。后来又接受任务，将几个私立中学合并，重新组建成立新生中学（后改为三十五中），他担任校长。他对工作任劳任怨，倾全力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和协调，整顿教学秩序，使学校较快步入正轨。

他万万没有想到，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父亲因在学校合作社有过“赊账”，就将他打成了“大老虎”，进行批判斗争，“隔离审查”，（详见段葆兰《回忆父亲二三事》）被整了三个多月，父亲的身心遭受到严重的凌辱

和打击。由于当时有不少学校校长被打成“大老虎”，市委发现后，即下指示“复查”、“纠偏”，父亲才被放出来。在新中国这块光明的土地上，竟然受到如此大的屈辱，是父亲始料不及的。他似乎很快地苍老了许多。不久，他被重新安排了工作，先在北京市教育局做了一个时期的视导员；后来担任北京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经一事，长一智。后来的反右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中，他总算是没沾上边儿。

当他正在自己亲手建起的厂矿干部文化学校干得起劲的时候，“文革”来了。学校是重灾区，他这个“长”字号更是在劫难逃。他戴着“黑帮”、“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嫌疑”的帽子，艰难地度过了十年漫长的“文革”岁月。后来，他向我们谈



段西侠手迹，作于1937年至1943年

起在批斗会上，有人问他：“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别人被捕，你没有被捕过？”似乎地下斗争中只有两条路，一条当烈士，一条当叛徒。既然没有牺牲当烈士，必是叛徒无疑。对此，父亲只是以轻蔑的沉默来回答。后来他就完全“想通”了。在批斗会上，他常常默背唐诗，以对付那些聒耳的噪声！

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但是提到对教育工作的体会，他总是慨叹不已。他说，新中国建立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校长的哪有多少时间去搞教学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常幻想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所中学，约请最好的老师来教，待遇优厚一些，政府少干预一些，踏踏实实地潜心于教书育人的事业。现在看来，他的想法只能是“说梦”而已。

离休以后，父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一切都是返朴归真了。正如他的诗中所说“混迹市廛成大隐，幽居僻巷即神仙。”他从那一家人只住一间房的教职工宿舍搬到西城学院胡同，后移居天宁寺附近妹妹的机关宿舍去住。他身体本来不错，只是双手颤抖厉害，用药也没有什么效果。连吃饭用筷都有困难。不然，他的书法绘画完全可以充实他的晚年生活。现在只有望而兴叹了。不过，他经常去紫竹院和月坛公园散步、练功，与那里的老伙伴们谈天说地。读书，看报，与老友聊天下棋，成了他晚年活动的主要内容。他的老战友陈叔亮从外交部离休后，出了一本诗集寄给他。父亲想起抗战前在陈家挂的条幅上写的清代张船山的两首绝句，他至今未忘。就依原韵也写了两首，题目是《和船山两绝（拟寄陈叔亮同志）》云：

风雨劫灰早废诗，红羊虽过尚栖迟。
江郎未殒才先尽，卅载深情忆昔时。

浪高风急几浮萍，兴废沉沦岂性灵。
醇醪楚赋原多事，刹那何须论醉醒！

他的学生马虹，是经父亲帮助送往解放区的，在石家庄当了多年中学老师，后在市政协工作，后来成了太极拳名家。他每次从石家庄来北京都要看望老师，还要打几趟拳脚，请老师指点。中学语文教师肖豹岑，与父亲是忘年之交了，他是著名书法家萧劳之子。在“文革”父亲被批斗的日子，他常偷偷地揣着一瓶二锅头来家中看望和慰问父亲。“文革”后也经常来家谈古论今。当代著名画家陈雄立先生与我家有世交，经常到父亲家里来，向父亲学习顺手拳、谈书论画。他在一次名家访谈节目中道出了与父亲之间的忘年之谊，他说：“有三位老人影响了我的一生。一是外祖父刘丁辰……二是段西侠，他是我党地下工

作者，一身武功，为人豪爽，我曾经患了癌症却能康复，和跟他习武强身不无关系。三就是李苦禅先生……”。还有三十年代海淀小学那些老“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们，如安正生、袁德隆等都是家中的座上客，其中赵文明退休后，经常来家陪老师下棋。他坚持每两个星期陪老师去澡堂泡澡（父亲一生有泡澡习惯），十几年如一日。

北京解放前后在八中与父亲风雨同舟共同战斗过的那批同学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与父亲的师生情谊始终未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昔日同学相约，每年春节正月初三到老师家拜年聚会。这个聚会一直持续到到父亲去世，十六年来，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1993年的春天，父亲的长孙段强从密云县长任上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年36岁。父亲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几天中一连写了九首诗，表达了他的喜悦，他的勉励，也还有几分耽心。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呀。现举出两首：

成公后裔正气昌，儒医济世祖荫长。
段家自有青鸟使，喜报传来满院香。

这首诗是向长孙讲述段氏家族历史，表达他的喜悦和自豪。他列举两位家族的祖先，一位是唐代的段秀实（字成公），他面对反贼，一身正气，用象牙笏板击贼面痛骂的忠烈事迹。另一位是父亲的祖父段秉钧公，一生以儒医为业，享誉乡里的事迹，以此勉励段强继承家族的优秀传统。

再一首：

一颗新星飞上天，耽心任重难胜肩。
仲谋赤壁夷陵日，曾疑公瑾与伯言。

诗中表示对“进步”快，但阅世尚浅的爱孙的某些隐忧。诗中举出三国两位最著名将领周瑜和陆逊所遇到的“谮言”和不幸结局作为警示。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三国志》记载：赤壁战后，孙权举大宴与刘备叙别。宴会后又与刘备个别交谈。孙刘交谈中孙权流露出对周瑜的极不放心。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气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曹操也曾给孙权写信，诡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所以《三国志》注者裴松之说：“瑜盛声远著，故操公、刘备咸疑谮之。”谮，是诬陷中伤之意。至若陆逊，字伯言，曾大破蜀汉兵于夷陵之战，拜辅国大将军，官至丞相。但后来因废太子事，遭到孙权打击，“遂愤恚而死”。恚，音“惠”，怨恨之意。父亲以一种忧患意识向爱孙的告诫，语重心长！随着世事迁易，更显示出这位耄耋老人的睿智和清醒！

1995 年春节正月初三，他和学生们第十六次聚会将要结束时，父亲又招呼大家坐下来，他兴致勃勃地将昆明大观楼上那 180 字的天下第一长联背诵给大家听。大家叹服这位 88 岁老师惊人的记忆力，满怀信心地表示来年为老师 90 岁生日祝寿。但未曾料到，这次聚会却成为老师给他最喜爱的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他的学生和战友黄维忠同志将长联写成正楷书法一帧，并记其事，作为八中 75 周年校庆的献礼。

写到这里，我想起父亲在 1942 年写的那首《咏珍珠梅》：

校中有珍珠梅两丛，花小如堆雪，香清而淡冶，叶浓而色碧。直至百花枯后，犹峙立冷风中有感于怀，成诗一律：

罗浮山上多白云，白云深处寄此身。

佛手拈来香正妙，禅心证后色犹深。

……

冰姿雪骨云情态，仙魂素魄玉精神。

清恬只自怡闲苑，艳冶凭它闹上林。

蕊珠宫里游仙侣，菟狗人间落魄身。

狷介何堪供案几，疏狂只可谪蓬门。

早知不入繁华眼，留得清操证素心。

是的，父亲在 35 岁时写的这首诗多么像他一生的写照呵！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一生以珍珠梅自喻，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始终清高自守，清廉自律，清恬自乐。既悟于“早知不入繁华眼”，实践了“留得清操证素心”！这是父亲给他的子孙们和心爱的学生们留下的一份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2007 年 2 月定稿

2007 年 5 月 30 日修改

苗培时访谈录

宋 湘

苗培时,我国著名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家。1918年生于房山县坨里村,2005年10月28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少年时曾就读于原房山县洪寺村私立长育学校。

1993年5月25日苗老来长育学校。区政协、城关办事处、长育学校,以及洪寺村等单位负责人共十余人欢迎苗培时返校,与之座谈。下午,苗培时在长育学校全体教师大会上讲话。笔者参加了这次全天的活动。

1995年2月12日,房山区召开首届游子联谊会。获悉苗培时与会,笔者又一次拜访了他。

苗老的数次访谈、讲话,笔者都做了记录。现综合整理于下,作为对苗老的追思与怀念。



1993年3月,作者到北京西直门内南半壁街19号苗培时家中拜访

幼读长育 成才之基

1918年我出生于房山县坨里村。祖父是资本家,到我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我小时家境不是很好。1929年入长育学校第10班。那时校长是肖鼎三,语文教师邱雪樵。

长育学校教学质量就是高。特点是教师水平高,而且整齐,没有瞎凑合的。我在长育上学二年,12岁小学毕业,英语达到初中水平。作文课教师出个题目,一个半小时交卷,真是马不停蹄,笔走如飞,下笔千言。

我重点介绍一下语文教师邱雪樵先生。邱先生是房山县饶乐府村人，北京男四中毕业。邱先生对学生特别严格，说话待“挖苦”，外号“邱损人”，也有人叫他“邱疯子”。对学习差的学生有时气得他像疯子一样，想打又不打，自己一边去哭：“怨我没能教好你！”南车营有一个姓孙的同学，各门功课都挺好，唯数学不及格，气得邱先生边掉眼泪边说：“你别跟我学了，回家告诉你爸爸，让他教你怎么算‘驴打滚’利息吧！”其父知道后专门来校，向邱先生作了两个揖，说：“您教育了我儿子，也教育了我，我一定抓紧管教他！”从此孙同学发奋努力，后来考上了北京宏达中学、中国大学。

邱先生古文、诗词底子浓厚，尤擅旧体诗词。我后来能够走上文学道路，并且能写点诗词，就得益于邱先生的启蒙。

邱先生善于对学生因材施教，对学生未来发展看得很准。每年学生到北京考学，邱先生都亲自送。而且让谁考哪个学校准能考上，教师了解学生到这个程度实在不容易。我和南关同学张辉在班上一直是第一、二名。邱先生说：“你俩一起去考师大附中，准能考上。”五千多人报名，取50名，百里挑一。结果，张辉考第一，12门功课平均98.6分；我考第二，平均98.4分。张辉入学了；我因为交不起90元钱学杂费未能入学。

长育学校第二个特点是，各科教师都以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教学宗旨。邱先生经常给我们讲邹韬奋、李公朴、闻一多、鲁迅，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讲“九一八”事变。邱先生讲得声泪俱下，全班同学痛哭失声。

邱先生在社会上知名度甚高。当时的县长姓白，曾约见邱先生，被邱先生严词拒绝。邱先生从长育学校回饶乐府，穿房山城而过；一进西门就高声痛骂县政府腐败，一直骂出东门，官方也奈何他不得。当时长育学校有没有共产党组织，我年龄小不清楚，但是个别党员可能是有的。当时房山县教育科长姜时喆就是地下党员，这是后来知道的。邱先生是不是共产党，与姜时喆等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是个值得考证的事；但我可以肯定邱先生是一位坚强的爱国主义者。长育学校，特别是邱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石。

投身革命 矢志不渝

1931年底，我12岁从长育学校毕业，考上师大附中，因交不起学费未能入学，但从此与北京地下党发生联系，成了党的地下交通员，跑遍全国。1943

年，我进入成达中学，从此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一年半初中毕业。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在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已是北京市学联常委；姚依林是学联执行委员。高中读了半年，考入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校长沈尹默，教授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中法大学是共产党的活动基地之一，周恩来、邓小平、向警予、陈毅都在这里工作过。

1936年10月，我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京特科党员。此后，党决定让我去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我到达了延安。毛主席每周给我们讲两次课。1938年“一二九”三周年，学校召开纪念会。我写了一篇以抗日为题材的鼓词到台上去唱。唱完后毛主席把我叫过去说：“你还会干这个！真是人才难得呀！明天你到我那里去，我专门跟你谈谈。”第二天我到了毛主席住处，毛主席亲切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家乡住址、经历等情况。最后毛主席对我说：“今后你就专门研究民族的、大众的文学好不好？”我欣然答应。“苗大鼓”的绰号也在同学间传开来。

这是毛主席分配给我的第一个正式工作。从此五十多年来，不管艰难险阻，我一直坚持“民族的、大众的文学”这条道路。从陕北公学出来的学生后来都当了高官；秦基伟当时也只是营级干部。解放后，上级曾让我去当河北省宣传部长，我说毛主席分配我的工作我不能改行。所以直到离休我没当过官，一直是党内自由职业者。除去党组织外没人领导我，我也不领导别人。我立过二等功。离休时党给了我副部级（老行政10级）待遇。几十年笔耕不辍，自号“一斗斋主”，著作一千万字以上，现正编纂“苗培时文选”，共10集。中共中央党校编纂的《当代名人录》介绍了我的简历，著述；进入《当代名人录》的房山可能只有我一人。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解放后至今，我坚持体育锻炼，没花过公家的医药费。我今年已75岁，身体没有毛病，腿脚健壮，登泰山、爬华山不坐缆车，每天还能写至少五千字。我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文学学会主席，中国煤矿文工团党支部书记，石油工业文学学会理事，中法大学校友会常务会长，中国赵树理研究会顾问，中国公共关系协会高级顾问。

关心教育 语重心长

1931年底，我离开长育学校。1935年在中法大学时回过一次母校。邱先生让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讲我的成长之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我的出生

地坨里，也没有回过长育学校。今天（1993年5月25日）是我第二次返校，有幸能在母校全体教师大会上再次讲话。

我今天只给大家带来一颗火热的心：要爱护我们这个学校，发扬我们这个学校的优良传统。第一，要“严”字当头。对学生要严格要求，教师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严格的老师就没有好学生。我在这里上学时多数学生住校，白天上课，晚上自习，第二天早晨交作业。写不完就得在课堂上站着，学生没有怨言，反而感谢老师。今天你们采取什么方法教学我说不好，但严字当头还是重要的。你们都有自己得意的弟子，怎样让他成才，就得有个从严的学风。没有十年寒窗苦，难得一个状元郎。现在当然不能要求学生去头悬梁、锥刺股，但是这种精神还是要有的。长育学校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后来成了科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官员。当初没有老师的严格要求是不可能成才的。一个老师能教出几个尖子学生就应该给他记功。

第二，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学风。老师当然不能饿着肚子教学，能吃白面了不能再强调天天吃窝头，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要发扬的。艰苦奋斗是长育学校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上学那时，学生中也有大财主的子弟，也有中小地主的子弟。伙食费一月3元，以吃窝头为主，一周吃3次白面馒头。就是为了让大多数学生能交得起伙食费。家里有钱的学生觉得苦一点，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有个同学家里有钱，有时到外面买点小吃，夜里偷偷地吃，怕老师批评，怕同学耻笑。我今天提倡艰苦奋斗，决不是不让孩子吃饱。但是现在有的独生子女一天吃冰棍就花十几元，这怎么得了！将来怎么能成才！

第三，要教育学生懂礼貌，要尊老爱幼，上汽车不抢坐。不要把礼貌看简单了，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是国魂。教育学生懂礼貌就是我们教育的成功！

第四，要坚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骨，是我们教育的根本。我们提倡爱国主义，绝不是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主义教育要有内容，不是空谈。希望大家读一读近代史，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打败过，被打败的只是当时腐败的政府。为什么？就是中华



1993年3月16日，作者与苗培时座谈

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师要有责任感，要为人师表，教好孩子，根本就在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常常回想我的母校，那时邱雪樵先生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九·一八事变”，声泪俱下；课后带着我们打着小旗去周口店、长沟峪向农民、窑工宣传抗日，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救中国，感人至深啊！为什么长育学校的学生在“七·七”事变后绝大多数走上了抗日战场，参加了共产党，许多人在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生命。我们十班的毕业生后来几乎全都成了共产党员，解放后，许多房山籍的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干部、专家、教授、学者，绝大多数都是长育学校毕业的，这就是当年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的结果。

无怨无悔的刘占职

李桂清

中国共产党成立 86 周年之际，我们对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刘占职进行了采访。刘占职已经 83 岁，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过去的事记忆犹新，时间、人名记得很清楚，那些革命时期的事情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踏上革命之路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党领导了平西的抗日斗争。1939 年，十渡镇马安村建立了党组织，刘占职加入青年救国会。10 月，经马安村村长和民兵中队长的介绍，刘占职加入共产党，时年 14 岁。第二年，日军对根据地大“扫荡”，刘占职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更深深地被我八路军的英勇气概所激励。在一次反“扫荡”战役中，我八路军冀中部队在西庄西山、十渡东山、马安南山阻击日军的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战斗，我军打退日军，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牺牲一百多人。在八路军扩大抗日力量时，刘占职担任青年救国会主任，积极报名参军。他字写得不错，人也可靠老实，被调到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工作，到公安局既当文书，又当勤务员和警卫员。一年后，调到县委工作。

在战斗中成长

刘占职说：“共产党员，就要听党的话。无论是当兵的，还是干部，‘立着’出去，就没打算‘立着’回来，参军革命就准备牺牲”。刘占职先后在房良联合县委和房涿涿联合县委工作，担任过赵然烈士的通讯员。后由于染上肺结核，组织批准他回家休养，但他仍带病坚持斗争。期间，正赶上日军开始新一轮“扫荡”。一天，刘占职在家里，没有粮食，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他从山上找来七个小傻瓜，蒸熟正准备吃，房涿涿县委的两个干部进到刘占职家里，刘占职

二话没说，把蒸好的瓜全给了县里的干部吃，两个干部就着贴饼子和倭瓜吃到一半，日军就来了。刘占职带着干部就往山上跑，跑到山头上往下一看：“鬼子离我们就 50 米左右，我只说了一个字‘快’，就领着县里的干部往东边跑”。刘占职对两个干部说：“你们往东边跑，我往西边跑，如果听见枪响，你们就从右边往山上跑，说明日军看见我了，我掩护你们，那边有很多石头。如果枪没响，你们就从左边上山，我去找你们”。面对残暴的日军，年轻的共产党员刘占职以一种朴素的情感，勇敢地保护领导干部。

日军“扫荡”时期，残酷的形势使一些人叛变，成为汉奸，我们牺牲了很多优秀党员干部，但他并没有退缩。在一次给我军送信路上，路过一个日军的岗哨，日军对他进行盘问，他机警巧妙地摆脱了日军的搜查，成功完成了送信任务。派他送信的领导嘱咐过，除了信上写的人，信，不能给任何人看，那里面有很多党员和县委、区公所等领导的名字，非常重要。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而他也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就是豁出命也要完成党组织的嘱托，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而使党组织受损失。

艰苦岁月

在敌人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下，粮食、医药极缺，甚至饮用水，都是非常珍贵的，有时候很难吃上一顿正经饭。一次，刘占职和县里干部走在山上，又饿又渴，一个干部拿着干饼子，要喝水坑里的水，刘占职说：“我看看这水能不能喝”。水坑里有羊粪豆、乱草根等，看了看，刘占职说：“能喝”。那位领导问他：“你怎么知道能喝？”“我是看看有没有跟头虫子，那虫子有毒”。

又有一次，领导分给他们一斗栗子，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等几名干部在一起谈事，刘占职给他们炒栗子吃。他们就着水，边吃栗子，边谈事。不知不觉肚子涨得不行，都走不了道了。唉，看着他们难受的样子，刘占职心疼，怪自己没有早提醒他们少吃点。可不吃这些，他们又饿着。又有一次，刘占职吃了很多山枣，结果晚上睡不着觉，嘴里吐着白沫，心里翻江倒海。原来，他舍不得把枣屁股扔掉，吃得肚子也胀得受不了。说到这儿，刘占职乐了：“想想，真是巧，我们都是因为‘贪吃’而涨肚子”。

那时传染病闹得非常厉害，浮肿病、疟疾、伤寒流行，没有药。刘占职也身染重病，浑身哆嗦，抽风似的，受不了了，他出去找药，走到半道，碰见一个王医生，那个医生给他一小包苦杏仁，回去炒吃了才好转。1941 年和 1942

年是我们最困难时期，根本没粮食吃，糠、榆钱都没了，野菜挖光了，树皮也扒了，全村两年没有生小孩的，生下来也活不了，大人没奶，肚子都透亮的，吃的什么都看见了，一个个干瘦干瘦的。

高山峡谷，生活条件艰苦，土匪在山区呆不长，国民党也呆不了，日本呆不了，唯独八路军住下了，刘占职和众多党员干部一起忍饥挨饿，坚持抗日。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刘占职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他说，很多在一起工作、吃过饭的老党员、老革命，付出了生命，如才华出众的赵然，积劳成疾，被病魔夺走年轻的生命。这些刘占职身边的党员干部无时无刻不在鼓励他、影响他，无怨无悔地为党和人们做贡献。

无私奉献

1995年8月，中组部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老同志座谈会和农村老党员座谈会。胡锦涛在座谈会上讲话。七十位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党员参加会议，刘占职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北京晚报》记者司马小萌、记者徐涛等对其进行了采访，谈到他抗战时的情况，在平淡、谦虚的叙述中透着自豪感。这要从他家里的一头驴说起。刘占职从8岁开始放驴，后来念了两年书，卢沟桥事变，书念不了了，在家种地、继续放驴。“1940年敌人“扫荡”，八路军部队在转移中有两箱子药品要驮运，那时的药珍贵，从敌占区弄来的，全村找不着能运药的牲畜：我们村里就两头驴，我家的那头驴正推碾子呢，我的一个叔叔是农会主任，把套子卸下来拉着驴就驮药去了。那时我和父亲都有病，走不了路，驴是我家最值钱的东西，也是我们生活的根本。那时敌人杀人放火，把房子都烧光了，人都没有了，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理由舍不得一头驴呢。有一年，部队住在我们村里，我把家里存了几年的玉米给了八路军，家里的两条新口袋也给了部队，半床木头做了枪架子，还有准备结婚盖房子的石板、桌子等也都交了部队”。他带头支援部队，出粮、出力，伺候伤病员，抬担架。年仅14岁的他抬担架送伤员。担架是大门板做的，足有8、9厘米厚，前面两个人，用绳子拴着棍子，后面一个人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像推小车似的，三个人抬一个担架。刘占职仗着个高，一晚上两次从马安抬到石门村，往返100多里山路。

无怨无悔

土改时期，刘占职在村里先后任村长、党支部书记，那时村里有救济款、救济粮。但刘占职没吃过一斤救济粮，没用过一分救济款，没用过一寸救济布。他的儿子说他老实，刘占职却说：“直到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和那些牺牲的同志相比，我做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心里无愧、痛快。在平西烈士陵园，我每次去心里都不好受，这里埋葬的这些烈士啊，都曾是我的领导和战友，那时候，干部和战士，只是有个分工不同，你不挣钱，我也不挣钱，每个人都是用生命为革命做事，就是这么一个亲如弟兄的关系。我十几岁入党，能坚持下来，就是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像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看到那么多战士都牺牲了，幸存下来的少，我幸存下来，就应该宣传他们的那种精神，只有自己全力以赴地为党做事，自己死后才有脸见那些老领导、老战友，不然的话，没脸去见他们”。这就是纯朴、厚道的老党员刘占职。

大鼓名家章翠凤

栗景鸿



章翠凤像

京韵大鼓，形成于清末，主要流行在京津一带，又名“卫调”、“京音大鼓”、“小口大鼓”。它由木板一鼓、民间小调和清音子弟书合流发展而成。京韵大鼓曲调丰富，调子高亢，既以细腻刻画见长，又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清末民初京韵大鼓分为三个流派，最享盛名的就是鼓王刘宝全的刘派大鼓。刘宝全嗓音天赋甚好，声腔甜润清亮，音域宽广。且精于音律，善于创制新腔，勇于革新，逐渐形成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即是唱，唱即是说”的说唱风格，把大鼓艺术叙事抒情、刻画人物的表现力推向了新的境界，享有“鼓界大王”之美称。其关门女弟子章翠凤得其真传，以其身怀绝艺，走遍大江南北。

章翠凤，原名张慧卿，生于1913年，河北省良乡县人。出生后其父母请盲眼的算命先生批八字，结果不幸的批文是列位三台的“大命”，可惜竟为女儿身。所以在她八岁时，被舅父母带进京城，住在西城的屯绢胡同。其舅父家隔壁是当时著名弦师王德纯家。章翠凤自幼喜听王德纯溜活儿时的弦声，并能随弦的节奏唱出高声，甚得王德纯喜爱。于是王德纯与章翠凤舅父商托，收其为徒。王德纯传授章翠凤的第一段“活儿”就是《战长沙》，她能准确地把握关公等人物的刻画表演。由于章翠凤天资聪慧，乐感极强，三年从师学艺生活之后，就表现得极为不俗。章翠凤十一岁时，王德纯在天桥为其安排了第一次演出，唱段就是《战长沙》。据章翠凤晚年回忆这第一次上场时讲到：“我唱的是《战长沙》，它是‘三国’上的段子，是我第一次听大鼓时听到的，也是我开蒙学的第一出。对它，我极为偏爱，那时我虽然不能逐字逐句地了解词里的意思和每个字眼儿，但是对黄忠的老当益壮，关公的豪气凌云，心里也能琢磨个大概齐，唱的时候，嘴里、身上、眼神、行腔走韵，都还没有离谱”。

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成功后，章翠凤的舅舅和王德纯商量决定带她出京去“开码头”，等唱得有相当声誉时再回来。于是，在1926年的中秋节后，十三岁的章翠凤跟随师傅来到山东济南演出，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章翠凤渐渐成为当地非常叫座的角色。

在济南演唱的最后一年中，章翠凤的大师兄邀她回天津灌制唱片。当时，名贵一时的鼓王刘保全正在天津小梨园演唱。章翠凤经常去台下聆听，深受影响。她认为刘保全的“玩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自己的所学不过是些皮毛。如不跟刘先生学习，真是虚此一生。后来，章翠凤曾经跟刘保全在小梨园同台唱了几次，刘保全对章翠凤也很是赏识，又经过大师兄从中奔走说和，刘保全答应收章翠凤为徒。

每年的阴历四月十八，是鼓曲艺人祖师爷周庄王圣诞之日。1929年的这一天，章翠凤举行了拜师大典，正式在天津致美楼拜刘宝全为师。拜师后，当晚在小梨园剧场，章翠凤给刘先生唱了前场《华容道关公挡曹》，刘保全饶有兴致地唱了大轴《群英会周瑜逞能》。按故事的时间，原是该《群英会》在先的，所以当时天津的小报都把这当作一段艺林佳话。

不久，章翠凤又重返济南，直到歇伏的时候，才回到北京，正式的追随刘保全，开始对大鼓艺术作进一步的追求。

自从章翠凤从师刘保全后，得到刘先生真传，很快享誉大江南北。先后在汉口、开封、奉天、南京、蚌埠、徐州、上海等地巡回演出。演出期间，章翠凤总是兢兢业业地以刘派传人自居，把从师傅那里学来的绝艺，原原本本地贡献给各地观众。由于她的板眼尺寸应用自如，且带有滑腔的甩板嘎调，情节、人物刻画得入骨神似，可谓与众不同，自成一派。北京从事过鼓曲艺术的年龄最长者关翠兰自民国十六年（1927）开始在北京北城习艺，在其口述的《我的从艺之路》一书中，曾回忆到章翠凤到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演出时的情况：“不久，北京的京韵大鼓名角章翠凤路过开封，也到园子来了。她不要钱白‘票’了一场《大西厢》，的确是名不虚传，嗓音、身分儿、动作都好。何老先生与章翠凤都是魏福汉给弹弦伴奏的，魏弹弦是个好手，傍得很严实……”。现存天津百代老唱片《战长沙》是她十六岁灌录的，堪称极品。

1938年，章翠凤在大观园走红后，被日本特务市川看中，几次让人从中说合，要“娶”章为“妻”，均遭拒绝，章说：“别人我不管，我就知道我是靠卖艺吃饭，决不卖身！”有一次，章演出结束刚一下台，市川就跟进了后台，并在化卸室内欲行不轨，章拼命挣脱。恼羞成怒的日本特务竟追至戏园门口，

对章施以拳脚，致章身受重伤，后又被长期禁演。

1949年1月，章翠凤去了台湾。那时大批军人思乡心切，所以国防部成立了几个“国剧队”（也就是京剧）劳军，有陆军的陆光国剧队，海军的海光国剧队，空军的大鹏国剧队和联勤的明驮国剧队。由于章翠凤是刘宝全的弟子，原先在大陆就已经成名，所以特地安排她加入陆光国剧队。但由于大鼓不能自弹自唱，而章翠凤的琴师又没有跟去台湾，所以章翠凤一度生活异常困苦。后来她找来一位会弹三弦的和一位会拉胡琴的琴师，跟他们研究了三个月，总算勉强能伴奏了，于是就开始参加劳军演出了。所到之处，那些北京、河北地区的老兵听了久违的乡音，激动地都哭了，演完之后总是拉着她不让走。



▲《大鼓生涯的回忆》一书封面

章翠凤在台湾没有灌录唱片，只是曾经在军中广播电台录了几个段子，如《单刀会》、《百山图》等。章翠凤的嗓子真是惊人地好，又高又宽又亮又冲，唱得比大师兄白凤鸣要好多了，可惜伴奏真是业余水平，几乎只有在唱的时候跟一下，在小过门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录音已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由于那时台湾部队的经费等原因，章翠凤在陆光国剧队待了几年之后就没再获得续聘。这之后，她的经济情况就每况愈下。1964年8月27日，章翠凤因生活窘困，疲劳过度而血压升高，得了轻度中风，几年后去逝。在她生病后的1966年8月，台湾的传记文学社社长特地邀请著名女作家刘枋为她写了传记《大鼓生涯的回忆》（台湾远行出版社版，1976年3月初版）。1989年4月，大陆宝文堂书店出版该书简体版，里面记载了不少珍贵史料以及数十段京韵大鼓的唱词。

汉末三国之际的风云人物闫柔

王德恒

闫柔，燕国广阳（今房山区长阳镇一带）人，年少时，流浪到乌桓、鲜卑族中。长大后，深得鲜卑族人的信任。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发生了黄巾军起义，在黄巾军的打击下，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对各地州郡失去了控制。各地官僚、豪强趁机争夺地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一时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当时势力较大的有袁绍、曹操、公孙瓒等。

闫柔利用这个时机，利用鲜卑的力量，杀掉了原乌桓校尉邢举，自己取而代之。

东汉董卓之乱后，渔阳曾一度为幽州牧刘虞所控制，他注意发展渔阳地区农业生产，继续开发盐铁资源，使渔阳较为安定、富裕。刘虞在幽州统治时与乌桓、鲜卑族互通有无，友好往来，深受鲜卑、乌桓族尊信。刘虞是汉朝宗室，此时得到袁绍的支持。袁绍的计划就是将刘虞拥立为“皇帝”，目的也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在河北一带，力量比较强大的军阀是公孙瓒。献帝初平四年（193），与袁绍不和的公孙瓒抢先攻击刘虞，刘虞兵败被杀，公孙瓒遂利用手中兵权尽占幽州之地，成为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军阀之一。

公孙瓒大败刘虞后，更加横行无忌。当时幽州旱灾、蝗灾不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公孙瓒丝毫不知体恤百姓，奢侈挥霍无度，且对士人又大施横暴，所以，公孙瓒在幽州大失民心，众叛亲离。

公孙瓒的倒行逆施，极大地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献帝兴平二年（195），原刘虞旧属鲜于辅等欲为刘虞复仇，便推举闫柔为乌桓司马。闫柔为人诚信，自幼在乌桓、鲜卑族中长大，担任乌桓校尉后，在两族中一呼百诺，此时被鲜于辅推举为乌桓司马，威信更加高了。他和鲜于辅轻而易举地便招募了幽州兵和鲜卑、乌桓数万人，一时兵强马壮。经过短期休整后，鲜于辅、闫柔率军与公孙瓒所置的渔阳太守邹丹大战于潞县（今北京通县东），大败邹丹，邹军尸横遍野，溃不成军。

袁绍很高兴，派大将曲义宠慰闫柔，以安定北边。乌桓峭王也感刘虞的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向南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袁绍亲自率军北上，闫柔、峭王和袁绍将合兵 10 万，趁势北上，攻打公孙瓒。

潞县大战的败绩，本已令公孙瓒气急败坏，忽又听袁绍率军来攻，公孙瓒不禁勃然大怒，双方在鲍丘水(今潮河)摆开战场。不久，双方开战，只见袁军生龙活虎，猛打猛冲所向无敌，再看公孙瓒的军队疲于应战，狼狈不堪。一场大战，只杀得幽州兵四散奔逃，丢盔弃甲，袁军大获全胜，斩首两万余级。袁绍率军乘胜追击，横扫幽州地区。

鲍丘水之战，使公孙瓒势力遭受重创，幽州各郡豪强乘势而起，与袁绍联军共击公孙瓒，公孙瓒一蹶不振，终在献帝建安三年（198）为袁绍所灭。袁绍据有幽州。闫柔仍然为乌桓司马。

二年前，即建安元年(196)，曹操控制了汉献帝，假献帝之名发号施令。建安五年(200)发动了官渡之战。长于判断的鲜于辅在此时归附了曹操，闫柔是比较尊重鲜于辅的，所以也跟从归附了曹操，曹操也以闫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为左度辽将军，让他们回幽州镇守。当时，幽州还在袁绍的儿子袁熙控制之下。建安七年(202)，袁绍病死，其家族内讧。建安十年(205)，幽州大部分地区被曹操所占领。

袁绍儿子袁尚也败于曹操，逃奔辽西的乌桓首领蹋顿。当时幽、冀人众为避免战乱，逃奔乌桓的就有十万余户，袁尚准备凭借这些人，操练成兵，进一步争夺中原。

曹操意识到这一点，在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大军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将蹋顿斩首，俘获了二十余万人。袁尚、袁熙与楼班、乌延等人，继续向辽东逃跑。北征乌桓之时，闫柔将部曲及鲜卑所献名马以助军。

辽东太守公孙度，是曹操封的武威将军、永宁乡侯。正好此时他刚因病去世，儿子公孙康即位。

蹋顿失败之后，乌桓峭王的势力最大，公孙康和曹操都要争取这个势力，曹操派遣的使者牵招和公孙康的使者韩忠在峭王面前争论得非常激烈。峭王早和闫柔是好朋友，击败公孙瓒的同盟军，此时，牵招抬出闫柔作为榜样，峭王顿时表示服从中原王朝的管理，接受曹魏的封职。公孙康已经收留了袁尚、袁熙，两人也积极招兵买马，势力逐渐壮大。公孙康既担心袁氏兄弟吃掉自己，又怕曹操怪罪自己，便将袁氏兄弟杀掉，表示对曹操的忠心。曹操闻报后，封公孙康为襄平侯，拜左将军。这样，峭王和公孙康两大势力都归附了曹操，辽

西辽东均告平静。

为了稳定局面,建安十三年(208)7月曹操把威信颇高的闫柔任命为渤海的太守,起到统领辽西辽东的作用。

闫柔虽然统帅的是鲜卑、乌丸部落,但始终持汉使节,治广宁如旧。北部鲜卑部落酋长步度根与轲比能在闫柔的劝说下,向曹操进贡。河间田银叛,曹操西征关中,闫柔随行,轲比能将三千余骑追随闫柔击破田银,闫柔因此立了大功。

此时,北方平定,曹操对闫柔更加信任,将降服的汉、胡二十余万人以及随闫柔归附的乌桓万余移徙于邺城附近诸郡,由闫柔编为齐民,担负赋役,选其壮健者为骑兵,由侯王大人率领随时听从调遣参加征战。闫柔统领他们一直到去世。

明代高僧不二和尚

杨亦武

明京兆房山县人，明代中晚期间名天下的高僧，武当山大修炼家。俗姓孙，法名园信，又名信翁和尚，自号孙不二，即谓“持之以恒潜心修炼，终生不改”之意。出家白云山，拜高僧德敬为师。早年在家乡的上方山兜率寺和幽岚山的红螺险佛寺僧居二十余年。其间曾云游江南的武林、淮安、六安和终南山等地，他每至江南诸地都要住上几年。明正德七年（1512）不二和尚到北京城内施食，受到明武宗朱厚照的褒奖，武宗皇帝接见了她，并御赐千佛衣一袭。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不二和尚入道教名山武当山中的虎耳岩修炼。据文献记载，不二和尚到达虎耳岩以后，岩中的野兽都避匿而去，可见其道行之高。虎耳岩确是一处世处净土，溪涧边卧着连绵的灵石，奇花异草幽放涧侧，岩上有两池清水，阔可二丈，旱岁不竭。初到虎耳岩，生活十分艰苦，他找到一处山崖，剪荆刈草，搭建茅庵三间，仅能容身，庵内仅有圆瓢等几十件简单的生活用具。渐渐地有行脚僧前来虎耳岩，不二毫不吝嗇，尽其所有以供之。如此几年后，虎耳岩成了十方丛林。不二和尚法声远播，远近的信徒为之号呼哭啼，净处虎耳岩的不二和尚成了信徒顶礼膜拜的圣僧，虎耳岩成了武当朝山的必趋之地。以至于不到虎耳岩犹如没到武当山，到了虎耳岩无缘面见不二和尚顶礼的，必痛哭而去。如果想一睹不二和尚的圣颜，须小心地在岩门外等待时机，也许几天后偶然有机会望见不二的身影，就已经是大喜过望了。因此，武当山虎耳岩闻名天下，每天都有达官显贵到这里朝圣，每月都能得到朝廷的赏赐和附近州县的供给。

有明一代，自嘉靖、隆庆以来，不二和尚的殊荣、在朝野的声望影响之大，没有哪位高僧可及。然而，此师务为密行，不以解显。所出应机之言，多依孝敬而论。金钱涌至，拒而不纳。有人施舍粮食，他就送给山中的常住和尚为供养之需。大师居虎耳岩四十余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补续高僧传》称道“虽利根之士好为奇谈，诡学者睹其颜，莫不肃然增敬。”

明万历年间，著名文学家王世贞、袁宏道曾先后前往武当山虎耳岩拜访不

二和尚，并有诗作传世。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尧州山（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史上的“后七子”之主将。王世贞万历二年（1574）任都察院副都御史抚治郟阳提督军务，次年三月登览武当，游历凡四天。期间特地前往虎耳岩参拜不二大师，并留下了《由南岩寻北岩谒不二和尚》诗：

降陟虽遗迹，眺览用怡心。心怡体旦调，支策探道林。是时春初暮，遥绿结屯阴。一幡风空表，双树吐绿寻。初窥但绝壁，缓步得蓝精。开士人杜机，眇睐不能禁。延我坐芙蓉，啖我以林禽。清楚如流泉，曾闻海潮音。忽者西岫景，圆规已半侵。归来愧禽鱼，自得忘高深。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北公安人。明万历年间文坛“公安派”巨匠。举万历进士，知吴县。袁于万历三十年（1602）与其父袁士瑜及家人朝武当山访不二和尚。赋诗《虎耳岩逢不二和尚》，对在虎耳岩辟谷隐修的不二和尚大加褒赞：

幽岩幻出支公面，瘦壁玲珑点葱茜。百年一室锁青烟，涧石霜松几回变。师言少时住西山，南内风光眼曾见。武皇七年四月时，搭衣曾上戒坛殿。白头等死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电。榔梅重得大十围，又见曾孙头似霰。衣深屈指数朝贤，青山阅人如邮传。元美伯玉今在无，可惜聪明死编撰。

《续辑均州志·卷之十六·杂识志叙》记述了不二和尚的一件奇事。贵州人霍靖州曾与同乡张进士、胡孝廉、昆仲五人前往武当山敬香。听说不二禅师在山修炼，能预知未来事情。随即参访。五人来到虎耳岩，适逢不二大师坐禅入定，不敢惊扰，各自默默地在座旁侍立。过了一会，大师慢慢睁开闭着的双眼，看到霍靖州一行，问明来由，请他们落座。相语良久，五位来访者各求指示。临行，大师拉着霍靖州的手说：“你慢行，我先送四位。”送到了门，大师忽然双目泪流，连呼“可怜！可怜！”而别。然后，转身送霍靖州。众人不解其故。两年后，贵州发生战乱，张、胡四人死于乱兵之中。恰巧，霍靖州不在贵州，而在浙江临安县任县令，才躲过一场劫难。

不二和尚入武当山虎耳岩修炼凡四十二年，法声远振。万历三十年（1602）坐化，寿一百二十岁。明代是武当道教的鼎盛时期，而作为佛教的不二和尚却在这里金声独振，并与武当山道教相容相合，交参传道，这不仅是武当山道教史上的一大奇迹，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奇迹。不二和尚圆寂后，明神宗朱翊钧的母亲慈圣李太后出藏金为其治塔于武当山紫霄宫后展旗峰葬之，明神宗朱翊钧委派钦差前往祭奠。

不二和尚修炼的虎耳岩，位于距武当山南岩西北十余里之山峦间。峰林苍茫，远离人烟。该岩坐北朝南，直望武当天柱峰，其岩为天然洞穴，宽大敞亮，确为理想的隐修之地。历代不乏隐修之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有王道人辟谷于此。岩中尚存小庙数座，俱已残颓。不二和尚墓塔位于和虎耳岩相对的展旗峰的密林中，与虎耳岩相距三华里。因山高林茂，人迹罕至。不二和尚塔共九级八角型密檐塔，宝珠刹，塔体为砖石结构，塔高 8.16 米。塔身四周雕有四尊石罗汉。塔前有台二崇，置有雕刻精美的石香炉、香案，塔院占地亩余，塔前两侧原有房屋，塔院四周有高大的砖石围墙，自塔院由下而上，须登多级石阶，皆有石栏。从塔院的规模看，它是现存武当僧道墓陵中规模最大者。塔前现有碑刻两方，一为《虎耳岩众信建碑记》，一为《遣官致祭碑文》，均倾倒地。前者的年代不详，碑文记录了河南、山东、南京、北京、湖北、浙江等地出资建碑信士的名姓。后者立于万历三十年（1602）七月初，碑文乃是不二和尚圆寂后明廷所遣钦差祭奠不二和尚的祭文。

张寿龄将军其人其事

赵润东

张寿龄，字鹤舫，房山良乡人。生于 1888 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中将。1949 年 1 月在北平参加起义。建国后，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9 年 9 月 25 日在上海病世，享年 101 岁。

—

张寿龄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外国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主权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幼年丧父，家庭无助，生活较为贫寒。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一方面要料理家务，一方面要倾心培养儿子成材。她知书达理，并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因此，在疼爱之余，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善诱，不惜一切努力抚育其茁壮成长。寿龄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于艰难的岁月中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这在当时实属不易。然而，却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外国侵略者在我国肆意横行，十分猖獗。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益衰亡的祖国和被外国列强烧毁残存的废墟，给张寿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起初，他认为民愚国弱，只有教育才能救国。于是，读完初中，便报考高级师范。然而，在国难当头，军阀混战的形势下，他又进一步认识到，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难，光靠教育还不行，还必须有真正卫国的武装力量。因此，他又弃文学武，考入陆军军官预备学校。

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校址在北京清河镇，校长是毛继成，后为钱选青。学制 2 年，学习课程为普通学科和初级军事学科，术科是连以下制式教练和各种器械、体操、拳术、马术等。外文分英、日、德 3 种，全校编为 8 个连队约 1000 人。各连连长大多出身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排长绝大多数为保定军校第二期

毕业，各连还设有助教。1919年初，张寿龄毕业，被分派到当时的边防军第二师。见习半年后，正待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时，直、皖两系军阀战争爆发了。鉴于这种情况，一时不能入校就读，只得应聘为京兆农业中专教师。学生来源一般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后改为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再入保定军官学校。该校自1912年至1923年的12年中，共办了9期。

1920年初秋，张寿龄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与其同学者有董振堂、赵锡章、张克侠、何基沣、边章五、宋邦荣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保定东关外，是前清末年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的原址。校长是张鸿绪，后为孙树林，教育长赵协彰。当时，第八期学员尚在校，与第九期学员总数约2000人。在分科编组中，步兵科第八期为一至四队，第九期为五至八队。其中，骑、炮两兵科各分一队二队，工、辎两兵科各一队。各队队长以留日士官为多，分队长多为本校第五期毕业生。黄琪翔、钱大均、何柱国、杨正治、楚溪春等都曾担任过第八期、第九期的队长和分队长。

1922年，当第九期学员将要毕业，直奉军阀又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学校马上进入停顿状态。期间，学员们有的坚持在校学习，有的却被卷入战争，投到部队当中去参战，时间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923年初夏，张寿龄等第九期学员参加了毕业考试。之后，学校为本期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当时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亲自到保定主持典礼仪式。因为这一期学员是张绍曾任陆军训练总监时招收的，所以他亲临现场，以示重视。这样，张寿龄等结束了6年来时局动荡中的军校历程，随后，保定军校也随之停办。

二

毕业后，张寿龄与夙常最投契的同学董振堂、边章五、何基沣等投入当时北洋陆军最负盛名的冯玉祥将军部任职。当时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统率第十一师和第七、八、二十五三个混成旅驻在北京南苑。他们初到冯军时任学兵团教官。张寿龄于1924年初被提升教导团队长。

1924年秋，直奉两系军阀第二次战争爆发，激战于山海关至九门口一带。冯军任直军左路军，奉令出古北口趋赤峰。因冯玉祥已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救国，遂联合陕军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孙岳推倒曹锟政权。冯玉祥趁山海关方面激战方酣，吴佩孚已倾直军全力增援前方，后方空虚之际，率冯军于10月20日以一日夜三百余里的急行军从承德飞驰回师北京。张寿龄当时任冯军新编第

一旅参谋长，率赵席聘、张维玺两团为先遣支队，于午夜首先入城，布置城防，囚禁了曹锟。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联合组成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吴佩孚闻此变化，由前线抽调一部分队伍，亲自督战，被冯军阻击在京奉铁路的杨村附近。京汉路方面的曹军第十六混成旅与孙岳部的第十五混成旅对峙在固城镇。孙军势弱不支，电传冯增援。冯立即派孙良臣为旅长，张寿龄任参谋长，率张自忠、赵席聘两个团驰往固城增援孙军。他们采取向固城镇敌后迂回与第十五混成旅协同夹击的方案，迫使孤守固城镇的第十六混成旅投降。

1925年1月，张寿龄调任冯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旅参谋长，驻防包头。是年仲秋，第二师奉命进驻甘肃。因原甘肃督办陆鸿涛解职，由冯玉祥兼领甘肃督办一职。冯因不能亲往就任，遂特派第二师师长刘郁芬、总参议蒋鸿通分任总副指挥，率第二师入甘，代冯行使职权。第二师于中秋节从包头经内蒙到达兰州后，首先遇到当地汉族驻兰州的第一师师长李长清的忌恨，阴谋在第二师立足未稳、后继无援之际向第二师袭击。事为刘、蒋获悉，计擒李长清等，化险为夷。张寿龄当时奉命代刘、蒋向第一师全体官兵做了安抚工作，随即调任甘肃省办公署参谋处长。

1926年初，冯军主力被奉、直两系军阀的联军压迫在察哈尔绥远境内，在南口一带展开激战。冯玉祥为了缓和内战的冲突，引退去苏联。但奉直联军的攻势更为激烈。在此形势下，甘肃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联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和其它地方汉族部队，向兰州进攻。刘郁芬派第二师的梁冠英旅拒张兆钾部于定西的清凉山，以张维玺旅扼守何干镇西边的要隘关山。在此相峙的情况下，刘郁芬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由张寿龄提出缩短战线，固守待援，攻势防御的方案。经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由他亲自在电话上指挥梁旅撤至金家崖一带与扼守关山的张维玺旅连接起来，并电令驻宁夏的吉鸿昌旅驰抵兰州。先由关山方面的张旅出击，迅即进入陇南天水。东路以孙良臣率梁、吉两旅出击，攻占平凉。张兆钾、孔繁锦均仓惶逃走，甘肃局势得以稳定下来。于此同时，冯军在南口的主力溃败。冯玉祥迅即由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重整旗鼓，组建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东出陕西。甘肃督办公署改为国民军联军驻甘肃总司令部，张寿龄任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在张寿龄的倡议和主持下，曾于兰州东校场举行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军民联合体育运动会，对打开西北多年来闭塞的风气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7年张寿龄调任冯军任军事政治学校中将校长，招收三千余名具有中学文化知识的青年，集中在兰州训练。他对教育严谨认真，与学员们同甘共苦，

经过坚实的教练，颇著成效。1929年初，张寿龄奉冯玉祥电召率全校学生从兰州长途行军抵达洛阳。由于这批学生经他的严格教育，在长途行军中纪律严明，沿途还向百姓作爱国宣传工作，深受冯的表扬。在洛阳受冯检阅时，冯曾集合全军营长以上军官观摩这批学生，树立楷模。冯随即颁发了毕业证书并把这批学生分派到冯军各部任职。是年夏初，张寿龄从洛阳回到兰州，任冯军驻甘总司令部参谋长。之后，驻甘总司令兼省主席的刘郁芬去陕谒冯，特任张寿龄与新一军军长赵席聘共同负责代行甘肃军政职权。

1930年1月，张寿龄调往西安，任冯军后方总司令部参谋长。1931年初，第二十五路军驻防苏北地区，总指挥梁冠英以顾问名义聘请张寿龄为该军客僚。这年，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寿龄曾率领一个参谋班经南通至海州把沿海地形作了详细观察，制订了以南通、连云港两处为防御重点的方案，二十五路军在苏北地区的海事防御奠定了基础。

1933年，第二十五路军移驻河南信阳。蒋介石为了削减非嫡系部队的实力召开了一次裁军会议。会后，上官云相、刘茂恩、梁冠英、张印湘、萧之楚等在汉口秘密协议抗拒裁编，形成五头联盟。张寿龄以第二十五路军顾问身份代表二十五路军驻在汉口与各方联系抗裁事宜。因这些部队当时均驻在武汉外围，蒋介石顾及当时形势，对裁编也只好搁置起来。这时，张学良从欧洲出访回国，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蒋介石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张寿龄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1934年夏秋之间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庐山海慧寺举办军官团，召集全国各部队上校以上在职军官轮训，训练内容为准备抗日。张寿龄被推荐为军官团中将教育委员。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任官时，他曾被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为陆军中将。

三

1936年，正是第二十九军举步为艰的困难时期。全军所辖的第三十七、三十八、一三二、一四三4个师和3个独立旅，是由原西北军仅存下来的部队扩建的。他们的防区是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当时，第二十九军外受日寇的窥伺，内受南京蒋政权的牵制，处境十分艰难。为预防突发事变，培训新的骨干力量，充实部队，二十九军在南苑成立了军事训练团。宋哲元兼

任团长，以副军长佟麟阁权代，张寿龄应军长宋哲元之邀任教育长，负实际教育责任。于是，由平、津两地招收爱国知识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团的教育主旨为：“誓血国耻，报国雪恨”。在佟麟阁和张寿龄的主持下，军训团办得非常出色，为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军训团营地在南苑机场的最南端，共有 13 座大营房，每座营房可住 1000 人，当中有的破烂不堪，有的甚至倒塌。军训团共计 1500 余人，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分四个中队。第一、第二大队是步兵科。第三大队是特科，队长由冯玉祥长子冯洪国担任。特科包括骑兵、工兵、炮兵、化学兵等。

军训团学员每人发一套灰色棉服，一件灰色大衣。每人一套书籍，包括典、范、令、战术、攻城、兵器、礼节等。另外，从《四书》、《五经》上摘录一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内容，汇集起来，印成《四书》袖珍本。

1937 年 1 月，军训团正式开学。开学那天，宋哲元、佟麟阁都亲临现场参加典礼并讲话。其大意是，我们是中国人就要热爱祖国，外国人欺侮中国，我们中国人就要反抗，爱国是军人的天职。

在以后的学习和训练中，军训团都认真贯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和“八德”精神，并把“八德”编成歌曲，组织学员们天天歌唱。

“八德”歌词是：

八德首歌兮，孝双亲，孝双亲。柔顺承志兮，定省亲。雏鸟尚能知反哺，飞鸟日日念老心。国民，国民，人人都要记在心，孝顺父母是好国民。八德次歌兮，兄要友，第要恭。兄弟相亲兮，乐无穷。倪墙须防招外辱兮……

除上课外，军事训练还有操练队列、匍匐前进、盘杠、打红拳、大刀、构筑工事等项目。

为深化教育主旨，张寿龄还亲自谱写一首军训团团歌：“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砺精神，诚真正平（此四字是二十九军军训）树木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由他亲自每日教全团歌唱，以激进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

张寿龄与副军长佟麟阁、副参谋长张克侠、第三十七师——〇旅旅长何基沣经常在一起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研究，一致认为：二十九军与日寇迟早必有一战。绝对不使“九一八”重见于华北，只要日寇挑衅，我方立即还击。同时还确立了以攻代守的方略。

同年 7 月 7 日，张寿龄亲历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事变”的当天早上，学员们在南苑也听到了枪声。学员们起床后集合点名，同时通报与日军开

战的情况。军训团当日停止训练，马上投入备战。当时，军训团的学员们参军仅6个多月，年龄大多在18岁，有的只有16岁，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他们简直束手无策。

7月25日，日军开始攻打廊坊。南苑虽然相对平静，但日本特务和便衣队四处出没，预示着南苑大战即将爆发。下午，宋哲元决定将29军军部移往北平城内，留下佟麟阁负责防务及南苑善后工作。赵登禹师虽然负南苑防御之责，可主力却都守护在永定河右岸。南苑满打满算，加上学生军也不过五六千人。这将如何防卫北平的南大门？佟麟阁一阵阵着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天渐渐暗下来，张寿龄来到佟将军身边，轻声问道：“捷三兄，军部撤走了，南苑防务如何具体落实呢？”俩人根据目前形势，认真地交换着意见。

进入战备状态后，军训团为每个学员配发了一支三八枪、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一把大刀、水壶和背包，每个班发一挺唐山造轻机枪。南苑军营附近南北小街的磨刀匠、铁匠全都被请到团里为大刀开刃。同时，为抢修防御工事，扫清障碍，二十九军军部下令，将200米内的高杆庄稼全部砍倒，准备与敌人开战。命令下达后，所有作战部队立即进行工事作业。不扰民，不破坏百姓庄稼，是西北军的传统。这些农民出身的官兵深知这些庄稼是百姓的命根子。官兵、学兵们列队站在庄稼地面前，首先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歌声荡漾，唱得官兵们心里火辣辣的。

已经做好准备的全体学员群情激奋，热血沸腾，各队还推选代表写出请战书：“风云恶，陆将沉，胸中热血，手中利刃，杀敌保国，不成功，便成仁。”请教育长张寿龄转呈佟麟阁。张寿龄转告学员，决心杀敌保国，精神可佳，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没有命令，即须加紧战备训练。于是，军训团开始在野外挖战壕、单人掩体。晚上住在阵地上，睡在战壕里，不怕蚊叮虫咬，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围绕如何打鬼子，七嘴八舌议论不休。

7月28日天刚亮，日寇主力兵团川岸文治郎的二十师团突然出现在团河附近。接着就向南苑大举进攻。几架日本飞机在南苑上空盘旋后，沿着工事和营房又扫射又扔炸弹，转瞬间，火光冲天，瓦砾横飞。没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们起初被这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搞的束手无措。这时，只见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抄起一挺机关枪，二话不说对准空中的敌机就是一阵扫射。这一幕令血气方刚的学员们倍受鼓舞。随后，枪炮声由远及近，由稀变密，密集的炮弹落在学兵们的阵地上，堑壕内，尸横一片，鲜血流河。接着，日军发

起地面攻击。当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出现在学兵阵地不足 200 米时，学兵队长大喊一声：“射击！”学兵们马上爬到堑壕前沿射击，密集的子弹将敌人击倒一片。学兵们奋勇杀敌，越战越勇，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但是，由于敌我悬殊，加上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结果，学员们伤亡极其惨重。

当天下午 4 点左右，南苑机场失守。炮火中传来命令，南苑守军全部转移，撤离阵地。佟麟阁与张寿龄研究再三，决定分别率领 600 余名幸存学兵撤退。一部分向南突围，一部分向大红门突围。佟麟阁决定率领 200 名训练团学员撤回北平。为免遭日军伏击，不走大路走青纱帐。在大红门以东地区集结好三四千人的队伍，开始有秩序地向城区撤退，最后分散转移。张寿龄率领的这一队基本没有遇到日军堵截，顺利撤退。而佟麟阁部很快与敌军遭遇，几架敌机又出现在撤退队伍的上空，猛烈地向地面轰炸扫射。设伏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旅团趁势在公路两侧伏击。一时间，弹密如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死伤迭枕，其场景惨不忍睹。这时，佟麟阁瞪大血红的眼睛大声命令：“快趴下！隐蔽，向两侧疏散！”突然，一梭子子弹射来，佟麟阁和身边的副官、随从数人应声倒在血泊之中。佟麟阁咬紧牙，挣扎着站起身，他大腿被子弹射穿了，血流如注。军训团一个大队长带几名士兵围上来，劝他躺下接受包扎，他坚决不肯。他咬着牙吐出几个字：“情况太紧急了，眼下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你们快冲击吧，别管我！”部下无奈，只好挥泪告别，向前冲去。佟麟阁原地站着，硬挺着指挥部署，以期摆脱遭伏击的困境。这时，又是一批敌机飞临公路上空，扔下一簇簇密集的炸弹。佟麟阁被弥漫的烟尘吞没了，后被炸弹击中头部，不幸壮烈牺牲。这一年，他年仅 45 岁。

四

卢沟桥事变之后，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此时的张寿龄辗转到了第五战区，被任命为督察官，负督战任务。

1938 年春，第五战区与日寇在徐州会战大捷后，根据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与敌寇保持接触情况下全战区部队逐步向豫鄂地区转移。是年年底，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老河口。因战区各部经年余不断作战，军中干部特别是初级干部亟待补充。1939 年 1 月，张寿龄奉命负责在湖北均县章店镇，组建战区干部训练团，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团长，张寿龄任教育处长。训练对象除招收约六百名知识青年外，其余由各部队选派初级干部轮训。

经过一年训练，干训团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这时，张寿龄又被调到战区司令长官部任专职高级参谋及司令长官办公室主任。1940年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调查当时任七十七军副军长兼九师师长何基沣，原因是何基沣有通中共嫌疑。张寿龄得知后，多方奔走，想尽办法加以袒护，最终使何基沣解脱险境。

1945年张寿龄随同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总务处长。日寇投降后，李宗仁调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张寿龄仍任总务处长。当时何基沣任徐州绥区副司令适在北平奉亲。中共中央令何速回防地掌握队伍，因当时地面交通阻断，难以成行。何基沣请张寿龄代为设法。张寿龄立即以行辕名义为何基沣派了一架专机，使何得以返回防地，配合淮海战役，率所部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增添了有力的保证。

1947年张寿龄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翌年五月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会议。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北平行辕随之撤消，张寿龄即脱离军职，迁居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疯狂地追捕进步人士。当时为党做地下工作的孟宪章为逃避特务的追捕经他的掩护未遭毒手。

张寿龄将军智勇双全，被称之为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在主管军事训练团当中，工作十分出色，为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寿龄以民革成员身份曾参加土改工作，还担任过人民教师。退休后坚持参加社会活动，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在年逾九旬时，仍不断为老战友、烈士们撰写资料和纪念诗文，表彰革命先烈，积极从事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

在颐养天年的日子里，他不但自己注意保健身体，还鼓励人们要学会养生之道。一年春节，上海市文史馆宴请新老馆员。席间，上海市一位领导获悉百岁寿星张寿龄在座，就笑着问他养生之道。只听他润润嗓子，朗声答道：养生之道不敢当，但我写过一首《长寿保健歌》：

节制喜怒，心情舒畅。劳逸结合，以动为纲。不近烟酒，生活正常。基本吃素，食不过量。预防疾病，注意冷暖。养神育气，长寿永康。

张寿龄将军虽然已经故去，但他将给后人留下永久的记忆和怀念。

注：本文根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部分学员回忆录和张寿龄将军自传整理。

诗人赵日升

刘泽林

赵日升，诗人、编辑家，笔名月恒、曾翼人、了之。1938年11月4日生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次洛村。2004年7月11日，赵日升因突发大面积脑梗塞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5岁。

1952至1955年，赵日升在房山中学读初中时，即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从二年级开始向报刊投稿。1955年考入通州（当时通州属河北省）第一中学（即今潞河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学风甚好，鼓励学生全面发展、长项精进，中国著名作家刘绍棠曾经在此就读，并少年成名，步上文坛。袭此遗风，学校在文学方面，气氛尤为浓烈。学校成立有“春笋文学社”，社员有100多人，从初二到高三，每个班都有若干人参加；每年级划为一个小组，初中、高中各划为一个组，全校为一个总部。总部设正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初、高中各一名），并设事物股、编辑股、刊物股、印刷股，每股有若干名工作人员；每级组织也都有正组长一名，副组长若干名。“春笋社”按期举办各种文学活动，交流讨论各自写的作品，请本校老师或外界的人士做辅导报告、外出参观访问；定期出版板报、壁报、学生作品集；向外推介优秀作品。赵日升报考通州第一中学，即是看中了她浓郁的文学氛围。从高中二年级起，在文学上十分活跃的赵日升担任文学社的副主席，高三又升任主席，直至毕业。在此期间，他继续给报刊投稿，有小说、散文、小品、诗歌等均有涉足。1956年第2期《河北文艺》发表了赵日升的处女作《谁能猜得着》，从此便专意写起诗歌来。这一阶段，赵日升的诗作多是民歌体，单纯、明快、朝气蓬勃、朗朗上口。

1958年第2期《蜜蜂》发表了《拒马河，靠山坡》，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拒马河，靠山坡，
弯弯曲曲绕村过；
河水两岸垂杨柳，
坡上果树棵连棵。

一群鸭，一帮鹅，
荷花出水一朵朵，
红霞落入水中天，
对对渔船河心过；
咿呀呀，咿呀呀，
半船欢笑半船歌。

果树园，果树窠，
棵棵行行遍山坡，
阳春三月花果山，
八月仲秋红似火；
嘻哈哈，嘻哈哈，
采果姑娘笑话多。

拒马河，靠山坡，
弯弯曲曲绕村过；
河里流的金银水，
人们过的好生活。

1958年，赵日升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院广播站站长、《北京师院》记者。生活视野和文学视野都得到很大的拓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赵日升创作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这一时期先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将军下放返太行》、《小白丫》、《灯下》、《灯笼三剪》、《赶驮》、《山村秋色》、《珍珠》、《中秋月色》、《山村迎娶》等。发表的阵地，除河北、天津的报刊外，还有《北京文艺》、《北京日报》及《人民日报》等中央级的报纸。这时的赵日升已经北京的重点业余作者，开始为文学界所关注。

1962年，赵日升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县琉璃河中学任教。由于环境的变化，工作任务的繁重，在此后的几年间，创作的数量并不多，但质量却有明显提高，作品主要有《农家待客》、《鲜果收购站》、《中南海的柳》、《老王夸瓜》、《夸队长》等。赵日升的创作引起了北京作协（筹备组）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并给他分配创作任务。1965年10月，受北京作协的派遣，赵日升与著名作家管桦一起去房山县富合大队采访，写出散文《高高的富合山上》、

《三朵红花》，发表于《北京日报》上。

“文革”后期，有部分文学刊物复刊。《北京新文艺》编辑组到房山组稿，发表了赵日升在“文革”前创作的《收麦歌》、《编草帽》、《春潮澎湃》，引起很大反响。其中《编草帽》被《中国文学》（英文版）选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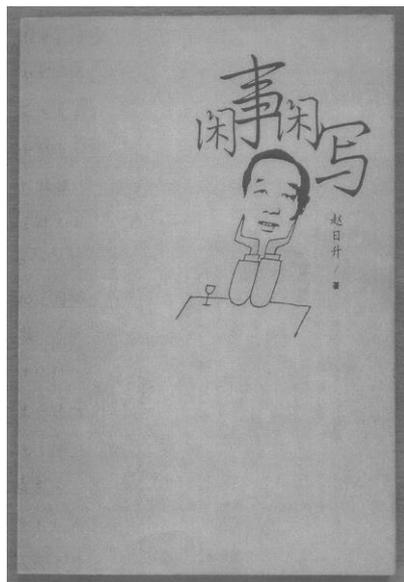
1973年，赵日升调入房山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

在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有七、八年的时间，但这几年无论对赵日升个人，还是对房山整体的文学发展，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对个人来说，赵日升除了诗歌创作，从此又踏上了一条文学辅导之路；对于房山的文学创作而言，从此就掀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在此前至建国后这段时间，房山虽然也有可以圈点的文学创作，甚至王凤梧更因几篇杂文而被错划“右派”，但那终究都是零散的个体行为。文化馆虽历来推崇文学创作，但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旗手。所以，调赵日升到文化馆，主要看中的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赵日升文学创作组工作期间，开始致力于房山文学队伍的打造，组织起了几十人的文学队伍，到他调走时，已经有上百人之多了。赵日升对这支创作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审稿、提修改意见，是他主要的日常工作。赵日升对待作者十分真诚，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文学辅导上。为了使业余作者有展示作品的平台，赵日升几经努力，于1974年起，创办了16开本的《房山文艺》；三年以后，改为报纸型，对开，每月一期（又几年后，房山作家王凤梧接任主编，更名为《青峰》），为房山的业余作者，开辟了房山县第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促进了房山文学作者的成长和文学事业的发展。那一时期，受时代所限，房山的文学创作虽然整体水平不高，但业余作者队伍快速扩充，为几年后房山文学的崛起培育了一片沃土。赵日升调离房山后，尤其是在任《青年文学》副主编期间，仍然时刻关注和扶植房山的文学创作。现在房山文坛比较活跃的十几位作家，大多受过他的教益。赵日升退休后，仍然为房山文学不辞辛劳，房山每有文学事，赵日升得邀必至；在2001年，赵日升欣然受聘为房山区文联顾问，继续为房山的文学事业发挥余热。所以，客观地说，现在房山文学呈现的一片繁荣景象，赵日升无疑具有开创和奠基之功。

在这一时期，赵日升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喜报歌》、《大干歌》、《进军歌》、《一月八日的献诗》、等一大批诗作，在《北京文学》、《诗刊》、《国风》《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

1980年3月，赵日升出席北京市文代会。即时北京市作家协会正式成立，成为第一批会员。同年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从此开

始了长达 17 年的职业编辑生涯。198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青年文学》杂志副主编，1996 年任《小说》杂志主编，直至 1998 年退休。在职业编辑期间，赵日升提出“不薄名人重新人”的编辑理念，扶植、培养了一批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青年作家，为繁荣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成就了他作为一个编辑家的地位。房山的几位较有实力的作家，当此期间大多受过赵日升的指点和提携。在作职业编辑的早期，赵日升的诗歌创作仍保持旺盛和上升的趋势，并兼及散文等其它形式的写作，作品在全国、省、市、地级的各种报刊遍地开花；报刊的级别也比较高，如《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等。作品有《乡风》、《月是故乡明》、《养育我的土地啊……》、《河边》、《历史与老人》等数十首，显然这是他一段创作的高峰期。



赵日升遗作《闲事闲写》一书

赵日升的主要艺术成就：诗歌《拒马河，靠山坡》被收入《红旗歌谣》和《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 诗歌集）。诗歌《养育我的土地啊……》获 1982 年度“北京文学奖”，并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 诗歌集）。1982 年 12 月出版诗集《四月草》（与他人合著，北京出版社）。1991 年 10 月出版诗集《岁月之窗》。

退休以后，赵日升彻底放下诗歌的创作，开始有意识地写起了散文、杂文、随笔一类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他把这些文章精心地编辑起来，总计近 70 篇，自定名为《闲事闲写》。几经努力，这本书才于 2005 年 1 月出版了。只是没能等到出版作者就去世了。

赵日升对家乡充满热爱与眷恋，正是因为对家乡的这种眷恋，激发着他不断地写出一首又一首满含乡情的诗歌；正是因为对家乡的这种热爱，赵日升对房山的文学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是源于这种对家乡的不舍之情，赵日升生前不只一次表达出了身后要回房山安葬的意愿。赵日升去世后，房山文联和赵日升的家属，为赵日升身后之事合力奔波，几经周折，赵日升的骨灰终得在 2007 年于房山静安公墓安葬，也算魂归故里了。

附：赵日升碑记

赵日升，诗人，散文家、编辑家。北京房山大次洛村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先后在琉璃河中学、房山文化馆工作。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副主编，《小说》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风质朴，真诚待人，热爱桑梓，奖掖后贤，勤奋写作。所作民歌《拒马河，靠山坡》广为传诵，先后收入小学课本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有诗集《岁月之窗》，散文集《闲事闲写》等多部文集行世。

浩然先生二三事

孙奎春

我与浩然先生相识将近 40 年了，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浩然是一位杰出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农民作家。1932 年 3 月出生在河北省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只上过半年私塾和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勇于进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先后当过区、县干部，报社记者，于 1956 年 11 月踏入文坛。几十年来，他发表了数百万字农村题材的作品，享誉文坛。有些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曲、连环画等，深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艳阳天》，“文革”后，他又发表了长篇力作《苍生》，获“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

浩然先生从一个拿锄头的农民成长为一个拿笔杆的作家，并且获得了如此成就，但他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把农民看作自己的再生父母，深深扎根于农村这块沃土之中，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生活，为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泥土芳香，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1969 年 5 月至 1970 年，市直党政机关、报社和文联等单位千余名干部，下放到房山县农村劳动锻炼，浩然等 5 人被分配到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我当时在县革委会政治组具体负责管理下放干部工作。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有“八个样板戏和两本书”——《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的大名无人不晓。当我在下放干部花名册上看到“浩然、作家、小学文化”时，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据说他历来填写干部履历表都是如此）。浩然担任下放干部组长，通过接触，增进了友谊。他平易近人，热情诚恳，办事认真细致，谈吐幽默风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多数人而言，由城市到农村，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革命”。然而对浩然却是如鱼得水，可以说一切驾轻就熟。他除了以身作则按统一要求带领大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学习外，还积极为村里工作出谋划策，主动帮助大队起草计划安排，写年度总结等。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紧密结合真人实事为村宣传队编写文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表演唱、快板书

等，很受社员群众的欢迎，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1970年秋，市里召开下放干部总结表彰大会，经过大队推荐，公社集中评选，全县有80名先进集体和个人出席会议，会期3天。浩然作为先进小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始之后，我与浩然商量，请他参加召集人汇报会，全面了解情况，以全体出席表彰会人员的名义，起草一份“给全县下放干部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大会基本精神，围绕“三项任务”提几条倡议。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着手搜集有关素材，主动征求他人的意见，进行写作构思。或许是由于长期写作形成的职业习惯，浩然先生一旦开始创作精力高度集中，有时半夜突然爬起来捕捉“灵感”。经过反复推敲、锤炼，很快将5000字的稿件压缩到1500字，最后提交召集人联席会“通过”，当浩然念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会后印发各公社、大队和三百多个市、县下放干部小组，反应非常好。

1990年春，我与申振海等几位朋友前往三河县招待所拜访浩然，当时外地来访、求教者应接不暇。浩然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老朋友久别重逢，话题自然很多。此时的浩然已经恢复了一切职务：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东方少年》杂志主编。此外还兼任三河县文联主席。尤其令人可喜的是他在三河县筑起了“泥土巢”，办起了“泥土文学”工程，成就卓著，影响巨大。

此次拜访的另一个目的是请浩然先生为申振海作品集《时代的风采》一书作序。按一般程序，作者应提供详尽的文字资料，然而老申只带了书稿，没做任何准备。浩然先生时间非常宝贵，他思忖良久，考虑到申振海一则是一名业余作者，而且此书又是他的“处女作”；二则作品是反映“文艺真空地带”——建材行业的人和事，因此破例给予特别关注与扶植。他不厌其烦地口问手记，详细询问作者简况、创作背景、作品内容及故事梗概。序言很快写成，他强调指出：“纵观书林刊海，反映建材行业的题材太少了，专门表现建材人生活面貌的文学书籍《时代的风采》似乎成了罕见的独一本。”在浩然先生的鼓励下，之后，申振海先生又完成长篇小说《时代的召唤》，再次请浩然先生作序。

2001年3月27日，房山区文联成立，浩然应邀前来祝贺。2002年11月，浩然因患脑血栓先后两次住进同仁医院。2008年2月20日，浩然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我在心里默默祝他一路走好！

房山的第一代女送电工

章世铭

新中国的第一代女送电工是谁？他们就成长在北京送变电公司。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棵棵青松要成材……”。每当《女送电工之歌》熟悉的旋律响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记忆之门打开，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4年2月6日，一支由15名女孩子组成的“三八送电班”在北京送变电公司送电二队成立了，这些花季的姑娘从此与送电施工的男人们“平分天下”。当时的送电工是很多男同志都不愿意干的工种，高空作业更被视为女性“禁区”。曾有人断言：“中国从西太后时有电的那天起，就没见过女的干送电工。”“现场环境那么艰苦，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哪受得了，干不了几天就得回去。”然而，旧传统、旧观念，没能阻挡住“三八送电班”前进的步伐，到1975年底，这支年轻的队伍已壮大到44人。1978年10月底“三八送电班”撤销，一干就是1700多个日日夜夜。

在“三八送电班”成立的近五年间，她们先后参与了京通线、西清线、上港线等8条220千伏输电线路的建设。这些年轻的姑娘凭借自己的坚强，和男职工们一样，磨炼出了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顽强意志和品格。

1975年，西清线山区开始施工。塔料运输全靠肩扛身背，最远的施工桩号要爬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用抱杆进行吊装时，拽大绳的姑娘就站在悬崖边上。为了抢工期，她们早晨四、五点钟出工，晚上八、九点钟收工是常事。用人工搅拌混凝土，50公斤的水泥袋，她们扛起来就走。

1977年，在上港线施工时正值夏天，天津地区连下了三天大雨，整条线路一片汪洋。由于当地地势低洼，积水难以消退，一连半个多月，帐篷里全是积水，脸盆、鞋子都在水里



1970年10月，北京送变电公司二队送电“三八班”合影

飘着。当时正值紧线附件阶段，“三八送电班”的姑娘们每天淌着齐腰深的雨水，往返于现场和驻地之间，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的不知多少遍。直到最后一个区段紧完线，水才全部消退。

1978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正在天津大港地区施工的“三八送电班”奉命返回良乡基地。7月29日就与公司派出的救援队伍一起赶赴唐山，参加震后抢险救灾工作。为了尽快恢复送电，她们一到唐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三八送电班”的姑娘们与男职工穿的没什么两样。尤其是冬天，野外作业天气严寒，每个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蓝色劳动布工作服里套着粗毛线织的毛衣和小棉袄，整个人变得圆嘟嘟的，再穿上大头鞋，戴上棉帽子，不仔细看根本分不出是男还是女。虽然已经全副武装，等爬到塔上不一会儿，手脚就会冻得发麻。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皮肤变得又红又黑。

虽然送电施工工作辛劳，但“三八送电班”的姑娘们总能自娱自乐。不管出工多早，收工多晚，一坐上敞篷大卡车就放声高歌。施工中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线路沿线有很多小水沟，一下雨积水将近半米深，坑里的鱼多得直往腿上、脚上撞。姑娘们的工具袋都是圆桶的，在工作间隙，她们经常跳进坑里摸鱼，不一会工具袋就能装得满满的，于是香喷喷的焖酥鱼就成了驻地改善伙食的招牌菜。

就在这亦苦亦甜的工作和生活中，“三八送电班”的姑娘们度过了近五年难忘的时光，用青春和热情为电力工业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为北京送变电公司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她们的奉献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1977年，“三八送电班”先后荣获北京市工业学大庆标杆集体和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称号，女工黄德兰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劳模吴春山

白全永

吴春山，1901年8月14日出生在岗上村的一个雇农家庭。1948年冬，良乡县解放后，吴春山1949年担任村农会主任，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带头创办全县第一个互助组，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后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2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被选为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他任村党支部书记，为集体事业日夜操劳，使集体经济有较快发展、林牧业发展尤为显著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1958年，当选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1963年、1964年、1966年连续四次被评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文革”期间，遭非人摧残。后恢复工作，继续担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因成绩显著，曾先后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七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1年，被选为中共房山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5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北京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第七届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3月，被中共房山县委授予“农业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1979年退休，1983年11月2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3岁。

受尽压迫

吴春山于1901年出生在原河北省良乡县岗上村（现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岗上村）的一个雇农家庭。父亲名叫吴斌，是个善良的穷苦农民。因家境极为贫寒无奈之下，家中把吴春山的妹妹送给了别人家当童养媳，把他幼小的弟弟也过继到了外村。八、九岁的吴春山便在村中的武财主家做活放牛羊、扛长活、打短工受尽欺凌，但他从不屈服。当时幼小的吴春山干活机灵勤快，但贪心的财主并不满意，总嫌吴春山吃得多，曾多次夺过吴春山的饭碗说：“小孩子家吃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可吴春山并没有被吓倒，他暗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智慧与财主斗争。一天傍晚，吴春山赶着牛羊回来。站在门口的财主一眼就看见有只小牛的嘴被柳

条捆上了，小牛饿得“哞哞”直叫，财主非常生气地问：“为什么把小牛嘴捆上，不叫它吃草？”吴春山理直气壮地说：“老爷！不是您说年龄小的没必要吃太多的东西吗？我是按照您的吩咐干的呀！”财主听了也是哑口无言。

旧社会的中国贫穷落后备受欺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吴春山口中的一个顺口溜可以说是对当时岗上村的一个真实写照：“岗上坡、虎狼窝，地主狠、保甲恶。土匪多得赛蚂蚁，穷苦人民没法过。”吴春山在旧社会给地主放羊 10 余年，扛长活达 28 年之久，六个孩子死了五个，只剩下一个女儿。受生活所迫吴春山曾往塞外跑过买卖维持生计。

1945 年底，中国共产党房、良县政府开辟了坨里以外的新解放区。派纪玉林、刘振怀两人秘密来到岗上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受苦受难的吴春山终于看到了曙光他积极拥护“双减斗争”，并担任了本村的农会委员。1948 年家乡解放了，吴春山获得新生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 年春，党组织下派的土改工作队罗兰堂、马振学等同志入村。召开贫苦农民大会组织农会，吴春山当选为农会主任。翻身的吴春山心情振奋干劲十足，在他的带领下岗上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岗上村穷苦的百姓终于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艰苦创业

1949 年分到了三亩四分地的吴春山，两眼含着幸福的泪花，他从心底里感谢恩人毛主席，感谢救星共产党。同年 7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他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决心。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1949 年岗上村的 6 名党员在吴春山的带动下积极参加抗旱活动，挑水点种努力搞好生产。吴春山还组织贫雇农成立了生产拨工组，互助合作促进生产，使该村成为了生产模范村。1950 年党号召农村走互助合作道路，身为村农会主任的吴春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带头和吴坦、吴秀三户贫农办起了原良乡县的第一个互助组。共同耕作他们分得的三十九点五亩地，创业之初人微力薄吴春山竟赤膊带领组员人力拉犁耕田，到秋天他们三户都丰收了，其中吴秀的十六亩地就打了 18 石粮食和 3000 斤红薯，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事实胜于雄辩，吴春山常拿吴秀家举例子，通过宣传只用 3 年时间全村 119 户人家就有 98 户加入了互助组。吴春山还领导全村 30 多个互助组向河北省的互助组发出了生产竞赛的倡议，推动了全省互助生产的发展。吴春山当选为河北省

的互助劳模，他办的互助组在全省闻名。全良乡县展开了学习吴春山的活动。

1952年3月3日在原互助组的基础上，吴春山又带领吴春荣、吴平、吴秀、吴旗、吴春禄、吴坦、武凤等十户贫农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有些人对这个新生事物坚决反对，扬言：“在丘陵村办不了合作社。”可吴春山坚定的说：“是共产党毛主席让咱穷人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不听党的听谁的？”他还表示：“就是抛家舍业也要跟党走，办好合作社！”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从八元钱、六头毛驴起步战天斗地、打井抗旱、艰苦创业。当年就在山坡地上获得了亩产皮棉97斤，谷子516.5斤的好收成，获得了国家农业部的高产奖励。1952年吴春山作为河北省劳模代表出席全国英模会并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奖金500元，可吴春山分文未动如数交给集体为社里买了一头骡子和两匹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在吴春山的带动下岗上人入社的积极性极为高涨。1955年吴春山农业社被中共良乡县确定为试办高级社的试点。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苏联著名作家巴巴耶夫斯基曾亲自来岗上村视察和采访，良乡县委农村部直接向中央农林部作了汇报。后来岗上村还与邻村联合办起了大社，吴春山任五村联村社主任。

1955年，已经55岁的吴春山开始担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社员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社并根据岗上村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岗上村地势高水位低原本是个“偏坡旱地不打粮”的穷地方。吴春山就带领岗上人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们利用自己的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条扁担凿石井27眼，在村北修起了一座能存水10000多立方米的小水库，扩大水浇地200亩；利用七个冬春垒起72道坝阶，闸沟垫地、开边展堰增加田地360多亩。由于极大的改善了生产条件，使岗上村在1956年就扭转了历史上的缺粮现象。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

吴春山常说：“畜牧是半个家，耕耩驮拉，代替劳力造肥全靠它，离了它就抓瞎。”“村子要想富，必得要栽树，好年头人秧树，坏年头树养人，树木里面出珍珠呀！”所以吴春山很重视畜牧业和林果业的发展，岗上人称这是老书记的“骡马经”和“林果经”。起初集体办猪场没有猪源，他就动员爱人把自己家的两头猪赶到合作社；没有钱买大牲畜，他就带头集资凑钱800元为集体买了八头牛。他还搬到集体畜牧场去住，而且一住就是十三年。发展林果没有树苗，他就带领社员一面去漫水河河滩拔河柳，一面卖鸡蛋凑钱买树苗。通过十余年的艰苦创业，一个七道沟八面坡遍地僵石的岗上村已经成为骡马成群、

猪羊满圈、沟里树木遮天、户里粮食余款并逐渐向电气化过渡的村庄。吴春山带领岗上人共同富裕的事迹通过电台、报刊的传播很快轰动了全市、全国。1965年5月，岗上村被中共房山县委树为十二面红旗之一。

历经磨难

吴春山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被人们称为“革命路上的老黄牛”、“人民的老长工”。十年动乱期间，吴春山却被打成紧跟旧市委的“三反分子”、“走资派”，又说他是“二地主”、“反动会道门坛主”、“国民党党员”，遭到残酷迫害。

在那个非常的岁月里，造反派抄了吴春山的家把他的奖章、奖状统统撕毁砸碎；还强迫他跪雪地，后背压上两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爬街达四小时之久，从焦渣地上经过腿上鲜血直流；有时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粘在肉上都脱不下来。文革中，吴春山先后被批斗327次，但他一身铮铮硬骨在高压淫威下坚强不屈从不动摇。就是在这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的日子里，吴春山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仍关心集体的事业，发现问题及时指出。一个造反派说：“你都挂了黑牌子，还管闲事？”吴春山却说：“不管！除非我咽了这口气。”党的九大召开后，1969年6月初时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的张鼎丞同志来到岗上村看望吴春山，并传达了上级指示：强令造反派解放吴春山。1969年6月10日，吴春山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以古稀之年继续担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跟他一起搞初级社的老伙伴武凤曾经劝他说：“您快七十的人啦，少操点心吧！”可吴春山说：“不！共产党员得有志气，咱就是一个心眼跟党走，风吹浪打不回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高龄的吴春山没有止步他继续带领社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走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吴春山亲自带队利用6个冬春挖平了五个山坡，填平了一道沟，大平大整土地600多亩。在治山的同时大力治水，吴春山带领社员先后打机井11眼，建扬水站5处，使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山坡地变成了水浇田。由于生产条件改观，岗上村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69年粮食亩产406斤上了纲要，1974年提高到600斤过了黄河，1978年亩产达到了849斤，成为了北京市郊区丘陵地区粮食产量最高的村之一。同时村内还办起了烘炉修配、米面加工、粉坊、油坊、豆腐房、建筑队等基础副业，并利用本村的小水库和一个池塘养鱼20000尾，

使岗上村真正实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吴春山心中时刻装着集体的生产建设，每天他都要拄着拐棍围绕村子转上几圈，哪头牲口病了，哪块地该施肥了他都要亲自过问。自己患了重病他也拖着不去瞧，他是把一切身心都投入在了岗上村的事业上。到他离任前的 1978 年，岗上村人均向国家贡献粮食 432 斤，全村人均种树 230 棵，集体资产户均占有 7930 元，从 1956 年到 1978 年累计向兄弟社队、国营厂矿提供木材 5000 多立方米；干鲜水果 400 多万斤；大牲畜 406 多头。昔日“偏坡溜岗”的穷岗上变成了“花果山，米粮川，鸡鸭猪鹅养殖全”的富岗上。

无私奉献

吴春山历来办事公道，大公无私，两袖清风，已被人们誉为一代楷模。岗上村的老会计邵文福说：“老书记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很好！他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把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

岗上人至今还记得在抗美援朝时期，吴春山变卖家产捐款 40 块银元。办社的头一年，吴春山就向国家交余粮 27000 多斤。1958 年他退掉了上级拨给建猪场的 7500 元款项，自力更生只用 800 多元就建起了 80 个猪圈。三年困难时期，吴春山发现首都市民吃不上鲜菜，他就把三十万斤蔬菜全部按平价提供给了首都市民。就是在最困难的 1960 年，还向国家交售了 6 万多斤粮食，把多余的白薯秧支援给了兄弟社队。1970 年秋，房山县葫芦堡公社朱岗子大队的大牲畜因食物中毒突然死亡，来岗上村求援。吴春山问明情况后，把本队四挂大车的驾辕牲口以 7000 元低价卖给了朱岗子，一时间“风格马”的故事轰动了全县。由于多年来吴春山的平易近人、诚恳待人和乐于助人，所以大家亲切的称他为“老主任”、“老社长”。市县各单位干部、群众来岗上大队，都受到吴春山的热情接待。

吴春山常说：“勤是聚宝盆，俭是传家宝，搞社会主义建设少不了。一分钱也要掂量着花，不能金手银胳膊，能挣能哆嗦；马蜂吃窗户纸，一嘴一窟窿。”首先吴春山从自身做起，他多年来坚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勤政为民，他家的两间小黑屋一住就是 80 年。办社 20 多年岗上村不设招待费，就连上级领导来村检查工作大队招待了几斤桃子，事后吴春山自己还付了钱。当时来岗上村参观的人很多，有人就提议盖个礼堂，可吴春山说：“我们要把钱用在生产

上，花在刀刃上，争取为国家多做贡献。”1976年大秋，吴春山带头利用晚间出义务工把集体900亩的玉米剥完，节省了集体的开支。1963年北京市财务计划会议上，市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矛盾，市领导彭真、刘仁、万里等人把吴春山接到香山饭店礼堂为大家作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报告解决了难题。多年来岗上村在吴春山的倡导下一直坚持民主理财，大兴勤俭之风。1977年7月20日，房山县委向全县各公社、局党委、各基层支部下发文件通知，号召大家学习岗上大队自力更生、勤俭办社的经验。

吴春山善于思考动脑筋，他在多年的农业生产中一直求真务实、肯于钻研、勤于实践、勇于开拓创新，所以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被称为是京郊农业的“土专家”。1979年，房山县委专门成立了“吴春山经验工作组”派李福田、郑德光等同志来岗上村总结吴春山的宝贵经验。有关部门还专门总结整理了吴春山的《骡马经》、《养羊法》、《抗旱经验》、《造林经验》、《谈农业气象》、《农业谚语》和“勤俭办社”等经验，进行推广。

风范长存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春山积极响应号召退位让贤当了岗上大队的顾问。虽然他因年事已高无法参加劳动，但他始终关心集体事业的发展。在他的指导下岗上村又建起了铸造厂、车床厂等多个村办企业，壮大了集体经济。1980年2月，已经80高龄的吴春山还参加了北京市的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四化建设献计献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许多单位请他去作报告，他都欣然前往。他经常说：“我要为革命做一辈子老黄牛。”吴春山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岗上村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春蚕到死丝方尽！”吴春山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就是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还叫身边的人给他阅读上级“关于党员教育”的文件。1983年11月2日上午9时25分，吴春山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3岁。11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大会。1984年1月8日，中共房山县委做出了向吴春山同志学习的决定。1985年8月29日，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山塑像纪念碑在岗上村西坡落成并被开辟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吴春山同志的一生是勤劳俭朴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生。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本文根据吴春山档案材料和本人多年收集的口碑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回忆老书记李明

魏志华

1953年初，我从房山团县委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这时，县长李明调任县委书记。这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几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影响很深。他在房山的干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虽然离开我们40多年了，但我与一些老同志在一起，还经常谈起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关心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作风。

深入实际

房山解放后，李明一直担任县领导。不论多忙，他都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一有空就下乡，很少在机关。1952年10月，李明任县长不久，就到房山六区下乡。当时山区没有公路，不能通汽车，他和警卫员坐供销社的卡车到佛子庄，从佛子庄往里步行到霞云岭，听完汇报后，又赶到龙门台、四马台、宝水、蒲洼等村，然后从十渡回来，去了六七天，走了200多里地。每到一个村就和党员、干部及群众进行座谈，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研究发展生产、群众致富的办法。1953年初到1954年，李明任房山县委书记时，经常骑自行车下乡。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每次下乡，差不多都是我



1954年9月，李明（左二）与房山县委部分同志合影

和他的警卫员张凤仁一起去。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和他去过一区的田各庄、瓜市、夏村、顾册、吉羊；四区的赵各庄、五侯、西东；三区的长沟、坟庄、南良各庄、北良各庄、双磨、南正、北正；五区的南尚乐、北尚乐、惠南庄、广润庄、半壁店等村。每天要骑十几里到几十里地。近的地方晚上就回来，远的地方就住在村里。

1953年冬天，第一次实行粮食统购统

销。我和李明同志一起去一区的夏村检查工作。吃派饭时只给我们喝稀粥，当时那个村是比较富的，他发现这是群众对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满。当天就没有回县，与县下乡工作组和夏村乡的主要干部一起开会，分析群众思想，找工作上的差距，研究出深入发动群众的具体措施，一直到深夜。最后这个乡超额完成了县里分配的任务，还出现不少干部、群众积极交爱国粮的先进事迹。

1958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由于受“浮夸风”、“共产风”影响，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尤其是山区更为严重。在村外山上住的群众，都搬到村里，远地没人耕种，地都荒了。果树也没人管，造成严重减产。李明多次到山区调查，与干部群众座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出了“三上山、四照顾”的口号，即人、畜、肥三上山，对搬回山上住的群众的吃粮、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子女上学、小型贷款四方面进行照顾。全县山区有几百户群众搬回山上去住，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市委对房山这项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北京日报》、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上进行了介绍。

李明同志为了及时了解农村情况，除经常下乡调查以外，还建立了书记与农民交朋友的制度。即与全县24个影响较大的全国劳模、市劳模、大队党支部书记都交了朋友。如南韩继村党支部书记徐庆文、岗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山、上万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希儒、坨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华、北市大队党支部书记高树林、半壁店大队党支部书记赵仲启、惠南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杜宝珍、十渡大队党支部书记隗合春、西关上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堂、富合大队党支部书记隗稟库、夏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奎、双柳树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春常、军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德生等。除了县委经常与这些同志联系外，每个季度开一次会，了解情况，交流经验，研究一些有倾向性的问题，对指导和促进全县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李明和县委一班人深入调研、抓好典型及扎扎实实的作风，房山县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比较活跃。特别是农业生产，房山在全市郊区县名列前茅，电影《北京大跃进》中房山的内容最多。《红色邮路》、《红色背篓》等电影反映的事迹，也都是当时全市的先进典型。

关心群众

李明同志平常不好开玩笑，眼睛又大，不了解他的人对他都有点怕。实际上他是热心肠的人，没一点架子。对干部、对群众的生活非常关心。对待年轻

干部，都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1952年，李明从县供销社主任调任县长以后，原来的警卫员被保送到北京上学，李明同志都经常给他些零花钱。1953到1954年，我和他的警卫员张继仁经常一起骑自行车下乡，不论吃派饭，还是到外边吃饭，总是他给钱，从不叫我们给钱。他的下乡补助（每人每天3角钱）全给警卫员。当时部里的同志经常给报社写稿，稿费统一保存，一、两个月到外外边饭店改善一下生活，也请李明参加。每次吃饭除稿费外，他都得给一半以上饭费。各义上干事请领导，实际上是县长请一般干部，可见李明同志与一般干部的关系非常密切。

1954年夏季，连降大雨，河水上涨。县委办公室我们几个人昼夜值班，随时与下边联系，了解情况，并随时向通县地委汇报。李明还亲自到办公室指挥。有一次，大石河水太大，把洄城村包围，因为这个村地处大石河东，房山县派不过人去。李明同志马上给良乡县委及琉璃河派出所打电话，请求他们支援。很快就把洄城村险户全部搬走，使群众生命财产没有受到损失。

长沟有一个解放前党的关系户，都叫她“麻老太太”，她为了掩护八路军和革命干部，多次被敌人毒打，险些丧命。解放后政府对她很照顾。李明同志到长沟去，都打听她的情况，还亲自到她家去看望，每次都给她留下点钱。有的时候回去后办公室的同志到县民政科报销，有的时候李明同志就自己负担。

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群众发生浮肿病。李明对此非常重视，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安抓好群众生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亲自到农村食堂去认真检查，争求群从意见。

使我最难忘的是1953年发生的一件事。这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们接到通县地委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凌晨有寒流，要做好晚秋作物的防冻工作，我们马上电话通知了各区。晚上，县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动员住机关的同志到城关附近各村做防霜工作。我和县委组织部的一个同志分到大洪寺村（当时大洪寺，小洪寺还没有合并）。我们要走的时候，李明书记看我只穿一件单衣，叫我等一下，从他的办公室拿出一件新的皮大衣，叫我穿上。我不好意思的说：“我年轻，没事”。他说：“穿上吧，冻坏了还怎么上班呀！”这是我第一次穿皮大衣，不仅身上暖和，心里更热乎。领导这样关心我们，能不好好的工作么？

李明同志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对干部，尤其是对县里委办局的领导，工作上严格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严格批评教育，但在处理上非常慎重。真正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1957年“反右”时，房山、良乡两县都划了不少

右派，大部分人的问题已定性处理，少数人的问题还没有定案。1958年房、良两县合并后，县委（当时是周口店区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反右”的遗留问题。原房山县的一位副县长，按右派进行了批判。他的主要问题是曾讲过“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县委大报告”的话，被认为是反党言论，实际上是对县委召开时的报告太长有意见，他的问题定不定右派，常委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反党言论，应该定；有人认为不应该定。李明同志非常慎重。他说：“我们要看他是真心反党，还是认识上的问题。要看他的一贯表现，不要只看一个事。划这么多右派对我们党有什么好处？”经过反复讨论，对这个同志没划右派，属犯右倾错误。后来这位同志经常和别人讲：“是李书记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啊！”

党员楷模阎爱众

白玉

阎爱众，河北省清苑县田蒿村人，原良乡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他以“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思想境界无私奉献，赢得了后人的敬仰。



阎爱众同志

阎爱众生于1909年6月6日。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至1939年5月历任河北游击军司令部参谋、独立营营长、冀中独立四支队民运科长、游击大队长、政治主任；1939年5月至1945年8月先后任田蒿村高小校长、文化建国社主任、抗联主任、宣传委员、村支部书记；1945年8月至1952年12月先后在冀中第一中学、河北省安国中学、保定一中支部书记等职；1952年12月至1983年1月在良乡中学、房山师范学校任支部书记、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1月起任房山区教育局老干部议事组组长。

阎爱众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上世纪30年代还是军阀混战时期，为改变旧中国文化落后面貌，宣传爱国爱民，破除迷信的主张，18岁的他就在家乡奔走呼号，兴办了田蒿村小学和孟庄小学。在办学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有识之士，其中有领导保定地区高蠡暴动的孙必强，后经他介绍，1937年底，阎爱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阎爱众响应党的号召，以校长身份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秘密发展党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建立了河北游击军。他与延安来的孟庆山一起，收编周围的联庄会武装，扩大抗日力量。又与吕正操的抗日民军联合起来，在冀中广阔的平原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在八年的抗日烽火中，他们利用地雷战、地道战等方法，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年，阎爱众被派往位于山西五台山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学习

期间，聆听了校长聂荣臻将军的讲话以及彭真、邓拓的报告，思想修养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升华。1939年，阎爱众回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受命再组织一支游击大队，他任大队长。在一次率队与敌人斗争转移过程中，身患重病，离开了战斗岗位。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冀中第一中学任支部书记、主任，后又去安国一中担任领导工作。1948年11月解放保定的时候，参加了指挥解放保定的战斗。保定解放后，阎爱众在军管会中主管文教卫生工作。时间不长，组织上又安排他去保定一中担任支部书记主持工作，一直到1952年。

1953年初，阎爱众从保定一中来到了良乡中学任校长、支部书记。用他的话说，叫“南雁北飞”。来良中以后，阎爱众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坚持艰苦创业办学。工作中，他以身作则，他说过：“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教育领域是一块特殊的园地，不像其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它要求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具备终生的奉献精神与爱心，纯心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

阎爱众呕心沥血，坚持勤俭办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师生义务劳动，修建了400米跑道，24.5亩的大操场。又多方求助，建起了容纳千人的大礼堂。1955年初，根据国家教育部的指示，在北师大和外国专家的帮助下，良乡中学创办了一个占地20亩的“生物实验园地”，其规模和形式都是很少见的。建园时，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园地建立，有种有养，有动植物的科学试验，使学生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在当时普教系统是首创。建园地是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最好的形式。河北省教育厅在良乡中学召开了普教系统的现场会，推广良乡中学的经验。北京市领导也到良乡中学参观视察。良乡中生物园地的事迹后来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都刊载了良乡中学的经验。

阎爱众曾说过：“不求个个升学，但求人人成才”。文革前，良乡中学共培养高中毕业生7000余名，其中考入大专院校600余名，中专专业学校的3000余名。毕业后担任地师级干部80多人，担任处级以上及职称技术人员600多人。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干部，有的成了作家、工程师、艺术家。例如侯隽，是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是青年一代的楷模，曾受周恩来总理六次接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阎爱众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继续关心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他严格要求党员，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老干部活动中心青少年教育小组开会时，他说：“我

们老干部要武装起来上前线，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做一名反和平演变的卫士，要教育好青少年一代”。他经常和十几名校外辅导员，深入到一中、二中等学校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阎爱众受市委老干部局邀请到北京饭店参加座谈会。会上，市委授予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荣誉证书，他风趣地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人民服务，是我毕生的宗旨，在见马克思之前，我们要发挥余热！”

1991年春节，区四部门领导代表全区人民到阎爱众家拜年，祝贺他全家幸福、康乐。并敬送一块镶嵌着“似兰斯馨”四字的长匾。阎爱众心潮起伏，激动地说：“我首先感谢区委、区政府各级领导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首先受教育’，我绝不辜负全区人民对我的期望，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阎爱众是地师级校长，可他从不享受该得的待遇，却把他一颗伟大的爱心，完全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在保定一中的时候，就用他的工资帮助了不少有困难的学生。他来良中之前，对学生会的同学说：凡是资助学生的钱和物，一律不用还了。他到良中以后，还是不断的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而他在生活上始终克勤克俭，把自己和老伴的生活标准压的很低，每月只80元至110元（包括住房、水电等）。他经常说：“粗茶淡饭保三餐，早也思甜晚也思甜”。他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培养接班人关系着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如果国家兴旺不起来，钱还有什么用？”从1991年到1996年，阎爱众先后向贫困灾区、“希望工程”捐赠了25000余元人民币。

阎爱众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很少有亲戚来找阎爱众。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校园里来了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找阎爱众。阎爱众自己抱一床被子，在教室里找了一张空床，安顿父子住下。而这个农民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那个孩子就是老校长的亲孙子。他的儿子不是来要钱，他恳切的向父亲讲：“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让老大、老二在乡下当了农民。我想把老三送到您身边来，一方面可以照顾您，另一方面在这里上学，将来兴许考上大学，总算他们三个里头能出去一个”。阎爱众回答“不行”。他儿子当时哭了，认为他父亲太绝情了。阎爱众说：学校都是一样的，跑几百里路来上学，不但浪费国家钱财，也不符合国家要求。在阎爱众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裙带风”是中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风气，中国共产党早就声明，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关键。

只有坚持党性原则，才能铁面无私，才能杜绝拉关系走后门。阎爱众接待过一位“五七”干校的老同学，这位老同学与阎爱众是患难之交，这种友谊是不容易忘记的。如今这位同学回到工作岗位，重新做了工程师。阎爱众也回到良中担任了校长。然而这位工程师的孩子没有考取重点中学。于是他想起了阎爱众，他也知道他的这位老同学是铁面包公，不容易被私人感情所打动。就准备了一些礼物找上门来，他深信老校长会破例的。阎爱众没有忘记友谊，他在家招待了这位老同学。之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这位老“同学”，并让他把拿来的礼物送了回去，对这位老同学也没有破例。

阎爱众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可他从不要求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外出开会，从不要车，就坐公共汽车。从房山到良乡是35华里，有时从房山步行回良乡，他说“生命在于运动”。他刚到良中时，以校为家，在学校食堂用餐。有一次，大师傅把饭菜送到吃饭的桌子上，他说：“以后不要这样，这点小事都要帮助，那我就到了无能力工作的地步了”。

1978年落实干部政策时，阎爱众重新回到良中。教育局考虑他年纪大了，又有较高的资历，准备对他进行一定的照顾，下发了一份文件，让学校为闫爱众盖三间房，这对区重点中学，不是大问题。阎爱众看到了下发的文件，就悄悄的把文件收起来了，在距学校较远的地方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住了下来。凡是到他这小屋去的老师和领导，都深受感动。1980年，学校盖了新的教职工宿舍楼。教育局又指示学校给阎爱众一个单元房。阎爱众还是没住，又让给了一位住房紧张的老师。

阎爱众从不请客、不送礼，也不收礼、不陪客。有时因公事来人，把客人请到家去吃便饭。学校接待回校参加校庆或本校毕业生座谈会时，由于人多，出于礼节和人情的关系，就象征性的陪一陪，然而用过饭之后，一定要照价付钱。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曾花多年时间，研制一种莫汉扑克牌（也叫莫汉桥牌），阎爱众给予了试印的支持。牌印好后，赠送了不少人，也送给阎爱众一副。闫爱众坚决要付钱，否则，决不收这牌。后来这位老师收了他的钱，他才收下扑克牌。

1980年春，学校里组织教职员工去东陵参观。为此，学校里租了汽车。这天早上，阎爱众的爱人也随着大家上了汽车。这时老校长来了说：“这是学校为老师组织的活动，你怎么可以参加呢？”他硬要老伴下车。大家都说：“老人来良乡中后哪儿也没去过，就让老人家去吧，多一个人也不算什么”。老校长坚持说：“有这一次，就会有下一次，咱们不能那么办”！

1996年11月22日，阎爱众同志因病逝世，终年88岁。

养蚕姑娘李秀荣

魏志华

1958年，原房山县（当时是周口店区）马安公社十渡村的养蚕小组的几个姑娘，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大丰收，4张春蚕实收鲜茧349.9斤，平均每张产蚕87.5斤，其中1张丰产春蚕产茧124.4斤。4张蚕的平均产量比1957年的60斤增产45.7%，属于全国最高产量。养蚕小组组长李秀荣先后被评为县、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养蚕小组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这个养蚕小组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1957年，房山县为了发展山区经济，同时又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和出口的需要，提出要大力发展养蚕事业，在蒲洼乡举办了十几天的养蚕技术培训班。十渡村社员李秀荣参加了学习班。学习回来后，李秀荣找到本村社员隗淑红、齐秀荣，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姑娘，成立了一个养蚕小组。她们把县培训班的情况和养蚕计划向大队党支部作了汇报，得到了大队的支持，帮她们作了具体计划，把大队学校的两间旧房腾出来作为蚕室，并安排有养蚕经验的妇女隗秉兰协助她们。开始时，大家虽然情绪很高，但有的人也有些顾虑。她们几个过去谁也没养过蚕，没有经验，怕养不好，担责任。也有的怕脏怕累，信心不足。党支部对她们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号召青年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使她们解除了顾虑，鼓足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过去当地群众养蚕都是老办法，产量很低。这次，李秀荣她们完全按县里讲的管理办法，运用先进技术进行饲养和管理。在整个养蚕过程中，掌握好几个技术环节，步步做好，以保证蚕的良好发育；一是严格消毒，做好催青。对幼蚕和用具都做了周密的卫生消毒。催青时采用“手辅催青法”。即在茧子孵化时，在蚕子上面盖上清过毒的毛巾和布，保持温度。孵化温度掌握在74°F至78°F，干湿相差7°F。每月通风换气3至4次。夜间不点灯，孵化率达到98%，而且孵化整齐。二是高温勤喂。1至3龄时，保持温度83°F，干湿相差7至8°F，每夜喂16至18次；4至5龄时，温度78°至80°F，干湿相差8

至 10°F，每昼夜喂 18 至 20 次。高温养蚕，蚕生长快、成熟早，勤喂才能使蚕满足生长的需要。三是稀养、勤除沙，少丢蚕。每平方米的席面有蚕 54 头，这样得吃得长。在幼蚕期采取随扩座、随除沙，可避免丢蚕。壮蚕期保持蚕座的清洁和干燥，使蚕生长整齐一致。除沙，就是每隔一两天，把蚕吃剩下的桑叶、梗子及蚕屎等杂物及时清除，保持席面干净，使蚕少得病。四是及时合理的上簇。蚕室内是用木头做几层架子，上面铺上席。架子上共放了 20 张席，每张蚕籽能出 5 张席。蚕生长成熟准备作茧时，要及时合理的上簇。采取“墩簇”形式，每平方米放熟蚕 68 头，这样可以减少下脚蚕的百分比。

养好蚕虽然时间不太长，只一个来月，但非常辛苦。4 月中旬就开始养蚕。为了保证室内温度和湿度，在室内生了 3 个火炉，把每张蚕籽上放上热毛巾或布，半个月出蚕。开始出蚕后，由于蚕小，先放在筛子里或木板上，下边放上纸，一天要喂 20 次。到 2 龄时每天要喂 11 至 12 次，3 龄开始上席，4 龄开始分席。每张蚕要分 4 至 5 席。夜里要喂 3 次，白天喂 2 次。5 龄以后随时喂。开始蚕小，吃的少，桑叶是由组员们轮流上山去采。后来吃的多，又要保证吃上新鲜的桑叶。村里又没有集中的桑园，生产队就轮流派人去采。采桑叶要带上树枝，回来后放在背阴处，泼上水，吃时再采叶。5 龄以后蚕逐渐成熟，不吃东西。蚕的头部发亮、发白，群众把长成熟、准备作茧的蚕叫“老公”。这时组员们就随时观察。一个一个的挑“老公”。把“老公”先放在簸箕或木板上，然后再把蚕往“山”上放。所谓的“山”，就是把树枝、谷草绑成“绑”，有 4 至 5 米高，1 张席要放 20 捆，20 张席要放 400 多个，整齐的摆在地上，把成熟的蚕往“山”上放，也有一定的技术和顺序：先往高处放，后往低处放。上边先放的蚕已经吐丝作茧，不再拉尿，下边的蚕茧就不会脏。如果先放下边，已作了茧，再放上边的，上边的蚕拉尿，就会把下边先作的茧弄脏，影响质量。蚕到了 4、5 龄这一段是最紧张、最艰苦的。室内温度高，穿背心都热，因为蚕室搭了 5 层架子，喂蚕、拣蚕都要登木凳，每天要上下几十次。还要管煤炉，一个多月里，她们根本没法休息。尤其是后一阶段，虽然大家离家都不远，但谁也不能休息，昼夜守在蚕室，从家里带饭，或让家里人送饭。她们虽然这样忙、这样累，待遇却不高，每人每天只记 8 分工分，比村里同等劳力稍高一点。她们谁也没有怨言、一心只想把蚕养好。

县农业局把十渡养蚕当作重点，长年派技术干部进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那一年的 5 月中旬，蚕正在生长期，突然发现不少的蚕不吃食，养蚕小组找到县农业局的技术干部郭志忠一起研究，检查桑叶没有问题，可能是室

内温度高，通风不好，她们开了几次窗户后，情况果然好转。

由于十渡村养蚕大丰收，李秀荣先后被评为周口店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养蚕小组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1958年10月初，全国妇联召开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房山县（后改周口店区）共有4名代表参加，除马安公社十渡村李秀荣外，还有琉璃河公社妇联副主任马淑英、长沟公社炼铁厂干部霍淑珍、花果山公社（后并入河北公社）接生员安金华。会上除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等领导出席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并和全体代表合影。

1958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房山参加会议的共5人，包括区委副书记张革夫、长沟公社下滩管理区党委书记杨文辉、长沟公社石窝管理区副主任高福春、良乡公社坨里管理区副主任宋希儒、马安公社十渡村养蚕小组李秀荣。会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农业部长廖鲁言、林业部副部长张庆浮等同志作了报告。国务院向先进单位代表颁发了奖章和奖状，每人发给一支金星钢笔、两个笔记本。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和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另外，国务院还奖励十渡村优种桑苗5000棵。回来后，他们试种了十几亩，确实比本地的桑树好的多，生长快、分杈多、叶子大、产量高。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后不久，李秀荣被邀请参加北京市英模报告团到各地作报告。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反响很大。1959年4月，北京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李秀荣又被邀请列席了市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人代会结束不久，《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以《养蚕姑娘李秀荣》为题，报道了十渡村养蚕小组的先进事迹，并配有李秀荣和春蚕大丰收的一组照片，当时在北京，尤其在郊区农村影响很大。

1959年至1960年，周口店区和北京市先后举办了农业成果展览，十渡的养蚕事迹占了显著位置。北京市农业展览在农业展览馆举办，彭真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并作了讲话。

李秀荣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后，被留在区里，在农业局帮助抓养蚕工作。曾到良乡公社的几个村指导养秋蚕，后来又调到良乡蚕种场当技术员，专抓养蚕工作。

1960年，良乡蚕种场划归北京市林业局，李秀荣被马安公社调回在六渡管理区、十渡公社当妇联干部，重点抓养蚕，直到文革结束。

房山与耆英的生前身后

杨亦武



耆英坐像

耆英，是中国近代史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自十一岁步入官场，历嘉、道、咸三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显赫一时的宗亲硕辅。早年，耆英曾在良乡县西置庄产一处，为之打理农活的庄户依庄而居，形成一个小村，当年叫“庄户”，即今青龙湖镇的西庄户。庄产东边有清溪一道，名叫柳叶河，耆英曾在柳叶西岸建别墅一座，称为“耆宅”，现在这里是阎村镇小马村地界。咸丰元年（1851）以后，耆英官场失落，一度在耆宅中闭门隐居。咸丰八年（1858），耆英惨遭杀身之祸，悬绵而终，最终葬身于自家庄园的松林坡。如今，知道耆英与房山这段渊源的人并不多。崇墓无踪，耆宅荒草，而一些耆族后裔至今还守在这片乡土。

赫赫帝胄 父子拜相

清耆英为清东阁大学士禄康之子，乃清显祖宣皇帝塔克世七世孙。

始祖塔克世为中国明朝后期女真建州左卫领袖，塔克世生年不详，明万历十一年（1583），同其父觉昌安试图赴古埒城劝降叛明的内弟阿台，不料尼堪外兰破城后纵兵屠城，塔克世与觉昌安均死难。清顺治五年（1648），追尊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

塔克世共有五个儿子，长子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穆尔哈齐，另外还有第三子舒尔哈齐，第四子雅尔哈奇，第五子巴雅拉。

二世祖穆尔哈齐，塔克世第二子，清太祖努尔哈赤异母弟。出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努尔哈赤以十三幅遗甲起

兵，穆尔哈齐随同征伐“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战功卓著，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卒于清天命五年（1620）九月十日，终年六十岁。太祖努尔哈齐亲奠。葬于虎栏哈达之郝图阿喇（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一日迁葬于辽阳城东北阳鲁山岗。

穆尔哈齐有子十一人，有封有爵者、有嗣者六人，分别是：第二子达尔察，奉恩辅国刚毅公，其后裔分隶左翼正蓝旗远支宗室第七族。第四子努达海，奉恩固山襄敏贝子，其后裔分隶左翼正蓝旗远支宗室第九族。第五子汉岱，奉恩镇国公，其后裔分隶左翼正蓝旗远支宗室第二族。第七子塔海，奉恩辅国公，其后裔分隶左翼正蓝旗远支宗室第十三族。第九子祜世塔，奉恩辅国公，其后裔分隶左翼正蓝旗远支宗室第五族。第十子喇世塔，奉恩辅国公，其后裔分隶左翼正蓝旗远支宗室第十二族。

第一子萨哈廉、第三子硕弼基、第六子噶巴喇，第八子唐喀、第十一子欢齐费扬古五人无嗣无爵。

三世祖祜世塔，穆尔哈齐第九子。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六月十五日，清顺治八年（1634）三月晋封辅国公，康熙二年（1663）三月初五日卒，享年四十九岁。祜世塔生了十一个儿子，有后裔传至今日的为长子祜世布、四子伊尚阿、七子越龄和八子鄂蜜。

高祖越龄，祜世塔第七子。顺治十年（1653）三月生，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四十八岁。

曾祖常祥保，越龄第二子，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二十六日生，雍正三年（1725）授七品笔贴式，乾隆五年（1740）十二月授宗学副管，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初十日卒，享年六十三岁。

祖父炳文，常祥保长子，雍正八年（1730）二月二十八日生，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授七品笔贴式，三十五年（1770）七月授御史，嘉庆十三年（1808）十二月赐头品顶戴、郎中俸，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十日卒，享年八十三岁。炳文有五子：长子禄丰，授监察御史。次子禄康，三子禄钟。四子禄清，曾任职主事。五子禄廷。

父禄康，炳文次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二十五日生，十八岁授七品笔帖式，历任宗人府副理事官、理事官。乾隆四十六年（1781），擢山东道监察御史，稽核该省刑名案件，并负责稽察刑部和太医院。乾隆五十一年（1786），吏科给事中，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乾隆五十二年（1787），盛京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七年（1792），盛京户部侍郎、兵部侍郎。

嘉庆四年（1799），授刑部右侍郎，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刑部左侍郎兼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兼公中佐领，吏部右侍郎。嘉庆五年（1800）十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奏奉天省仓储米石请仍照旧例出陈入新，以便民食，得嘉庆帝旨允行。是年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从一品。掌本旗户籍、田宅、教养、营制、兵械以及选官序爵、操演训练等军政事务。嘉庆六年（1801）正月授兵部尚书，掌全国军事及武职官任免，并赏紫禁城骑马。二月擢刑部尚书，七月充经筵讲官。七年正月授步军统领，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掌京师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城九门内外及近郊的守卫巡获任务，并赏戴花翎。禄康以步军统领衙门与刑部有交涉事件，不便兼摄，具折恳辞，嘉庆帝嘉许，命专办步军统领事务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并赐南海淀寓屋一所。

嘉庆九年（1804）二月京察届期，嘉庆帝赞谕：“禄康职任度支兼管步军统领，办事勤妥，交部仪叙”。是年七月授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嘉庆十年（1805）五月，西洋堂人德天赐等刊书传教。嘉庆帝命禄康偕尚书长麟、侍郎英和管理西洋堂事务，并共同妥定章程奏入，嘉庆帝允行。是年十一月授内大臣。

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充国史馆正裁官。十月命为阅兵大臣，解步军统领，授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十四年（1809）仍授步军统领，户部尚书，管理三库大臣，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嘉庆十六年（1811），授崇文门正监督，管理右翼宗学，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管理圆明园包衣三旗官兵事务。嘉庆十八年（1813），授热河都统、正白旗汉军都统、正黄旗汉军都统、宗人府副理事官。是年因失察所属兵丁曹幅昌参加天理会坎卦教首领林青攻进皇宫事件被革职。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十六日卒，终年六十岁。

穆尔哈齐家族，至禄康、耆英父子步入巅峰。嘉庆、道光两代，父子相继授大学士，入阁拜相，成为显赫一时的宗亲贵胄。

授大学士入内阁拜相是清朝入关后参照明制，大学士均加殿阁衔，称“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是为三殿三阁。

内阁职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赞理机务，表率百僚。”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自雍正八年始，满汉大学士俱定为正一品，大学士成为清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以授大学士为拜相，犹如历朝的丞相，通称为中堂，位居文官之首，享有最高荣誉。此外尚有协办大学士，从一品，为大学士之副职，

往往以尚书及总督授以此衔，仍任本官，如遇有大学士缺出，即尽先递补。

清朝自开国以来，百数十年，宗室成员中未有入阁拜相者。嘉庆十一年耆英父禄康授东阁大学士。清宗室庄亲王绵课之子、清代满族文学家奕赉的《佳梦轩丛著》称：“此宗室入相之始也”。

事隔二十八年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耆英授协办大学士。三年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授耆英文渊阁大学士。父子两代，相继入阁拜相，在清代绝无仅有。难怪奕赉在《佳梦轩丛著》中感叹：“父子相承，开我宗室未有之荣，实佳话也。”

一代硕辅 埋骨松坡

耆英，字介春，清太祖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齐六世孙，永字辈，隶满洲正兰旗。据《爱新觉罗宗谱·丁册》第 7184 页记载可知，耆英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三日，由于他生长在封建社会中极富权力的宗亲贵胄之家，自幼聪明过人，并且受到了一般人难以得到的良好教育。他不仅继承了满族人特有的善于骑马张弓，能打善战的尚武传统，而且受到乾隆后期满族贵族崇尚汉族文化之风日盛的影响，精通诗文、绘画和书法，当时就被誉为京城第一才子。此后，仕途得意，官场上直步青云。

嘉庆元年（1796）年仅十岁的耆英奉恩诏荫六品官。嘉庆十一年（1806）二十岁的耆英被授为宗人府额外主事。后历任山海关监督、崇文门监督、太仆寺少卿、副都统、都统、内务府大臣、宗室总族长、经筵讲官、国史馆清文总校官，兵部、工部、户部侍郎、步军统领，理藩院、礼部、吏部、户部、工部尚书，盛京将军、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曾授十五善射、紫禁城内骑马、赏戴双眼花翎、紫禁城内乘坐肩舆。是道光朝“历五部之权衡，掌九门之管钥”的重臣。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进犯江宁（今南京）。耆英于二十二年（1842）出任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受全权赴江苏与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根据清廷密旨被迫接受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是年任两江总督、兼管苏、浙、闽善后通商事宜。二十三年（1843）与英国在香港签订《五口通商章程》，继而签订《虎门条约》。二十四年（1844）调任两广总督，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二十八年（1848）离粤回京，任文渊阁大学士。

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即位，耆英失宠，九个月后，被贬任五品员外郎。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奉旨赴天津交涉。由于英人曾在攻入广州城内获得耆英辱骂英人和如何对付洋人办法的奏折，对耆英怀恨在心，惧怕耆英为谈判设置障碍而达不到侵略目的。英公使额尔金、法公使葛罗为达到与毫无外交经验的桂良、花沙纳会谈的目的，而拒绝会见耆英。耆英恐在天津久留，使“抚局决裂”，随奏清皇上“面陈机宜”。未等咸丰帝同意，便立即起程回京。咸丰帝以其“不候朕旨”、“擅自回京”为由，“传旨令伊自尽”。是年七十二岁。耆英死后，葬于良乡县西的庄户，今属于房山区青龙湖镇西庄户村。

耆英墓俗称耆大人墓，位于青龙湖镇西庄户村东的松林坡正东脚下，墓址坐西朝东，呈“人”字形向外展开排列，中央坐落着三个宝顶，正中最为高大，为耆英墓冢，北侧宝顶葬其长子马兰总兵兼管内务府大臣庆锡，南侧宝顶葬其次子通政司参议庆贤。宝顶以三合土层层盘踩，夯实而成。

庆锡、庆贤宝顶以下为土坟。排在庆锡脚下的乃庆锡之子四品衔副理官德竣及德宝、德深、德涵。庆锡共有九子，另有德昌、德崇、德基、德厚、德全五子葬于它处。庆贤共三子，均葬于脚下，分别是监察御史、鸿胪寺少卿德本、笔帖式德弼、凤翔总兵德祐。

墓地正南另有“小坟地”一区，葬耆英家族小妾及夭折子孙。

耆英墓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远眺西北，大房山蜿蜒曲折，峥嵘峻拔，气势磅礴。俯视东南，则一马平川，沃野无边。连绵起伏的丘陵自西、北、东北将墓地环绕，松柏盈坡，翠影连天。墓前有柳叶河自西北流向东南，花岗岩石桥跨水而踞，尽显出墓地的庄严。正所谓“半环青山钟佳气，一条玉带揽乾坤”。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耆英墓多次被盗，民国十九年（1930）最后一次惨遭盗掘。“文革”期间的1968年，村民将墓地的三座宝顶七座土坟全部平毁，至使耆英墓荡然无存，松林如画的松林坡更成为历史的记忆，如今当人们置身松林坡，看到的只是满眼荒坡，不见一棵松树。惟有柳叶河不见了溪流和波影去，花岗岩石桥静静地躺在那里，“耆宅莹地”的青石界向人们诉说耆英墓的苍桑。

耆宅可征 守土有人

耆英故宅，在耆英墓东南两华里，即花岗岩石桥以南的柳叶河西岸，今属

阎村镇小马村西。当年，耆英择良乡县西经营庄产，名曰庄户，即今西庄户村。而筑宅其东，以为乡下别墅，号称耆宅。

耆宅坐南朝北，分前院、中院和后花园三部分。前院正房七间，中为过厅。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五间，中为大门，设有报事房。

进大门，步入正房过厅，进入中院，中间有南北甬路一条，高出地面尺余，方砖铺墁，直达中院南面正房，正房七间抱厦，为耆英起居会客之所。内设会客厅、书房、暖阁。室内金砖墁地，上罩桐油，有地炕。地炉及火道设在抱厦房屋后两侧。冬温夏凉，不落灰尘。中院房前、转角、四周以游廊贯通，即使风雨天，也畅行无阻。耆英在道光年间深得皇帝恩宠，荣及一时。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即位，耆英的政治命运出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仅仅九个月后，便由一品大员的幸辅贬为五品员外郎，政治失意的耆英，为避政局，离开是非之地的京城，来到良乡庄园的耆宅，居家不出，过起隐居生活。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耆英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临危受命，奉旨赴天津与英公使额尔金、法公使葛罗为达交涉未果，由于宫廷内斗，悬绵而终。葬在庄户村东的松林坡。家人将其影像供奉在他生活居住过的抱厦房内。影像按真人大小，由精木雕制而成，穿戴真衣、真帽，脚踏机关操纵，能立能坐，奇巧绝伦。

穿过抱厦房，就是后花园。园内种有各贵花木。花园西南角有“望青楼”一座，二层小楼，上下均为三间，登上望青楼，远山近景，墓地宝城尽收眼底。

耆宅尚有东跨院一区。院内有下人住房、待客房、农具房、碾房、磨房及牲畜栏。院外东侧有水井和供牲畜饮水的大石水槽。

耆宅四周由高墙所围，筑墙时，墙体内用木栅作支撑，外砌青砖，异常坚固。

随着耆英的政治跌宕和满清王朝的没落，耆英子孙每旷愈下，以至后来结束了“黄带子”的权势地位，耆宅竟成了他们最终的避难所。

耆英有二子，长子庆锡，次子庆贤。

庆锡，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二十四，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由廪生补主事用，历任主事、副理事官、内阁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道光二十八年（1848），乃父耆英入阁拜相，庆锡的政治生涯也到达了巅峰，是年十二月受马兰总兵，兼管内务府大臣，成为正一品大员。咸丰元年（1851），耆英被贬，三年以后的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庆锡即遭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庆锡在流放地过了二十年的苦役生活，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才所转机，奉旨从流放地返回京城，照原奉降二级，用三品衔。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二六日去世，

享年八十三岁。

庆贤，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二十四日，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赏三等侍卫，二十一年（1841）二等侍卫班领，二十九年（1849）七月侍卫著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咸丰三年（1853）二月授通政司参议。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庆锡即遭革职，庆贤因此受到诛连，交部议处。翌年二月降笔贴式，同年十一月，以理事官补用，同治元年（1862）十月授理事。

耆英共有十二孙。因家道中落，自庆锡以后，耆英家族远离清王朝统治核心，子孙无位高权重。庆锡九子，有功名者仅三人，长子德峻，同治朝笔贴式。二子德昌，同治朝泰陵主事。五子德厚，光绪朝效力笔贴式。三子德崇、四子德基、六子德全、七子德宝、八子德深、九子德涵，均无功名。庆贤三子，虽有功名，但和庆锡诸子一样，在场官上也是位卑职低。长子德本，同治、光绪朝历任员外郎、浙江道监察御史、四川道监察御史、鸿卢寺少卿等职。二子德弼，同治朝效力笔贴式。三子德祐，光绪朝历任笔贴式、刑部候补主事，宣统朝凤翔知府。

耆英曾孙中，德峻长子长宜曾任光绪朝户部主事；德本长子长绍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宣统朝安庆知府。

耆英身后，家族以长子庆锡主持，尚且维持着大家族的生活。光绪十八年（1892），八十三岁的庆锡阖然辞世，这个人口众多、矛盾百出的家族，终于走到了尽头。北京东四北大街钱粮胡同的耆府，原本是一座豪华的相府豪宅，中、东和西三院部局，进深六重，宅邸高深，彩绘和谐，雕花精工，大小数百间。家族中人，一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随着家族的败落，经济收入日陷窘境，家族的分离日迫一日。有的凭借老关系取得了外放知州、知府的职位，有的依仗自己的苦读，考得头榜头名的荣誉，但遵于满不点元的祖制，只能进入翰林院，成为清廷的御用文人。耆英曾孙长绍就是进入了翰林院后，接触朝廷重臣，得到赏识，下放安庆知府的。而大部分居京人丁只能依宗室待遇，按时领取钱粮月米。由于清廷的衰败，这有限的钱粮越来越少。享受贯了的宗室子弟们，过不惯这种日渐清贫的生活，便典当衣物、盗卖家中什物，由此进一步激化了家族矛盾，最终导致了家族的分裂。

耆英孙、庆锡第八子德深和耆英曾孙、德弼第二子长纪叔侄两家人，先于清末脱离大家族，离开北京东四的耆府，来到良乡城西祖坟，在耆英墓旁的耆宅生活。不久，耆英另一个曾孙、德本子长绍，结束了官场生活，也回到了祖茔边的小马村耆宅度日。耆英墓周围有大片的树林和荒地，德深与长纪、长绍

叔侄三家，联合开垦数十亩荒地，伙耕分收，定居了下来。由于不纳租赋，收成足够日常用度，比起城里坐吃山空的族人来，也算小康之家了。

德深嫡室苏勒洪呵之女苏佳氏早亡，续娶良乡黄辛庄汉族女子李氏，育有三子一女，改穆姓，长子穆长荫，二子穆长华，三子穆长瑞。一女穆菊芳。是为耆英在良乡耆宅所添曾孙。耆英曾孙长纪三子寿庸，在小马村耆宅为耆英添了天民、天才、天佑三个六世孙。民国十二年（1923），德深在耆宅中病逝，葬于耆英墓庆锡脚下。战乱连年，兵来匪往，家中衣物用品抢劫一空，连仅有的一头毛驴，也被散兵抢去吃了。当年，普通旗人受到歧视，加之匪徒的抢掠，耆英的后人在小马村耆宅难以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举族迁往德深妻李氏的娘家黄新庄村。后来的岁月，小马村耆宅日渐荒圯，最终荡然无存。

耆英曾孙穆长荫后改名穆江山，又名润生，字大正。1914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小马村耆宅。载字辈。七岁在黄新庄外婆家入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后从族兄翰林学士长绍精修古典文学。三十年代曾在良乡县城的乡村师范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到二十九军从军，任第二十九军佟麟阁副军长的司书，参加了卢沟桥抗战，“七七事变”后化装进城曾任北京聋哑学校高级班教员。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高炎、罗铮夫妇，在他们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曾任地下党报《正报》社的编辑、记者，《新建设日报》主任秘书。在此期间，曾从日本监狱中救助过地下党员，并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区买过药品。解放后，历任中央招待所所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姚依林同志的行政秘书，首都图书馆参考研究部馆员等，1977年离休。1998年4月3日在北京去世。穆长荫有三子：穆和平、穆知平、穆安平，是为耆英五世孙，均生活在北京城内。穆和平有子女穆桐、穆阳，是为耆孙六世孙。

曾孙穆长华，穆长荫二弟。出生于小马村耆宅，曾定居良乡四街，后到北京西单商场任美工，直到退休，现仍健在，生活在北京。穆长华在良乡育有三子一女：穆增、穆长、穆旺、穆珍。在北京另在穆嘉宁、穆庆宁、穆双宁、穆天宁四子女。是为耆英五世孙。

五世孙穆增，出生于良乡，居良乡四街，务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穆增有二子一女：穆劲松、穆红宇、穆红霞，是为耆英六世孙。长子穆劲松，现在房山区西南物流中心本工作。二子穆红宇，现在房山区审计局工作。女穆红霞，现在区国土分局工作。穆劲松有女穆丹，穆红宇有女穆彤，是为耆英七世孙。

五世孙穆长，穆增二弟。出生于良乡，务农，现居良乡西潞园。有子穆红伟，区城管大队工作；女穆红丽女，嫁通州。是为耆英六世孙。穆红伟有子穆樊，是为耆英七世孙。

五世孙穆旺，穆增三弟。出生良乡，务农，现居阎村镇焦庄。有二女，穆红超，嫁平谷；红杰，东阎村。是为耆英六世孙。

曾孙穆长瑞，穆长荫三弟。出生良乡，装甲兵工程学院退休，现居良乡城内文化路。育有一子二女，子穆明，原涿州物探局党委书记，现居涿州；女穆辉，房区工业公司退休；女穆悦，北京中法工作。是为耆英子五世孙。穆明有一子穆小松，生活在天津；一女穆红梅，现居涿州。是为耆英六世孙。

六世孙常天民，庆贤五世孙，寿庸长子。1930年1月2日出生于小马村耆宅。1949年7月毕业于良乡察哈尔省立北岳第三中学师范班。1949年月分配到良乡县二区佃起学区任小学教师。1949年冬天，曾参加土改工作，被推选为良乡县二区人民代表。1950年3月1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应征入伍。历任飞行助教、飞行教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等职。1964年授予大尉军衔。曾获军级通令嘉奖、荣获三等功各一次。现退休，安居北京。常天民有四子，常青、常林、常悦、常江。是为耆英七世孙。

七世孙常林，1965年12月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曾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北京文化热线网络管理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现任北京市文化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耆英祖先与努尔哈赤共同创立了大清王朝，作为爱新觉罗宗亲，耆英家族随着清王朝的兴起风云一时，又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走入历史，以至沦为芸芸众生。在历史的沉重与悲怆中，留给人们的除了反思还有感慨。

史树青与房山

张寿江

史树青，1922年8月生，河北乐亭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1947年任北平历史博物馆干事。新中国建立之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被人们称为是鉴定国宝的“国宝”。著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书画鉴真》、《鉴古一得》等书。

史树青为人随和，生活简朴，学识渊博，善于健谈，在古玩界和文博界很有建树和影响，由于笔者业余喜爱古玩鉴赏和文史书画，所以很敬佩这位先生，但无缘相识。

1987年12月6日，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并出版会刊创刊号《收藏春秋》，我代表燕山收藏协会，把这份民间小报，冒昧给史树青寄去一份，并写信建议以他的名义，号召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收藏家协会，公开出版一份正式的收藏刊物。谁知，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他的一封回信：

张寿江同志：

来信并《收藏春秋》均收到，你们成立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谨表示热烈祝贺。

我们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同志，经常接触文物，根据我们的职业道德，自己不应该收藏文物，更不应该自己收买文物，若有家中旧藏的文物，都应该捐献国家或售给国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明文规定，人人应该遵守。因此，收藏联谊会我们不便参加。

我在精神上特别支持你们的工作。《收藏春秋》希能不断惠寄。专此申谢，并致敬礼！

史树青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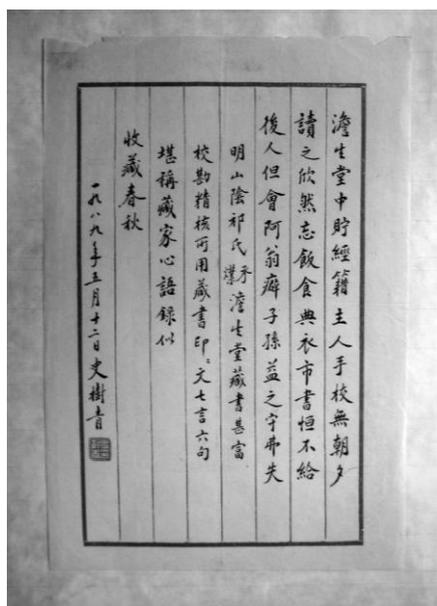
从这封信中，一方面可以看到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他随时随地在注意宣传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但客观的说，另一方面，也看到当

时在他身上多少还受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如何对待民间藏品的去留，好象只有一个渠道。其实这样不利于民间藏品的交流与保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各项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和完善，人们思想上得到解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开始对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加大需求，很多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令人欣喜的是：1993年10月，史树青出任《收藏家》杂志主编，1996年6月12日，出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现在看来，当初我们的请求和提议，我感觉多少还带有一点超前意识。

1988年12月6日，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一周年，协会准备印制一枚纪念封，我又给史树青写信联系，请他为我们书写“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没过几天，他用毛笔写来了精美的小楷文字，并签名钤印。使得这枚纪念封大增其辉。

1989年5月，我又一次给史树青写信，请他为即将出版的第3期《收藏春秋》题词，他不厌其烦，没过几天，他就用毛笔写在一张老信纸上寄来了：

澹生堂上贮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饭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会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明山阴祁氏承（璞）澹生堂藏书甚富，校勘精核所用藏书印，印文七言六句，堪称藏家心语，录似收藏春秋。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史树青。



史树青墨迹

金帝陵墓地处房山境内，史树青很早就对金陵感兴趣，但他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到金陵考察。史树青与房山的一些文友相识以后，1992年10月26日，由陈万清和赵思敬牵线，并由他俩把史树青与夫人夏梅云接到燕山。史树青时年已70岁，但他不顾劳累，在王雨华、王德恒、索俐、宋家骧、孟凡立和我的陪同下，先驱车前往三盆山崇圣院（又称十字寺）。此处两块石碑原被人一直认为是辽碑，经史树青确认：一为元代、一为明代，皆是重刻辽代碑文。接着又到金陵实地考察，在行走山间的路上，他与我们一行人，大谈文博界的一些掌故和趣闻逸事，欢笑不断。由于金陵地面早已没有任何古建筑，此行只能观看到残存的遗址和

地形风貌。我们又带领史树青夫妇前往白水寺勘察，他认为：根据石佛的高度，以及附近发现沟纹砖和琉璃瓦来看，白水寺应该是辽金时期的建筑。他的这一推断与白水寺遭火焚后改石质结构相吻合。10月27日，他又对凤凰亭和燕山公园的石刻“一佛二菩萨”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这一石刻佛像也是辽金时期的遗物，这一观点与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的“隋代石刻”说法不同。

据了解，史树青每到一处，由于出于职业习惯，总是喜爱观赏和鉴定文物，了解一个地方的民间收藏情况，并且很擅长对一般文物的新“发现”，这是他的最大乐趣。记得报纸上曾介绍说：有一次他去外地考察，在人们不注意的文物里，发现了多件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

当天晚上，他又为我鉴定所藏古代书画藏品和文房用品，我请他先观赏了一件翁同龢行书对联：“忆昔北寻小有洞，重闻西方止观经。”因为翁同龢名气大，又是皇帝的老师，所以世上流传他的赝品很多，即使是他的真迹，由于不是同一个时期所书写，字体和风格也不一样，我对自己所藏这幅字也不敢肯定。经他这次鉴定确认这副对联是真迹，我终于放心了。接着，又观看了一件李文田楷书对联：“良辰美景赏心悦目，英辞华章好古博闻。”当他看到上面钤有著名鉴藏家樊君达的一方收藏印时，连连说：“好、好，精品！”他又对我说道：“李文田，广东顺德人，探花。现在广东的收藏人士喜爱购买他的作品，你这件可不能轻易就卖掉啊！”

我又拿出一方明代端砚，砚池上方刻有清晚期著名书画家何维朴题跋砚铭：“梅庵先生勘书之砚”，这个梅庵是谁？清代有几个名人的字号，都叫“梅庵”，其中就有李瑞清，是不是他呢？还须日后待查。两旁又刻：“蕉叶青花烂中央，勘书无譌君擅长。诗孙何维朴题。”背面是明代吴宽小楷题跋砚铭。史树青对这方砚很感兴趣，反复欣赏，他说：这方砚台够入藏博物馆的标准。他又鉴赏一方韩登安刻朱文“吟涛珍藏”寿山石印章。我向他请教，这方印章左侧有“登厂”边款，但另一面为何又有“石樵”落款？他解释说：“这是雕刻印钮作者的字号。”

接着，我又让他观赏一件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作水墨山水扇面，他见到这件画作很感亲切，一边观看一边辨识上面的所题文字：“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用元人笔写梦窗词意，以似述贤二兄正（之），元伯启功”。下钤白文“启”、朱文“元伯”印。他见引首印章钤白文“癸未”印。就说这个癸未，即公元1943年。启功当时31岁。

那天，史树青来到燕山，十分高兴，观看完我的藏品，应我之邀，兴致勃勃地为我书写了“常夏斋”匾额，落款写道：“寿江同志藏扇多精品，承为鉴

定，欢喜赞叹无量。壬申秋月史树青题。”其实我心里明白，这词句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接着，他又为赵思敬题写了《历代名人咏房山》书名，又为索俐题写了《山溪》书名，当他听说站在一旁的孟凡立平时喜爱画山水时，立刻给他题写了“大好河山之居”的匾额，真是出手不凡，情趣盎然。

关于史树青及夫人这次到燕山之行，在1992年11月3日出版的《燕山油化报》上，刊登了由索俐采写的新闻报道《国宝鉴定专家史树青来燕山勘访》。

再说另外一件事，赵思敬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读书写字，刻苦研习二王、颜柳欧赵诸多字体，书法很见功力。随着年龄和眼界的成长，他很喜爱史树青的人品和书法作品，于是，就给史树青写了一封求字信，史树青接到信后，欣然命笔，给赵思敬书写了两首自作诗条幅，其中一首：

小房竹屋傍楣南，仿佛曾从画里看。

蔬菜大棚市未散，停车容我小流连。

史树青和赵思敬相识以后，见面交谈，如同师友，当畅谈到关于房山的历史古迹、人文方志时，史树青说起早年购买的民国期间出版的《房山游记汇编》和《上方山志》，二人情谊相投，成为“忘年交”，最后他把这两本珍稀书籍，赠送给了赵思敬。我在《房山文史资料》第十六辑撰写的《溥儒与上方山志》一文，有关资料就是赵思敬提供给我的。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说，1999年的上半年，有一天，杨亦武给我打来电话，谈话中说起他将要出版一本关于研究房山的著作，因为这是一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他想请一位在考古界和文博界有影响的老先生题写一个书名。我建议他就请史树青题写，可他为难地说：史先生那么大的名气，我又与他不认识，他能给我题吗？根据我的经验，我对他说：史先生平易近人，有求必应，你先给他写一封信，把你本人和著书的情况介绍一下，可以试一试？后来杨亦武给史树青写了一封信，没过几天，史树青就给杨亦武题写了《房山历史文物研究》书名。不难看出，这是老一辈著名文物大家对青年文物工作者，刻苦钻研、著书立说的大力支持。同时，他还写来了一封书信，称“杨亦武师兄”。这一非同寻常的称呼，是对杨亦武研究成果的奖励和肯定。1999年11月，这部书由史树青题写书名、由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7年11月7日，一代文博界鉴赏大家史树青去世了，终年85岁。燕房两地，喜爱文史的人，特别是与史树青有过交往的人，无不感谢和怀念这位老先生。我感觉：一个人如果喜欢某一个事业，一生中能与这个事业领域中的一代大家，有过交往并得到他的教益，这是最幸运和最快乐的事情。

黄埔将才苏济吾

白全永

黄埔军校是一所中外闻名的军事院校，它诞生于中国的大革命时期。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了这所新型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说：“要用这五百人作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功告成，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民便不至灭亡。”

黄埔军校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国共两党都派出了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并吸取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建立起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制度。军校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奉行军事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严格进行军事训练，建立铁的纪律，形成了自己“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校风。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情况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组成的革命军为扫除封建势力、打败反动军阀和日本侵略者，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绩。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这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



《黄埔军校将帅录》封面

黄埔军校正式名称曾几经变化，一般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其创办时校址在广州黄埔岛，因而以“黄埔军校”名扬中外。黄埔军校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黄埔时期，南京时期，成都时期和1949年以后的台湾凤山时期，但后来的“黄埔”与之前的“黄埔”已不可同日而语。军校汇集了国共两党一代精英，培养了大批治国安邦的军政人才。截止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黄埔军校招生总数已达到66期，毕业生达40余万人。据1998年9月广州出版社出

版的《黄埔军校将帅录》（陈予欢编著）数字显示：黄埔军校师生中授予少将军衔以上或在其他领域有杰出业绩的人员就有近 6000 名，可谓人才济济。这其中就有一位房山籍的游子，他就是黄埔将才——苏济吾。

苏济吾，男，1904 年生人，又名名瑞，别号辑五，北京房山人。苏济吾少时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因学习成绩优异后考入北平国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时中国正处于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期，苏济吾毅然的决定弃笔从戎。1921 年他加入了西北军，任著名将领冯玉祥部第十三混成旅学兵连副排长，和第九师三十五团掌旗官。

1931 年苏济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因联系人被捕失去了组织关系。1933 年起苏济吾任第十七路军总部上尉参谋和少校参谋。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筹备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作为黄埔军校的延续。1936 年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苏济吾于 1936 年入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毕业的苏济吾奔赴抗日前线，任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中校参谋处副处长，上校步兵团长和第十七路军少将高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济吾入西北革命大学学习。后任西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秘书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曾撰写有《回忆李兴中将军》和《追念许权中同志》等多篇文史资料，分别被《河北文史资料》和《西安文史资料》收录。

1993 年，苏济吾去世，享年 89 岁。

忆彭老总的一段往事

魏志华

我没有和彭德怀元帅一起工作过，但在 50 多年前曾根据他的指示处理过长沟公社的一个问题，印象很深。

1958 年 9 月，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房山（当时是周口店区）成立了 7 个大公社，包括城关、良乡、琉璃河、长沟、马安、霞云岭、河北公社。我当时在长沟分社党委办公室工作。那时工作很忙，没有节假日，更没有星期天。尤其是办公室的几个人，天天加夜班，只有春节才能休一两天。这一年的腊月三十下午，机关刚要休息，突然接到区委办公室的通知，告知市委领导要到长沟去，公社领导在机关等候。谁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下午 5 点多钟，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和区委副书记张革夫到公社，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说明了情况，我们才知道是给北京参加公社劳动的大学生吃花生“惹”出了事。

1958 年秋季公社化以后，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大学师生要到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体验生活，搞好调查研究。当时到长沟公社来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的学生，共 300 多人。分住在南正、北正、双磨、半壁店等几个村。

北京师范大学带队的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同志。在这期间，学校领导和学生一起住在村里，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晚上与干部、群众进行座谈，住在农民家里，吃农民食堂。他们劳动的都很积极，村里干部、群众对他们也很热情，照顾的也比较好。除了在食堂吃饭外，晚上还给他们煮过几次花生吃。他们 9 月中旬进村，10 月底回校。走的时候村里给几位带队的领导带了点花生。彭老总当时没有在家，春节前从外地回来才发现有花生，问爱人花生是哪来的。浦安修同志说是到长沟公社劳动时村里给的。彭老总听到很不高兴，对浦安修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城里现在吃粮吃油这么紧张，你们为什么在农村大吃大喝，这么浪费，党的领导随便接受下边的礼物，这是什么性质？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是违反党的纪律。这样下去我们党会脱离群众的。并马上找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和刘仁同志，要求对这一问题严肃处理，一定要刹住这种铺张浪费、请客送礼之风。北京市委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同志来处理这个问题，要求公社党委对这一问题要认真检查，正确对待。

公社领导开始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认为是小题大作，只是作了一般检查。后来经过市、区委领导的批评教育，引导帮助，认识才逐步提高，作了深刻的检查。当时公社党委有 5 位书记。书记蔡景超（原房山县委常委、县委财贸部长）、副书记隗合龙、袁德印（原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洪仁（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和柴振江（原县供销社副主任）。他们几个人对这个问题都谈了认识，作了检查。认识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勤俭节约的意识不强，铺张浪费严重。认为成立了公社，“一大二公”，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不仅表现在食堂上，缺乏精打细算，浪费严重。而且在工作上，制定政策上，表现的也比较突出。严重脱离实际。如公社化开始时，公社党委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了，对全体社员实行五包：即包吃饭、包穿、包烧（煤火），包看病、包子女上学。什么都不要钱，一切由公社负担。结果不到半个月把公社医院吃垮。有些重病号由公社介绍到北京大医院看病，出院时医院来人找公社要钱，使工作造成很大被动。二是目光短浅，缺乏全局观点。公社领导只看到这一年长沟公社农业丰收，粮油增产，没注意到城市及全国的情况。大家表示一定要进一步学好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接受教训，把各项工作搞好。同时，通过这件事也更感到彭老总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处处考虑党的工业，想着人民的利益，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艰苦奋斗，大家对他这种精神更加敬佩。

公社党委会议开到夜里快 11 点才结束。办公室根据党委领导的发言，进行研究和整理，连夜写出公社党委的检查报告。到正月初一天亮，我们把公社党委的检查写完，送到区委。就这样，我们过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春节。春节后，公社党委又对下边有关的管理区、大队的领导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们也作了深刻检查。

张玉全脱险二三事

张启华

我的父亲张玉全（1913—1984），是河北镇河东村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因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不公开，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我父亲是村里给八路办事的，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当时的河北镇河东村是进入河套沟的门户，共产党的武装还很弱，人员很少，而且驻扎在河北以内的深山区，山外就是国民党统治区。与河北比邻的燕房地区是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又有地方部队。坨里当时有国民党的一个团和还乡团一个大队驻扎，武器装备优良，经常进山骚扰，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抓捕共产党员。我父亲接受上级的任务后，在当地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发展壮大我们的地下组织。先后发展了河东村的付连生、蒋志才、马良营、郝玉柱、魏天奎、付森、张玉琪等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我父亲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

河东村村南、村北是很险峻的大山，村西和村南是大石河的中上游河段，常年水很大，进入房山北沟的深山区都必须从村前的河滩路通过，是敌人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咽喉要道，也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村子距离敌占区坨里据点只有8公里路程，敌人三天两头向解放区进攻骚扰，残害解放区的干部群众，掠夺财物，一时间附近村庄曾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父亲组织带领民兵曾多次与敌人周旋。

棒子秸垛里巧脱险

1947年农历二月的一天下午，良乡县三区区委副书记吴怀丛带领区武工队四名新战士来我家找父亲，召集村干部付连生、马良营、蒋志才开会。为了安全，派出两名姓王的新战士去村东边金店坡头放哨。规定发现敌情就放枪，以便开会的同志迅速转移。

这两名同志是新参加武工队的，家是辛开口村的，常年靠打渔谋生的穷

苦人。当他们正在河北岸放哨时，发现三福村西的安口山处有十几个穿着灰色军装的还乡团士兵，提着上着刺刀的步枪从安口山下来，正向我村东小桥跑来。过了桥径直爬上了村北面东坡，占领了制高点，控制了河东村去东庄子的桥。两名武工队员见到这情形，撇下渔具向敌人放了两枪，接着急忙往会议地点跑。

会议还没开完，听到枪声立即散了会。付连生、马良营、蒋志才三人身份尚未暴露，都各回各家。父亲急忙催吴怀丛率领几名同志向东庄子转移。此时这两名放哨的战士也跑了回来，与吴副书记他们一起冲往小桥，向东庄子方向撤。刚刚跑到桥边，东坡上的敌人一起向他们五人猛烈地开了火，一时间“啪啪啪”的枪声不断。有的子弹从身边嗖嗖飞过。幸亏跑得快，加上距离比较远，大家才没有受伤。

父亲这时也急忙把会议文件放到了一个小瓷罐里，塞进炕洞里后才往外跑。出了我家院子往西跑到了我老奶奶家，老奶奶见我父亲喘着粗气跑进院子，急忙指着院子西墙边的玉米秸垛子，父亲心领神会，迅速钻了进去。老奶奶走下台阶又把散乱的玉米秸码齐了，看不出疑点了才急忙回到屋里去。

十几分钟后，从东坡下来了一伙儿还乡团士兵，到我家和邻居家挨家挨户地搜找我父亲，其中一个敌人喊：“张班长，到这边这个院子里瞧瞧去吗？”敌班长回答：“看看去！”随后两个敌人冲进了我老奶奶家院子，大声叫道：“你们看到八路军没有？见到张玉全没有？”老奶奶在屋里回答说：“刚才是有八路，你们打枪时，他们早跑过桥了！”

傍晚，老奶奶的大儿子张保成回到家来了，老奶奶问张保成：“咱们村里的‘白箍儿’走干净了吗？”保成说：“不清楚。”老奶奶让保成到街上去看看。保成出了门一直走到了村东头儿，转回来对老奶奶说：“没发现敌人”。老奶奶说：“这帮狗日的可走了，你四哥玉全还在棒子秸垛里藏着呢！”保成叔听后惊讶地喊：“四哥快出来吧，敌人走净了！”父亲从玉米秸垛子里钻出来，把身上打扫干净，走进老奶奶屋里叫了声：“老人家，我这条命可是您给保住的……”。

从老奶奶家出来，父亲回到我家，见到我母亲和全家人都在着急呢。父亲说：“你们别哭了，他们没抓到我。多亏了西院的老婢儿。要是没有老婢儿掩护我，肯定今儿就被敌人抓住了，那肯定必死无疑了！”父亲对着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凝重地又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人家的救命之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亲！”

军民团结保家乡

1947年农历六月初的一天清早，父亲把家里的骡子和小毛驴赶到河滩去吃草。不大会儿，突然听到沙嘴那边儿传来“砰!砰!”两声枪响。父亲忙把牲畜赶回家，不顾一切飞快地往村武装部跑，到了武装部拿起木锤敲钟紧急集合民兵。民兵还未到齐，父亲叫中队长魏天魁带一班七人去村北东崖尖，二班付连启等人立即去村东给地雷挂弦（因夜间下雨把地雷弦都摘了）。

去东崖尖的民兵，刚走到半山坡，抢先占领东崖尖的敌人听到脚步声，喊：“干什么的？口令？”民兵没有回答，立即朝敌人开了一枪，边打枪边向下撤。敌人的机枪向民兵扫射开了，幸亏雾大敌人看不清楚，没伤着人。给地雷挂弦的二班民兵听到机枪声，地雷弦还没完全挂完，剩下的只好把罩地雷的筐子掀到旁边后，也很快往回撤。

父亲听到枪声，焦急地在村口寻找他们，几乎两个班的民兵同时赶来。父亲对魏天魁说：“根据枪声分析，敌人肯定很多。很显然敌人一路从河街口出来上将军坨，一路从牛山往西奔西岭子，一路从小港沟上东崖尖。对我村形成三面包围。你带一班走边山小道，向河北方向撤，我带二班出村从东庄子向西奔河北村，咱们在辛庄大槐树汇合。”此时，敌人的步枪、机枪一齐朝桥射击。因距离较远，雾霾沉沉，撤退的民兵无一伤亡。当到上石碾东边南沟时，父亲让民兵向追来的敌人掷了三颗手榴弹，敌人没敢从西岭子西坡下来。

当时河北村是良乡三区政府所在地。父亲见到区委书记李兴民和区武装部长张凤田，向二位领导做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完汇报后，张凤田指示：“你们村和其他村的民兵都集合起来，到辛庄村西的坳峪山，以防房山的敌人从杏园过来对我们的夹击。”

父亲接受了命令，到了指定地点与魏天魁带领的民兵汇合上了坳峪山，其他村的民兵也陆续到了。当时民兵的武器就是套皮和汉阳造步枪，每个人有三四颗手榴弹，没有枪的挎着五颗手榴弹。有的民兵还提着用雨布拈封的洋桶，守候在山头上。

河北村驻着一个独立营，可巧一连、三连、四连都出发去了鲁家滩，配合北岳军分区独立团攻打门头沟去了，只留下二连。二连听到枪声，连长命令一排抢占河北村北山，二排到石棠寺制高点山头，三排迅速赶到坳峪山配合民兵狙击南山房山来犯之敌。一排刚到达北山头尖上，进入各阵地，就听见东面半山坡上有嘈杂的脚步声和庄稼哗哗啦啦的声音。排长命令战士各就各位。当敌

人离一排阵地前沿只有五六十米时，排长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朝敌群打去。只听到敌人大叫：“山头上有八路军，快撤……”敌人抱头鼠窜狼狈逃回坨里据点。在一排打响之时，坨峪山头的民兵和三排的战士们也把炮竹点燃放在洋铁桶里，咣咣咣、啪啪啪响个不停，与一排的枪声混成一片，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这次战斗后，共消灭敌人 7 人，缴获步枪 7 支，甜瓜“掌手雷” 23 个。极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机智少女巧对敌

1947 年农历十二月初一，父亲起得早，刚要出屋，就听见沙嘴和牛山有枪声。敌人这是趁我解放区民兵随大部队到外线作战之机，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父亲转身回到屋里，把棉大袄穿好，三颗手榴弹插在腰上，快步往外跑，过了桥到东庄子村小学校墙根时，回头一看，有一支穿灰色军装的队伍正从我村（河东村）向东庄子村走来。带队的人个头不高，拎着手枪，手拿一面小红旗。

父亲以为是良乡县大队来了，正要去迎接。这时我村治安员（地下党员）段志奎背着粪筐从东边过来碰到父亲轻声地叫：“快走，这是坨里‘白箍儿’，带队的是小队长冯玉忠。”

父亲听后，立即走进东庄子村贾家胡同，进了吕四家院子。院子有两间旧西房后墙挨着田地，北面有间破旧的棚子。父亲进了西屋，发现大人不在，只有一个十一二岁女孩，问：“你父母呢？”女孩儿回答：“上地里了。”父亲对女孩儿说：“我是河东张家的，遇上‘白箍儿’了，我跑不出去啦。在你家躲一躲。”接着对女孩儿说：“我躺在炕上，把被子连头都盖上，四周压严实。要是白箍儿来了问你，炕上的是谁？你就说是你叔叔，昨天才从门头沟煤窑回来，病得浑身烫着呢，还打哆嗦。刚喝了药发汗呢。”

临近中午时，一个“白箍儿”端着步枪冲进屋里，向屋内用眼扫了一遍。开口问道：“你们这儿来过八路吗？”小女孩儿回答：“我家没有八路。”那个白箍儿接着问：“炕上躺着的是谁呀？”小女孩儿按照父亲教的话，机智地对答如流。那个“白箍儿”只得转身走了。

为了躲避更大的危险，父亲对小女孩儿说：“你们那个小棚子里有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女孩儿说：“里面净是些乱七八糟的筐筐篓篓，还有一个腌菜的

大缸”。父亲把三颗手榴弹别在腰上，快步走进小棚子。蹲到大缸里把棉袄往头上一蒙。将手榴弹弦拉出，要是‘白箍儿’再来，就跟白箍儿同归于尽。

敌人在河东村和东庄子村折腾了多半天儿，闹得鸡犬不宁，小女孩儿一直在院墙外看着。下午4点来钟，敌人才撤退了。小女孩儿走到大缸前，喊了声：“叔叔，我在街上看见他们开走了，过了桥往河东那边去了。快出来吧！”父亲因地冻天寒在缸里腿都蹲麻木了，吃力的站起来跨出了大缸。走出棚子进了西屋。此时小女孩儿父母也回来了，父亲忙拱手作了个大揖，叫了声：“您二老养了个懂事的女儿，今天是她救了我”。这时，女孩儿的母亲端着一碗玉米糝儿粥，递给父亲说：“这次敌人没把你抓住，真是命大呀！吃碗粥吧。”父亲说：“还是您的女儿机智、勇敢、沉着应付敌人才救了我。您二老就让她做我的干闺女吧。”一家三口都表示同意。然后父亲给女孩儿起个名字，叫“贵智”。父亲又说：“只要干爹不牺牲，全国都解放了，穷人过上好日子，再报答救命恩人。我家有儿女六个，他们也不能忘记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女孩儿上学后，嫌贵智像男孩名字，改叫“桂芝”了。几十年过去了，桂芝妹妹与我们兄弟姊妹相处得跟一母同胞一样。

父亲牺牲之后

殷宗泽 口述 李志国 整理

1945年7月，我的家乡解放了，父亲当了基干民兵。1946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在村里搞土改，斗地主，参加了变工大队，配合抗日武装搜集敌情，破坏敌人铁路公路交通和通讯设施，造成敌人交通瘫痪，通讯中断，以便我军关起门来打狗，各个歼灭敌人。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良乡五区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地方武装，全区以基干民兵为主，普通民兵共同参加的一支350人的“破交”队伍。由良乡县武装部副部长晋朝明和区大队长顾宪图指挥，负责破坏哑巴河以南至琉璃河30多华里地段的铁路公路和电话线路的破坏任务，以配合我解放大军对保定、石家庄和清风店等地的战斗。这支“破交”大队神出鬼没，白天回解放区工作和学习，夜晚出发在敌伪区的交通线上。搞的敌人晕头转向，焦头烂额。

1948年9月25日夜晚，良乡“破交”大队去良乡执行“破交”任务，父亲任警卫班班长，他和佛子庄村李曾担任警戒任务。当他们接近铁路时，被东面来的一股敌人发现，向他们开了枪，“破交”大队便立即进行了自卫还击，终因寡不敌众，“破交”大队迅速撤到吴庄村，父亲和李曾中弹身亡。惨无人道的敌人把两个人的人头砍下来悬挂在良乡城南门外示众，后又吊在城内西街的集贸市场一棵大槐树上恫吓群众。“破交队”得知父亲他们被敌人杀害的不幸消息后，个个群情激奋，同仇敌忾。日后，“破交队”在解放区的磁家务村召开了追悼大会，父亲被政府追认为烈士。父亲1919年出生，牺牲时年仅30岁。

父亲牺牲时，当时祖母正半身不遂瘫痪在床，每天吃喝拉撒都要由母亲侍奉，父亲牺牲的消息母亲一直瞒着不敢跟老人说，怕她老人家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发生意外，祖母每当问起父亲怎么还不回来时，母亲总是说：“配合解放军南下了，等全国解放了就回来了。”后来，祖母又问起时，母亲跟她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去了……”直到1953年祖母去世，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就在战场上牺牲了。

父亲牺牲时，姐姐5岁，我3岁，妹妹仅9个多月。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模范烈属”牌匾

如晴天霹雳，母亲吃不下饭，日夜难眠，怕祖母知道消息，只好到村外野地去哭。四个月后，小妹也因病离开了我们，真是雪上加霜啊！面对生活的重担，母亲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没有消沉下去，硬是靠她柔弱的双肩撑起了这个破碎的家。我和姐姐年幼，帮不上母亲的忙。母亲既当爹，又

当娘。无论冬夏，一日三餐，家务农活，忙忙碌碌，从没闲过。我家有3亩山坡地，除春种、秋收农忙季节村里会派些人帮忙外，平时都靠母亲自己忙活。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有困难从不向村里提，她还独出心裁的组织起了有安立芳、杜玉容等人参加的寡妇互助组，你帮我，我帮她，互相帮助，亲如姐妹。这在当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鲜事。后来，政府为了帮我家解决些困难，奖励我家两头小毛驴，母亲农忙时种田，农闲时驮煤脚，卖自产山货。换些针头线脑和全家需用的副食品。赶驴驮煤脚、卖山货要到60多里外的坨里集市，初秋时节，大石河没搭桥之前，要爬8里多山路，过十道河水。为了卖个好价钱，母亲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就要赶着毛驴出发，天一亮赶到早市。

在农村，赶毛驴都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是很少干的。有时毛驴不仅不听使唤，还可能发脾气、撒欢、尥蹶子。母亲确认为：“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一定行。”她愣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很快把两头毛驴训练的服服帖帖。母亲在村里样样都不落后，成绩突出，曾上过当年的报纸，还被房山五区工商联会授予“模范烈属”的光荣牌匾，一直保存至今，成为我家的传家宝。

吴有训先生二三事

强家华

1997年4月26日是我院首任院长（所长）吴有训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那时，我院为筹建核工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吴有训先生的几件事使我感动异常，特写于此，以示缅怀和纪念。

“毕竟我是个中国人”

吴有训先生出生于江西高安，从小发奋读书，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22年，在他25岁时考取了江西省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直接受教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在芝大的赖尔森实验室开始对康普顿效应进行研究，3年后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物理系助教。康普顿效应是现代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使物理学界最终确认了光量子的存在性，对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刚提出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吴有训先生针对反面意见的论据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以确凿的实验结果和精辟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康普顿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康普顿因发现该效应而荣获诺贝尔奖，吴有训先生也因实验证实康普顿效应而成为中外知名的物理学家。康普顿视吴有训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就在他前途似锦的时候，吴有训先生却毅然向康普顿提出了回国，要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献身，并以一句“毕竟我是个中国人”使康普顿教授深受感动，变挽留为送别。

1926年秋，吴有训先生回到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祖国。1928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投身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培养出一大批后来对我国科学与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才，诸如钱三强、王淦昌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

儿子取名叫“惕生”

在吴有训先生的心中，国家的存亡、民族的荣辱是最重要的事情。据吴先

生的孩子吴再生回忆说：“母亲曾说过生惕生哥时，是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晚上，次日清晨母亲满怀喜悦等候父亲到医院探望，却看见父亲满脸的愤懑与忧愁，父亲说：‘昨夜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如果我们不警惕、不反抗就有灭亡的危险，孩子生在这个时候，就叫他惕生吧！’”吴先生的爱国精神可见一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园附近炮火连天，当时学校主要领导不在北平，身为清华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临危不惧、坚守岗位、沉着应变，与其他负责人一起安排在校师生员工疏散，及时转移财产使之免落敌手，为保护国家财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平、天津沦陷后，为了保存我中华科学文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吴先生爱国忘家，辞别刚刚分娩的爱妻和四个幼小的孩子，只身南下，参加临时大学的组建工作。后来，学校迁至昆明，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先生受命于国家危难时刻，出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并兼任清华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直到抗战胜利，为我国理学和教育事业在抗日烽火中的保存和延续作出了历史贡献。我院第四任院长戴传曾以及朱光亚、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即是此时吴先生的学生。

“中国的希望，就看共产党了！”

1945 年 8 月，吴有训先生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他把家人留在昆明，布衣长衫单身一人前往重庆“就任”。他开门见山地宣布：“我来是为母校服务，不是为做官！”并明确提出：“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否则就应该关掉。”吴有训先生以他刚正不阿的人格、清正廉洁的品德，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面对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疯狂镇压的行为，吴先生义愤填膺，他坚定地表示：“只要我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一天。”1946 年初，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为迫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建议，促使政协会议举办成功，在中共重庆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 月 25 日，中大学生发起万人大游行。就在游行前夜，吴先生得知国民党当局可能要对游行学生进行镇压，为了保护学生们安全，吴先生亲自参加游行，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爱国学生。为此，他受到以陈布雷为代表的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责备。吴先生却表示：“这事我应该这样做”，并立即向当局提出辞呈。任中大校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吴先生曾 14 次递交辞呈，成为当时出名的“不愿做校

长”的中大校长。1947年10月，他借出国开会之机离开学校。1948年8月终于辞去了中大校长职务。11月，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吴有训先生悄然返回祖国。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举家从南京迁往上海，受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这期间，吴先生坚决地拒绝了国民党当局对他的封官许愿和赴台“邀请”，打定主意在上海迎接解放。他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介绍科技工作者赴东北解放区工作，还规劝朋友勿去台湾。他对家人说：“‘三民’主义被蒋介石搞成了‘三迷’主义——官迷、财迷、色迷。国民党这么腐败哪能不失败？中国的希望，就看共产党了！”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先生在华东地区工作，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等职。1950年调往北京，担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我院前身）所长，成为我院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年后，他辞去所长职务，专心致力于中科院副院长的工作直至1977年辞世。吴有训先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回忆老县长曹庶民

魏志华

曹庶民同志是 1939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1953 年，他任良乡县县长。1958 年，房山、良乡两个县合并划归北京市成立周口店区后，任周口店区委副书记、区长，后任房山县县长。我于 1961 年从长沟调到房山县人委办公室，与曹庶民同志一起工作了近十年。这期间，曹庶民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对我有很大影响。2010 年，曹庶民同志因病去世，更引起我对他的思念。

性格耿直 不说假话

曹庶民性格耿直，不说大话，不说假话，坚持实事求是，尤其是“文革”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文革”开始后，县里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当作“三反分子”揪出来批斗。当时北京市委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绝大部分被批斗的干部也被迫地、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但曹庶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他总是说：“我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我有错误，但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三反分子。”这样一来，群众组织就认为他态度不老实，顽固不化，对他的批斗就越来越升级。在县级领导干部中，挨批斗次数最多的就是曹庶民。1967 年冬季，在房山电影场批斗他时，有个学生用皮带抽他的脑袋，打的头破血流。不仅如此，对他的爱人高淑英，也以历史问题为由进行批判、打骂、隔离。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除老大已参军外，其他几个都在上初中、小学，他的小女儿才 8 岁，生活无人照管，就是这样，曹庶民也没有屈服。在后来的检查交待时也只是说：“我是被群众组织定为三反分子的曹庶民”。

“文革”当中不少外单位、外地人找曹庶民调查一些老干部的问题，有的人还对他搞“逼、供、信”，但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不管调查什么人的问题，也不管调查人员什么态度，他总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作伪证。正因

为这样，曹庶民被下放到离县城最远、也最穷、最苦的地方——蒲洼公社鱼斗泉村。

经过“文革”，曹庶民不但没有被批倒，威信反而更高了。了解他的人都说曹庶民正直、有骨气，是个硬汉子。1968年，有个山区村以批斗为名，把曹庶民要去，住了几天，一次也没有批斗，生活上照顾的也不错。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的好人，关心我们山区，我们就是叫你在这休息几天，少受点罪。”这让曹庶民很受感动。还有一次，曹庶民被批斗完后，有个群众表面用拳头杵了他一下，实际是往他兜里偷偷塞了个大馒头。

严格要求 不搞特殊

曹庶民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不以权谋私。在当房山县长期间，家里没用过一次机关的汽车。1958年，他带领几个人到山区下乡，都是自己做饭。粮管所给他们准备了大米、白面，曹庶民说这是给群众过年准备的，我们不能用。坚持吃玉米面窝头、碴子粥。他一次去琉璃河下乡，食堂给他们准备了馒头，他发现社员吃淀粉窝头，就叫办公室的同志把馒头给食堂送回去，坚持和群众吃一样的。

1961年困难时期，曹庶民患了肝炎。当时副食非常罕见，崇各庄水库的领导给他送来十多条鲜鱼，他全部给了机关伙房，自己一条也没有留。

1963年机关调整工资，曹庶民的爱人高淑英在县人委办公室工作，按条件她应该调一级。但那次不是普调，根据曹庶民的意见没有给高淑英调，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1980年前后，曹庶民的几个孩子先后毕业，需要安排工作，当时他正在北京市农业局任副局长、市区划办主任，但几个孩子的工作都是按正常手续自己找的工作，没有一个是他利用职权安排的。

1987年曹庶民的爱人因病去世。经人介绍，他与房山的一个女同志再婚，就搬到房山来住，每月回一趟市里。从房山到北京他的家里要换三次车，需要三个多小时，市农业局的领导告诉他有事向机关要车，房山有些同志也主动给他派车，都被他谢绝，每次都是老伴陪他坐公交车回去，在房山住了二十多年，一次车也没有要过。

每年春节，市农业局、房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都到曹庶民同志家里去慰问，征求意见。曹庶民从没有提出过任何个人的问题。病危时，他告诉家人：

“我死后谁都不要通知，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联系群众 不摆官架

曹庶民长期担任县、市局领导职务，工作要求很严，但对一般干部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群众，却非常关心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上世纪 50 年代，他经常和警卫员（当时县里的主要领导都有警卫员）骑自行车下乡，住在农村。衣服脏了就自己洗，就连警卫员的衣服、袜子也一起洗，弄得警卫员很不好意思。

1958 年，曹庶民的警卫员母亲有病，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因回去的时间太长，他不好意思回机关上班，准备辞职，曹庶民知道后带领县医院一名有名气的医生，到他家给他母亲看病，把他几个月没领的工资也给带去。临走时对他讲，“过几天上班去，你母亲的病不好再回来，或者和你父亲轮流照顾你母亲。”这个同志很受感动，以后的工作也更加积极。

曹庶民对待群众也很关心。1958 年他带领几各干部到史家营下乡，晚上几个人用一盆水洗脸、洗脚，最后洗的人看到水太脏，就把水倒了，换了一盆。曹庶民看见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说山区吃水很困难，比吃粮食还重要，我们决不能浪费一点水。从第二天起，大家轮流给老乡背水。

曹庶民在政治上也很关心同志。1957 年“反右”前夕，交道小学校长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些教育上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和意见是正确的，但与当时的形势不相符合。曹庶民知道后，首先了解了这位校长的情况，学校管理得很好，为人正直，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曹庶民便安排人告诉校长今后说话要注意。这个校长理解了领导的意思，说话非常注意，不久“反右”开始，这位校长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没有被划为“右”派。后来，这个校长经常对人说，是曹县长救了我。

特级飞行教练魏建华

魏志华

魏建华，房山城关洪寺村人。1959 年从房山中学入伍。经过部队的培养锻炼，成为特级飞行员、特级飞行教练、飞行大队政委。在 30 多年的飞行事业中，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因教学成绩显著和安全保障工作出色，曾荣立三等功 3 次，二等功 1 次，多次被学院评为教学标兵，被北京军区司令部授予“飞行教学能手”称号。曾出席过空军教学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87 年，魏建华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

解放初期，我空军部队飞行员只从陆军中选拔。从 1956 年开始，为保证飞行员的文化素质，空军飞行队伍建设进行了重大改革，改为从学校中招收。房山县首批招收飞行员是 1956 年 6 月，招收对象是应届中学毕业生。当时县里只有房山中学一所中学，而且只有初中，没有高中。两个毕业班，毕业生近百人。

当时招收飞行员的条件很高，审查得非常严格。不仅身体不能有毛病，在政治方面，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及本人的政治表现，有一点问题也不行。经过体检、政审，县里确定合格的有 14 人。我当时在县招收飞行员办公室，带他们到当时河北省省会保定进行复查。经过空军部队的复查，只有一个人合格。送飞行员走时，学校召开了欢送大会，县里领导也亲自给招收的飞行员送行，并给他带上红花。不过去了两年多，还没有上飞机便因故转业了。

第二批招收飞行员是 1959 年 6 月，招收对象仍是应届毕业生。这一年房山中学应届毕业生有 4 个班，近 200 人。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合格 3 人，其中就包括魏建华。

1959 年 7 月，魏建华带着对飞行梦的追求，首先进入飞行预备学校



魏建华评级证书

学习。在预备学校的6个月里，进行军人基本素质和飞行人员特殊需要的训练，在政治、思想、作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学习训练中，魏建华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1960年初，空军为了把这批学生兵锻炼成合格的军人，把他们安排到陆军全训部队锻炼。这一年是我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生活最艰苦的一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魏建华从单兵教练到合成演习，吃苦耐劳，全身心投入各种训练中，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因表现突出，1960年11月，魏建华光荣的加入了党组织。

1961年3月，魏建华回到空军预备学校。因自然灾害加上国家经济困难，直接影响到空军建设。飞行缺器材、缺汽油，本应进行飞行训练的学员不得不延长学制。因学制延长，不断有些学员被淘汰。有些人因熬不过无限期的延长学制，而找理由退出航校。当时组织上也允许改到其他军事学校学习。不少人为此告别了飞行之路，踏上新的军旅征程。

为实现飞行梦想，魏建华下定决心只要不因本人条件不合格而被淘汰，就决不轻言放弃。凭着“我要飞”的执着精神，他经受住了考验，战胜了各种困难，完成了滑翔和跳伞等训练，在其他训练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在思想上也成熟了许多。

1963年初，魏建华终于进入我军十二飞行学院，开始飞行专业学习。飞行教学是在空中课堂实施的，因此，飞行专业是一种高风险、高噪音、高度紧张和高强度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职业。在这种环境中，就更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魄力，否则就完不成学业和各项任务。

魏建华虽然在空军预备学校进行了学习和训练，但真正上飞机，飞上蓝天，还有很大距离，遇到不少困难。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不适应。因为空军飞行员不同于民航，不仅要超高空、低空飞行、翻跟头、射击，而且要几架飞机互相配合，动作复杂，难度大，状态多变，体力消耗大，不少人开始不适应，头晕、恶心、呕吐、无法完成空中教学任务，如果不能克服就只能被淘汰。

魏建华为了尽快适应情况，每天练长跑，几百次的进行原地旋转和悬梯、滚轮练习，以增加耐力。经过刻苦锻炼，魏建华的平衡能力大大改善，从呕吐到慢慢适应特技动作，最后能圆满完成全套特技动作，并适应了以后的仪表夜航，复杂气象等各种科目的体能需要。

魏建华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时正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空军的汽油和航空器材十分紧缺，当时飞行学院设备十分简陋，只有一套简易练习器，就

是一个“一杆两舵一油门”的练习架。空中教学中所有的技术动作，都要在这个简易练习架上练熟。当时学员们的口号是：“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飞行演习场成为他们业余时间活动的主要场所。在教员指导下，反复模拟表演各种飞行动作，在练习架上体会特技动作的间与量及其要领。地面演练时精力也随之到空中，身临其境一般，实际飞行时才能收到好效果。就这样，魏建华克服了种种困难，突破了各种难题，圆满完成了训练大纲的要求。

飞行是一种高风险职业，特别是特技、夜航和复杂气象等科目，都有风险。要做到既要保证飞行质量，又要保障飞行安全，就必须时刻保持风险意识，每个起落，每个动作，都要切实做好特殊情况处理的准备。因为每一种“特情”的出现，从判断到处理，仅仅需要几秒到十几秒的时间，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甚至机毁人亡。

有一次，魏建华进行复杂气象飞行，在返回机场途中，他穿出云层仅 300 米高度，下面还下雨，座舱前白茫茫一片，仅仅看到前下方一点点地面。此时机上导航设备又出现故障，地面指挥员看不见飞机，也无法实施具体指导。魏建华沉着冷静，按飞行前的预案，凭着对地标的熟悉和冷静的驾驶，利用超低空飞行，终于安全降落。

1966 年 5 月，魏建华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训练所有科目，顺利毕业，成为房山县解放后首名空军飞行员。

魏建华毕业后，组织上准备留他当教员。是否留下来，他也有过思想斗争。当时一起毕业的战友，有的分到战斗部队，空战、立功、提升的机会很多，留下来当教员是一条漫长而辛苦的道路。经过冷静的思考，魏建华认为中小学教师一辈子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当飞行教员同样也是培养保卫国家的人才，只不过教学场地在蓝天。既然党和国家需要就留下来，把飞行教员作为终生职业，做一名合格的空中园丁。

当好飞行教师，必须有与工作相适应的组织和过硬的传授本领。魏建华不断钻研业务，虚心像老同志学习，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把学员的思想、技术、作风带好。他按空军提出的八项素质，对学员严格要求，全面培养。不仅教技术，而且教思想。在地面，他和学员们一遍又一遍的演练，耐心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在空中，他认真做好每一个示范，纠正学员每一个不准确的操纵动作。

编队飞行是航空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技术难度大，机动范围小，可能出现危险的机遇多。这就需要在地面千百次的协同演练，把实际飞行中可能出现的

偏差，在一遍又一遍的演练中加以修正，做到万无一失。在一次编队飞行时，魏建华担任长机，另一名教员带领学员担任僚机。中途他发现僚机动作不正常，偏差较大，他及时用无线电提醒僚机，可僚机偏差越来越大。他当机立断，把长机、僚机的位置互换，以便观察动向，发现僚机以 10° 俯冲角向下冲去，他觉得可能是教员出了问题，学员初学不知如何判断，就立即指挥学员把飞机拉上去，避免了飞机撞山。随后，他引领飞机返回机场。在指挥员的帮助下，学员架机安全落地。事后发现这个教员空中晕厥。由于判断准确，处理及时，挽救了飞机和飞行员的生命。



魏建华荣誉证书

魏建华作为飞行教员，对学员不仅教技术，而且教思想。有一段时间，他发现有一名学员情绪低落，飞行技术上也出现了滑坡。就通过几次和他谈心，找到了原因。原来这名学员家乡的一位同学，也是飞行员，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不幸牺牲。这名学员的父母受些刺激，来信劝儿子放弃学飞行。问题搞清后，魏建华耐心的做思想工作，又先后三次给这个学员的父母写信，向他们介绍一般的飞行常识，告诉他们只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就能保证飞行安全。在魏建华的帮助下，这个学员的父母搞通了思想，来信对学院的领导、对魏教员表示感谢，支持儿子继续学习飞行。这个学员放下了包袱，飞行技术又上去了，被评为全优学员。由于教学质量高，成绩突出，1968年，魏建华被评为空军教学积极分子，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由于航院的飞机不是一种，有初教 6、雅克 11、雅克 18、米格 15 等，大部分是原苏联的飞机，不同的飞机性能又不完全一样，作为教员必须全面熟悉。因此，在教学中，魏建华不断更新知识，改进方法，把心理学用到教学中去，把思想教学与技术教学相结合，在教学中不断突破，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多次被评为“教学尖子”，被北空授予“飞行技术能手”称号，并被评为特级飞行员，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1988年荣立二等功。魏建华的事迹被刊登在空军编写的《教员风采录》中。

1981年，魏建华调到航院政治部当主任，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1986年10月，为了加快干部年轻化建设的步伐，上级组织决定魏建华从团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魏建华服从了这一决定。这时，他已经45岁了，

今后怎么办？是走，还是留？在他的一生中是个重大的转折。这时，他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父母，希望他回到家里，他的同学、战友也希望他早点回北京，“落叶归根”。魏建华也想转业回北京，对父母，对子女的发展，对家庭都有好处。自己年纪大了，要求转业也不过分，只要提出来，组织会考虑的。可他又想，党和人民把自己从一个青年学生培养成一名飞行教员、领导干部，就这样放弃为之奋斗了30年的飞行事业，对得起党和人民吗？经过思想斗争，他作出了庄严的选择。他说：“我追求自己的理想，爱恋这战斗的岗位。”组织上满足了他的愿望，他愉快地回到曾经生活、工作过的飞行一大队，当了一名飞行教员，开始了新的航程。

他回到飞行大队后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放下架子，勤勤恳恳地干”。他在团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十年来，他飞行了3200小时，荣立过3次三等功，1次二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员，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从不摆老资格，不以功自居。他多次对新任团领导说：“我当教员就是教员，不要摆在领导的位置上，交待任务，安排工作要和其他人一样对待。”大队、中队的领导多数是他带出的学员。但魏建华坚决服从他们的领导，支持和配合他们的工作。他拒绝了大队领导的照顾，回到大队后，在他的要求下，大队把带教研组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和过去一样，对工作认真负责，一心扑在教学上，没有耽误过一个飞行日，每天要飞3个多小时。1987年他飞行了364个小时，1988年他飞了358小时，连续两年夺得了全国飞行时间第一名。

魏建华一心扑在飞行事业上，很少考虑自己和家里的事情。1987年他的儿子患病需要手术，他利用休息时间把儿子送到离部队营房50多公里的侯马市医院后就返回部队。他虽然疼爱孩子，但家庭与工作发生矛盾时，他总是以工作为重，心里想的是飞行。

魏建华是全院资格最老的教员，职务到了正团，论军衔已授上校，而他一如既往，保持一个普通军人，普通党员的本色，获得全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大队领导说：“他既是我们的好老师，也是我们的‘棒劳力’”，教员们说：“他乐于助人，工作勤奋，是我们工作上的榜样，学习和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1992年2月，魏建华结束了30年的飞行生涯。同年5月，退休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叶祖孚的文史情怀

张玉泉

不久前，我在整理书柜中发现了叶祖孚先生于1995年2月26日给我的一封信。这是我寄赠给他两本书《京西风物典故》和《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之后他寄来的。信中说：“《房山文史》中登载了裴文中所著《我发现了“北京人”》一文，使我很感兴趣。……周口店的“北京人”是房山人的光荣。解放以前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亲自听裴文中讲发掘“北京人”的经过，那时听讲的有二三十人……裴文中是应邀来的，讲得很生动。解放以后我又见过裴文中几次，那时他是‘九三学社’中央负责人，忙于党派工作，没有再讲发掘经过。”“两年前我应北京出版社之约，为《可爱的北京》撰写一册《名人荟萃》，我把裴文中发掘‘北京人’写了进去，因为我想应该让青少年知道裴文中当初刻苦工作的精神，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内容。”

叶祖孚随信还给我寄来了《名人荟萃》和他新出版的《北京风情杂忆》各一册。拜读后深受启发。该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很值得学习。

叶祖孚，1928年9月生于上海松江县，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曾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等。他长期在北京工作，经常注意观察北京风情，阅览古籍，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并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与之结交友谊。曾在内地报纸刊物以及香港、美国华人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北京的文章。并为《侯宝林自传》和《溥杰自传》执笔。著有《北京杂忆》、《北京风情杂谈》、《北京琉璃厂》、《燕都旧事》等著作。正如中国文学院原院长舒乙先生在给他的《北京风情杂谈》写的序中所说：“他在北京掌故、风土人情、名人轶事方面称得上是个活字典，是个地道的‘市宝’人物。”

我在区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期间，曾多次接触叶祖孚，向他探讨有关文史工作的知识，比如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审等工作。除去参加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每年召集的文史工作会之外，还抽空去拜访请教他，他那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4年初夏的一天，区政协文史委召开撰稿员培训班，我曾邀请叶祖孚来讲课，题目是“怎样写好文史稿？”他讲课的内容很丰富：如史料的来源，如何做到“三亲”（亲历、亲闻、亲见）之外，还要做到‘真、准、详、好’；如文史资料的体例以记叙为主，还要做到叙事、记人、状物三者结合；他还讲了有关人物传记的写作问题等等。叶祖孚的讲课内容不仅深刻而且系统，只可惜当时没有得到他的讲稿。

令人兴奋的是我在以后的一份《北京晚报》上看到叶祖孚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叶祖孚先生谈人物传记问题》。此文章我看了后似乎很熟悉，好像他在房山讲课时讲过。文章说：

我认为撰写人物传记是项重要工作，通过一个人的一生活活动可以反映出历史上某个侧面、某个方面、某个时期的重要情况。北京是六朝古都，又是政治、文化中心，可写的人物甚多。现在北京刊登人物传记的报纸刊物不少，有些是专登影星、歌星或节目主持人的，有些是专登隐私材料的，有些则注重猎奇色彩甚至扭曲了人物的形象。很多该写的无人去写，也无人研究。为此，我主张：

一、全面、系统地研究一下哪些人该立传，哪些人该写传记或写个较长的专题资料。由各单位（党史资料、地方志资料、文史资料等单位）派人分头撰写，不使重复。最好能有个刊物反映一下关于人物传记的进行情况。

二、撰写时间要长一些，进行一些专题研究，不要操之过急。我曾为很多人写过传记，主要为两个大人物（侯宝林、爱新觉罗溥杰）写了传记，每人各用去三年多时间。后者在全国文史资料作品评比会上得了三等奖。我和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成了知心朋友，已记不清出入其家门多少次了。我还遍访他们的亲戚朋友，深入到他们经历过的领域。如写《溥杰自传》，我曾到抚顺、沈阳、铁岭、吉林、长春等地访问当年溥杰的管教人员。《溥杰自传》出版后短时期内全国有近30种刊物转载。今年的7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还有人写文章在评论《溥杰自传》，说：“溥杰这本《自传》由叶祖孚执笔，文章‘白’的好像听溥杰闲谈往事，很难得。”试问，如果不下苦功，怎能让人家把心里话倒出来呢？又如何能掌握我国某个时期、某个方面的重要史料呢？有个有名的女外交家，她让我为她写传记，我用半年多的时间，跑了数十趟，录了37盘磁带，整理了四万多字的材料，在经过她本人同意后，发表了一万七千字的文章。这个已发表的材料，又被人转载了好几次。所以我主张要下苦功为名人写好传记，包括为已故者搜集历史资料。不要操之过急，要把写作过程放的长一些。

叶老离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写了大量老北京的史地民俗资料及人物传记方面的文章。1998年1月初的一天，他突发心脏病倒在写字台前，与世长辞，走完了他70余年的生命历程，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的北京史料。

2003年初夏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北京文史馆召开的文史作者座谈会。会上叶祖孚的爱人周秀英女士发给我们每位与会者一部《叶祖孚文史散文集》，并介绍了该书编辑出版的经过。

接过书我既兴奋又激动，感慨万分。该书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全书分“故人难忘”、“文史札记”、“京华杂谈”、“民俗风物”、“往事撷拾”、“大地漫游”、“激情岁月”等八章，共收153篇文章。当我拜读了这些集毕生精力的文章后，似乎又看到这位笔耕不辍的老人的身影，他除了留给后人的那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外，更多的是一部没有讲完的地方民俗民情的历史。此书的出版实现了他生前大半辈子研究成果整理成册的愿望，这也是他身后对北京民俗文化的一大贡献。

叶老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了，缅怀往事，不胜怅然。

苏适先生的笔墨人生

孙奎春

我与著名书法家苏适先生友好交往近三十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踏入书法界的引路人，也是现在《房山文史资料》封面题字的作者。

苏适，1935年生，1950年就读北京机械学院机械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机械局工作，1984年3月，经市文联、市委宣传部批准调任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次年任秘书长，一直干到1996年光荣退休。

北京书协是在中国书协1981年成立之后，于1983年9月20日在全国各省市率先组建的，由启功任主席、张旭为副主席，这标志着书法工作者第一次正式被列入艺术家的行列。

长期以来，书协专职人员只有两三人，当时的情况是人员少，工作量大，经费不足，困难重重，然而苏适与工作人员同心协力迎着困难上，工作兢兢业业，忍辱负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主动协助兼职主席、副主席协调和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充分调动艺术家及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积极性，推动书法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因此，苏适曾荣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愈古稀的苏适至今依然担任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海外联谊会理事。

苏适自幼喜爱书法，在其父亲苏连茹指导下临帖，由于家中人口多，生活贫寒，没有钱购买笔墨纸砚，他便以方砖为纸，红土泡水当墨，将竹棍一头砸成毛状作笔坚持练字。在北京机械学院读书期间，有40名越南留学生在该校就读，因苏适的毛笔字出众，院长让他给胡志明主席写封信，邀请他来华访问时光临学院视察指导。结果在1953年胡志明果真来到校院，并且点名要见一下给他写信的学生，苏适受到胡志明的接见，胡志明还用流利的汉语夸奖苏适毛笔字写得好。

苏适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书法家魏长青、杜襄学习魏碑、汉碑和赵孟頫、李北海、王羲之诸家，尤其喜爱赵体，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书体结构严谨、端庄秀美、方圆兼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或许是因为苏适的字赏心悦目，为人随和，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润笔费”的缘故，他的行书市招匾额，在京城重点建筑、地铁站名和旅游景点等随处可见，如“金隅大厦”、“腾达大厦”、“天安大厦”、“光大大厦”、“金鼎大厦”等。在北京、济南、安徽、河南、云南、广东、湖南、湖北和香港等地均有他的书法碑刻。同时，他还经常为大报题写报头或头版文章书写标题。2008年10月15日，我将载有我写的缅怀浩然先生文章的《房山文史资料》送给他，并说这本书是区政协办的内部刊物，至今已连续出版25年，而且越办越好。他听了之后感触良多，若有所思地说：“当时书写比较仓促，现在看来字体不够丰满”。于是，欣然命笔重新写了“房山文史资料”六个字，供日后备用。

进入花甲之年以后，苏先生摆脱了繁琐的行政事务，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进行创作，开展艺术交流活动。完全可以说这是苏适笔墨人生的“黄金季节”。他对书法创作的体会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广采博取各家，进行综合比较，取长补短，丰富自己，才能造出独特的风格。”“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必须讲究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可以作为我们创作时追求的目标，也可以作为衡量一幅作品好坏、高低的三把尺子。”他信奉的座右铭是：“老实做人，诚信做事，刻苦磨炼，永攀高峰”。近几年来，苏先生先后随中国书画艺术家考察团赴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印度、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并被北京教授讲学团聘为书法教授，加入了教授协会。他的作品被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所收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苏适谦虚谨慎，力戒浮躁，不图虚名，平淡做人，精书艺进。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出并获奖。书法作品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当代中国名家书画宝鉴》等数十部书法作品集。北京电视台曾三次报道他的书法艺术，2009年9月29日，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专题播出苏适的“笔墨人生”。

中国书协副主席、北京书协主席林岫在2006年7月为《苏适书法集》所作序言中指出：“苏适不追时风，不鹜虚浮，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出新，孜孜不倦，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成功之处。艺贵自主。或许，正是这种笃实的固志精神，才成就了他书法作品中气象不群的风韵。”苏适的书法作品可谓：“气韵通达，骨舒意适，如行云流水一般让人清心明目。”

新中国大众文学的奠基人苗培时

刘泽林

苗培时，著名大众文学作家。曾用名苗振坤，别名大古，笔名草田、田禾、任青、曹兰、有光。生于1918年农历二月。北京市房山区坨里镇人。在房山长育学校读高小；在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就读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肄业于北平私立中法文学院。任党领导下的革命刊物《草原杂志》月刊社的发行人。写过多篇自由体的短诗、长诗、报告诗、歌谣和短文、论文等作品。

“七七”事变后，他和一批平津进步青年，在南京成立了“平津救亡同学会”。1938年7月，他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赴延安，途经西安时，林伯渠安排他到位于陕西枸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后被保送到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由于他能写唱词等大众文艺作品，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并派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专职大众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从此苗培时走上了大众文学之路。当时，因他创作和表演的京东大鼓在边区十分活跃，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苗大鼓”。后来苗培时还多次以“大古”为笔名发表作品，既是对领袖和那一段火热生活的怀念。

1940年初，苗培时任“全民抗战社”华北战地特派记者，同时兼任李公朴秘书。访问了晋察冀、平西、太行、冀南、鲁西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1943年夏，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协助徐懋庸主编《华北文化》，任副主编。后调华北新华书店任文艺编辑。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特约战地记者、邢台市文教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大众》半月刊杂志主编、《新大众报》副刊版主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各种形式的作品，较有影响的有《走马太行山》、《风雪之夜话五台》、《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女秘书孙文淑》、《过同蒲路遇大雪》等，经重庆“全民通讯社”发出后，不少大后方报纸都相继刊载。这期间，不仅写了大量的小说、故事和报告文学作品，还创作了各种形式的剧本，主要有话剧《祖国青年》、秧歌剧《庆祝太平舞》、快板剧《小两口谈和平》、三幕话剧《开渠》、京剧《李闯王》等。还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

《百名英雄》、《歌谣丛集》、《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等书。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文化管制委员会调查研究组组长、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大众日报》、《工人日报》编辑主任、工人出版社领导成员、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说说唱唱》社执行编委。还曾兼任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北京市文联、中国曲艺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前身）等文艺组织的常务理事、党组成员、中国煤矿文学研究会主任等职。改革开放后，苗培时参与了《农民日报》、《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国通俗文艺》杂志的创建工作。苗培时主编过《新农历》、《新曲艺》丛书、《新戏剧》丛书、《新儿童》文学丛书。出版了《人民英雄颂赞》、《鼓词集》、《红树岭》、《慈禧外传》等几十部作品。

苗培时生在矿区，长于矿区，对煤矿生活十分熟悉，所以在其文学创作中多有取材。1958年，他响应党的关于作家艺术家挂职下厂矿、农村体验生活的号召到了煤炭部，从此更与数百万矿工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了许多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苗培时一生创作丰厚，而煤矿题材作品就达600万字，几乎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中写煤矿行业发表作品最多的人，被煤矿工人誉为煤矿作家。苗培时的文学作品语言通俗，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在内容上以革命斗争、煤矿生活和历史题材为主；从体裁上分，曲艺、剧本、报告文学、小说等均有涉及，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在苗培时65年的创作生涯里，共为人们留下了洋洋2000万字的文学财富。

1999年11月23日，“苗培时从事大众文学创作65周年、煤矿文学50周年座谈会暨《苗培时文选》首发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等单位 and 各界人士70余人到会祝贺，与会者称赞他为“煤矿文学创作的奠基人”、新中国大众文学的奠基人。

除了进行大众文学的创作，苗培时非常热心公益事业，离休后仍为此努力。上世纪90年代后，他参加了中国公关协会的工作，深入到农村、厂矿调查，通过各种努力，扶持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他长期资助家乡圣水峪的5名失学儿童上学；资助从小失去母亲，父丧劳力的一对兄弟长大成人；他到处捐资助学、捐款救灾。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为了给国家省钱，他有病不住院；曾步行百里到房山开会，让家乡人至今感慨不已。1986年，他带头捐款为赵树理立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

苗培时少小离乡，但对故里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上世纪90年代初，房山区成立“游子联谊会”，苗培时以70多岁的高龄，毅然受任第一副会长之

职，从此更是以家乡发展建设为己任，捐款捐物，献策建言。苗培时一生耿介，淡薄名利；一切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未谋求半点私利。苗培时在70岁时写的自励诗，即是对自己一生的字证：

无端寻梦延水流，眨眼风云白了头。

太行荷戈杀倭寇，中原驰骋血染裘。

国土何惜头颅贵，书生从未觅封侯。

老骥羞说柴骨瘦，昂首长嘶志未酬。

2005年10月28日，苗培时辞世，享年87岁。临终遗言：将毕生所藏图书，回赠房山。

陈英才烈士

王树忠

陈英才烈士，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县王村人，1947年任良乡县四区区委书记时，在窦店镇芦村开会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年仅23岁。

在良乡人民的心目中，陈英才是一个神出鬼没、手持双枪能蹿房越脊的英雄，老人们常常给后生讲关于陈英才的革命故事和传说。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带领全区人民在良乡与敌人战斗数十次，他机智勇敢，遇事非常冷静、大胆、果断。有一次他正在一个庙里吃饭，一个和尚飞快的跑来报告说：“坏了，烙饼队来了（这是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贬称），快进门了，你说怎么办？”陈英才说：“怕什么”，接着用手指着旁边停放的棺材，和尚不知他要干什么，便问这是干什么，陈英才一步跨了进去躺下后说：“你快把棺材给我盖上。”陈英才在里面躺了很久，敌人什么也没发现，垂头丧气的走了。陈英才出来后笑着说：“没想到吧，我在里边把饭都吃完了”。

1947年6月，良乡县四区区委书记陈英才、区长崔永泉等区干部住在芦村，夜间开完会，各村干部离开后，陈英才和区长来到王贵家，拿起一个冷菜团子，刚吃了几口，一百多个敌人突然不声不响，把院子包围得水泄不通。陈英才从窗户往外一看，心里立刻像塞进了一块石头，对区长崔永泉说：“出是出不去了，插翅也难逃。”二人马上作好了战斗准备。“陈英才缴枪吧！”敌人齐声冲陈英才住的北屋喊道。陈英才迅速把文件烧光以后，他们便扒在窗台上沉着应战，瞄准敌人就开枪射击。敌人知道捉活的不可能，乱枪向屋内扫射，并围住他们的院子不断高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陈英才的手枪从窗口对准喊叫声，叭叭两枪，喊声中止了。紧接着敌人疯狂的向屋内射击，陈英才和区长分别守在门口、窗口，只要敌人接近就一发子弹射向他们。敌人不敢靠近，只好躲在远处放枪，枪声渐渐停下来，敌人以为屋内的八路军干部被打死了，就蜂拥来到院内。此时，躲在门后的陈英才看到敌人接近门口并用枪托砸门，就拉开手榴弹导火线快速扔到院内，一声轰响敌人被炸的血肉横飞，活着的连滚带爬退出院内，这时院子变成了烟海和火海，陈英才沉着应战。敌人又

集中火力向屋内射击，区长崔永泉多处受伤光荣牺牲了。陈英才看到朝夕相处的战友倒下了，永远离开了人间，更加怒火燃烧，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敌人，子弹快打光了，他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敌人仍不敢接近房子，他们无奈，只好胆颤心跳的用木梯子从后墙爬上了屋顶，用枪刺刀、大镐和铁锹把房顶挖开了一个洞。陈英才听到拆房声音后又迅速退到墙角，敌人从屋顶洞口向屋子内张望，刚探头，陈英才的手枪，叭！一声射向敌人。只听“哎呀”、“扑通”一名国民党兵从屋顶滚到了院子里。敌人急了，从房顶向屋内又射击，又投手榴弹，半个小时过去了室内没有任何声音。此时敌人认为陈英才已经死了便进院砸门，门被砸开了，陈英才躺在血泊中仍握着手枪。敌人壮着胆子来到他身旁用脚踢他，陈英才在昏迷中隐隐听到声音，并有撞击身体的感觉，他拼尽全力用手扣动枪机，最后一颗子弹又射向一名敌人，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敌人又一阵乱枪声中他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陈英才永远离开了他工作战斗过的良乡人民。敌人狼狈撤走后，芦村保长连夜到良乡县委报告了区长、书记被 100 多敌人包围后经激战壮烈牺牲的经过。芦村人民悄悄安葬了两位烈士。

民主人士周硕臣先生

顾梦红

周硕臣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清末民初，政局动乱，为避战祸和饥馑，周家逃荒到房山县惠南庄。

周硕臣出生于1900年，时值西方列强宰割中国，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时代，悲剧深深印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满怀报国之志的周硕臣开始在乡间任教。那时私塾学馆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而热血青年周硕臣则公开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激励青年学生，教育他们矢志报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傀儡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两年后日本帝国主义越过长城一线，加速了吞并中国的进程，平津受到威胁。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青年学生积极组织南下宣讲团，抗日救国的呼声震撼九州。强烈的爱国热情鼓舞着年青的周硕臣，他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坚定的人生信条，在教学之余，他悉心研读中国历史的兴衰史，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文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西安事变前，周硕臣对蒋介石积极反共，对日寇的侵略不抵抗政策极其愤慨，他奋笔疾书写信给国民政府，要求积极抗日，共御外辱，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然而这封信被蒋介石冷置起来，周硕臣对蒋介石的最后一点幻想终于破灭了，从此，他便把希望寄托到共产党身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房山大地，黎民百姓惨遭蹂躏，周硕臣被乡亲们推举为村长，组织村民抗日自卫。不久，他在共产党员李振东的帮助下，秘密到涞水县“野三坡”找到了共产党。他从山里带回《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一系列宣传品，在房山西南一带进行抗日宣传，为八路军筹粮筹款，带领村民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邓华、宋时伦支队来到平西开展抗日活动。周硕臣以其在村民中的威望和能力积极组织征兵、筹粮等工作，并在自己家中秘密设立了中共的地下交通站。为了以实际行动号召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斗争，周硕臣毅然把三个儿子都送进了抗日队伍。长子周景岩到北平万寿山

作地下交通员，次子周南及霍洪江等人送到房涑涿联合县政府所在地“野三坡”抗日中学。后来，在长子周景岩的一再要求下，他又把这个生活上的唯一帮手也送到县里参加秘密工作，接着又动员内弟参加了革命，并把年仅十三岁的幼子周景橙送到了十渡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平西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张坊十渡一带除了有七团、九团、县大队等大股力量外，每村都有游击小组，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十分活跃。那时周硕臣经常跟着县委副书记赵然活动，战斗情谊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

1940年6月，赵然当选为房良联合县政府的县议会议长，周硕臣当选为副议长，他们的合作就更密切了。一次，日寇风风火火地来到穆家口抢粮食，当时我主力部队正巧不在十渡地区，情况异常紧急。赵然知道情况后，立即组织村里的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转移粮食。突然，敌人的枪声大作，枪一响，村里乱了。看着纷乱的群众和来不及运走的粮食，赵然心情十分焦急。这时，周硕臣果断对赵然说：“这几袋粮食运不走就烧了它。咱们不能叫敌人追着屁股打，应该设计引开敌人主力。你布置民兵边打边撤。我带领运粮的人离开大队，到小路上去单独隐蔽起来，然后设法引诱敌人去追县大队。”赵然心里顿时一亮，立刻布置了后卫。周硕臣领着运粮的人进入了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把粮食暂藏进了一个石洞。赵然带领大队，故意边打边撤，把敌人引走。事后，赵然感慨地说：“我亏了有你这么个参谋长！”

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之后又发动了“强化治安”运动。平西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药品、粮食等物资十分缺乏，周硕臣利用各种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到了食盐、无线电器材、药品等大批急需物资，秘密运往根据地，支援前线抗日斗争。深秋时节，周硕臣见县大队的一百多个战士还穿着单衣，夜里宿营时战士们冻得让人心疼。他知道根据地太困难，难以解决冬装，就主动向赵然请示，由自家承担起给县大队战士做军服的任务。他自己掏钱买棉花布匹，找乡亲邻居连夜赶做，使战士们尽快地穿上了棉衣。

为了扩大平西情报网，晋察冀边区决定在长沟设立一个秘密情报站。周硕臣积极筹办，在长沟开了一个“振兴文具店”，对外卖些书籍、纸张、笔砚等。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报纸，秘密接待同志，传递军事情报，秘密接送过往的抗日干部。不久，上级又决定在周家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在封锁沟外接应进出山的过往同志。为了便于工作，周硕臣在村里办了个小卖部，来掩护工作，传送消息。他多次义正辞严地对家人说：“这是咱家份内的事，咱们宁可掉脑

袋，也要掩护好同志，要是谁把消息漏出去，他就不是咱周家的人！”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这个交通站先后接送过数十个同志，其中多数是向往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党和八路军的重要领导干部。

这年冬天，赵然指示周硕臣的长子到北平西交民巷去接北平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培华。赵然说，张培华同志是边区政府姚依林秘书长的爱人，那里的情况复杂，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在周家的掩护下，张培华顺利地越过封锁线到达根据地。全国解放后，姚依林夫妇对周家父子的感情依然很深，两家还经常来往。

1942年4月，在去根据地的途中，周硕臣不慎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老虎凳的砖增加到三块，但始终没有动摇得了周硕臣的革命意志。他在狱中写诗明志：“忧国忧民志未酬，身陷囹圄更何求；青山处处埋忠骨，并将吾血灌神州！”

周硕臣出狱后，赵然说：“是组织上让你家属卖了家产来营救你们的，你们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今后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一定给你们解决。”周硕臣激动地说：“我周硕臣早就把一家人交给革命了。现在回来了，更要感激党！要说要求，我只求党给我更多的工作，如果我死了，党要把我的孩子们拉扯大，让他们继续跟党干革命！”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温塘召开边区参议大会，周硕臣光荣地当选了边区参议员。会议期间，他见到了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同志，认识了新当选的边区参议长成仿吾。他还看到了根据地广大军民崭新的精神风貌，领会了新的精神，心情异常兴奋，激发了他更大的革命热情。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国民党也很快抢占了平津。原来投靠日军的石窝乡大乡长崔士镰知道周硕臣在当地的威望很高，企图拉拢周硕臣为他们办事，派人传信说要周到房山当县长。周硕臣义正词严地对传信的人说：“你回去对崔士镰说，我周硕臣跟他势不两立，他欠的血债必须偿还！让他死了那份心吧！”

1946年，周硕臣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常驻代表的身份到了张家口，参加边区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当时边区参议会有三个驻会参议，一个是参议长成仿吾，当时是华北联大的校长；一个是董岳，解放后曾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周硕臣是唯一的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周硕臣从1949年到1953年连续当选为房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56年到1958年担任房山县副县长。他勤于政务，作风稳健，

举止儒雅，平易近人；他从不抽烟也不嗜酒，生活非常俭朴，总是布料中式装，青布绑腿，一身农民打扮，异常朴素。他对子女要求也极严，教育子女不要攀比吃穿，多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有一次他的幼子从北京骑自行车到房山给他送棉衣，到了县机关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他就到厨房给找了点剩饭。厨师心疼年轻人，要做点新的，他硬是不肯。他在县里工作时，石窝中学是他抓的试点，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家乡的孩子能就近上学倾注了许多心血。

1959年，他感到年纪大了，提出辞职申请，被彭真同志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作馆员。晚年周硕臣研习书法，他写得最好的一条横幅是：马列主义如日月，主席功德似地天。反映了他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情怀境界。1966年7月12日，他走完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1986年5月，中共房山县委，房山县人民政府为悼念周硕臣逝世20周年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当年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北京市、房山县的有关党政领导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周硕臣墓碑揭幕仪式。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房良联合县县委书记的杨济之等老领导在大会上讲话，以“著名的民主人士，共产党的挚友，房山人民的光荣”的赞誉高度评价周硕臣先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抗美援朝老兵高桐的战争经历

苏宝敦 孟庆祯 张春增

2012年2月7日，在房山良乡隆泽园大酒店小会议室内，建国以前参军，现年86岁，享受离休待遇的退休老工人高桐，在他的家人陪同下，应《北京人》杂志相邀，讲述了他参加抗美援朝的一段战斗经历。高桐1927年8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涿州市向阳乡保安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被抓壮丁进入国民党军队。1949年1月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张家口、太原和大同等地的战斗；1950年10月14日入朝作战，1951年8月负伤回国，1955年转业分配到北京市金隅水泥厂周口店采石场工作。1987年10月25日退休（享受离休待遇）。先后被授予“华北解放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入朝作战纪念章”。2009年，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部门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章”，为三等残废军人。退休后，经常被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请去为战士们讲述朝鲜战争故事。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前夕，高桐从国民党军队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属66军592团特务连机枪班。高桐身材魁梧，打仗勇敢，曾担任副班长。

1950年10月中旬，高桐所在的66军592团奉命调往吉林省中朝边境，属邓华领导的23集团军。部队领导传达指示时，只说是到边疆驻防，没想到，一开拔就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他们入朝作战时，战争形势极为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从朝鲜人民军手中夺回了汉城，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北朝鲜的首都平壤被炸成了平地，还时常派飞机轰炸我国的安东（即现在的丹东），气焰十分嚣张。我国声明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是10月25日，而高桐所在的66军进入朝鲜是10月14日，尚处在保密阶段。因此，他们进入朝鲜时换上了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大盖帽、上衣、裤子全换了。由于战事吃紧，当天夜里，他和战友们一过鸭绿江大桥，就一溜小跑着奔赴前线。为了争取时间，一边跑一边换军装。一口气跑了12华里，进入龟城、泰川、新兴里一带的前线投入了战斗，一边打，一边向南推进。美国飞机不停地盘旋轰炸，志愿军白

天隐蔽起来不露面，所有的战斗都在夜间进行。尽管美国的飞机飞得很低，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导致更加残酷的报复，眼看着它们不停地俯冲拉起，一波一波地扔炸弹，不能打。美国飞机不分昼夜天天轰炸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粮食、衣物、弹药无法运至前线，战士们生活极为艰苦。据高桐讲，他所在的特务连机枪班一共 14 名战士，有两挺机枪，一挺是捷克造的，一挺是波兰造的。打起仗来，一挺机枪能顶一个排的兵力。至于其他战士们使用的武器，全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缴获敌人的七九步枪，三八大盖，每人分配三百发子弹，打完了就完了，迟迟补不上。论武器装备，比美国人相差悬殊，战士们穿着秋天发的单衣单裤胶球鞋，承受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低温，每天饿着肚子，趴在冰天雪地里和敌人作战。休息的时候，六个人盖一条被子。就是这六个人合盖的被子，开战不久还被打坏丢失了。到了夜里，战士们找些稻草裹在身上取暖，如果连稻草都找不到，只好躲在雪地里过夜。不少战士被冻死，不少战士被冻坏了胳膊、腿、手和脚。实在找不到吃的，战士们就把朝鲜老乡们来不及收获的谷穗掐下来，揉搓碎了，吹掉糠皮装进口袋，饿得实在受不住时，抓一点放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进入冬季，连谷穗都没有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

攻打泰川的时候，高桐和战友们越过一条山沟，争先恐后地往上冲。因为仗打得特别激烈，牺牲的战友和敌人的死尸遍地都是，全都被冻僵。当时，他和战友时玉文登着一具具死尸往前跑，爬到一处高台上，时玉文听见炮弹的呼啸声，一把把他推了下去，炮弹落下，时玉文当场牺牲。如果石玉文不先把他推下高台而自己先跑，那么被炸死的就不会是时玉文而是高桐。因此，高桐认为时玉文是为救自己而死。

打下泰川往回走，敌人和志愿军互有进退，分不清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常与敌人不期而遇。这天，为了躲避敌机，高桐半个排的战友在一处树林里藏了一会儿，觉着不安全，躲进了泰川右侧一座小山坡上的山洞里。高桐钻进了路边的一根水泥管里。在水泥管里呆了一会儿，他觉得飞机暂时不会来，便跑回树林里擦枪。枪没擦完，就发现几个美国鬼子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着朝他们走了过来。他连忙把枪装好，冲着美国鬼子开了一枪，枪一响，藏在山洞里的战友们被惊动了，全跑了出来，一下把美国鬼子团团围住。原来，这是一群被打散了的美国兵，一共 8 人。当下，这八个美国兵全给抓了活的，一个都没跑掉。此后不久，两个被打散的美国兵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跑到一块空地上用白绸布摆字儿，想通过这种办法招唤空军来救他们，字儿没摆完，就让高桐和战友们给发现了，围上去按在地上，抓了俘虏。

1951年1月春节前夕，由39军、40军、42军和高桐所在的第66军组成的第23集团军，在邓华司令的率领下，简称“邓集团”，配合韩先楚领导的西线“韩集团”从中线向南突击。打到华川一带，连里已经断粮。这天，他们正准备到附近的村子里找点吃的，上级命令他们迅速开赴乌云山前线参加战斗。一班班长李军说，594团已经打没了，守不住了，让592团赶上去支援。这样，他们就饿着肚子向阵地跑去。进入阵地爬进战壕，架起机关枪朝着山下的敌人射击。打着打着，突然，一颗子弹打进了高桐左腿外侧膝盖下面的部位，鲜血喷涌而出。战友们见高桐挂花了，便给他包扎了一下，让他退回山下阵地的后方。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他刚想站起来往山下走，一个跟头摔倒在雪窝里。腿上负伤走不了，他就趴在雪地上爬。往前爬了一段，手几乎给冻木了。他就从一具尸体上扒下一双手套戴上，继续往前爬。这时候可能是敌人又攻上来了，战友们的机枪又响了，可他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了，继续向前爬。爬一段，就试着劲站起来，咬紧牙关忍着疼痛跑几步，跑不动了重新趴在地上爬。好不容易爬到一处山顶，他把手套摘下来，扯着山上的灌木丛，坐在雪地上一点一点地往下溜。溜到山下，遇上三位抬担架的同事，他们把高桐搀扶到一个低洼处，给他一片药让他吞下，用剪刀豁开他的裤子，给他的伤口绑上绷带，把他抬到一位朝鲜老大妈家里让他休息。老大妈连着问他几句：“撒以里骚？！撒以里骚？！”高桐听了朝鲜老大妈的话，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问他有没有米。他摇摇头回答没有。原来，部队领导考虑到他们是出国打仗，需要朝鲜人民的配合，主要是跟美国人作战，组织大家学了一些英语和朝鲜话，简单的英语和朝鲜话都会说。老大妈从屋子的某个角落找出了一点大米，给他煮了一碗粥喝。这说明，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入朝作战，积极拥护全力支持，反映了相互之间的鱼水深情。

高桐喝了粥，体力恢复了一些，拄着棍子继续往前走。一连走了几天，不知走了多远，道路宽敞了，遇上一辆后方开来收容伤员的汽车，连忙举手拦截。汽车停下来，他爬上去。汽车把他和伤员们拉到一处地方，让他们下了车，调头返回。他和伤员战友们拄着棍子继续朝后方走。因为经常遇上敌机轰炸，白天只能找树林或者洼地隐蔽下来，黑夜赶路。即使是离前方远一些可以白天赶路了，仍然不能放松警惕，每隔一段，就安排一位志愿军站在高处，当“枪击哨”监视敌机。一旦有敌机要来，“枪击哨”就会鸣枪示警，枪一响，路上的伤员们赶快躲避，等飞机飞走了，再走出隐蔽处往前走。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伤病员们刚从汽车上下来躲进树林，敌机就过来轰炸，把汽车给打着了，车上

的司机战友们光荣牺牲。还有一次，他躲在一座大桥下边隐蔽。发现不远处有一头牛，为了不让敌机把牛炸死，他想走过去把牛牵到桥下，几架美国飞机轰轰隆隆地飞了过来，可能想炸大桥，盘旋了一阵开始向下俯冲。其中的一架不知是出了故障还是飞行员技术不高，一头栽下来扎进地里，机翼撞到桥上被刮断了，机头扎进地里，驾驶舱吊在半空中，飞行员的脑袋给刮掉了，只剩下身体。高桐和战友们看了以后觉得特别高兴，说你们这帮子美国鬼子开着飞机耀武扬威炸死了我们多少战友，落个机毁人亡的下场罪有应得。

高桐和伤病员战友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个叫山堂的地方，总算遇上了接待伤病员的单位，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大米饭、一盒罐头，从这以后，每天总算能吃上一顿饭了。吃了饭，接着往后方走。到了一处火车站，上了火车，发现车上有护士、医生专门为伤病员服务。车上有许多伤员，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断了腿，还有的被炸瞎了眼睛。医护人员把高桐的伤口处理了一下，换了药，重新包扎好，让他好好休息。

闲着没事儿，高桐和战友们下了火车，到站台上转游。发现到处都是箱子，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码着。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觉得好奇，打开箱子一看，一方一方的全是猪肉，每块有一斤左右，全是熟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一问才知道，志愿军战士们在前方饿着肚子爬冰卧雪，党中央非常清楚，准备了许多衣服和吃的，只是由于敌机不停地轰炸，运输线被切断了，东西运不上去。此后，高桐和伤员们被送回国内，来到吉林通化，到了火车站，没等他们下火车，担架队就赶到车站来接。到了通化医院，护士们推着小车把他们送去洗澡、换衣服。可能是回到国内身体彻底放松了，洗完澡换了衣服不久，他就发起了高烧昏迷不醒，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来，已经坐火车到了黑龙江省一个叫昂昂西的火车站，出了昂昂溪火车站，住进了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在这所医院住了几天，被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接到了北京通州潞河医院，在医院开刀手术，取出了腿上的子弹。当时，给他作手术的是一位日本医生，名叫央刀（音）。央刀医生告诉他，子弹钻进他膝盖子下边的部位，把他的大筋给打断了，并没伤着骨头。不然，他的腿很可能再也直不起来了。

1987年，高桐退休了，享受着国家离休待遇，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市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傅宝良

李志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我在周口村供销社工作，与市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傅宝良，门对门，同饮他家的一井水。同时因工作的关系，与傅宝良相处得非常和谐，有着浓厚的感情。我由衷地敬佩他，对供销社工作的支持，更钦佩他舍小家，顾集体，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发展农业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

帮助乡亲多打粮

1948年10月，周口村解放了。不久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但也有极少数人，因受了反动派的恶意宣传，害怕地主反攻倒算，把刚分的土地卖掉。也有的人不敢加大投入，精耕细作，当时平均亩产玉米仅有百余斤。这些现象，被傅宝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反复思考：“好不容易盼到翻身解放，没有土地的人家分了土地，如不重视，有的人家还可能受穷，亦会影响农村新生政权的稳定。”于是他主动找村党支部书记卢翠英商讨，加强对分地农民的引导，加大投入，发挥地力，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傅宝良走东家串西家，讲述自己多年种地的经验和体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人哄地，地哄人，马虎种地白劳神”、“积肥有千条，看你找不找”……。经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宣传，提高了群众认识，鼓舞和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增加投入，广积肥、多施肥。1950年组织农民建猪圈72个，养猪50头，牛马驴骡50多头。对大牲畜棚圈，勤垫土，常起圈，积肥



图1：傅宝良同志被选为北京市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评为河北省、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

50 多头。对大牲畜棚圈，勤垫土，常起圈，积肥

90多万斤，打蒿草沤绿肥 20 多万斤。平均每亩地施肥 4000 斤。同时，他还研制发明了“三合剂”农药，即五加皮 1 斤、茺蒿 10 斤，石灰 5 斤，兑水 30 斤的比例为一剂。使用时加水 300 斤，一剂可喷洒 50 亩地庄稼。效果好，花钱不多，很受群众欢迎。对粮食增产起到了很好地作用。当年每亩地平均增产了玉米 76 市斤，全村共增产了粮食 50724 斤，进一步鼓舞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1951 年，傅宝良同志被评为农业技术劳模，出席了河北省第一届劳模大会。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的表彰。



图2:傅宝良同志荣获河北省和北京市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部分奖章,上排左 1、2 为 1950 年—1951 年荣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章,右 1 为 1956 年荣获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章。下排左 1、右 1 为 1954 年—1956 年荣获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章。下中为荣获房山县生产劳动模范奖章。中排两枚为 1956 年—1957 年纪念章。

组织互助合作社

1951 年 2 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确定:“继续贯彻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的决定”,这给予傅宝良指明了方向。他又不失时机地以“自愿、互利”的原则,首先组织起有张凤兰、傅义、李淑文、张文志、傅宝良、高淑琴、马淑琴七户农民参加的,周口村第一个互助组。互助组有 35 口人,80 亩土地,因他种地有经验,耕、耩、锄、刨、提耪、下种,扬场、拔簸箕样样精通,大家选举他为互助组组长。互助组成立后,由于采取互助互利,有活一起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难互相帮,合理出工,合理记工,多劳多得,收益归个户,年终兑现找齐等分配办法,初步显示出了互助合作组的好处,粮食连年增产,收益增加。

1954 年 1 月,中央关于“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傅宝良在原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大力宣传,深入发动,大讲成立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大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社会主义是金桥,单干是独木桥”、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以后人们居住的条件会越来越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国家集体富强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经他入情在理的深入宣传讲解,社员纷纷要求入社,跟他一起干。1954 年春组建起周口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胜利社),亦是周

口店地区建立较早的合作社之一。为了发展和巩固农业合作社，傅宝良舍小家，顾大家，带头腾出两间房屋作为合作社的办公室。把自家三头耕牛、两头大母猪和一辆铁轮车，及院子的棚子全部无偿捐给了合作社，他的善举，受到了群众的赞佩。

人民代表为人民

1954年6月20日，市委副书记、市选举委员会主任刘仁为他颁发了代表证书（证号531号）。在北京市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期间，于8月22日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傅宝良见到毛主席后，当晚，他心潮澎湃，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回想起旧社会，我这个与土坷垃打交道的泥腿子，哪有当代表的份呀！反动派只会欺

压百姓，搜刮民财、要捐税、抓民夫、修炮楼，当牛马，受欺压；而新社会，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人了！能跟国家领导人照像，和市政府领导人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哇！他反问自己，该如何去做呢？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两句话：“今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好好工作，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全村百姓，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人民代表要反映民意，他每次去市里开代表会前，都要多方征询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写好提案带到会上。1955年，他和刘桐恩代表共同提出《请政府对京西矿区几个农业合作社的困难户予以救济》的7号提案，得到市委市政府



图4：傅宝良代表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出席证

的高度重视，很快对京西矿区斋堂、清水、金鸡台三个乡，无依无靠、生活困难的孤



图3：1954年6月20日市选举委员会刘仁为傅宝良代表颁发的代表证书

老社员，生活不能维持的，都由政府给予救济。当年第四季度，发给这三个乡生活困难户补助和修房救济费共12660元，还发出了棉被15床和棉衣40套。此外，

这些乡1956年冬还开展副业生产，并输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去做壮工，使困难

户都增加了收入。1956年，他又与刘代表共同提出《改进兽医工作，防治牲畜疾病》的101号提案，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市政府有关部门从1956年6月份起在各区都建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站，专门负责各区的畜牧兽医工作，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这些站的业务领导。同时，农林水利局抓紧编印家畜疫病预防治疗的先进经验和先进饲养管理办法，在全市推广。这对郊区畜牧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久，他领导的胜利合作社与本村东风社合并，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他一直担任合作社社长和大队长职务。工作中积极响应党大办农业生产的号召，坚持农业，“八字宪法”，开展多种经营，注重改善群众生活。为了动员多养猪。他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在养猪上，他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猪要管好，圈干吃饱，强弱分养，热天洗澡，注重卫生，圈勤垫扫，新生小猪，要防压着，繁育仔猪，公母选好。”他对养猪很是精心内行，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每天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不是外出开会，他都要抽空儿到猪场转一圈，哪头猪快要下猪了，哪头猪快要出栏了，他心里都一清二楚。有一年的寒冬晚上，天特别冷，有头母猪要下猪了，他和饲养员一直守护在母猪旁，母猪每生下一头小猪，他就用身穿的大襟棉袄裹好抱回家里放在热炕头上，用棉絮围好，小猪要吃东西，他就让老伴用奶瓶给小猪喂米汤，直到小猪硬朗后才抱回猪场交给饲养员。他的行动感动着每个饲养员，他们的养猪场，猪养的好，出栏快，收益高，仅1959年养猪年存栏5000多头，国庆10周年前夕，一次向国家交售生猪500余头，全年向国家交售生猪2000多头，有力地支援了国家，为偿还外国债务和保障首都节日市场的供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以食为天，为了使农业稳产高产，他带领群众采取“精耕细做”、“合理密植并打井修渠，改造低产田等措施，削平乱石土岗50多座，挖岗填洼土方50多万立方米。打井11眼（其中机井2眼，）修水渠4000多米，改造村西河滩低产田200亩，使粮食亩产逐年提高，到1960年亩产上了纲要达到400斤。为了增加集体收入，从1956年开始，他带领社员在京周公路北建起了300亩果园。组建起一支25人的专业队，投资5000多元，购进新品大桃、苹果、杏、梨和葡萄等树苗。为抢栽果树，组成了50人参加的青年突击队，全村青年，人人报名参加，不提报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挖沟填土，平地培埂，刨坑放苗，浇水施肥，昼夜不停，奋战在果园，直到把果树栽完，无人喊苦叫累，都怕落后寒碜。果园每到春季鲜花盛开的时节，苹果花、梨花等也次第开

放，令不少去周口店龙骨山的中外游客停车驻足，观花赏景，拍照留影。经过精心培育，改良土壤，适时浇水施肥，防止病虫害等科学管理，果树长势良好，几年功夫，结出丰硕果实。1962年，通过不断实践，改良，培育出“三熟”葡萄。（早茬、中茬、晚茬），他们的经验还吸引了十里八村的果园管理人员前来参观学习，对全公社及至全县葡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果品收获后，傅宝良和他的乡亲们，坚持“统筹兼顾”的精神，遇事想全局，全国一盘棋。首先把果品卖给供销社，供应首都市场，让城里的工人老大哥和市民们尝尝鲜。待完成向国家交售果品任务后，剩下的再给社员分。1960年，果品产量达到15万斤，既供应了市民需求，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美化了环境。由于果园管理到位，交售任务年年增加，产量年年提高，收益年年增长。果园队长傅让，还被评为北京市果园技术管理模范，并出席北京市劳模大会，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表彰。为了让更多妇女参加劳动，跳出“三台”（锅台、碾台、磨台），他选派有经验，责任心强的傅秀英为幼儿园园长。没有场地，就因陋就简利用村西大庙进行改造，使村内大部分婴幼儿能入园。幼儿吃饭、学习、就医等一应俱全，使90%以上的婴幼儿母亲能安心生产劳动。他们的幼儿园，曾被京西矿区妇联评为先进典型，园长傅秀英自1957年到1965年一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保育员，连续多年出席北京市劳模大会，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改善群众生活

他常说：“农业生产也和打仗一样，不能光叫群众干，还必须关心群众吃喝暖，群众才有干劲，有奔头。”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他带领社员自力更生，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社员一些生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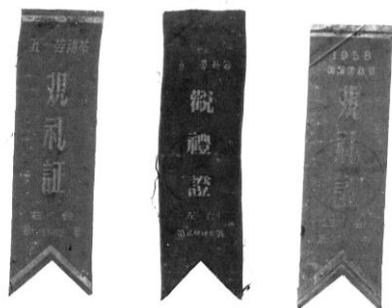


图5：傅宝良劳模应邀出席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天安门观礼台观礼证

首先解决烧煤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勘测，在黑山嘴附近的河滩开挖小煤窑，供群众生活用煤，并抽出5名社员，15头毛驴为社员送煤、运土，使群众安心搞生产。其次用自产的白薯和黄豆做粉条、团粉、豆腐。缺少技术人员，他们从长沟请来师傅，组织起7人的食品加工厂，解决群众一些食品供应问题，博得群众好评。

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办食堂”等活动。期间，他任周口村大队长。他说：“我是人民代表，一手托两家，上对党和政府负责；下对百姓负责，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否则，会失掉民心，一事无成。”他自打互助组开始，一直坚持身不离劳动，每天天不亮起床第一件事先到地里转一圈，把转的情况告诉队干部后才回家吃早饭。他说：“当干部，不能当‘空军司令’，要脚踏实地心中有数，不误庄稼，才能指挥好发生产。”

权利要为民所用

傅宝良，在任职期间，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处处精打细算，十分注意节约集体的每一分钱。他不占集体和社员的一点便宜，外出开会、办事，除市内外，一般都自带干粮，骑自己的自行车。1956年京周公路开通后，公共汽车穿村而过来回跑，有人不解地跟他说：“现在交通方便了，为什么还老骑自行车？”他却说：“坐公共汽车还得掏钱，现在咱家底还薄，用钱地方多，能省一分是一分。”他生活很俭朴，身上有“四件宝”烟袋锅、烟荷包、羊肚手巾、大襟袄。这一生活习惯，一直到他去世，从没变过。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子女。他当代表、干部、劳模10多年，经手招工、招干数十次，他都让社员子女进城了。而有时其他干部提出让他的子女去，却都被他一次次谢绝了。有时他的孩子也想不通，他耐心作孩子的工作。他对儿子说：“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只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不能因为我是代表、是干部就让你去当工人，与社员争好处的事儿我不能做。否则，人家会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说话就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我虽说不是党员，但我要听党的话，当人民的公仆。”孩子慢慢地理解了父亲，安心扎根黄土地，在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

踏遍青山人未老

1960年，傅宝良已过花甲之年，他主动把大队长的职务让给了青年干部魏世忠。但他不是船到码头车靠站，从此安度晚年，而是开辟了新的绿荫战场。他感慨地对新上来的干部们说：“我们住在周口店龙骨山脚下，周口店‘北京人’是中华民族祖先曾经居住栖息的风水宝地，我们有幸享受着山的灵秀之气，

坝河水的滋养，这是我们的福气。古人从前吃绿、穿绿、住绿、生活在这片绿色家园里。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孙，多年来，人们开山挖石烧灰，满山伤疤。冬春季节，风沙弥漫，虽说我们建起了果园，有了片绿色，但这远远不够。我想在有生之年，把西大沟多种些树木，由黄变绿，建起村西风沙屏障，装点锦绣，把土地绘成丹青。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代表活力、代表希望。在咱村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雨季可防洪灾，冬春可以防风沙。使中外游人，到龙骨山去旅游，路过我村清翠秀。树长大成材，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座绿色银行，等我见上帝的时候，我上不愧待祖宗，下不愧待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带着 10 几名社员，赶着一辆牛车，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坚守在造林现场。他首先在村西大沟拉开了战场，摆开了阵势。投资 5000 元，购置了杨树、柳树、洋槐树等树苗。引用上游周口店坝河的水把长达 1500 米，宽 20 米的烂河滩全植上了树，使昔日荒草河滩污水沟，变成了一道绿色靓丽的景观。傅宝良曾经被评为农业技术劳模、模范社干部和劳动模范，并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多次表彰。从 1954 年开始连续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多年劳累，积劳成疾，于 1976 年 1 月 13 日因病逝世，享年 75 岁。

缅怀杨祥麟先生

孙奎春

我与金石书画家杨祥麟先生友好交往数十载，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在老人家与世长辞四年之际，撰写此文缅怀他坎坷而辉煌的艺术人生，或许会对后人有所启迪。

杨先生祖籍浙江绍兴，十几岁随父亲来到北方古镇琉璃河定居，高中毕业后先后当过民校教师，在窦店镇、琉璃河镇、高舍乡、立教乡任扫盲校长。为了集中精力潜心研究书法、绘画和金石篆刻艺术，于1953年辞去工作，兼营一家小刻字社，勉强维持一家一女五子八口人的生活。1981年至1986年，当选原房山县政协一、二届委员。于2008年6月20日逝世，享年86岁。

祥麟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酷爱金石书画，七岁随父学习赵孟頫、董其昌书体，十几岁拜姑父——晚清书法大家、与华世奎齐名的潘龄皋为师，主攻赵体，兼临汉隶、甲骨、小篆等多种名家碑贴。特别是1953年至1980年间，杨先生废寝忘食，刻苦磨炼，遍临古今名帖、碑拓，可以说是他书艺精进的宝贵年华。不仅领悟了先师潘龄皋的艺术真谛，而且推陈出新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书法以潇洒、俊逸的行草见长，动中有静，端庄秀丽、遒劲挺拔，笔墨精湛优美。尤其是他能“左右开弓”，左手书写竟与右手一样精纯，开创了书艺的先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民航专业杂志等媒体，先后介绍了杨先生的艺术人生。

在绘画技艺上，杨先生以清代华喆为主，以宋代文同、明代夏昶、徐渭、清代扬州八怪为宗，风格沉古厚实、笔墨精湛有力，线条质量很高，柔中带刚，飘逸洒丽，极富有线性生命之美。他的工笔画花鸟人物精美异常，他画的嶙峋怪石更是栩栩如生。从老先生的画中可以看到其书法深厚功力的渗透。杨先生精于金石，以秦古玺、古籀、汉印、瓦当、碑碣、甲骨、象形等字图入印，刀法娴熟，章法有序，独具特色，把所谓金石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堪称一绝，为业内人士所称道。他一生共治印500余枚，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美不胜收。其中不乏鸡血石、田黄石等多种名贵篆刻。纵观历史，兼金石书法诸

艺于一身，且融汇贯通者不多，而杨先生却诸艺兼备，并且能掌握其精魂，实属难能可贵。他的作品流传到 20 多个省市，1985 年他的书法、金石篆刻作品，先后被日本、东南亚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团体及个人收藏。

1998 年 10 月，在杨祥麟 76 岁之际，他的《杨祥麟金石书画集》正式出版发行。杨先生手捧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集子激动不已，饱含深情地说：“这本集子是我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缩影，也是我对艺术不息追求的真实写照。”

当我阅读《杨祥麟金石书画集》之后，感到无比喜悦与震撼，随即写了一篇短文，《刻苦磨炼，大器晚成》登在 2000 年 5 月 31 日《中国建材报》上，强调指出：“《杨祥麟金石书画集》的问世，是书画界的一件盛事，是金石书画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也是金石书画爱好者的福音。”“梅花香自苦寒来”，杨祥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最主要的是他淡泊明志，不鹜虚浮，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刻苦磨炼，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才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多次推荐杨先生参加全国书画大赛，并且将邀请函送到他的手上，然而他却不求闻达，专心致志地埋头做学问。直至在国内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他仍然谦虚谨慎，从不张扬。为了勉励自己奋学精进，自命号为“拙夫”，即笨拙之人只有勤奋执着才能有所进步。他常说：“人的一生应该是不断学习进取的一生，要活到老学到老，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追求，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他信奉的格言是“经年勤苦，用力至深，心诚则灵，艺无止境”。同时，还有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因，杨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金石书画的学习与创作，是与老伴翟玉翠女士不遗余力的支持分不开的。每当我带着同事前往杨宅“燕谷斋”观摩欣赏老先生的作品时，老夫人总是热情协助翻阅，并深有感触地说：“在过去最困难的时期，全家七八口人宁可不吃不喝，也要省吃俭用为他购买最喜爱的文房四宝。”更为可贵的是杨祥麟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他为了传承书法艺术，在繁忙的创作之余，安排一定时间帮助本地区十多名青少年系统学习书法知识，而今有的学生已成栋梁之才，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多次在全国书法大赛中获一等奖。如果杨先生得知人才辈出，后继有人的消息后，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